

同人与非同人之间:文学研究会与《小说月报》

刘 忠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小说月报》是在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后逐渐成为同人刊物的,从隶属关系上看,《小说月报》是商务印书馆麾下的一个老牌刊物,自沈雁冰对《小说月报》进行改革始,与文学研究会倡导的“为人生”文学相向而行,才有交集。《小说月报》与文学研究会强强合作的天平先在地倾向商务印书馆一方,并非文学研究会同人,在商务管理者眼里,盈利是必须的,于是,《小说月报》摇摆在同人与非同人之间,兼有同人和商业双重属性。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不是《小说月报》,而是《文学旬刊》。

关键词:文学研究会;《小说月报》;同人;非同人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6.05.001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6)05-0001-08

如果说《新青年》是在办刊过程中确认了同人性性质,那么《小说月报》则是在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后逐渐成为文学研究会的同人刊物,带有心照不宣、朦朦胧胧的色彩。从隶属关系来看,《小说月报》是商务印书馆麾下的一个老牌刊物,背负着十多年“文言”“通俗”历史,前身可以追溯到《绣像小说》,历经王蕴章、恽铁樵两任编辑,在小说和外国文学翻译方面渐有“现代”气象,及至沈雁冰对《小说月报》进行改革,方始与文学研究会倡导的“为人生”文学相向而行,有了交集,进而被学界误认为是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从作者群体和编辑理念上看,两者多有重叠,不仅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叶圣陶)三任主编是文学研究会初创成员,稿源也主要来自文学研究会作家,《小说月报》对平民文学的重视、对北欧弱小民族文学的介绍与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宗旨十分契合。与《新青年》《新潮》《语丝》《新月》等有独立编辑理念、用稿取向的同人刊物不同,《小说月报》主编沈雁冰多次表示,《小说月报》“非同人杂志。它只是出版商的刊物,我任主编也是在演‘独角戏’。稿件去取,只我一人负责”^[1]。也就是说,《小说月报》与文学研究会强强合作的天平先在地倾向于商务印书馆一方,并非是文学研究会同人,只

是在同声相和、同气相求层面上彼此倚重。换言之,《小说月报》部分地充当了文学研究会的同人刊物角色。

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不是《小说月报》,而是《文学旬刊》。该刊创办于文学研究会成立四个月,即1921年5月10日,为《时事新报》副刊之一,先后由郑振铎、谢六逸、叶绍钧、赵景深等人负责编辑,第81期起更名为《文学周刊》;1925年5月9日,第172期起改名《文学周报》,脱离《时事新报》,独立发行;1929年12月10日出至第9卷第5期停刊,前后共出380期,创刊之初即标识为文学研究会会刊。

一、强强联合——文学研究会与《小说月报》

人们常说“无巧不成书”,说书如此,文学亦然,创刊于1910年8月的《小说月报》与文学研究会的遇合充满了偶然。一个希望通过改革,吸收新文学养分,实现新生;一个亟待创办一份杂志,表达对社会现实、人生理想的关切。相互需要与借重成为两者牵手最主要的纽带,时间窗口恰好指向1921年1月,自此,“五四”新文学拥有了第一个展示实绩的纯文学刊物。

《小说月报》第12卷2号上的《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中介绍:“1920年11月间,抱着介绍世界文

收稿日期:2016-09-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同人期刊研究”(10YJA751048)

作者简介:刘忠(1971—),男,河南固始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和繁荣新文学的目的,文学史家郑振铎、翻译家耿济之等人欲在北京发起创办一个文学杂志,想自己编,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但张菊生(商务印书馆经理,即张元济)等不肯,只提议可以改组《小说月报》。郑振铎、耿济之等当然不干,因为要创办的文学杂志与《小说月报》(当时它还是鸳鸯蝴蝶派的阵地)性质完全两样。于是就想先办个文学会,由这个会出版杂志,这样既有稳固的基础,又便于对外接洽。这就有了文学研究会成立的萌芽。”^[2]“报告”透露出三个信息:一、郑振铎、耿济之等新文学作家需要创办一份杂志,传播新观念、新思想;二、商务印书馆为了挽救在新文学冲击下日渐失去的读者市场,主动求新求变,希望《小说月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新文学作家群体。三、双方均指向文学刊物,心思各异,郑振铎、耿济之主张自办刊物,借助商务印书馆这个金字招牌。商务印书馆则提议改组《小说月报》,不肯另外办刊,希望在掌握所有权和经营权的情况下,联合文学研究会同人,将《小说月报》从保守的旧文学、俗文学阵营中解放出来。显而易见,双方意愿看似相近,实则相距甚大。

既然未能说服张元济创办新刊物,退而求其次,先成立一个学会,再另谋刊物不失为一种优选方案。于是,1920年11月29日,郑振铎、耿济之等人借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室召开第一次筹备会,约请沈雁冰与会,讨论组织“文学研究会”的办法,推举郑振铎起草会章,决定暂不出文学杂志,以个人名义为《小说月报》撰稿。同年12月4日,在耿济之家召开第二次筹备会,讨论并通过会章,以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郭绍虞、朱希祖、瞿世英、蒋百里、孙伏园、耿济之、王统照、叶绍钧、许地山12人名义发起。1920年12月30日,在耿济之家召开第三次筹备会,议定1921年1月4日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召开成立大会。会上,推选郑振铎为书记干事,耿济之为会计干事。这就是文学研究会成立的大致经过。^[2]

而在商务印书馆一方,张元济、高梦旦北京之行并未设定具体目标,仅是为《小说月报》改革做一次市场询问,接触新文学作家,寻求稿源支持。合作意向虽没有达成,但并不影响书馆的正常经营。据沈雁冰回忆,“张、高回上海后即选定我改组《小说月报》”^[1]。既然张、高二人与郑振铎、耿济之等人有过接触,说明已经意识并看到新文学未来的发展前景,为什么不接受郑振铎、耿济之们的建议,创办一个新刊物或邀请他们来改组《小说月报》?据郑振铎回忆,“张菊生、高梦旦先生到了北平来,我和济之去找他,预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个文学杂志。

梦旦先生说,还是把《小说月报》改革一下吧。当时便决定由雁冰接办《小说月报》,而由我负责在北京集稿寄去”^[3]。如是,则说明沈雁冰出任主编是商务高层已经确定的,北京之行不过是投石问路的试探行为,张、高二人对已在商务工作四年之久的沈雁冰的工作能力是认可的。这一点为《茅盾全集》“茅盾生平著译年表”所证实,“1920年11月下旬应高梦旦约谈,陈慎侯在座。高梦旦约请茅盾主编和改编《小说月报》及《妇女杂志》,茅盾同意接办《小说月报》,辞却《妇女杂志》编务。此项工作实系张菊生与高梦旦在北京与郑振铎商谈之拟议”^{[4]78}。

作为出任主编的条件,沈雁冰向商务高层提出来三个条件:“一是现存稿子都不能用,二是全部改用五号字(原来的《小说月报》是四号字),三是馆方应当给我全权办事,不能干涉我的编辑方针。”^[1]三个条件针对性极强,第一条表明决心,阻断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联系;第二条改换字体,变相增加信息量,拓展市场;第三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全权办事”既保证了编辑方针、栏目设置、用稿原则的自主性,又以“自我”为中介搭建了一个与文学研究会合作、沟通的平台,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馆内保守势力的干涉。事情至此,对于文学研究会和《小说月报》双方来说,是一个相对双赢的结果。在文学研究会同人助力下,《小说月报》“革新”工作向着既定方向前进;文学研究会同人则在《小说月报》上施展才华,把人的文学、写实的文学进行下去。

在文学研究会与《小说月报》的强强合作中,如果说张元济、高梦旦北京之行、沈雁冰的被邀入会是偶然因素,那么求新求变上的相互契合则是偶然中的必然。《小说月报》部分地承担了文学研究会同人期刊的功能,不仅发布《文学研究会宣言》《文学研究会简章》《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等纲领性文件,还发表文学研究会同人的文章,“为人生的文学”“写实的文学”等观念得到充分阐释与建构,进而成为文坛的主导话语。

翻看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可以发现其主要栏目基本上都由文学研究会成员把持。叶绍钧、冰心、许地山、王统照、徐玉诺、王任叔、庐隐等人是“创作”栏目的常客,据统计,叶绍钧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小说25篇,庐隐26篇,王统照21篇,冰心15篇,这些还不包括他们发表的诗歌、散文、话剧等。“海外文坛信息”“现代文坛杂话”栏目也是如此,1921年1月至1924年4月,沈雁冰撰写“海外文坛信息”的所有稿子;1928年1月至1930年12月,赵景深包办“现代文坛杂话”^{[5]45}的所有文章。可以说,文学

研究会同人当仁不让地成为《小说月报》稿源的主力军,在学衡派、鸳鸯蝴蝶派、创造社等论敌的眼里,《小说月报》是地道的同人刊物,甚至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刊。对于文学研究会和《小说月报》的强强合作,沈雁冰给予过高度评价,“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意味着普遍的全国的文学活动开始到来”^{[6]12}。

二、同中有异——刊物的商业属性与中心话语

置于中国新文学史上看,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可谓适逢其时,此时旧文学已经日薄西山,新文学方兴未艾,《小说月报》在与鸳鸯蝴蝶派的论争中一举确立其中心地位。《文学研究会宣言》中明确规定,社团的一个宗旨为“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三项任务:“联络感情”“增进知识”“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结成一个文学中心的团体”^[7]。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社团强调观念、趣味相近不同,文学研究会俨然是作家的工会组织,新文学的中心语态遮蔽了文学社团的独立性和个体性。“宣言”之外,文学研究会还设置“书记干事、会计干事”之类岗位,在上海、广州、宁波等地创办分会,并订立一些工作计划,发展会员谢婉莹(冰心)、黄庐隐(庐隐)、朱自清、王鲁彦、徐玉诺、夏丐尊、舒庆春(老舍)、胡愈之、谢六逸、刘延陵、刘半农、刘大白、朱湘、许杰、徐志摩、彭家煌等170余人。^[8]这样的组织架构和使命担当远远超出了一个文学社团的职能范围,更像是一个社会组织机构。难怪有学者认为:“文学研究会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社团,尽管成立之初具有典型的、完备的文学社团特性,但它的价值取向,它的行为目标,以及它的发展趋向,与其说是在进行文学社团的营构,毋宁说是在进行整个新文学格局和倾向的设计;文学研究会的创作和理论主要不是通向特色与个性的建树,而是通向新文学时潮和文坛新道德的建构。这是一个从不安心于成为有限社团的文人群体,它的所有活动几乎都在弱化作为一个文学社团的形象,而同时强化自己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工会’据守于文坛中心的姿态。”^[9]这样的定位和运作不仅会淡化社团属性,也会打破同人边界,不断泛化,以致失去自我。

文学研究会的这种中心话语姿态,势必会投射到《小说月报》上,试图通过倡导人道主义、现实主义来实现对新文学话语的主导。作为文学研究会成员和《小说月报》主编,沈雁冰在《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中开篇明义,打出“为人生”旗帜,“文学和人的关系也是可以几

句话直截了当回答的。文学属于人(即作家)的观念,现在已过去了;文学不是作家主观的东西,不是一个人的,不是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反过来,人是属于文学的了。文学的目的是综合地表现人生,不论是用写实的方法,是用象征比喻的方法,其目的总是表现人生,扩大人类的喜悦与同情,有时代的特色做他的背景”^[10]。为人生的文学观不仅是《小说月报》的选稿标准,还波及到对西洋文学作品和理论的译介。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中,沈雁冰补充说:“虽然现在对于‘艺术为艺术呢,艺术为人生呢’的问题尚没有完全解决,然而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艺术我们应是不承认的。”^[11]沈雁冰的双重身份决定了他的这种“为人生”的文学观并不仅限于个人,而是有着极大的扩散效应。瞿世英说,“文学的对象是人生,他的作用是批评人生,表现人生……文学是人生的表现,是人生的批评,那么文学的本质便是人生”^[12]。受文学研究会的中心话语姿态、批评家的有意倡导、主编的选稿取向的影响,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历任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三位主编,始终秉承“为人生”的办刊宗旨。

“为人生”的文学观还渗透到西洋文学的译介上。《小说月报》革新之后,译介西方文学的步伐明显加快,仅1921年就出版两期专号“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和“俄国文学研究”,1924年1月和4月推出“法国文学研究专号”和“拜伦研究专辑”,向国人讲述了俄国、波兰、捷克、芬兰、法国、英国等国的文学概况。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的两年间,介绍的西方作家就有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安德烈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阿尔志跋绥夫、易卜生、安徒生、显克微支、巴尔扎克、法朗士、莫泊桑、罗曼·罗兰、霍普德曼、惠特曼、王尔德、莫里哀、拜伦、叶芝、萧伯纳等,几乎囊括了19到20世纪西方所有的伟大作家。细心察看,可以发现《小说月报》译介西方文学也是有所选择的,尽可能选择那些“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和英法等国的批评现实主义文学,时限上偏重近现代作家。在《小说月报》“通信栏”中,沈雁冰和周作人有过一次对话,两人不约而同地表达从事翻译及介绍西方文学当以近代为主、为急,而以古代为次、为缓观点。于是,在《小说月报》上,我们看到的是撇开浩瀚的古典文学经典,转而投入到近现代文学洪流,并将关切的目光聚集在“被压迫被损害国家文学”上,特别是俄国和北欧文学。周作人说:“俄国近代文学的特色……是社会的、人生的。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却多相同的地方,所以我们相信中国将来的新兴文学。当然

的又自然的也是社会的人生的文学。”^[13]如果说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的文学主张和他们的创作倾向,可以理解为代表文学研究会的主张,那么沈雁冰的编辑理念则标志着文学研究会与《小说月报》“为人生”文学观的统一。

倡导“为人生”文学观的同时,文学研究会和《小说月报》对写实主义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衷,仅沈雁冰一人就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波兰近代文学泰斗显克微支》《西班牙写实文学的代表者伊本纳兹》《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等多篇论文,阐发写实主义的重要性,甚至把现实主义、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混为一谈,试图用“经过近代科学的洗礼的”自然主义来医治中国文学的顽疾。在沈雁冰的大力提倡下,1921年后的《小说月报》大有自然主义一统天下之势。冰心、王统照、许地山、叶绍钧等人小说书写人间苦难,“通信栏”开辟“自然主义”讨论,沈雁冰在回信中强调:“照西洋文学之往迹看来,古典文学之后有浪漫文学,是一个反动;浪漫文学之后有自然主义,也是一个反动。每个反动,把前时代的缺点救济过来,同时向前进一步。”^[14]既然文学潮流的演变是“反动”的、“进化”的,中国文学要追赶世界文学自然就要把西方文学潮流重演一遍,“西洋文学进化途中所已演过的主义,我们也有演过之必要;特是自然主义尤有演过之必要,因为他的时期虽短,他的影响于文艺界全体却非常之大”^[15]。当然,由于新文学初创时期的不成熟和认识局限,“通信栏”讨论结束的时候,沈雁冰对自然主义文学观进行了修正,“我们要自然主义来,并不一定是处处照它;从自然派文学所含的人生观而言,诚或不宜于中国青年人,但我们现在所注意的,并不是人生观的自然主义,而是文学的自然主义。我们要采取的,是自然派技术上的长处”^[16]。从对自然主义的全面移植到选择性吸收,从思想观念的盲从到写作技巧的运用,标志着沈雁冰对现实主义认识的深化,也是《小说月报》在西方文学译介方面的矫枉过正。

在“为人生”文学观和现实主义原则引导下,“问题小说”和“为人生小说”大量出现,中心话语态势愈加明显,以致引发创造社同人的指责,认为文学研究会统治文坛,假社团之名推一己偏见之实,破坏文学生态。为了巩固和论证“为人生”的、“写实主义”文学的中心地位,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用大量篇幅刊发理论文章和译介西方文学;为了吸引市场,增加订阅量,还开辟“通信”专栏,开展“翻译文学书”“语体文欧化”“自然主义”“文学主义”等讨论。如此,留给“创作”的篇幅就少了许多,冰心、庐隐、

叶绍钧、王统照等人的作品多次出现在《小说月报》上,引发读者的不满与批评,指责《小说月报》被一些作家“包办”,甚至来信询问,投稿是否需要有人介绍,或只刊发相识之人的作品^[17]。如此恶性循环,“为人生”的文学成为了一种标签。事实上,任何文学都是为人生的,区别仅在于怎么为,即使是被人们冠以“为艺术而艺术”之名的创造社,他们的文学书写也是人生之一部分。相反,《文学研究会宣言》中“工作”“联络”的说法强化的是一种职业取向,而不是人们习常理解的为人生而文学,至少从宣言、简章中,读出的不是社团个性,而是职业化诉求。

三、平衡与突围——同人与非同人与人之间

革新之后的《小说月报》销量虽然有所改观,但并不乐观,在宣传一段时间“为人生”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之后,《小说月报》面临的阻力开始增大。革新之初“12卷1号印了五千册,马上销完,各处分馆纷纷来电要求下期多发,于是第二期印了七千,到第一卷末期,已印一万”的市场,很快就面临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和高举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的蚕食鲸吞,读者的抱怨、文坛的纷争以及商务高层的不理解一股脑地抛来,令主编沈雁冰猝不及防。

一方面,沈雁冰、周作人、瞿世英、郑振铎极力倡导的“为人生”文学与大多数市民的娱乐文化需要尚有一段距离,“叫好”不“叫座”,引介的西方文学作品及理论更让广大读者望而生畏。“曾有文友谓如今《小说月报》虽不能说高深,然已不是对于西洋文学一无研究者所能看懂;譬如一篇论文,讲到某文学家某文学派,使读者全然不知什么人是某文学家,什么是某文学派,则无论如何愿意之人不能不弃书长叹;而中国现在不知所谓派……以及某某文学之阅《小说月报》者,必在数千之多也。”“据实说,《小说月报》读者一千人中至少有九百人不欲看论文。”^[18]^[27]很显然,读者对《小说月报》上的理论文章和“西洋文学”引介不满,对北欧“被压迫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很陌生。面对读者的不满,沈雁冰采取了一些调整措施,在给周作人的信中,他说:“前天见仲甫(陈独秀)先生,他说可以放得普通(通俗)一些,望道(陈望道)劝我仿《文章俱乐部》办法,多收创作而别以‘读者文艺’一栏收容之。我觉得这两者都是应当的。”^[18]^[31]不过,这种策略与沈雁冰本人和文学研究会持守的精英化写作存在某种天然的不可调和,一旦走通俗化之路,就意味着《小说月报》“革新”失败,重回老路;意味着文学研究会中心话语的失语,同人的消散。所以,在沈雁冰看来,刊物品位与读者兴趣的割裂原因是读者鉴赏能力太低,

需要教育提升,“我以为最大的困难尚不在‘新式白话文’看了不能懂,而在‘新式白话文’的意思看了不能懂。……民众对于艺术鉴赏的能力太低弱……鉴赏能力是要靠教育的力量来提高,不能使艺术本身降低了去适应。”^{[18]82}在一个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下的时代,在一个启蒙话语刚开启就面临夭折的语境中,沈雁冰的这种精英化办刊方向注定是命运多舛,无法落到实处。主办方商务印书馆的市场份额、利润追求不得不考量,自己认同的“为人生”的写实文学又需要坚持,在编者与读者、娱乐与人生之间,沈雁冰能够做的就是平衡,增加与读者互动的栏目,试图通过“读者文艺”“讲演会”“通信”等方式感应市场变化,赢得读者认可。客观上,这些策略起到了维系市场人气的作用,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同时,通俗化也与沈雁冰的启蒙文学观相悖,所以,商务高层更换主编、调整办刊方向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退潮,通俗文学兴起,严重挤压了《小说月报》的读者空间,商务印书馆不得不考虑市场与经济因素。沈雁冰接手《小说月报》之时,正值新文化运动退潮,苦闷彷徨的时代氛围左右着广大青年的心绪,曾经的科学民主、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等话题遇冷,“三年前曾热心社会问题的中国青年,近来对于一切大问题也冷淡了。讨论社会问题的文学杰作如《父与子》等等现在已经不能引起青年的注意;青年的注意力反而集中在肤浅的‘婚姻小说’了”,因此,“姑不论种种社会问题,即使是小小的文艺上的问题,亦没有热烈的讨论与注意了”^[19]。沈雁冰的感慨并非泛泛之辞,而是有着很强的现实性。虽然在革新的旗号下,《小说月报》做出一些应对,试图用“话题论争”的策略激发人气,活跃读者市场,针对一些旧派文人反对新文学语体欧化现象,《小说月报》从12卷7期开始发起“语体文欧化问题”的讨论,欢迎读者以书信的形式参与,所有来信,不论赞成与反对,“当一律在本报通信栏内发表”,令人失望的是,两个月后除了周作人来信之外,仅收到读者两封来信,其中一封还与所讨论的问题“有点不相关”^[20]。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通俗文学出现复兴之势,《礼拜六》《小说世界》销量大增,这一点,郑振铎、成仿吾等人敏锐地注意到了。郑振铎说:“香艳体的小说杂志《礼拜六》,居然以原来面目,大呼‘复活’而出现于现在的上海文学界。黑幕小说在一二年前已经缩头不出的,现在也大肆活动,居然有复活之状态。”^[21]成仿吾在《歧路》中也指出:“像革命时期的满清督抚一般,一时抱头鼠窜,逃得无影无踪了的《礼拜六》自从去年复刊以

来,几个月的功夫,就把他的一些干儿干女,干爹干妈之类的东西,差不多布满了新中国的全天地,到了现在,我们的出版物之中,一天天增加的,几乎尽是这些卑劣寄生虫拿来骗钱的齷齪的杂志。”^[22]抛开“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此一时期,无论是《小说月报》还是《创造季刊》,都面临读者市场萎缩的困局。在指责读者“对于新的作品和好的作品并没有表示十分的欢迎”的同时,郑振铎不得不承认,社会上的普通读者对于消遣的闲书“特别欢迎。所以如《礼拜六》,《星期》,《晶报》之类的闲书,销路都特别的好”^{[23]227}。对此,沈雁冰除了批评与抱怨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也许是商务高层最终决定更换《小说月报》主编的最直接因素,毕竟在商务高层看来,在商言商,文学刊物虽然是文学作品的载体,但盈利是必须的。

另外,从新文学作家的态度来看,《小说月报》也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获得人们的一致认可,批评和质疑之声一直都存在。《小说月报》革新之初,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都给予过高度评价和支持,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胡适认为,《小说月报》发表的作品过滥,水平不高,沈雁冰提倡的“新浪漫主义”不切实际。鲁迅与文学研究会和《小说月报》颇有渊源。据高君箴(郑振铎夫人)回忆,“那时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据说根据当时‘文官法’规定:凡政治官员不能和社团发生关系,因此没有参加。但先生对这个组织(指文学研究会)一直是十分关怀和支持的,他后来常为沈雁冰与郑振铎先后任主编的《小说月报》撰稿,因此有的人便认为鲁迅先生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甚至有的人以为文学研究会宣言是鲁迅起草的”。鲁迅的小说《社戏》《在酒楼上》《端午节》就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第12卷第10号的‘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里,鲁迅推荐作品的同时,一连发表了《近代捷克文学概况》《小俄罗斯文学略说》《战争中的威尔珂》《疯姑娘》等四篇译作。不过,鲁迅也表示过一些担忧,留下“雁冰他们太骛新了”“引进西方文艺思潮,太注意‘最新之书’”“维新得太过”的评价。胡适、鲁迅有“太骛新”之感,遑论一般读者了。

再则,就《小说月报》栏目而言,创作太少、论文和翻译过多的内容配比,也制约了读者订阅。以沈雁冰主编的第12卷为例,“创作”部分全年发表小说45篇,新诗9首,戏剧1篇;同卷论文发表数有60余篇,远在创作之上。创作、论文之外,其余篇幅均为翻译占领。如此悬殊的栏目设置招致读者抱怨“蔑视创作”也就不足为怪了。探究原因,这与沈雁

冰的角色定位和办刊方向有紧密关系,无论是作为《小说月报》主编,还是身为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批评家,沈雁冰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引入新思想,提高国民素质,而不是如何使刊物迎合读者需要,获取市场份额和金钱利益。相反,他和文学研究会同人对当时那些以赚取金钱为目的的通俗文学作家和刊物深恶痛绝。面对读者看不懂新文学作品、不喜欢阅读论文等抱怨,他坚决地站在启蒙主义的立场上,表示“万万不可”改变自己的目标,“专以民众的鉴赏力为标准而降低文学的品格以就之”。在回复读者梁绳纬要求《小说月报》顾及水平线以下的“低能的鉴赏者”的来信时,沈雁冰认为,一般人不懂新文学,问题不在于新文学本身,而在于他们不懂“新思想”,“对于艺术鉴赏的能力太低弱”。而“因为民众的鉴赏力太低弱,而想把艺术降低一些,引他们上来,这好意我极钦佩,但恐效果不能如梁先生所预期。因为鉴赏力之高低和艺术本身,无大关系;和一般教育,却很有关系。鉴赏能力是要靠教育的力量来提高,不能使艺术本身降低了去适应”^[24]。应当说,沈雁冰是一个优秀的文学批评家,而不是一个合格的编辑家,没有通盘考虑编辑、作者、读者、市场和经济等综合因素。正是在后几个要素上,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陷入读者冷落、市场萧条、出版商不满的窘境。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郑振铎接替沈雁冰,出任《小说月报》主编,进入商务印书馆高层视野。在编辑能力方面,1921年5月初,郑振铎担任《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主编,同年5月10日,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他当时虽然不是《小说月报》的编辑,却在拉稿方面出了最大的力”。在人脉关系方面,郑振铎与胡适、周作人、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先驱,与朱希祖、蒋百里等社会贤达都有联系,还是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通过《小说月报》《文学旬刊》广交作家朋友,能够保证《小说月报》的稿源。郑振铎接替沈雁冰之后,《小说月报》在编辑方针上做了微调,采取多登创作、注重发现和培养新人的措施,不仅放缓了“先锋”步伐,对异己之见也给予一定容忍,开展“整理国故”的讨论,译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品等,这些都是在吸取沈雁冰编辑经验的基础上做出的。之后,《小说月报》又经历了叶绍钧主编、徐调孚主编时期,直至1932年1月,尚未来得及发行的第23卷新年号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一同毁于“一·二八”战火而终刊,共出22卷258期。

四、争鸣的阵地——《文学旬刊》创办与发行

1921年1月之后,文学研究会在与《小说月报》

强强联合,倡导为人生的、写实的文学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创办会刊的追求。1921年5月,作为《时事新报》副刊之一的《文学旬刊》正式创刊。按照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初的想法,《文学旬刊》肩负着发表研究会“宣言”“简章”“会务报告”,阐明社团宗旨、推介作家作品的任务,事实上,它大多数时候充当了社团同人“论争”的阵地。综观文学研究会与鸳鸯蝴蝶派的论战、与创造社的论争,活力十足的文章基本上都发表在《文学旬刊》上,有些论争并非《文学旬刊》挑起,但冲锋在前、给对手以致命一击的往往是《文学旬刊》。客观上,论争在起到辨明事理、强化新文学实践之外,也扩大了文学研究会的影响力,提高了刊物的发行量。1922年9月29日闻一多在给梁实秋的信中说:“我们若有创办杂志之胆量,即当亲身赤手空拳打出招牌来。要打出招牌,非挑衅不可。故你的‘批评之批评’非做不可。用意在将国内之文艺批评一笔抹杀而代之以正当之观念与标准。……要想一鸣惊人当挑战,否则包罗各派人物亦足轰动一时。”^[25]不排除论争各方为博取名利而采取剑走偏锋的做法。其实,通过论争而达到短时间引起文坛重视的做法,不独文学研究会心知肚明,《新青年》的“双簧”戏法,创造社的“翻译问题”讨论,都是经典案例,许多社团和报刊都如法炮制。

人们常说不是冤家不聚首,文学研究会与鸳鸯蝴蝶派就是这样的一对冤家。一定意义上,文学研究会的登场就是以鸳鸯蝴蝶派的掘墓人形象示人的,无论是它的成立宣言、简章,还是问题小说、为人生小说,无不指向社会的血泪、人生的爱恨,而不是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娱乐消遣、言情黑幕主题。作为文学研究会同人的大本营,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更是与鸳鸯蝴蝶派不相兼容,“革新”最初针对的就是王蕴章、恽铁樵主编时期的“守旧”,是对他们游走在雅俗两端、最后又不得不倒向通俗的编辑理念的一种反驳。凭借着将小说与“买笑”“觅醉”“顾曲”等日常文化消费行为绑缚在一起的做法,《小说月报》发行量曾辉煌过十年。据统计,在20世纪20年代,一般杂志的发行量都在一两千份,甚至更少,超过一万份的杂志不多,而《小说月报》在1913年印数就到了一万份,之后又不断攀升^[26]¹⁷⁸。但是,自1917年“文学革命”以来,在科学、民主等启蒙思想冲击下,在与《新青年》《新潮》等新文化报刊的论战中,《小说月报》明显落了下风,发行量江河日下,1920年印数滑至最低点两千份。正是在这样一个危机时刻,沈雁冰受命出任主编。沈雁冰接手《小说月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约请文学研究会同

人撰稿,调整栏目设置,决心把《小说月报》办成新文学创作的重要基地。取消了与“鸳鸯蝴蝶派”相契合的“弹词”“文苑”“杂载”等栏目,设置“海外文坛消息”“社评”“译论”“读者来信”等与新文学有很强关联性的栏目,曾经的主力作家林纾、程瞻庐、周瘦鹃、程小青、徐枕亚、李涵秋等鸳鸯蝴蝶派作家退出了《小说月报》的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文学研究会同人冰心、王统照、许地山、叶绍钧、杨振声等。显然,《小说月报》革新本身就内含了文学研究会与鸳鸯蝴蝶派的冲突。

文学研究会宣言中所说的“文学是一种工作”,“一种与人生很切要的工作”,“文学作为消遣、娱乐的时代已经过去”等言论,严重刺激着鸳鸯蝴蝶派作家的神经,当年的重要阵地失守,更让他们不甘心受制,于是,他们就开始利用《游戏杂志》(1913年)、《礼拜六》(1914年)、《香艳杂志》(1914年)、《消闲报》(1914年)、《小说大观》(1915年)、《小说新报》(1915年)、《小说画报》(1917年)、《晶报》(1919年)、《红玫瑰》(1922年)、《红》(1922年)等向文学研究会和《小说月报》发难。在一篇写给“莺雪老弟(暗指雁冰)”的信中,作者说:“好不容易把第一期盼了来,急急地拆开一看,只见装样,的确有革新的气象。接着就看小说,谁知越看越弄不明白,难道是我的眼睛花了不成,立刻用西湖水,把两眼洗了又洗,四面一望,觉得甚是清楚,遂又展开来看,不指望不但弄不明白,连字句都看不完整。我想大约这头一篇太高深了,遂接着第二第三,看了下去,一直看到末了,仿佛在雾里,简直是莫名其妙”^[27]。讥讽、不满之情溢于言表。面对这样的奚落式批评,沈雁冰、郑振铎等文学研究会批评家们决定反击。先是郑振铎以主编和作者的双重身份在《文学旬刊》上著文《悲观》《血和泪的文学》,批评鸳鸯蝴蝶派“不是把文学当作消闲的东西,就是把它当作自己的偶然兴起的游戏文章”^[28];“不过应了这个社会的要求,把‘道听途说’的闲话、‘向空虚构’的叙事,勉强地用单调干枯的笔写了出来,换来几片面包,以养活他自己以至他的家人而已”^[29]。接着李之常、沈雁冰分别发表《支配社会底文学论》和《中国现代文学与自然主义》,列举鸳鸯蝴蝶派小说的遗毒,指出它们于人生无益,于文学有害,“作者自己既没有确定的人生观,又没有观察人生的一副深炯眼光和冷静头脑”,“简直是中了‘拜金主义’的毒”^[30]。理论上,沈雁冰、郑振铎、李之常等人站在思想启蒙的前沿,阐明了文学与时代、人生的深层关系,指出了鸳鸯蝴蝶派文学的保守和落伍,在学理

和未来层面取得了显著优势,《文学旬刊》也在与学衡派、鸳鸯蝴蝶派文学的论战中暴得大名。但从实践上看,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并没有因为学理上的失语而消遁,而是在时代的缝隙中觅得了生存空间,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40年代中期两度迎来“中兴”。不管怎么说,《文学旬刊》在论争中释放了新文学构想,显示了它的时代性和先锋性。

如果说文学研究会与鸳鸯蝴蝶派的论争表现为“新/旧”“保守/激进”文学观的冲突,那么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论争则表现为现代性的维度之别,是作家主体精神、人性丰富性、写法多样性的差异。偏见挤兑了包容,执拗代替了理性。无论是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等一方的文学“为人生”定位、写实主义的倡导,还是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的文学“为艺术”定性、浪漫主义的偏爱,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新文学,不同的仅在于考量角度和路径。从新文学成长角度看,两个同人社团和刊物的交锋标志着人们开始从引进、译介文学理论走向沉思、辨识其中的差异,以便更多地为创作实践提供理论支持。“为人生”“为艺术”的论争在深化理性之思的同时,也带动了双方刊物的生长,能够在很短时间里放大刊物的人气效应,进而在竞争激烈的上海出版界立足。在文学研究会一方,受益最大的当是会刊《文学旬刊》;创造社一方则是《创造周报》。何以如此?沈雁冰给出过解释,他说:“因《小说月报》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刊物,而商务的老板最怕得罪人,我们对有些文艺上的问题,就不便在《小说月报》上畅所欲言。《文学旬刊》创刊时曾公开说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刊,我们在它上面发表文章就不必存什么顾忌了。”^[1]这大约是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在《文学旬刊》上发表的文章充满火药味的一个重要原因,甚至用某种侮辱的词汇,如“文丐”“文娼”“污秽”“罪孽”。不仅不避讳,反而喜用夸饰用语,追求某种偏颇的深刻,为社团和报刊赢得更大的声望和市场。《文学旬刊》第40期上有一篇短文,很好地阐明了它与《小说月报》的互补互动关系。“《小说月报》一向是兼重介绍西洋文学与提高创作;它和本旬刊同一宗旨,同一精神,然而战略不同。本旬刊是短小精悍的冲锋队,它的对象是国内旧腐的古文学摹仿者,与浮滑的文明戏式的消遣主义的白话文作品,它的手段是批评、指责,把社会从醉梦中唤醒来”^[31]。在此基础上,郑振铎更进一步,认为“娱乐派的文学观,是使文学堕落,使文学失其天真,使文学陷溺于金钱之阱的重要原因;传道派的文学观,则是使文学干枯失泽,使文学陷入教训的桎梏中,使文

学之树不能充分成长的重要原因”^[32]。观点不可谓不鲜明,态度不可谓不激烈。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文学研究会、《小说月报》和《文学旬刊》因为倡导“为人生”的文学观,参与并推动“五四”新文学建设,而定格在中国新文学史的版图上,成为研究第一个十年文学的关键词和重要对象。文学史家们在把溢美之词“最早”“最有影响”“贡献最大”等送给文学研究会的同时,也把现代文学“重要期刊”的标签贴在《小说月报》《文学旬刊》上。正是因为有它们的叠加复合、纵横交错,“五四”文学的天空才璀璨夺目,“为人生”的文学才惠泽今天——言说文学与人生的无尽内涵。

参考文献:

[1] 茅盾. 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J]. 新文学史料, 1979(5).

[2] 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J]. 小说月报, 1921, 12(2).

[3] 郑振铎. 想起和济之同在一处的日子[N]. 文汇报, 1947-04-05.

[4] 茅盾. 茅盾全集·附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5] 董丽敏. 想象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6] 茅盾.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C]. 上海:良友图书有限公司, 1935.

[7] 文学研究会宣言[J]. 小说月报, 1921, 12(1).

[8] 文学研究会简章[J]. 小说月报, 1921, 12(1).

[9] 朱寿桐. 论文学研究会的中心语态[J]. 福建论坛, 2003(6).

[10] 沈雁冰. 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J]. 小说月报, 1921, 12(1).

[11] 沈雁冰. 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J]. 小说月报, 1921, 12(1).

[12] 瞿世英. 创作与哲学[J]. 小说月报, 1921, 12(7).

[13] 周作人. 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J]. 小说月报, 1921, 12(号外).

[14] 沈雁冰. 通信·语体文欧化问题和文学主义问题的讨论[J]. 小说月报, 1922, 13(4).

[15] 沈雁冰. 通信·文学作品有主义与无主义的讨论[J]. 小说月报, 1922, 13(2).

[16] 沈雁冰. 通信·自然主义的怀疑与解答[J]. 小说月报, 1922, 13(6).

[17] 读者来信. 最后一页[J]. 小说月报, 1923, 14(4).

[18] 茅盾. 我走过的路(上)[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19] 雁冰. 青年的疲倦[J]. 小说月报, 1923, 13(8).

[20] 通信栏[J]. 小说月报, 1921, 12(9).

[21] 西谛(郑振铎). 复活[J]. 文学旬刊, 1921(2).

[22] 成仿吾. 歧路[J]. 创造季刊, 1922, 1(3).

[23] 郑逸梅. 记过去之青社[C]//芮和师, 范伯群, 等编. 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册).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4.

[24] 沈雁冰. 致梁绳纬[J]. 小说月报, 1922, 13(1).

[25] 闻一多. 致梁实秋[J]. 新文学史料, 1984(1).

[26] 熊月之, 主编. 上海通史(第10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27] 寒云. 小说迷的一封信[N]. 晶报, 1922-08-12.

[28] 西谛(郑振铎). 中国文人对于文学的根本误解[J]. 文学旬刊, 1921(10).

[29] 西谛(郑振铎). 悲观[J]. 文学旬刊, 1922(36).

[30] 沈雁冰. 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J]. 小说月报, 1922, 13(7).

[31] 真. 读《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六号[J]. 文学旬刊, 1922(40).

[32] 西谛(郑振铎). 新文学观的建设[J]. 文学旬刊, 1922(37).

(责任编辑 刘海燕)

Identical Group and Non – identical Group:
Literature Research Association and *Fiction Monthly*

LIU Zho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iterary research association, *Fiction Monthly* has become an identical publication. From the subordination relations, *Fiction Monthly* is an old publication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After Shen Yanbing transforms the *Fiction Monthly*, it is in contact with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association. *Fiction Monthly* and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association strengthen their cooperation. However, the balance priority tends the press, not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association. In the eyes of business executives, profitability is the first. Thus, *Fiction Monthly* swings between the identical group and non – identical group. The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literary research association is *Literature Periodical*, not *Fiction Monthly*.

Key words: literature research association; *Fiction Monthly*; identical group; non – identical group

来自生命深处的知性写作

——以王晓莉的散文写作为例

刘海燕

(中州大学 学报编辑部, 郑州 450044)

摘要:散文作家王晓莉以一颗天然境界的心,在经典中滋养历练的眼睛,多年来求真训练、素至无痕的表现力,深情而冷静地写出那些活得不易却超出常规定论的生命,他们身上的光;写出心的深处因爱而生的难言的痛……她的文字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武断、等级,在人和人之间建立起一种天然、纯正的关系,悄无声息地撼动着人的灵魂。

关键词:王晓莉;散文写作;《红尘笔记》;《双鱼》;《笨拙的土豆》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6.05.002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6)05-0009-05

2005年春天,我和江西青年散文家王晓莉同为鲁迅文学院首届青年评论家班学员,因为对世事的态度的太相似,我们成为石头一样沉下来经风雨的朋友。还有一种缘分,80年代末,我们同在武汉读书,她在珞珈山,我在桂子山,有着对江城共同的记忆。在她1997年的散文集《红尘笔记》里,我看到她写珞珈山上樱花的惊艳,“仿佛它不是从沉滞的泥土里往上长,而是从天上的云锦里往下伸一段路才来到人间的”^{[1]67};她写游客在集市般的氛围里,走了一圈,“以为自己看到了美,其实看到的只是樱花的名声罢了”^{[1]68}。当年,我也是这樱花下的游客,从晓莉的文字里才品味到樱花这恍如隔世的美,在星夜或微雨中,在游人都散去之后,才被独行者发现。晓莉更早地懂得了掠过浮名,去接近世上的美质。

晓莉大约每十年出一本简洁的散文集,《红尘笔记》之后,有2006年的《双鱼》和201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笨拙的土豆》。我喜欢这种写作的低产者,她的文字似从经验之海里萃取的盐,没有水分,有的是人生之况味和光泽。这本《笨拙的土豆》,封面没有一句推荐语,序也是清澈的“自序”,无一字之多余,我想:这才是晓莉的风格。一本真正的好书用不着借名人的光环,它自身有着璀璨的光。

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俄罗斯流亡诗人布罗茨基曾说:“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愈是出色,它和总是充满重复的生活的区别就愈大。”^{[2]49}晓莉的散文就是这样,她以一颗天然境界的心,多年来求真训练、素至无痕的表现力,让你看到人和人之间天然、纯正的关系,看到那些活得不易却超出常规定论的人,他们身上携带的微弱却不熄的光,看到心的深处因爱而生的难言的痛……但他们都努力地生活下去。她的作品,能悄无声息地撼动人的灵魂。这是我喜欢并评介晓莉的因由。

一、《红尘笔记》,差点被销毁的一本书

在我的索要下,于2009年春天,王晓莉寄来她的《红尘笔记》。她在邮件里说:“真是很令我汗颜的一本书啊。我一直有想把放在家里的这些存书付之一炬的想法,只是还没来得及下手——否则你就看不到了。”这本1997年出版的散文集,晓莉已经不愿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最后两页也已经残破。这样的细节,似乎只发生在世界文学史中,而不是当代,但我却在晓莉这里遇到了。

晓莉丢弃它的理由,大意是那些文字比较抒情,缺少根性经验的支撑。其实,晓莉写于十多年前的这些文字,属于青春期写作共有的抒情症状并不明

收稿日期:2016-08-05

作者简介:刘海燕(1966—),女,河南太康人,硕士,《中州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中国作协、中国评协会员,主要从事当代文学评论及思想类随笔写作。

显,属于她的心之静界、悟性却是同龄人中少见的。如上述讲:青春时代的晓莉写游人看珞珈山上的樱花,看到的多是名声中的樱花,而不是樱花真正的美。继而她写不仅赏花、游览如此,在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都如此,人们看的只是名声、头衔,这与观察的方式、情境、观察者的综合心智等有关。因为观察方式的问题,真实与美质总是处于隐匿状态。晓莉更早地懂得了揭示这些。

随着年龄的增长,梦幻在社会生活中像玻璃一样被碰碎,我们得学着让自己像棵野草一样地生长,无论环境如何,也要挣扎着茂盛地生长,学会把易逝的脆弱的美安置在心中幽深的角落。晓莉无论是作为写作者还是文学编辑,以其绝对的敏感,都更早地发现并捕捉着那深入地气的脉络,在《红尘笔记》里,她写到乡野随处可见的桃花,“它们大红着高高挂在绿色的田地上空,一股健康、厚实的土地之气也许凝聚已久,三四月时释放出来便几乎是喷薄着了。它还将挂果结实呢”^{[1]64}。樱花属天上的美,纯粹的美,桃花属大地上的美,有生命力的美。晓莉还写到一只碗与水仙,“有时就觉得许多人都像这只经历过水仙的碗。盛着平凡如水的生命时光,偶尔去做一回清静而脆弱的梦……而后梦灭花幻。而后就还是一只最朴素的碗,默默忠诚地履行人生原本的使命或非使命”^{[1]10}。

晓莉的这些文字已经向人生的原本“扎根”了,她让梦境在现实中生长,写出此前此后的况味。

作为文学编辑,她希望约到写得“扎实”的小说稿件,这“扎实”就像农民一锹一锹地翻地一样,把深层的生活经验翻出来。

很多时候,我感到晓莉的神经就暴露在空气中,太敏感以至太疼痛。这样一个具有超现实性情的人向现实的每一次扎根,其情绪损耗都太大。这是一个写作者的天资,超强的敏感成就着晓莉的写作。但却伤着她这个人,作为朋友,有时我甚至希望她不要那么清晰、彻底,甚至希望她向那些自以为很了不得的人学习一点,因为,晓莉太明了、太肯定自我的缺陷了,以至她对自己的作品,总是那么惶恐不安。一个常常自省的人,苛求内心不断进步的人,会有什么本质性的缺陷呢?有的只是和艺术理想之间的距离,和那种天外飞来的艺术之境的距离罢了。

二、鲁院时期的晓莉,及其散文集《双鱼》

2007年春天,关于王晓莉,我曾写《怎样的生活,怎样的原创》一文。我无法丢弃这些文字,就像无法丢弃对生活的理解:

2005年初夏鲁院学习结束后,断续收到晓莉的

邮件,大多是关于读书和观影的,给我一种错觉,好像晓莉天天都稳在家中,读好书,看好电影,眼睛里、心中,掠过精神生活的风暴。事实上,谁能没有现实之累呢?关键是你把什么看得更主要,又怎样以易感的心去接近它。如在鲁院学习期间,晓莉一次次穿越大半个北京城,去电影学院、中国电影资料馆等处看平时不易找到的片子,那百感交集的欣赏旅程使一个人的目光逐渐拒绝世故,拒绝由逢场作戏带来的名望或成功。

如果不是她的文字,这些生活也许会被我们的眼睛永远忽略,尤其是会被我们的内心永远忽略,不说是宏大叙事了,在日常中也不足以挂住人的眼睛,都是些淡得不能再淡、微得不能再微的场景,为什么晓莉非要从世间这些尘土般的人与物开始呢?这大约是一个真正的写作者训练自己目力的最佳方式,很可能不是有意的,因为一个人的写作性情由她的天性、学养、人生品质酿成的。简洁而深度生活着的晓莉,不绕,也不投机,她一层层地向里走,直到所有的市井声消失,所有过分平常、凝滞的生活外衣揭去,那余下的才是她最终要表达的。

如《双鱼》,写即将收摊的菜场一角,一片狼藉,水池里剩下两条瘦弱的鱼,水太浅了,浅到不够栖身,这两条鱼各自吐出泡沫,蹭到对方身上,仿佛市场的喧嚣、卖鱼男人的高声大气都消逝了,只剩下鱼们“相濡以沫”的声音。然后,她写人,两个相倚的生命所潜藏的激情,即便面临无数劫难,依然如双鱼那样相互撑着,在彼此的命运中相爱、活着。悲哀尽处生出缕缕温暖,这温暖,像是千年紫砂煲出的汤,缓缓地暖向你的神经末梢去。

晓莉一笔一笔地写来,坚定、扎实、一步步深入生活的核心,结束得不多一字。我想晓莉不允许自己犯当下文人们的毛病,由高产带来的一系列毛病。她明白什么是浮世烟云,什么可以在生命中留下。

读晓莉的作品是需要耐心的,也需要心静,因为她一笔一笔都很素,素得像那种看不见的生活,但所有的素织在一起,就如天使来到人间,让我们爱生活本身,爱合乎天性和有生命尊严的生活。

晓莉在《牌桌旁的第四个人》中,写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处在与主角无涉的位置,双手抱着自己的胸膛,或者说捧着自己的灵魂,独立、专注地观察着人群。那是塞尚的画中人,也是塞尚的自画像,但我以为那就是晓莉在社会生活中的样子。这个社会生活中超然的观察者,在日常之爱中,又是一个非常的投入者,她内心的烈焰与狂野,那些能听得见鱼之呼吸的人,能看得见万物有灵的人,对世上的另一个生命

有耐心的人,应该能听得到。^[3]

2009 年秋天,我再次翻阅王晓莉的散文集《双鱼》,并写如下札记:

一个深秋的傍晚,我所在的这个土气的北方城市,寒凉干燥的风卷着尘土,人们都缩了头,急匆匆地赶路,我也是。我在近日来持续低沉的心境下,眼睛看到的全是心中的不愉快,突然契机发生了,我看到两个流浪汉蜗居在路边,靠在他们的家当(麻袋)上,其中一个在着迷地看着一份画册,应该是随手拣来的。他的头顶光秃秃的,那是长期缺少最低限度的卫生条件的结果。在昏黄的路灯下,整个慌乱的世界突然停顿了下来,就剩下了两个静静地养神、入憩的流浪汉。我心中暗惊:这不是晓莉笔下的人物吗?!等我再迈开脚步向前走时,眼睛里的世界就有了另一番滋味。

好的文字就是这样,它让你在孤独无依时、仓皇无望时,看到最不堪的生命得以延续下来的秘密。它让你重新感受这个世界。

晓莉的《怀揣植物的人》,那个在人流中一望便可知有精神问题的人,看见“我”手中的青菜,解开衣扣,从怀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棵小树苗来。他很快沉浸于和手中植物组成的“二人世界”里去了。一个终日在大街上流浪的人,却这样爱着一棵植物?他和这植物之间,有着怎样铭心的故事?在晓莉的理解里,当整个世界抛弃他的时候,还有一棵小树苗在陪着他;或者说,当他遗忘或认不清大千世界时,却爱着这棵植物。植物是永不放弃的一种生命,“你从来不会看见一棵植物偷懒,你也从来没有看见一棵植物会说——它活不下去了。”^{[4]8}

晓莉所写的这个怀揣植物的人,手捧植物的样子,像是启示录,让我们看到生命之间地老天荒的牵连,让我们看到所有正常的生存都丧失以后,最后的温情还在……

在晓莉笔下的流浪汉人物谱系中,还有这样一个资深的、干净的、表情正常的流浪汉,十多年来,一直在市内最繁华的一条大马路上——生活,晓莉强调他在“生活”,而不是别的。因为他并不乞讨,并不卖艺,他只是拣拾各种东西,很勤奋地走来走去,翻来翻去,也不与别的流浪者发生争执,闲下来,还会坐在一旁专心地翻一本《故事会》。“我仔细看过他的眼睛,平静得像在一块无人的田野里走过。人在他的眼里,和一棵树没什么两样。”^{[4]13} 晓莉从心底里尊重、理解任何一个生命,并视之为同类。他们曾在同一屋檐下避雨,“犹豫了很久,我说,你,好像家不在这里?”“我”试图和他交流,但发现这个失语

很久的人回避谈自己,“我”发现了自己的矫情和探密心理,“即使作为一个定居此地的人,我也并没有获得某种特权,去破坏一个流浪者的骄傲与自尊。”^{[4]12}

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阶层中,人与人之间有着看不见的界限、等级,内心的平等与尊重只有少数人才有;作为一个群体,还会获得适当关注,作为一个弱势的个人,几乎被视为草芥。我们虽不是流浪汉,或许是知识者、白领,但在公共空间中,如果不入主流,而是作为一个有个性的个人,也会时常落入尴尬之境。上帝缺席的地方,就要靠文学一点一滴地对人心渗透。某种程度上,文学犹如上苍,给芸芸众生施爱,心疼每一个生命,在它的眼睛里,人的自然身份高于他的社会身份,而不是相反。好的文字应是这样,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武断、等级,建立一种天然、纯正的关系。晓莉的文字,一直在表达着这些。

在《江边路上》一文里,晓莉写都市江边的一个女人,她从郊县过来做身体生意,一边织着孩子的毛衣,一边谈着生意,不柔媚,不咄咄逼人,就像在集市里推销自家种的蔬菜。她在不做生意的场所,极可能是个贤妻良母。现在她做着与众不同的事情,卖弄风情是必不可少的,她却采取了平静、日常、甚至算得上端庄的姿势。作者对这样一个路人,一个同性,也不是敬意,也不是鄙夷,只是尽可能全面理解真实表达。全面理解,真实表达,不带个人偏见,这也是晓莉散文的特色之一。这看起来很常识,但或许只有极少数的写作者才能做到求真的表达。

晓莉写这些命如草芥的人,改变着我们对于草芥之人的看法。

在这些日常草芥人物之外,《双鱼》中还有些对艺术场景再现性的文字,这部分文字,可以看出作者非一般的艺术发现力和概括力。如最后一篇《鸟这一辈子》,是写《鸟与梦飞行》这部影片的观感,她说,“鸟与梦飞行”中的“梦”,主要就是由音乐来烘托的。整个音乐有种梦幻气质,低低的,但绝不消沉,只是宁静与和谐,让你想一直停留,在那里做最好的休息。女低音与男低音也间断地出现。女低音有些母性的温柔,像自然之母低低哼唱的一首爱之歌;而男低音,则蕴涵着父性的力量与坚韧,对鸟们做着慈祥护送。“飞翔在,梦就在,生命就在。”鸟这一辈子比人更不容易。晓莉那双在经典中滋养历练的眼睛,一下就能看到艺术至境何在。

我一直在想,晓莉为什么总能遇见那些活得不易却超出常规定论的人,为什么总能看见艺术的至境?

因为,她心中有这些。对于一个心中有普世之爱的人,爱的对象才处处存在;对于一个心中有艺术的人,艺术的力量才存在。

三、《笨拙的土豆》(2015):一本有光的书

这本书,我先读《老宋的旅行》一文,这应是晓莉写得最开心的一篇。果然,我独自笑出声来,这个旅行趣人老宋,每次出门,都很少能够到达他想要的地方。他要么迷路,要么半途折回。一个春节,他本来要去大兴安岭看千年不化的雪,结果在河南下了车,住进一家去少林寺途中的小旅店,打开随身带的书看,突然觉得在异乡小旅店里这样读书很舒适,就停下来不走了,等把那本书读完,已在小旅店待了三天,于是打道回府。“真是圆满的旅行啊。他说。”^{[5]214}这也是我认为的自由旅行。有一年在威海,留在我记忆深处的却不是直面大海,而是在旅馆,走廊尽头的一个窗口,闭目听海声——风卷着大海的声音,像从地球的另一边传来……

人和人感受这个世界的方式不一样,但人不能绝对地孤单,一个人总要找到和自己类似的人,以印证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同类,他可能不是离你最近的人,却可能是书中的这个人。在书页中相遇,你会心一笑,感到尘世的温柔。这就是养心的阅读吧。

先说这些,仿佛是为说下面这些储备心理能量。那就是《弟弟的树》,这篇作品写于青春的弟弟意外离世五年后。那几年,晓莉没有提笔,在生命的丧失面前,能说什么呢?我们曾在电话里谈起,内心太敏感的晓莉,总是自责、哽咽。我不知道晓莉怎样表达这心里的痛,想延缓一些再翻开。而此时的我也有着类似凄寂的心境,这几年我经历了父母的过世,那种真实与梦境、存在与虚无边界的消逝,时常使我夜半惊醒,而我一直不愿写出……在生命突然的伤逝中,写或不写,面向的都是生命深处的真实。

晓莉把整个家庭的痛境,压缩成了约四千字,白描,无一句抒情,每一句话后面都牵带着万般难言滋味。她写,弟弟的去世几乎改变了家中一切事物:家庭成员的关系、家庭氛围、亲人心理、脸上的表情,以及许多道不尽的生活细节。

她写:一天,母亲突然打电话,东拉西扯了很久,突然话锋一转,问“家里……那棵金橘树现在长得还好吧?”

“我”告诉她,“开了花了”。“母亲仿佛不相信地说,真的么?真的么?”^{[5]74}这样反复问了几次,确信后,匆忙结束了通话。

那是弟弟留下的树,弟弟去世后,“我”看护着弟弟的房子,母亲“对与弟弟有关的一切,一枝一

节,一针一线,完完全全都记得”^{[5]75}。

晓莉写母亲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弟弟,却极力避免在口头上提到他。

她也是。她写弟弟留下的一张字条,虽每见到都是刺目且痛,却也不舍得撕去,因为她觉得弟弟留下的东西已经不多了。对弟弟留下的两棵树,她更是分外呵护,“每当这两棵树有什么生长变化——开花了,结果了,长高五公分了,这些我都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母亲——我知道母亲想要听什么。”^{[5]76}

“要记得拉开阳台窗帘叫树们见光,出差要托付邻居来家里浇水……母亲也总是这样叮嘱我。”

“像两个园丁在交流花情。可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通过树,我们在说一些别的话。”^{[5]76-77}

晓莉写这个家庭怎样逐渐克服失去亲人的悲伤,在悲伤里寻摸着莫名的希望……

读到这里,我心里有种释然和光亮,在满面泪水中居然笑了起来。因为这文字里又偶尔闪现晓莉智慧的幽默。就像她在《茶味》里写,一贯喜欢喝浓茶的父亲,在弟弟去世后,也不知道喝茶了,不喝茶的父亲等于完全不想要这个人了,直到有一天父亲端起了他的大茶缸子,“我”才知道父亲想回来继续生活了。我感到晓莉已经在生命的大平静里,深深扎下了根。

在当代散文家尤其是女性散文家中,晓莉的文字有种罕见的知性和悟识。胡兰成在《中国文学史话》中讲:“文学是悟识,是感情的完全燃烧。”“知性的诗文才可以是时代的新风。”^{[6]196}好的文学作品都有一种知性的光。晓莉从生活的万般滋味中炼出这少数文字——这穿行之后的俯察,这神性的眼光,这与万物相惜的言语。

读此书中的“识人”篇,我好奇于那“卖麦芽糖的人”“假装打电话的人”“弯人”……怎么都让晓莉给遇见了?而且遇见得那么深入?

想想也是,晓莉从心底里尊重、理解任何一种生命,并视之为同类;同时天性和写作生涯使她成为一个专业的观察家。她所写的这些草芥之人,被我们的眼睛尤其被我们的内心忽略着,甚至被我们回避着、讨厌着。

如她写的“弯人”^{[5]48},是她那条街上的清洁工,他的腰弯到几乎和地面平行的程度,他的脸始终朝向地面,他要是看人,只能侧过头,用眼睛的光往上搜寻。晓莉曾在家里客厅模仿这个弯人的走动,她看见的是地板、桌子和凳子的脚,好像下一分钟就要迎面摔到地板上去的感觉,她不得不赶紧直起腰来。晓莉的这个模仿情景,让我笑出声来,我感到晓莉的

童心未泯、可爱与幽默。但我知道晓莉怎么可能止于此?! 她要写出弯人难言的心……

这个始终弯曲的人,每天拉着一个巨型旧板车,摇着铃铛沿街收各个店铺的垃圾,有的人像投弹一样扔过来,垃圾袋半路散开,弯人“不能像我们一样立即用眼神去谴责一个人”,他只能看着地面,看着垃圾,然后一声不响地扫掉。高峰期的人流中,骑车的灵巧身躯骂着他“真讨厌!”

晓莉写弯人的职业感——那些掉到水沟的碎屑他也总是一下一下扯出来,绝不会像一些人为了省事,把成堆的垃圾往下水道里扫。弯人永远准时在早晨九点和下午四点出现。

这条街上人们总是制造着千奇百怪的垃圾,有时“我”出差回来,深夜,店面都关了门,“道路发着清冷洁净的光芒”,“道路真正像一条道路了”。“我知道这是弯人的作品”。

“不知命运为何要惩罚他”,“让他成了一个弯人”,“他永远不可能品尝到直起腰身的滋味了”^[5]⁴⁹,可我们这些正常体形的人却制造了那么多垃圾,让他清扫;还有人性的垃圾,让他忍受。

这篇作品,看得我心里疼痛。这篇《弯人》如果能贴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贴在地铁里,让更多的人看见该有多好! 这带着痛感的文字,一旦被看见,那手中的垃圾、心中的非仁爱怎忍心再抛过来?! 这肯定比那种宏大说教更有效。

收在这本书中的,还有获 2014 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的《暗房》,刊发于《人民日报》后被广为转载、并入选高中语文试题的《笨拙的土豆》等文,可我觉得这些也只是其中的篇什,因为每一篇都让我担心很快会被读完。

四、结语

读了王晓莉的这些文字,我心中多少有些释然,

我知道这些年晓莉所经历的现实伤痛。现在她终于开始用文字触及那些不可言说的痛,以悄然淡定的方式——人生不过如此吧,还能怎样? 有一些伤痛或许永远不能进入文字,文字也并非能洗淡命运的阴影,但是作为写作之人,文字恐怕是唯一经久靠得住的避风港了。

幸亏,还有文字。有时我们这样感叹。当一切都残破的时候,还有好的如梦一样的文字相伴,我这样讲着,突然感到所说的这一切就像晓莉笔下那个“怀揣植物的人”,不同的只是我们手捧的是文字。

从写作的速度、文字的数量来看,晓莉不像是这个时代的写作者,她仍属于我们最初对写作心存神圣从不亵渎的岁月。今天的写作者,太追求速成了,以致把写作的灵魂都丢掉了。

对于像晓莉这样写作的人,成功就是在历经艰难之后自由地一笔一笔地写下去。她在生命的深处写作。她以对各式生命精准而深度的表达,撼动惯性生活的人,去看见平时看不到的那些存在;撼动孤独的心,热爱活着的此刻,以深广的生命之爱连接起广阔的世界。

参考文献:

- [1] 王晓莉. 红尘笔记[M].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
- [2] [美]约瑟夫·布罗茨基. 悲伤与理智[M]. 刘文飞,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3] 刘海燕. 怎样的生活,怎样的原创:读散文集《双鱼》[N]. 南昌日报,2007-04-27.
- [4] 王晓莉. 双鱼[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 [5] 王晓莉. 笨拙的土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 [6] 胡兰成. 中国文学史话[M]. 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 吕志远)

Intellectual Writing from the Depth of Life

——A Case Study of Wang Xiaoli's Prose Writing

LIU Hai - yan

(Journal Editorial Office, Zho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Over many years' training of pursuing truth and simple expressiveness without the trace of contrivance, Wang Xiaoli, with a pure heart of natural state and one pair of eyes nourishing in the classic, calmly and affectionately, depicts those remarkable people who lead a hard but unconventional life, depicts the aura within them, depicts the unutterable pain springing from love of the depths of the heart. Her words eliminate barriers, indifference and arbitrariness among people, and establish a natural and pure relationship among people, touching people's soul silently.

Key words: Wang Xiaoli; prose writing; *Notes on the Changeable Secular World*; *Pisces*; *Clumsy Potatoes*

失落与寻找:70后的情爱之路

——以陈鹏的“季节三部曲”为中心

赵牧

(许昌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河南大学 历史与文化学院,开封 475001)

摘要:在当前流行的代际划分中,70后无疑是尴尬的一代,而在陈鹏的“季节三部曲”中,70后的情爱之路更是充满艰辛和失落。人到中年,情感上又遭逢变故,这是小说中男主人公共有的困境。小说的字里行间充满了男性叙述者的自我中心意识,既不能给予70后熟女自我辩解的机会,又暴露出70后熟男内心的种种惶恐。尽管如此,俗世的纠葛和虚浮的浪漫仍充满奇异的诱惑,这不能不归功于小说的混搭和悬疑的技巧,然而文本背后却一片空无,这和作者太多的一厢情愿而满足于一种“文本性态度”有关。

关键词:70后;“季节三部曲”;“文本性态度”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6.05.003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6)05-0014-05

在70后小说家中,陈鹏并无太大知名度,但在他有限的几部作品中,却让人发现这一代人共有的尴尬。以其接连发表在《青年文学》上的“季节三部曲”(《去年冬天》《今年夏天》《明年秋天》)为例,都是关于爱情的,但经过岁月的摧折,烟火的熏染,这些爱情已很难再与“原初的激情”相联系,而是苦涩、沧桑、衰败甚至腐朽不堪了。其中隐含的男性叙述视角,可用千疮百孔的熟男之爱来概括,在他们隐忍负重的对面,却不难发现那些背负恶名的熟女其实也不容易。这似乎是70后共有的状态。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年长的一代凭着权钱的威力纵情声色,年轻的一代借着青春的资本敢爱敢恨,上下不靠的70后却无奈地经受道德、物质、岁月、欲望的多重逼迫,还没大胆享受繁华,便已落得心情沧桑。陈鹏的“季节三部曲”描述的70后的情爱生活,让我们不仅看到70后面对诸多无奈和伤痛的困境,而且他们残存的对浪漫爱情的虚幻想象,也给我们提供了70后充满挣扎和煎

熬的内心样本。

一、无奈与挣扎:“熟男”的尴尬

作为男性叙述者,陈鹏在“季节三部曲”里给予了几个70后熟男以最为充分的曝光率。他们在情爱世界里,都遭遇了背叛,在无可奈何中抚平伤痛,在备受煎熬中继续挣扎,在一地鸡毛中隐忍负重。王重作为贯穿始终的一个人物,已经奔四了,竟才结婚不到半年,就在《去年冬天》出现了危机。对方叫赵薇,除了她曾作为拉拉队员而冲王重高声欢呼之外,王重竟对她的过去一无所知。这也许符合他作为足球运动员的身份,球场上的生龙活虎阻碍了他对这些鸡零狗碎的注意力。又或者他还沉浸在婚姻的新鲜感里,但等到赵薇跟他玩起躲猫猫的游戏,恍然梦醒的他才开始着手调查她的过去。通常情况下,我们会用“出轨”形容赵薇的这种状况。但她而言,有可能是常态,因为依据前丈夫与前闺蜜的说法,她其实一直在有本事的男人中打猎。钱或者性,是她的目的。然而,男性叙述者及作为调查者的

收稿日期:2016-07-10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支持计划(2013GGJS-171);河南省教育厅规划项目“新时期以来河南城乡小说改革话语研究”(2015-GH-554);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第58批一等资助(2015M580623)

作者简介:赵牧(1975—),男,山东单县人,博士,许昌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河南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博士后,美国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访问学者,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王重,并没给赵薇提供自我辩解的机会,所以其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存疑的。即便真实,也只对王重才重要。对于我们,看到的是王重的失魂落魄:到了这年头,别的熟男差不多都已修炼得刀枪不入了,他何以还那么在乎?

作为队友的李果就与他不同。在《去年冬天》里,李果的生活也遇到了麻烦。李果和王重的爱情有几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因球场上的出色表现而赢得了芳心;不同的是,一个结婚半年不到就无疾而终,另一个却风风雨雨凑合了八年之久。然而这八年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潮涌动。女儿得了不治之症,李果着急上火但无计可施,最后魂不守舍而又心怀愧疚的刘盐替女儿终结了痛苦。而她自己却陷入更大的痛苦中:女儿是她偷情的产物,所得之病呢,也由她长期嗜烟如命引起。她最初还怀着真相被揭穿的担忧,但没料到李果早已心知肚明。他似乎坦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不仅对非亲生的女儿充满怜惜,而且对轻生的刘盐也极尽救护的努力。这么一个隐忍负重好男人的典型,心中并非波澜不惊。“不想知道谁是她亲爹?”刘盐问他,他说“不想”^{[1]33},然而一接到王重的求助电话即刻血脉偾张。表面上是打抱不平,帮队友去教训野男人,但根子上却大有借他人酒杯一浇自己块垒的动机。面对两个受伤的男人,揣测他们的隐秘内心似有些不妥,但这年头,谁又能不承认,做个熟男真是不容易。

这种不容易,不仅王重和李果这对难兄难弟感同身受,《今年夏天》里的何冬,也有深刻体会。三年前,何东的老婆苏沫跟人跑了,这情形跟王重差不多。不同的是,王重新婚燕尔,还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失魂落魄,而后一旦大局既定,他还可以轻装上阵,一无记挂地再找新的爱情。何冬却不然,他还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儿,不得不尽一个奶爸的责任。所以何冬、刘东这三年的甘苦,虽被叙述人放在幕后,却不难让人体会。不过,他同时也收获了喜悦。女儿已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还有个网上的小萝莉走进他的生活。这样苦尽甘来当然给人安慰,但这符合世俗人心的理想,并不符合小说叙事的惯例,有经验的读者轻而易举地就能猜到,何冬的日子不可能这么风顺顺水下去。果然,麻烦来了。前妻苏沫就是麻烦的制造者。原来她不是跟一个商人跑了嘛,而今却独自一人栖栖遑遑地回来了。她给自己的回来提供了一个理由,而且赌咒发誓所言非虚。他对其中的一些因由很有些窥视的欲望,但作为一个有自尊的男人,他又不能这样做。这都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就在苏沫死皮赖脸而又泼妇骂街一般

一次次出现在何冬门前的时候,我们更多地以为她遭到了走投无路的报应。

事实上,她也的确认为自己走投无路了。很多时候,走投无路是一种自我感觉,而并非真的无路可走了。按照齐泽克的说法,这其实就是一种“幻象”,“它从相反两个极端想象自我所在的幻境”^{[2]16}。从消极的方面,这幻境可能使人做出极端选择;从积极的方面,它可能迫使人抓牢一个靠山,以防突如其来坠入深渊。苏沫显然将何冬当做了最后的靠山。当初弃夫背女追随野男人的时候,以为迈出的每一步,都是朝向天堂的,所以急切得不行;而今丢盔卸甲回来,她的每一次叫门,都仿佛将手伸向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结果她的貌似可怜竟给人可怖的感觉。她这么做并非无所凭依,显而易见的是,她的女儿在何冬那里。女儿对她陌生而拒绝,这让她失望,但她很快就发现何冬的恻隐,并意识到她的闹场,给何冬身边的“小狐狸”造成了困扰。于是,“清君侧”就成了她下一步的策略。一场寻常百姓的家庭闹剧,受了影视剧的影响,这时竟带有了某种宫廷戏的意味。处境尴尬的何冬显然没有帝王的权柄,所以,他甚至想到卖房逃亡的下策,但还没等他将这计划落实,那个小萝莉却玩了失踪。小萝莉的说法是,“姐不给你们老夫妻玩了”^{[3]37},言下之意很明显,何冬在她眼里并无太大争抢的价值。因为,何冬的表现,分明让她感到某种失落。面对苏沫的纠缠,何冬不断延宕着自己的决断,不能与小萝莉有效沟通。在小萝莉的眼中,何冬不仅没有权柄,连爱都打了折扣,争到他又怎么样呢?所以,宫廷戏的形式,家庭剧的底色,此中突显的不过是在消费主义的横行无忌中,70后熟男既看护不住老婆、又招惹不起小萝莉的尴尬。

作为读者,我们都是带着特定的伦理态度进入文本的^{[4]5}。比如对于苏沫的纠缠,作为男性读者,我特别不愿看到她的成功;而作为男性作者,陈鹏也没在叙事中给她当初的私奔提供令人认可的理由。我们知道,俗世的婚姻生活,总会遭遇这样或那样的不如意,而无论熟男还是熟女,其实都有可能心猿意马,但陈鹏却有意忽略了人性的复杂,只一味给这些出轨的熟女安插上贪恋浮华和不负责任的罪名,让她们独自承担家庭解体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苏沫就给人无理取闹的感觉。很大程度上,某种隐秘的男性意识构成了共谋。陈鹏试图证明何冬对苏沫残存的爱,并给这熟男之爱充塞了太多隐忍、牺牲和包容的内容。这其中或不无居高临下的同情。事实上,何冬不断给苏沫寻找开脱,而就在拖拽她下楼

时,因不经意瞥见她金毛卷发丛中的几根银丝,他还从心底泛上来一丝丝的怜惜呢。所以,即便爱已覆水难收,但作为一个男人岂能像她当初一样坏事做绝?像这样一些隐秘心思,虽在很大程度上道出了生活的本质,但更主要的还是将情义与担当的大男子主义价值观赋予了何冬。

二、回归或等待:“熟女”的苦涩

对于何冬身边的小萝莉,作者陈鹏的处理,似乎有意逾越了我们的期待。对于小萝莉的背景,我们所知不多,若按苏沫的说法,她的过去不仅形迹可疑,而且可用劣迹斑斑来形容。但苏沫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作为情场上敌对的一方,她完全有理由极尽诋毁之能事。所以,唯一的凭借就是她被隐含的男性叙述者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作为。她有脾气,有个性,但同时也很自我,这跟各种八卦杂志里的80后、90后时尚女孩没有太大区别。叙述者对于80后、90后女孩的观察,几乎被萨义德所谓的“文本性态度”所左右。宁可相信文本的权威而不肯接触现实,这几乎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弱点,在萨义德所谓的东方学语境中,“文本性态度”作为“想象东方”的方式,视有关东方的“文本”远比东方的“现实”更值得信赖^{[5][120-121]}。在很大程度上,躲进各种流行读物所构筑的文本空间中,将其中的陈词滥调作为金科玉律,正是何冬身边这位小萝莉被漫画处理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任性地甩出“姐不给你们老夫妻玩了”一句话,看似蛮刁蛮,同时也将爱与耐心、忍让、沟通给放弃了。在这一点上,她与70后熟女苏沫并无本质不同。

大众媒体突出了人群的代际划分,而任何时代的人都是环境的产物,都摆脱不了欲望的纠缠,都会陷入激情和享乐的泥沼,并且总想自己拥有的比别人多一点。但不同的是,70后熟女多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禁欲主义氛围中长大,比不得80后或90后女孩从小就在消费主义的染缸中泡着,而等她们猝不及防接触到灯红酒绿的世界时,却大多错过了花开繁盛的时节。身后更为娇嫩的花朵争先恐后地冒出,落红遍地的前景又那么触目惊心,所以免不了进退失衡。于是连忙补课,不但浓妆艳抹、奇装异服,而且抽烟、喝酒、K歌、炫富……但终究将消费化作表演,将放纵当作狂欢,既没得到期待中的自由与洒脱,也失去了本该有的成熟与娴静。很多情况下,她们自以为踏上了时尚的快车,结果却是出尽了洋相。《去年冬天》里的赵薇与刘盐是这样,《今年夏天》里的苏沫更加变本加厉。她那一头金毛狮王般的卷发,配上一张千沟万壑的粉脸,既仓皇又可怜。相较

而言,何冬身边的小萝莉,即便因负气而凌厉的时候,也真实可爱多了。当然,小萝莉也是得理不饶人,而且不给人解释的余地,所以,苏沫略施雕虫小计,她便气急败坏地中招了。中招的是小萝莉,但苦涩的却是苏沫这类70后熟女。小萝莉有年轻作资本,尽可以潇洒地离开,而熟女们却不得已地吞咽着放纵的苦果。

在“季节三部曲”里,无论刘盐还是苏沫,她们似乎都因为追逐物欲而得到报应,回归成了她们别无选择的选择,而历尽劫波的叶子、叶斯斯、肖丹、沈鹿、赵小男们,则为情感的畸变付出了惨重代价。这和男性叙述者隐秘的欲望不无关系,这其中充当观察者的主要是王重这个70后熟男。所谓观察者,来自强纳森·柯拉瑞的概念,他说:“尽管观察者指的是一个用眼睛看的人,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人是在用整套预先设定的可能性当中观看,他是嵌合在成规与限制的系统中的。”^{[6][11]}作为观察者,王重带有深刻的“被老婆抛弃的男人”的印记。所以他的尴尬,在叙事层面上构成熟女苦涩的前提。因此,叶子在他眼里似乎成了一个中邪的怪物,他几次想参与叶斯斯和沈鹿的情感世界,却终不能得其门而入。是偏见而不是同情,在熟男熟女之间构筑了一道屏障。看起来王重一直没闲着,一会儿泰国,一会儿欧洲,但虚浮的浪漫掩盖不了他内心的寂寞,奇幻的旅行彰显着他现实的失落。带着这寂寞与失落,对熟女们进行观察,怎能摆脱得了悲哀与无奈的底色?

以《今年夏天》的泰国之旅为例,王重在其中遇到的人物,看似活在童话的世界,实质不过是伪小资的幻觉。不仅叶斯斯,就连他自己也被这幻觉所迷惑了。叶斯斯是泰国旅游胜地象岛上一家旅馆的女老板,年龄当然比赵薇们年轻一些,但身心却也遍布沧桑。她曾有过一些狂野经历,但却用金钱、地位、美貌和支离破碎的自我陈述伪装成一份神秘。这与象岛的氛围极为吻合。那是个濡湿和燥热的地方,奇异而陌生,充满异国情调,且弥漫着情色气息。王重像别的观光客一样,在领略美景、品尝美食,感受海风与潜泳之外一无所获。不过,与别的观光客不同的是,他有美女店主叶斯斯的全程接待。这显然不能让他满足。很多时候,美女在侧却若即若离,更能引人失落。尤其是像王重这么一个年届不惑的男人,他怀着期冀而来,不能不渴望奇迹出现,结果却只能收获更大的迷惑。他名义上是来相亲的,但梦幻熟女叶斯斯,却只给他讲述一个又一个改头换面的故事。这些故事关乎爱情、声色、欲望、争夺、背叛,直白地说,无非是叶斯斯黏上了一个荷兰佬,而

这不停猎艳的荷兰佬却与她的一个闺蜜私奔了。然而,它的断续与缺省,不仅给荷兰佬的猎艳戴上了一顶文化差异的帽子,而且激起了王重强烈的窥视欲,并一度诱引他将自己想象为英雄救美人的角色。

借助王重的眼睛,我们切近观察到貌似美丽、富贵、优雅、活泼的叶斯斯行踪诡异和心事重重的一面,但在这有意的遮掩与显露之间,却更有力地揭穿了小资情爱的虚浮本质。同样是“眷鸟恋旧林”,苏沫是一个十足的市井泼妇,她迫切想攫取一处遮风避雨的港湾,而叶斯斯则像一个忧郁美人,一遍遍地回望旧日的浪漫时光。相对苏沫来说,何冬身边的小萝莉是现实版的敌人,她当然极尽污蔑和谩骂之能事。但对叶斯斯而言,王重是一个值得期待的观众,她渴望从他那里得到一个自我表演的机会。在全知的叙述中,苏沫世俗而干脆,一览无余地展示了她的泼妇嘴脸;而在限制性叙述中,叶斯斯超凡脱俗,始终不忘琵琶遮面。正如小萝莉的主动退出一样,王重也必然无功而返,这两个女人的交替出现,让我们窥见女人确实为爱的动物,只是她们有时太自我,有时又太犯贱。这一偏狭的结论,看似给熟女们命运的凄惶和内心的苦涩找到了祸根,但从根本上讲,再一次暴露了熟男们处境的尴尬。因为男性观察者和叙述者的存在,不能不让人意识到这文本世界的种种安排,这与他们在消费主义氛围中既担心她们的身体出轨,又恐惧她们的精神越矩紧密联系在一起。

三、混搭与悬疑:虚浮的浪漫抑或俗世的真相

就故事本身而言,熟男们的尴尬和熟女们的苦涩,不过是生活的流水,一地鸡毛也好,异域旅行也罢,都很容易让人觉得乏味,但陈鹏的“季节三部曲”,却充满了一种奇异的诱惑。这或许和小说所使用的混搭技巧及其悬疑效果有关。所谓混搭,在时尚界中通常指的是将不同风格、不同材质的东西按个人口味拼装在一起,借用在小说叙事中,则是将看起来并无多少关联的人物及故事,抛却语境、因果、人称等方面的差异,而错落有致地搭配在一起,以便它们相互激发,各自衍生出新的意味。^{[7]16}这在现代小说中早已广泛运用,在陈鹏的“季节三部曲”中,它给原本生活化、平面化、碎片化的故事增加了不少心理张力。这是后现代叙事的必然选择。由各种新兴媒介和消费主义操纵的后现代叙事,往往倾向于追逐浮华的表象,以满足于所谓“轻阅读”的需要。上海文艺出版社曾出版一套“轻阅读”书坊,各大知名网站纷纷开设“轻阅读”版块,而所谓的“轻小说”,也开始大行其道。打发闲暇,讲究轻松,强

调质感,渴望情调,拒绝深度,是为“轻阅读”,而与之相应,虚幻奇侠,耽美迷情,魔法穿越,则成了“轻小说”^{[8]132}的偏好。某种程度上,陈鹏的“季节三部曲”颇能满足“轻阅读”诉求,并具备“轻小说”偏好。如果不是有位回头浪女苏沫纠缠其间,《今年夏天》差不多就是一部导游手册和奇幻游记的耦合。但像这样将凡庸人生的烟火气与凌空蹈虚的小资腔错落混搭,却也让人耽美于叶斯斯浮华和苍凉之外,体味到更多的人还是像苏沫那样,在繁华褪尽之后,以千疮百孔的爱为基础紧紧抓住生活的凭依。

在文本的世界中,人们更爱追逐虚浮的表象。这就是为什么在《明年秋天》里,像苏沫这样的女人消失了踪影,换上了两个神经质的女人,给我们做奇幻之旅的导引,因而带来一种悬疑效果。《明年秋天》交叉讲述了两次旅行:一是欧洲旅行中肖丹和沈鹿两位熟女的百合之恋,这时从象岛归来的王重已变得沉默寡言,但却不失一个煞有介事的观察者身份。二是通往丽江的大巴上,新登场的熟男刘东跟一个叫赵小男的女士喋喋不休,两场旅行的可能交叉,仅在于心事重重的赵小男与沈鹿某种程度上的神似。事实上,沈鹿和肖丹曾一度相约“明年秋天”前往丽江旅行的,但结果她们却在巴伐利亚的最后一晚出人意外地殉情了。其中的原因令王重百思不得其解,他想,或许和他们一同参观的新天鹅堡有关,它的主人路德维希二世就死因不明。作为导游的肖丹在解说词中夸张了路德维希二世与茜茜公主的不伦之恋,这当然是一种职业习惯,但沈鹿却一直质疑其中的真实性,并将这质疑带入探访新天鹅堡的整个过程,结果一场寻常的游览弄得像侦探小说一样充满悬疑。将路德维希二世的同性恋嫌疑作为这两位萍水相逢的女子相恋的原因未免牵强,但除此之外,在文本中找不到更像样的理由。

至于沈鹿和肖丹的相约赴死,更被处理成了一个神秘事件。最为神秘的,竟因为沈鹿最后一刻的退缩,她才与远在丽江的赵小男联系起来。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将赵小男理解为沈鹿的化身,而事实上,她耳朵上常挂着的银白色 TOUCH,就跟肖丹送给沈鹿的那个一模一样,其中重复播放的古琴曲,说不定就是沈鹿那里的高山流水。事实上,我们也仅有一次从赵小男口里得知她叫赵小男,而她给献殷勤的刘东随口撒个谎也实在情有可原。要知道,刘东原本是到丽江给一部宣传片选外景的,但自始至终他将本职工作丢在一边,而一直陪着访友不遇的赵小男。这种热情过度显出他对艳遇的期待。沈鹿说,经过那个巴伐利亚之夜后,她恐怕再也快乐

不起来了,而赵小男则被刘东所讲的一系列丽江的殉情故事打动了,这其中或许隐含着叙述者的刻意强调。

可以说,悬疑是“轻小说”的特征,但陈鹏却以为完成了一件不可能之事。“轻小说”作为后现代叙事的一种,它更多地迎合小资的情趣,而“季节三部曲”,让我们在悬疑的惊悚中窥破俗世的真相。在《今年夏天》的那个傍晚,苏沫已经走了,去接女儿的小萝莉还没有回来,何冬打她的电话,得到的是冷冰冰的告别辞,且不给他解释的余地。苏沫和他已有七年,小萝莉才跟他七个月,他究竟该相信谁?这个问题恍如闷雷,炸得他脑袋轰然作响,于是他大叫一声女儿的名字,就冲下楼去,竟是虚惊一场。从中我们可发现惊慌失措的何冬,其实还活在千疮百孔的旧爱的记忆里。何冬和苏沫之间爱情的死灰复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居高临下的同情,还掺杂了他对她出走后秘密的好奇。小萝莉与何冬之间,说不定就有激情消退后的倦怠,还因苏沫闹场而令她暴露出来的自我意识。被大众媒体营造的戾气氛围左右的我们,也不由得像何冬一样,在幻想中把她从小清新变成小魔女。在何冬的大叫声中,我们眼前也似闪过一个血腥场面,但当谜底揭开,我们又发现,他对小萝莉缺乏信任并非源于不解,而是源于不自信:他宁愿修补与苏沫千疮百孔的旧爱,也不敢维

护与小萝莉的新爱,所以,才在跟苏沫的纠缠中不断延宕远走高飞的计划。这也难怪小萝莉对他失去耐心,因为她在他那里所要的不再是爱的激情,而是一份可怜的安稳,现在是连这安稳也没了,除了黯然离开,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参考文献:

[1] 陈鹏. 去年冬天[J]. 青年文学,2013(5).
[2] 齐泽克. 幻想的瘟疫[M]. 胡雨谭,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3] 陈鹏. 今年夏天[J]. 青年文学,2013(5).
[4] 詹姆斯·费伦. 作为修辞的叙事[M]. 陈永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 萨义德. 东方学[M]. 王宇根,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9.
[6] 强纳森·柯拉瑞. 观察者的技术:论19世纪的视觉及现代性[M]. 蔡佩君,译. 台北:行人出版社,2007.
[7] 李娜. 混搭:在漫不经心间出奇制胜[J]. 电影评介,2012(23).
[8] 葛红兵,赵牧. 媒体狂欢与理论沉潜[J]. 学术月刊,2013(4).
[9] 李德南. 看那苍凉而幽暗的人生:孙频的叙事美学[J]. 山花,2013(3).

(责任编辑 刘海燕)

Lost and Soul – searching: the Road of Love about the Post – 70s
——Centered on Chenpeng’s “Season Trilogy”

ZHAO Mu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Xuchang University, Xuchang Henan 461000, China;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The post – 70s is falling into an embarrassing moment and their emotional life is full of hardships in Chenpeng’s Season Trilogy. Men in these novels have a common plight, emotional change in their middle age. The words in the novel are full of male – centered ideology. It does not provide opportunity for maturational women to justify themselves, and it exposes all kinds of fears from post – 70s men at the same time. Though there is nothing at all out of text because of narrator’s “textuality attitude”, those novels hold great appeal because of the narrator’s skill of mash – ups and romantic suspense.

Key words: post – 70s; “Season Trilogy”; “textuality attitude”

无意撩人 有心嘲世

——论《鼓掌绝尘》的喜剧性讽刺艺术

沈云霞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文化与传播学院, 郑州 450046)

摘要:晚明小说《鼓掌绝尘》在描述人物时,多处巧妙地运用喜剧性讽刺手法,使小说不仅获得了强烈的喜剧效果,还达到了嘲讽世情的写作意图,在讽刺艺术方面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且对后世的《儒林外史》《聊斋志异》《官场现形记》等讽刺谴责小说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鼓掌绝尘》;喜剧;讽刺艺术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6.05.004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6)05-0019-04

《鼓掌绝尘》是明朝崇祯年间刊印出版的一部中篇白话小说集,作者署名为古吴金木散人。全书分《风》《花》《雪》《月》四集,每集十回,合演一个故事。闭户先生在“题辞”里说写作此书的目的是“无意撩人,有心嘲世”。《鼓掌绝尘》在语言艺术、结构布局诸方面均取得了较高的成就,而讽刺艺术则是其艺术成就的重要体现。在这个小说集中,特别是在《花》《月》两集里,作者为了达到嘲讽世情的写作意图,多处巧妙运用讽刺手法,从而使小说在讽刺艺术方面取得了较高的成就。《鼓掌绝尘》不仅浸染着喜剧色彩,获取了强烈的喜剧效果,且对后世的《儒林外史》《聊斋志异》《官场现形记》等讽刺谴责小说产生了深刻影响。

《论语·阳货》有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①,这是孔子对文学艺术之社会功能的高度概括。其中,对“怨”的解释,孔安国认为是“怨刺上政”,即诗歌可以表达对为政者执政之失的批判,亦可以抒写对不合理不公平社会现象的不满,此说是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源头,启发后世有良知有担当的知识分子,敢于直面现实,揭

露丑恶,弘扬正气。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叙中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②25}伟大的优秀之作无不是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深刻体悟,亦是他们血泪的结晶。

《鼓掌绝尘》毫无疑问是晚明社会现实的一部实录,作者采用嬉笑怒骂多种方式来记录这一时代的众生百态,而喜剧性的讽刺艺术则是作者揭露弊病、抨击丑恶的主要方式。

如果从总体和具体两个方面考虑,我们可以把《鼓掌绝尘》的讽刺艺术手法分为总体寄寓和具体运用两种形态。总体寄寓是从作品立意、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中寄托作者的讽刺意图,具体运用则是使作品的总体讽刺意图得以实现,进而传达出喜剧性效果而使用的具体方法。对于一部具有讽刺意味的优秀作品而言,这两种形态基本上是共存的,且相辅相成。

从立意上来看,《西游记》把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搬进一个虚幻的环境中,在虚无的场景中描绘虚无的形象,对丑恶的现象进行鞭挞批判、冷嘲热讽,其

收稿日期:2016-08-10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鼓掌绝尘》研究”(2013BWX023)

作者简介:沈云霞(1969—),女,河南南阳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寄寓讽刺的意图是很明显的。为了实现其讽喻的意图,作者精心安排情节、塑造人物,在情节与人物身上寄托讽刺,如猪八戒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所蕴含的讽刺意味。再如,在西天佛祖身边,阿傩向唐僧索要“人事”方才给予真经,亦极富讽刺意味。《鼓掌绝尘》吸收《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等小说的讽刺艺术,总体寄寓与具体操作相结合,人物塑造与情节铺排相结合,且更加生动传神,真实地再现了晚明的社会现实,在总体立意和细微表达诸方面均取得了较高的讽刺艺术成就。

在《鼓掌绝尘》中,作者“有心嘲世”的立意主要是通过“醉典史私衙通贿赂”“遭阉割监生命损”等情节来讽刺官场腐败,通过“假秀才马上剥衣巾”“求荐书蒙生争馆”“腐头巾拦路说人情”等情节来讽刺科场和文人,通过夏虎“察石佛”、星士李府襁病等情节来嘲弄和尚方士。同时,作者又通过塑造帮闲夏方、回头浪子张秀、势利鬼李岳等人物形象来讽喻世像百态和冷暖人情。在这些人物形象和情节之中,寄寓了作者对晚明衰世万事不纲的无尽慨叹,对黑暗腐朽的社会生活的愤慨,对人心不古、世态炎凉的无奈和失望。

二

讽刺方法和技巧的具体运用,是实现寄寓讽刺的途径,而具体讽刺方法本身借用恰如其分的手段,使诸如肖像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等具有调侃揶揄、诙谐幽默的喜剧性因素,或婉曲、或直斥,在嬉笑嘲弄中尽显讽刺之能事。大体说来,《鼓掌绝尘》在夸张和对比两方面的讽刺方法运用得较为成功。

其一,用无中生有的夸张来讽刺。“无中生有”本是道家一哲学命题,后被引用到文学艺术创作之中。文学艺术中的“无”并非捕风捉影,而是对现实生活的高度概括。《鼓掌绝尘》第三十六回写魏忠贤当权之时,魏的第一个干儿子崔呈秀,官任江西道御史,在魏忠贤生辰之日,除送一件宽大袖子的蟒衣要魏忠贤“好装权柄”之外,另送一个镌着“崔呈秀”三字的金便壶。当魏忠贤说这是个撒尿的东西,“可不把名儿污秽了”时,崔呈秀回答说:只要您高兴,就是再污秽也无妨。这本是个空穴来风的事端,作者正是通过这种无中生有的夸张手段,把崔呈秀讨好谄媚、不要人格、少廉无耻的丑陋行径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作者用无情之笔刻画崔呈秀这样一个十足的官场小丑,让读者通过晚明社会的这一缩影,看

到了无数崔呈秀构成的晚明王朝那个黑暗腐朽的官僚阶层。老舍说过:“夸大是讽刺的必要手段……既要讽刺,便须辛辣,入骨三分。”^③在这里,金便壶上镌名的讽刺,可谓入骨三分,直刺灵魂深处。

其二,用小题大做的夸张制造讽刺。用小题大做之法制造讽刺,最具喜剧效果。《鼓掌绝尘》第二十五回两媒婆当街争闹、第三十五回假秀才马上剥衣巾、第三十七回两蒙师争馆等,是典型的化小事为大事、小题大作的夸张讽刺方法。媒婆为媒钱争媒、蒙师为生计争馆本是生活中可能存在的事情,作者为了突出讽刺效果,着意夸大事实,把小事写大,让两个媒婆当街争吵打闹,这样就把媒婆为钱而不顾女人羞耻体面的恶俗嘴脸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在她们夸张的言行中实现作者对这类人物的嘲讽批判。李八八本是秀才,为了和王瑞争一个蒙师的位置,煞费心机:找人商议求计,寻人伪造荐书,失败后恼羞成怒,啸聚乡党叫骂厮打……其言行举止、所作所为,大大超越了现实生活中的可能。争则争之,不至于当街跳骂;骂则骂之,不至于当众厮打;打则打之,更不至于聚拢几十个人去对付一个王瑞。这里有意夸大事实,用夸张之手段行讽刺之目的,其妙处不言而喻。

如果说“蒙师争馆”讽刺了无行文人的丑恶行径,那么“马上剥衣”则深刻揭露和嘲讽了无德文人和黑暗不公的科举制度。《月》集中陈珍的老师本是一个冬烘先生,学业没教好,倒把学生带成了青楼妓院的常客,这已是生活中的一个典型。为了深刻嘲讽这类坏人子弟的业师,作者合理地超越现实,艺术地夸大这位先生的作为:先是毛遂自荐,主动为自己的学生当枪手考县试,然后帮助学生打通关节通过府试和院试,最终为学生赚了秀才的头巾。更富有夸张、讽刺意味的是,陈珍府试和院试两次考试交的竟是白卷,连一个题目也尚未写完,却都有了名次。后来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塑造范进这个人物时,采用了几乎相同的手法,一个不知道苏轼为何人的范进竟然高中进士,且做了主管一省教育和选士的山东省学政,真是令人惊讶。作者把不可能变成有可能、把小事由化出大事端,有意夸张,进而通过夸张显扬嘲讽效果,这种讽刺技巧实在让人拍案称奇。

三

运用对比方法显示人物与自身、人物与人物、人

物与环境之间的矛盾、不谐,从而造成强烈的反差效果,让人物的言行与心理在背离的状态下,显示其虚伪表象下掩藏的实质,露出麒麟皮下的马脚,从而造成讽刺效果,生成喜剧性的因素,这是对比讽刺的高妙之处。在《鼓掌绝尘》中这种方法有较多的表现,它与夸张手法一起,共同表现着作者追求自我智力的优势和道德完善的态度,营造着《鼓掌绝尘》在忧思和无奈中闪现的喜剧亮色。

对比方法的运用,一是表现在人物与自身之间的前后矛盾上。《雪》集中的李岳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他对侄女婿文荆卿前倨后恭态度的对比十分强烈。文荆卿考中探花前,李岳对其百般挑剔,冷言冷语,乃至暗中迫害。考中之后,则热情远迎,温言美语,巴结讨好,备宴席送贺礼,甚至在无人之处软膝下跪,极尽势利小人的奴颜卑骨。这与《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前后,其岳父胡屠户的表现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月》集中县官判案,在收取贿赂前后的心理与行为大有不同,判若两人,也极具喜剧性。

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对比。《风》集中的夏方本是“假小心,真胆大”的骗子,在主人娄祝身边,就高就低,每年要骗几百两银子过活,也算小有心机的人。他在骗卖娄祝宝马之后,洋洋得意,为自己的身手喝彩,不想却遇到了一个更高明的骗子“走盘珠”。这位穿了道袍的假神仙,竟把夏方“赚到箍芦圈里”,听他花言巧语,“三个多月,身边上千两银子渐渐去了大半”,这自然是被“走盘珠”哄诱去了。真是“山外青山楼外楼”“强中自有强中手”。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夏方二次行窃出逃后,他又遇到了阔别多日的“走盘珠”,这位“老朋友”也没太多客气,就第二次把夏方洗劫一空。你骗我也骗,你偷我来抢。毫无疑问,作者对夏方与“走盘珠”在对比之中寓寄的讽刺,有着更加明显的惩恶劝善的目的性,体现着作者维系风俗人心,使读者在哂然一笑的同时有所观感戒惧,进而达到醒世聪人的道德目标。夏方的骗与偷并没有使他因此而富贵起来,相反更加穷困潦倒,险些丧命异乡。其原因是他的背恩叛义,他所得的无非是不义之财,所作的无非是为人不齿的不义之举,因此用更加不义之人来加以更加严重的灾难,使他的人生遭际更富戏剧性的变化。在对他的轻蔑与憎恶之中,传达着作者愤世嫉俗的伦理倾向,寄托着作者完善道德理想的意旨。

此外,还有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之间进行的

言行对比,以此造成反差,来讽刺反面人物。如娄祝的宽厚待人与夏方的见利忘义、杨琦的廉洁刚正与其他官员的腐败昏聩等等,都构成反讽,形象有趣地揭示了正反人物之间的相异性,在歌颂正面人物的同时让反面人物的卑劣言行昭然于世,从而讥笑嘲讽了他们可笑的行径,使人物刻画颇具喜剧效果。

三是人物与环境的对比。通过特定的环境和在这个环境中活动的人物之间造成不谐和的否定,亦即黑格尔所言的“自否定”“自毁灭”,进而达到讽刺效果。这是一种比较冷静的客观呈现式的讽刺模式,作者一般不作主观情绪的表露,直书其事,不加断语,在冷静细致的观察中描写人物言行,不落一字褒贬,但褒贬讽刺尽在描写之中。在《金瓶梅》第六十五回中,西门庆在李瓶儿灵堂里的所作所为,就极其强烈地讽刺了西门庆的无耻本质。在《鼓掌绝尘》第二十六回,李若兰身染重病,命在旦夕之间,请星士禳灾除病。星士在李府堂前求来神灵,而在神灵面前,这位星士“打起油腔”,唱起世俗味十足的《十供养》,唱完之后即收拾供品准备带走。在不可亵渎的神圣面前,星士做的却是骗取“神前油米”和谢银的无耻勾当,假造的崇高气氛与实际的低俗品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环境与人物、假戏真做的行为与虚伪渺小的目的,在乖讹与矛盾之中产生了绝妙的讽刺效果。无独有偶,第十四回莲花寺夏虎察石佛一事,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制造讽刺的。寺院道观本是众神的人间住所,是俗世中不可多得的清静之地,然而莲花寺和尚却“假借三宝,哄骗十方”,在除恶镇怪的神圣前面做起“左道妖术”,在慈航普渡的处所里作着坑蒙拐骗的行当,在让人肃穆崇拜的环境里却住着一帮令人鄙视憎恶的恶僧。这样通过尖锐的对照,无情地嘲弄讽刺了佛门弟子的龌龊心灵和丑恶嘴脸。

当然,《鼓掌绝尘》所使用的讽刺技巧不仅仅是这些,通过人物语言的描写、细节描写、借助心理描写等,探求人物内心世界的真相,以戳穿其外在虚假性、揭示其与外在表现相背离的丑陋灵魂等讽刺方法也多有运用,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鲁迅在探讨“讽刺小说”时曾说:“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之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④198}《鼓掌绝尘》作为“人情小说”,继承《金瓶梅》、“三言”“二拍”等小说的讽刺艺术,形成了自己较高的讽刺艺术成就,并与这些小说一起,作为成功的范

本,影响后世的讽刺性文学作品。苗壮先生在《谈〈儒林外史〉的承前》中曾说:“艺术贵在创新,但在创作之中,全无依傍,实际上是不可能的。”^⑤他例举了《鼓掌绝尘》中陈珍等腐儒庸才形象对《儒林外史》中此类形象塑造的影响,指出了《儒林外史》讽刺艺术与《鼓掌绝尘》之间的继承关系。其实,何止一部“婉而多讽”的《儒林外史》,从清初至清末乃至今日,读过《鼓掌绝尘》的作家们,只要在自己的作品中有嘲世讽人内容的,自觉不自觉地学习借鉴《鼓掌绝尘》等讽刺艺术手法,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注释:

①孔子. 四书·论语[M].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

②周先慎. 明清小说[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③老舍. 论讽刺[N]. 文艺报,1965-07-30.

④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⑤苗壮. 谈《儒林外史》的承前[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6(5).

参考文献:

[1]金木散人. 鼓掌绝尘[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

[2]孔子. 论语[M].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

[3]谭邦和. 明清小说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4]林辰. 明末清初小说述[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

[5]吴敬梓. 儒林外史[M]. 济南:齐鲁书社,2003.

(责任编辑 刘海燕)

Unintentional Provocation, Intentional Satire

——A Comment on the Comedic Satirical Art of *Guzhangjuechen*

SHEN Yun - xia

(College of Culture and Transmission,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450046, China)

Abstract: *Guzhangjuechen*, written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describes people with the comedic satirical art in multiple chapters. It makes the novel strongly comedic and realizes the author's intention to satirize the social conditions, so it achieves high level of success in the comedic art. Besides, it also has an profound impact on the later satirical fictions such as *The Scholars*, *Strange Tales of Liaozhai* and *Tales on Ugly Performance in Officialdom*.

Key words: *Guzhangjuechen*; comedy; satirical art

倾听绘本的声音

孙晓燕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德育教学部, 郑州 450044)

摘要:绘本让孩子观察并体验成人世界的规则,让孩子感受到生的快乐和成长的力量,同时也为成人恢复青春的语言提供动力之源。这就是绘本的力量。当下我们要做的就是,用自己的话语和声音读绘本给孩子们听,让他们在温暖生动的话语中成长。

关键词:绘本的力量;倾听;孩子;成人;成长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6.05.005

中图分类号:I10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6)05-0023-04

小时候,由于生活条件所限,没有机会阅读更多的儿童文学作品。上大学后,攻读中文专业,一直醉心于成人文学作品的阅读。等成家生子之后,家庭教育作为一个崭新的课题摆在面前时,才开始如饥似渴地投入到儿童文学、婴幼儿心理及教育等方面书籍的阅读中。近几年的亲子阅读和自我阅读让我见证了绘本的力量:绘本让孩子观察并体验成人世界的规则,让孩子感受到生活的快乐和成长的力量,同时,也为成人恢复青春的语言提供动力之源。绘本用无法再精炼的语言、无法再形象的图画从孩子的视野诠释着人与自然、社会的秘密,同时又把人与自然、社会的生存密码用孩子能听得懂的语言、看得懂的图画,一点点注入到孩子幼小的心灵里。

一、绘本:写给成人看的书

1. 孩子的眼、成人的眼

在创作中,绘本作者常用易于孩子理解的画面和不约束孩子思维而留有余白的话语,来表述他作为成人对于自然和社会的思考。因此,优秀的绘本在阅读过程中就体现出两重视角:孩子眼中的世界和成人眼中的世界,两重视角在某一个点上(感知和理解的较浅层面)相交后又向不同的方向(绘本展示的丰富内蕴)延伸,随着阅读加深,两重视角会再次相交进而产生新的诠释方法。同一本绘本,不

同的人都能从中获得不同的乐趣,这是因为绘本的图、文蕴藏着丰富的可能性。

成人读绘本,先要从孩子的视角去读,尽量去回忆儿时的感受和看待事物的方法,再融合现有成熟的阅读方法。这种自由深刻的阅读才能让绘本所蕴藏的丰富可能性逐渐呈现,才能读懂作者的人生经历、思想、审美意识、梦想和憧憬、儿童观等等,从而获得阅读的乐趣。



图1 《小房子》

先来看一下1943年获得凯迪克金奖的绘本《小房子》^[1]。该绘本是美国作家维吉尼亚·李·伯顿于1942年创作,同年在美国出版。1942年,世

收稿日期:2016-08-20

作者简介:孙晓燕(1980—),女,河南方城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德育教学部讲师,主要从事德育教学及生涯规划、就业指导研究。

界和美国发生着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举国应战！作者却能够跳出战争题材的描述，用温馨的画面描绘了一幅人们珍爱生活、处处生机盎然的景象。在主题传达中作者紧紧把握着儿童视角，她用孩子非常习惯的语调“很久以前……”开场，分外亲切。对孩子最为关注的故事要素，时间（很久很久以前）、地点（乡下）、人物（小房子），开篇叙述得简单恰当。紧接着用20个场景的变化，让孩子发现小房子与周围的环境发生的多重变化：时间的变化；交通工具的变化；道路桥梁的变化；小房子生存空间的由大到小再变大的变化；各个场景颜色明暗的变化；小房子像人一样的面部表情，从舒展到痛苦再到笑逐颜开的变化等等。最擅长找不同的孩子，被这些细微的变化所吸引。他们可能捕捉到了关于“时间”的感觉，可能感受到了具有鲜艳明亮色彩的田园生活给人带来的喜悦……

然而，作为成人的眼，除了要用孩子的眼灵敏地感知上述的诸多变化外，还要配合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去看，其内容会呈现出多样性。我们会发现书中尽述的关于“时间”的一切：白天、黑夜、一天、一周、一年，历史的形成是如此的厚重。我们也可能注意到了小房子对城市曾有的渴望：对城市很好奇，她很想知道住在那儿会怎样。当她真正住进城市里时，却发现城市里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冷漠，城市开发和扩建造成的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等，人类文明发展中总充斥着悖论。

2. 阅读绘本，可以让心灵得以回归

优秀绘本的创作者一般都具有非常丰富的儿童心理体验，又能用成人的理性思维认识生活的本质。他们通过准确捕捉儿童对生活的感知规律，在创作中真诚地表达童年的情感记忆，将成人的情感回归到儿童的情感。因此，成人在绘本阅读中，不仅仅有成人的情感体验，更有一次又一次回归童年的情感体验。这种体验能让人从繁忙的生活和工作中回归心灵，关注到自己和他者的存在。

美国绘本作家玛丽·荷·艾斯正是将她个人儿时丰富的心理体验融入到绘本《在森林里》的创作中，该绘本曾于1945年荣获凯迪克奖银奖。玛丽·荷·艾斯小时候最喜欢去森林玩耍，她曾回忆说：“儿童时代最开心的回忆就是诺斯伍德的夏天。我独自一人奔向黑暗的森林，在那里能坐好几个小时。我喜欢在那里倾听夏风吹过松树树梢的风声，期待森林中生灵的出现。比如，领着小鹿的鹿妈妈、豪猪、獾、乌龟、青蛙等等。”^[2]这种森林的幻想体验，在她陪伴得了不治之症的丈夫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

时，竟成了她心灵回归的最好方式。她日后深情地回忆：“为了度过两个人在一起的有限日子，我们达到了一个与肉体的死根本就无法破坏的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境界，开心地眺望着来到森林里的动物和孩子们的身影。”^{[1][2]}艾斯先生也因此随同做游戏的孩子和动物们成了艾斯太太记忆中的永恒。



图2 《在森林里》

玛丽·荷·艾斯所创作的《在森林里》也为后人提供了心灵回归的蓝本。从“父亲”这一形象也可窥一斑。当越来越多的动物伙伴们加入小男孩的森林幻想之旅时，随着“我”爸爸的到来，“我”被领回到了现实世界。“也许它们会一直等着你，下次再来一起玩。”^[3]正是爸爸这一句话的力量，让森林里的这个幻想世界永远地留在了男孩的心里。正因为这位父亲理解并成就了孩子的内心世界，小男孩愉快地接受了父亲的建议，骑在爸爸的脖子上回家了。我想每个成人的儿时记忆里都有永远玩不尽兴的游戏经历，当一个人的灵魂荒芜时，作为父亲的他再看待孩子时，就失去了本真和初心。童年时期的每一种经历都非常可贵，而为人父母者，是否关注过孩子是怎样费尽心力度过每一天的？只有心灵的回归，才能让孩子得到真正的成长。

二、绘本：读给孩子听的书

1. 读绘本给孩子听，不因识字少桎梏孩子对世界的理解

绘本是图与文的结合，在一定时间内，将分别阅读的文字和图画结合在一起，在读者心里构建出一个故事世界，即使是成人也是不能很好填平两者之间的沟壑，何况孩子识字量小，同时人生阅历又不很丰富，这样孩子就不太可能了解绘本中的故事，绘本的内容也就不会留在孩子的记忆中，带给孩子精神的成长。如果读绘本给孩子听，她在用耳朵听故事的同时，可以用眼睛看图画，她所看到的画面会和她

所听到的语言同时在我心中重叠,静止的绘本画面就会动起来,形成连续场景,生动形象而又立体的故事世界就会浮现在心头,趣味和快乐就油然而生。

我们来看日本作家宫西达也的《我是霸王龙》^[4],作者通过绘本想要传递给孩子的是应对凶险和黑暗的正面力量——爱和善良。作者从不掩盖社会存在的恶,凶恶的霸王龙爬到悬崖顶上要吃刚离开父母还没学会飞行的小翼龙,但作者在恶的一方阴谋即将得逞之际设定了一场灾难,火山喷发,悬崖倒塌,霸王龙因受重伤失去攻击能力而需被救助。小翼龙放下胆怯,无微不至照顾随时可能吃掉它的霸王龙。一天小翼龙出去觅食回来,看到恢复健康又能捕鱼的霸王龙,果断地飞走了,小翼龙的内心有着一释然以及眷恋。而霸王龙呢,他那一滴眼泪,让我们感到小翼龙的爱与善良里蕴藏的力量,它深深地感动了这个粗暴凶猛的家伙。我清楚地记得曾给孩子读到这里时,不识字的孩子已经抑制不住情感,趴在我的身上泣不成声。善与恶之间的张力呈现在孩子的心里,种下的是一颗善良的种子,收获的是一种包容的胸怀。



图3 《我是霸王龙》

2. 读绘本给孩子听,建造一座成人与孩子心灵沟通的桥梁

作为孩子,内心所期待的是无时无刻都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梦想。依偎在妈妈的身旁,或坐在爸爸的膝盖,听着亲人的声音,一起看着绘本的图画,这对于孩子来说是无上的幸福。在听到自己喜欢的绘本时,孩子往往竖起耳朵、眼睛发亮、精力高度集中,仿佛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书中的世界。这种打动人心的力量也让父母无法停止朗读。这样的时光,

亲子间共同拥有语言,分享快乐,并彼此接纳。作为读书的父母,可能在这一瞬间,下意识地勾起儿时的回忆,曾经的喜悦会再次涌上心头,内心会变得非常温暖。这种幸福的感觉,会不知不觉地随着读书的语调与绘本的趣味性结合在一起传达给孩子。父母语言中的这种生动的喜悦,能直接传到孩子打开的心扉里,让孩子感受到“在一起”的喜悦和言语的快乐。这种体验给予孩子生存的力量,并不断激发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心灵对话。

3. 读绘本给孩子听,让孩子感知生命

绘本是与生命共鸣的书。那些优秀的绘本会借助动物或老人等形象,以震撼心灵的方式让我们感知生命,感知那些难以言表的生命与死亡、别离和悲伤。

丹麦作家金·弗珀兹·艾克松撰文、瑞典爱娃·艾瑞克松插图创作的绘本《爷爷变成了幽灵》,是老人讲述关于死亡和永别的故事,温暖、细腻、深情。那些对往事琐碎而又温情的回忆,让孩子体验了祖孙相处时的快乐和幸福,以及永别时的伤感和从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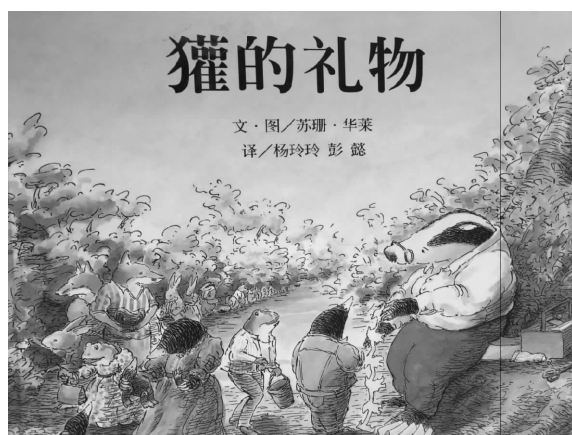


图4 《獾的礼物》

英国作家苏珊·华莱创作的《獾的礼物》则是借助动物讲述生命和死亡。绘本这样描述死亡:

……他(指獾)轻轻地来回摇晃着,很快就熟睡过去了,他做了一个奇怪却很美的梦,一点都不像他从前做过的梦。

让獾吃惊的是,他正在奔跑。他的前头是一条好长好长的隧道。他觉得双腿非常强壮,稳稳地朝着隧道跑去。他不再需要拐杖了,他把它扔到了隧道的地上。獾飞快地跑着,在长长的隧道里越跑越快,最后,他的脚爪离开了地面。他觉得自己在翻腾、旋转,起起落落,跌跌撞撞,却没有受

伤。他觉得自由了,好像已经脱离了他的身体。^[5]

这是獾临死时的感觉。孩子听到獾离开他身体这种诗意般的体验,死就已经是另一种形态的生了。这种关于死的经验,会带给孩子无穷无尽的恐怖,无法排解的悲伤吗?绝对不会。心和灵魂的永生,呼唤出生的力量。

其他绘本如法国作家蒙德利克撰文、塔莱克插图创作的《小伤疤》,以红色为基调的绘画细腻地传达出面对妈妈的死亡,男孩敏感的心理变化和情绪自我处理方法。瑞典作家汉伯格撰文、艾瑞克松插图创作的《我的爸爸叫焦尼》,讲述的是一个离异家庭的孩子与他爸爸短暂见面的故事。一个孩子这么用尽力气向全世界宣扬一件本是很平凡的事:我也有爸爸。绘本传达给孩子的没有悲伤也没有眼泪,没有埋怨也没有责备,只有永远无法割断的挚爱亲情。

正如蕾切尔·卡森所说:“如果把孩子们经历的一件件事情比喻成最终会孕育出知识和智慧的种子,那么各种情绪和丰富的感知力则是让这些种子

茁壮成长的肥沃土壤。幼年,正是耕耘这片土壤的最佳时期。”^[6]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用自己的话语和声音读绘本给孩子听,让他们在温暖生动的话语中成长。

参考文献:

[1][美]维吉尼亚·李·伯顿.小房子[M].阿甲,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1.

[2]彭懿.世界图画书阅读与经典[M].南宁:接力出版社,2011.

[3][美]玛丽·荷·艾斯.在森林里[M].赵静,译.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5.

[4][日]宫西达也.我是霸王龙[M].杨文,译.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1.

[5][英]苏珊·华莱.獾的礼物[M].杨玲玲,译.济南:明天出版社,2015.

[6][美]雷切尔·卡森.惊奇之心[M].王家湘,译.南宁:接力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 刘海燕)

Listening to the Voice of Picture Books

SUN Xiao – yan

(Department of Moral Education,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Picture books provide the chance for children to observe and experience the rules of adult world and help children experience happiness and growth power. Meanwhile, picture books provide the power source for adults to recover the void language. This is the power of picture books. Now, what we should do is to read picture books for children with warm and vivid words.

Key words:power of picture books; listening; child; adult; growth

创伤·认同·救赎:《灿烂千阳》的创伤叙事解读

杨 澜

(河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郑州 450002)

摘 要:本文立足精神创伤研究视角,结合斯皮瓦克的属下阶层理论,分析美国当代作家卡勒德·胡塞尼的小说《灿烂千阳》中由于战乱与突发事件造成的创伤性经历,揭示阿富汗文化背景下女性的个体创伤史与集体创伤记忆之间的互文关系,以及阿富汗社会中饱受压迫的女性如何摆脱束缚、寻找自我,从受害者的身份向救赎者的身份转变。

关键词:创伤;救赎;《灿烂千阳》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6.05.006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6)05-0027-05

《灿烂千阳》是美国作家卡勒德·胡塞尼继《追风筝的人》后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阿富汗内战背景下的两位女性玛丽雅姆和莱拉命运交织重叠的故事。玛丽雅姆与莱拉尽管身份迥异,却经历了相似的创伤事件:悲惨的童年、死亡事件、婚后遭受暴力等等。两位女主人公的经历反映了阿富汗社会中饱受压迫的女性如何摆脱束缚、寻找自我,最终从创伤受害者的身份向救赎者的身份转变。事实上,从《追风筝的人》开始,胡塞尼的小说中就充斥着多种形式的创伤:战争、自然灾害、性暴力、家庭暴力、亲人的死亡及自杀等等,而在《灿烂千阳》中,作者有意安排了两位女主人公的创伤经历,使之形成相互呼应、首尾衔接的互文关系。

《灿烂千阳》讲述了一个关于创伤与救赎的故事:两位伟大的女性在经历了暴力、战乱与死亡后,以强大的爱心与慈悲互相扶持,在宽恕对方的同时救赎了自身。她们既是各自创伤的见证人,又是与施加创伤的外力合力对抗的战友。归根到底,玛丽雅姆和莱拉同属于男性霸权社会中的弱势个体,她们的创伤性经历不仅具有同一性,更是整个阿富汗妇女血泪史的缩影。在小说中,两位女性的关系从一开始的对立、敌对到相互同情、帮助与关怀,而她

们各自的创伤也从平行走向交汇,最后相互消解,各自愈合。两人的创伤历史即阿富汗妇女饱经沧桑的共同历史,小说从精神创伤叙事的视点展现了阿富汗女性的成长史与反抗史。两位女性在经历了一系列来自父权和夫权的压迫后,相互扶持,共同完成了自我重建与灵魂的救赎。本文立足精神创伤研究视角,结合斯皮瓦克的属下阶层理论,通过分析《灿烂千阳》中两位女性各自创伤史的独特性与互文性,揭示精神创伤在胡塞尼小说创作中的特殊地位。

创伤之一:被迫认同与反认同

根据斯皮瓦克的属下阶层理论与朱迪思·巴特勒的性别研究理论,社会实际场景中的女性不过是男性霸权阶级的属下阶层,是霸权的对象、被动的承受者。小说虚构场景中的女性形象往往也不足以具备独立的人格与完善的话语权,而仅仅作为了霸权阶层理论的被动实践者、男性的欲望主体而存在。属下阶层意识为否定意识,与霸权意识是相反共存关系,只能借助官方反叛乱的文本或精英文献间接地认识属下阶层意识。^{[1]5}

以《灿烂千阳》中的玛丽雅姆为例,给她带来无尽痛苦的是她生命中两位最为重要的男性角色:父

收稿日期:2016-05-25

基金项目:2015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伦理视域下的伊恩·麦克伊万小说研究”(2015BWX028)

作者简介:杨澜(1982—),女,河南潢川人,硕士,河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从事英美文学的研究与教学。

亲与丈夫——男性霸权的代表。身为私生女的玛丽雅姆从小便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她是母亲口中的哈拉米，她是父亲藏在肮脏的棚屋里的脏东西，从未享受过双亲和睦、其乐融融的天伦之乐，也无法与同龄的儿童建立友谊，对他人诉说。这样的创伤是被边缘化的属下阶层在霸权社会中体会到的。从儿时开始，没有学校与朋友的玛丽雅姆主要依靠他人的叙述来认识世界、认识自我。从儿时父亲的讲述，到婚后丈夫的灌输，再到被执行死刑前男狱管的话语，玛丽雅姆始终是通过他人的讲述来构建自我意识。而当讲述者与聆听者分别为霸权阶层与属下阶层，前者的讲述本身就带有极大的偏激与歪曲，故而导致后者扭曲的自我意识。通过向属下阶层灌输充斥着被动接受、安于现状等概念的理论，霸权阶层进一步地巩固了属下阶层的被动地位，同时盘剥了后者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可能性。更令人气愤的是，当属下阶层中的某些个体开始觉醒并具备些许独立意识与判断能力时，这样的少数派往往得不到作为大多数的奴性属下阶层的认同与支持。

正因为此，玛丽雅姆听信了父亲为自己编织的美梦，不愿相信母亲口中所说的胆小懦弱、自私自利的父亲的真面孔。而当现实将玛丽雅姆的美梦击碎时，长期对霸权阶层理论的被动接受已经让玛丽雅姆丧失了反抗的能力，只能听任丈夫摆布。在一系列的创伤性经历中，玛丽雅姆都是被动的、没有话语权的：她无权为母亲的去世呼喊补偿，她无权对自己的婚姻进行选择，面对人生的重大转折完全没有表达主观意愿的机会。如果说不被父亲承认是第一重创伤，母亲的过世是第二重的话，那么被迫嫁给拉希德、远离熟悉的面孔与环境则是另一次被遗弃。玛丽雅姆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的生活在短暂的时间内竟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她觉得自己身处他乡异地，不知身在何处，好像闯入了别人的生活”。^{[2]32}婚后，玛丽雅姆的生活进入了另一个充斥着恶梦与创伤的阶段，与拉希德家居环境的肮脏狭窄相同的是拉希德本人品行的粗俗与暴力。首先，她了解到拉希德曾有过一任妻子，以前还有个儿子，但不幸早逝，迎娶玛丽雅姆并不是因为炽热的感情或出于怜悯与同情，仅仅因为拉希德需要一个服侍他起居的女人，并希望这个女人帮他传宗接代。也就是说，被父亲再次抛弃的玛丽雅姆不过是一件廉价的替代品，她再次沦为了工具和所有品。

赵冬梅博士提到，心理创伤可以导致多方面的

改变，如早期的受虐经历能够影响甚至阻碍一个人发展稳定的自我感觉。^{[3]93}多年的创伤经历让玛丽雅姆失去了生气与热情，变得麻木与绝望。因此，当莱拉作为另一个属下阶层个体出现在玛丽雅姆身边时，玛丽雅姆对其的反应最初表现为强烈的怀疑与敌意。对莱拉而言，她失去家人与恋人，被迫嫁给拉希德后又受其虐待，这对于尚未成年的莱拉可谓经历了他人的死亡、彻底性分离与家庭暴力的三重创伤，与玛丽雅姆同样遭受了身心的巨大创伤后，前者的不理解与不同情使莱拉被再一次地被边缘化。与玛丽雅姆不同的是，胎儿之死与长年遭受的身体虐待象征着玛丽雅姆的主体之死，她将从别人口中听来的认同理论化为了内心的负疚感，站在沉默与绝望的悬崖上等待死亡的实际降临。而莱拉作为受过教育、具有反抗精神的新女性，既不能忍受丈夫对自己的暴政，也无法对同为弱者的他人所受的暴力坐视不管。因此，莱拉首先代表属下阶层向拉希德代表的霸权阶层提出了反抗，而她的奋起反抗唤醒了玛丽雅姆心中长期被压抑的愤怒与希望。

创伤之二：从被“隐形”到被“妖妇”化

小说中有着这样的一段描写：“玛丽雅姆此前从未穿过布卡。拉希德只好帮她穿上。加了衬垫的头套很沉重，紧紧裹着她的脑壳；隔着一层网状的屏障看世界也是很奇怪的体验。她穿着布卡，在她的房间里练习走路，老是踩到裙边，步履蹒跚。由于看不到周边的境况，她变得很紧张，而且她也讨厌那褶皱的布料总是不断地以令人窒息的方式盖住她的嘴巴。”^{[2]74}就这样，玛丽雅姆的私人空间进一步退化、被压缩到仅剩布卡里稀薄的空气。布卡仿佛神奇的隐身衣，让真实的玛丽雅姆消失在其后，只剩下一个虚构的贞女形象。而布卡又像一幅眼罩，遮挡着玛丽雅姆的视线，让她不得不跟随丈夫的指引，对其言听计从。穿上布卡的女人被模式化、隐形化了，象征着男性强权意识对女性个体意识的剥夺与抹杀。

就这样，在丈夫的引领下，玛丽雅姆穿越了街巷，借丈夫的眼睛和语言得以了解外面的世界。她看到许多浓妆艳抹、搔首弄姿的女人，后者与自身强烈的反差让玛丽雅姆自惭形秽。在她的想象中，这些女人全都念过大学，在写字楼上班，在属于她们自己的办公桌后面打字、吸烟、打重要的电话给重要的人物。玛丽雅姆觉得这些女人神秘，使得她联想到自己出身寒微、姿色平庸、胸无大志、知识贫乏。然

而,从后文玛丽雅姆在拉希德房间找出的色情杂志一幕不难看出,作者有意暗示玛丽雅姆眼中这些高贵的女人很可能是出卖肉体的妓女。这其间的差异正是夫权和父权之下女性的双重异化:要么是布卡后唯唯诺诺的“贞女”;要么是将自身物化、作为娱乐男性的工具而存在的“妖妇/妓女”。丈夫拉希德给妻子戴上象征贞洁与禁欲的布卡,将妻子囚禁在一层面纱之后,不让其他男性瞥见妻子的面容,从而树立了传统的贞女形象,并进一步强调了自己作为家中拥有者的权利。然而,丈夫拉希德自己却偷偷翻看色情杂志中搔首弄姿的裸体女性:一种合理化的、男性专属的偷窥行为。不论玛丽雅姆还是街上的艳妆女人,都不过是话语权的拥有者、规则的制定者——男性享用、支配的对象。男性权力话语机制对女性弱势个体长期进行如此的打压与欺骗,使得女性认同这样的划分与界定,其后果即自行将自我禁锢在传统的道德观念之中寸步难行;与此同时,男性对女性进行贞女/妖妇(妓女)这样粗糙的二元划分,极有可能使得女性群体内部发生分裂与对立,以及女性个体内心的分裂与扭曲。

相比被布卡第一次“隐形”,玛丽雅姆被迫躲到阁楼上就象征着进一步地被“隐形”:家中有男性客人时,玛丽雅姆就必须躲在自己的房间中,直到客人离开。可悲的玛丽雅姆并不因此觉得不公,反而“沾沾自喜”,觉得“拉希德把他们的关系看得很神圣……他的保护让她觉得很光荣,觉得自己很宝贵,很重要。”^{[2]84}与创伤理论中的“分离”概念契合的是,创伤性经历的幸存者往往会选择“封闭的地域空间以躲避创伤”^{[4]20};而不仅仅是巧合的是,玛丽雅姆在阁楼上觉得自主舒服,因为她避开的正是给自己造成最大伤害的男性/夫权,是潜意识中对潜在创伤的自行规避。根据创伤理论,一再的分离体验引发严重的恐惧与焦虑,直接影响个体对自我的认知,极易产生错误的自我意识。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小被父亲背叛、抛弃的玛丽雅姆误将拉希德的霸道、不公当做了对自己的保护与珍惜,这是由于玛丽雅姆从未被赋予自由选择的权力,习惯了听从他人的、尤其是男性的安排,内心从而产生了扭曲的自我形象。拉希德代表的男性强权制定了针对女性的双重标准,将她们以妻子、贞女与妓女、妖妇进行区分,自己却可以自由地在丈夫、嫖客、偷窥者等身份间切换。对于女性而言,无论贞女还是妖妇都没有自主性,仅被视为象征意义上的交换客体:她们被男性夺

去独立工作与接收教育的机会,失去独立空间,成为男性欲望投射的客体与维系社会发展的繁衍工具。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歪曲与伤害给处于弱势的属下阶层个体带来最彻头彻尾的伤痛,势必造成身心的撕裂,形如死亡。小说中玛丽雅姆与莱拉重复经历的一系列死亡事件正是自我肉体与心理遭受巨大创伤的明证。

母性是女性的本能,是女性内在美的表现之一,而男性霸权阶层利用女性与生俱来的生育能力与母爱的本能,将其化为禁锢与打击的工具,将女性进一步地对象化、他者化、“妖妇”化。以十五岁便失去母亲的玛丽雅姆为例,自己成为母亲大概是正视童年的创伤、走出其阴影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不幸的流产事件无疑是另一桩创伤性事件,不仅让玛丽雅姆的期待落空,还要忍受丈夫变本加厉的折磨。流产事件虽然是偶发性的,却与玛丽雅姆经历的一桩桩创伤性事件彼此相关:母亲的自杀与父亲的抛弃导致了其内心强烈的失落感与负罪感,前者在玛丽雅姆婚后进一步滋生成为对拥有自己的家庭及子女的渴望,而后者则扭曲了她的认同感,让玛丽雅姆错误地认为自己罪有应得、命该如此。这就是创伤的反复性(Repetition):创伤性事件从不会很快被遗忘、或自行随时间消逝,它们总是潜伏在记忆深处,一旦现实中再不幸发生,势必与之前的创伤性事件再次融合,化为更强烈的、更具破坏性的创伤。

失去胎儿的痛苦让玛丽雅姆感到迷失、困惑,拉希德冷淡粗暴的态度让玛丽雅姆怀疑真主、怀疑自己的命运,但孤独与迷茫中的玛丽雅姆得出的最终结论是:自己所受的精神与肉体的磨难都是真主的考验,卑微的自己根本不应该质疑真主、指责真主。不幸遭遇流产的玛丽雅姆非但没有得到丈夫的庇护与关心,反而被认为是没用的工具,换来无尽的冷遇与虐待。与被父亲抛弃的经历相似,同样扮演着强权者角色的丈夫对无法生育的玛丽雅姆不管不问,即第二次抛弃。其背后的缘由则是男性心中女性要不是(听话的、任人摆布的)贞女,要不就是(无法生育的、不能迎合男性需要的)妖妇。

另一个被拉希德视为“妖妇”的是莱拉,而拉希德对莱拉先后态度的强烈反差正是基于男性对于女性不公平的二元划分:先是将年轻貌美的莱拉视若珍宝,而后发觉莱拉腹中胎儿并非自己亲生则立刻贬之为妖妇。与玛丽雅姆在没有选择权的情况下嫁给拉希德不同的是,莱拉为了保护塔里克的孩子而

主动选择嫁给拉希德。对于失去家人与恋人的莱拉来说,以保全与塔里克的爱情结晶来保存两人的爱情,是在陌生的环境中存活下去的唯一希望,是为了弥合过往创伤的一种自我救赎。与莱拉和塔里克的真挚感情相比,与拉希德的婚姻是为了保存生命的权宜之计,但这同时又是莱拉的自我背叛、对塔里克的背叛和对两人爱情的背叛,这样的精神创伤加上家庭暴力让年轻的莱拉身心备受煎熬。

两段创伤历史的重叠与相互拯救

莱拉曾失去了母亲与伙伴,而她在年长的玛丽雅姆身上发现了母亲与伙伴的模样“莱拉端详着玛丽雅姆眼皮松弛的面部,因为劳累而生出眼袋的眼睑,还有她的嘴巴四周深深的皱纹……莱拉看到的不再是一张敌人的面孔,而是一张自认命苦、忍辱负重、隐藏着无尽悲哀的脸庞。”^{[2]253}在这样的瞬间,莱拉看到的是俨然自己母亲般苦命的女人的脸庞。共同的遭遇让莱拉觉得与玛丽雅姆的距离被拉近了——从未与母亲如此亲近的莱拉找到了与母亲相伴的感觉:一同做家务、一同打扫、一同照顾婴儿。莱拉在直面自己的创伤的同时也解放了同伴,她的容忍与同情让另一个遭受相似创伤的同伴不再感到孤单。她与玛丽雅姆成了一家人,既是姐妹、也是母女。如同苏珊·布里森指出的那样“见证创伤经历”对于遭受创伤的个体走向积极、卸下心理负担是极为有益的。^{[4]23}在两人的相互倾诉中,各自被强加的贞女/妖妇身份一一散去,只留下真实的姐妹/母女关系。在摆脱了被男性话语界定的虚假身份后,两位女性不仅合建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回归了女性的本真身份,更得以纠正被歪曲的自我形象,从而更顺利地 toward 创伤的愈合递进。

为了完成创伤的穿越、真正地告别过去那个依靠别人的讲述的“哈拉米”,玛丽雅姆决定帮助莱拉,这是玛丽雅姆走出创伤的决定性阶段,在释放母性、充当莱拉与阿兹莎的保护者的同时充分了解了母亲为自己做出的种种牺牲,既原谅了自己的母亲,也化解了心中的负疚感,并收获了身为人母的满足感。在莱拉到来之前,玛丽雅姆已经习惯了被剥夺话语权的生活,习惯了按照别人的、尤其是按照丈夫的指令生活,从小棚屋到阁楼,从厨房到牢房,玛丽雅姆一生所居住过的空间都是封闭的、狭小的、被男性话语支配的。莱拉的遭遇如同一面镜子,映射出玛丽雅姆自己的苦难,让她有勇气直面与反抗,

让玛丽雅姆二十几年来第一次质疑拉希德的不公与暴虐。当拉希德快要杀死莱拉时,玛丽雅姆做出了她有生之年最勇敢的决定“玛丽雅姆不能也不会容许这件事发生。结婚二十七年来,他已经从她这儿夺走太多。她不会看着他把莱拉也抢走。……这么做的时候,玛丽雅姆突然想起,这是她第一次决定自己生活的轨迹。”^{[2]354-355}从听从别人的指令、依赖别人的叙述,到决定自己的生活、表达自己的意愿,玛丽雅姆成功地穿越了创伤,拯救了他人也释放了自己。玛丽雅姆的生命历经磨难,最终以救赎终止了创伤。

在偶然的场合下,玛丽雅姆与莱拉两人合力杀死了拉希德,这无疑是被压迫者心中积怨的集体井喷,而两人也由此象征性地逾越了男性霸权,重新发现了构建真实自我的可能性。可悲的是,玛丽雅姆选择了暴力的方式,从而决定了死亡是自己最后的归属。然而,面对最后的死亡,玛丽雅姆并无恐惧,她的梦中年轻的父亲、慈祥的老者、芬芳的野花和温柔的母亲无不暗示着回归与新生。更重要的是,玛丽雅姆最终获得了母亲、伙伴与保护者的身份,有了自己的归属,而死亡不过是新生的开始。可喜的是,对于觉醒后的玛丽雅姆,莱拉是一个自我认同过程中出现的他者:一个与自我有着相似的创伤经历,但比自我更强大、更清晰的他者。认识到这一点的玛丽雅姆毅然牺牲自我以保全莱拉:另一个自我的成长。在经历了怀疑——对立——接受——认同这一阶段后,玛丽雅姆与莱拉的形象合二为一,整合为一个历经创伤但未被创伤击垮的强大个体:牺牲自我以成全他人,而在他人的身上延续更好的自己。这样一来,长期被分裂的自我得到了整合和统一,长期遭受的创伤也得以愈合。

结语

在纷繁复杂的世间万象中保持理智与平静是困难的,而遭受创伤是普遍的、不可避免的。小说中的丈夫拉希德可以说也是创伤性经历的受害者,他深受丧子之痛,希望再次拥有子嗣而屡屡不能实现。但拉希德缺乏对生命的整体认识、缺乏自省的能力和对女性的起码尊重,从而将自我的创伤转移,造成了他人的痛苦以及最后的自取灭亡。相反地,莱拉、莱拉的母亲与玛丽雅姆、玛丽雅姆的母亲娜娜都是创伤性经历的受害人,都不得不忍受婚姻内的暴力以及社会动荡带来的命运波折,但她们并没有对

生活丧失信心,更没有将其他无辜的人拉入自己痛苦的沼泽中。与拉希德相反,玛丽雅姆与莱拉通过创伤不断地发现自我、认识自我、辨识他人、探明真相,她们在创伤的洗礼后变得更加坚强勇敢,重获新生。胡塞尼试图通过她们的故事说明创伤性经历的可穿越性与可愈合性——创伤可能是灾难性的,但灾难并不是永久的。同时,玛丽雅姆和莱拉的遭遇与磨难并不是独特的,而具有更广泛的、普遍的社会意义。在分享与聆听中,两位女性的创伤经历交汇融合,两人的形象也发生了重叠,她们的经历是千千万万母亲、女儿与妻子的普遍经历,饱受家暴与战火折磨的阿富汗妇女绝不仅仅只有她们两人:忍痛送爱子去前线打仗、因思念成疾的莱拉的母亲,不得不忍受各种嘲讽与屈辱的玛丽雅姆的母亲,被炮火吞噬的莱拉的儿时伙伴,以及无数因战争流离失所、或被迫卖身、或惨遭凌辱的妇女,在与死亡直面的过程中逐渐揭示生存的真相^{[5]6},此谓创伤经历带给当事人的正面意义。她们无法改变创伤性经历的破坏性,却可以选择面对创伤,直视现实。最关键的是,在面对创伤的过程中发现自我、审视自我,最终穿越创伤、实现灵魂的重生。这样,创伤的受害者就从被

动承受者变身成为主动讲述者,将被客体化的个体再次主体化,将被边缘化的个体再次带回话语界。《灿烂千阳》通过两位女性生活空间的交错、重叠与合并的故事,体现了个体创伤与集体创伤、历史创伤达到相互融合的过程。两位女性的创伤经历映射出创伤带给个体的伤痛,以及走出创伤、拨云见日的灿烂前景。

参考文献:

[1]陶家俊. 价值、性别和反认同政治:论斯匹瓦克的属下阶层理论[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4).
[2][美]卡勒德·胡塞尼. 灿烂千阳[M]. 李继宏,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赵冬梅. 弗洛伊德和荣格对心理创伤的理解[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
[4]朱云. 疏离、记忆与倾诉:解读《乐园》中的“创伤之家”[J]. 当代外国文学,2011(1).
[5]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rauma · Identity · Redemption:
An Analysis of Trauma in *A Thousand Splendid Suns*

YANG L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modern studies of trauma and psycho – analysis, together with G. C. Spivak’s subaltern theor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traumatic experience caused by war and other incidents in *A Thousand Splendid Suns* written by Khaled Hosseini, reveal intertextuality relations of history of trauma in both individual females and the whole female group in Afghanistan culture. Besides, the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of Afghanistan women from victims to self – redeemers, who seek the means of breaking away from oppression and trying to get self – identity.

Key words: trauma; redemption; *A Thousand Splendid Suns*

绩效视角下的营运资金管理效率研究

刘 辉

(大连广播电视大学 财经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11)

摘 要:市场经济环境下,营运资金被视为企业“流动的血液”,基于企业实际情况进行营运资金规划、监督、控制,可以使营运资金有效地应用于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提高企业绩效,促进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良好的生存与发展。基于此,本文从绩效视角出发,就如何提高企业营运资金管理效率进行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绩效;营运资金管理;管理效率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6.05.007

中图分类号:F23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6)05-0032-04

营运资金管理效率作为体现企业某一时期内所获取资金盈利水平的高低的评价方式,提高营运资金管理效率就是提高企业绩效。所以,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企业应当高度重视营运资金管理,基于企业发展需求及企业生产经营实际情况,提出切实有效的营运资金管理措施,科学、合理地实施营运资金管理,提高营运资金管理效率,进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为良好地发展企业创造条件^[1]。

一、营运资金及营运资金管理

(一) 营运资金

营运资金,是指企业经营过程中用于日常运营周转的资金。狭义的营运资金是指企业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差额部分;而广义的营运资金是一个具体概念,包含了企业所有流动资产,侧重于流动资金管理。从现代企业财务管理角度来说,营运资金包括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在营运资金管理中应当加强这两方面的管理,才能使其充分发挥作用。

基于以上对营运资金的了解及企业营运资金流动与应用的实际情况,确定企业营运资金具有多种特点。参考相关文献及自身工作经验总结,确定营运资金的特点,主要表现为:

(1) 营运资金周转时间短。无论是狭义或广义定义营运资金,都明确说明了其涉及短期的流动资金或流动负债。因此,营运资金的周转期较短,基本上在一年左右,甚至更短,这就意味着营运资金的周转对企业生产经营影响时间较短。

(2) 营运资金变现能力强。企业大部分营运资金都可以在短期内被消耗或出售,如存货或转为应收账款,进而实现营运资金变现。另外,在企业面临资金周转危机时,可以抵用现金,帮助企业渡过危机。所以,变现能力较强是营运资金的一大特点,在营运资金管理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特点,对于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予以有效的监督与控制,那么将提高营运资金的利用率,为企业创造较高的经济效益,促进企业良好发展。

(3) 营运资金的形态具有较强波动性。因为营运资金主要是以货币资金、存储资金、生产资金、结算资金等形态存在的,这使得营运资金在应用或存储时,具有灵活的变动形态,以便有效地、方便地应用或存储营运资金。

(4) 营运资金的来源具有多变性。对于营运资金的筹集,企业通常采用多种渠道,如商业信用、贸易等,进而筹集到营运资金^[2]。因此,企业可以充

收稿日期:2016-06-24

作者简介:刘辉(1969—),女,辽宁大连人,大连广播电视大学财经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财务理论研究。

充分利用营运资金来源多变性的特点,充分考虑营运资金的风险程度,进而合理规划营运资金的运用。

(二) 营运资金管理

1. 营运资金管理

目前,对于营运资金管理的定义,是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来说明的。狭义的营运资金管理是企业某个时期内,所有流动资产去掉流动负债之后的显示余额。通常,在企业财务会计工作中会这样理解营运资金管理,并且在企业某时期内因短期支付需求和实际资金支付,会借助营运资金管理来反映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以便企业渡过短期内的财务风险。而广义的营运资金管理是指企业在某个时期内的所有流动性资金,包括有价证券、现金、应收账款、预付账款等。这样理解的营运资金管理,使得企业在某时期内依据营运资金管理对象变化及发展情况,借助营运资金管理准确反映企业流动资金情况,进而合理实施财务管理,保证生产经营与理财有机结合。

2. 营运资金管理内容

基于以上对营运资金管理的概述,确定营运资金管理的内容为:

其一,存货管理。出于保证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开展的考虑,企业应当保证存货量具有一定的规模,而非过多或过少。因为企业存货量过多,不仅会占用营运资金,还会增加仓储费、管理费、人工费等,使得企业资金成本增加;企业存货量过少,那么良好的销售机会面前,企业通过存货变现所得到的资金不多,这不利于企业价值提升。

其二,应收账款管理。应收账款是企业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提高企业竞争实力,从而对外赊销商品、提供劳务造成的。大部分企业是不愿意赊销的,但是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要想在市场环境中销售更多产品,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就需要采取必要的手段来刺激产品销售,赊销就是有效的手段之一,因此目前大多数企业都开展信用业务。但这项业务的开展也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容易加剧企业经营风险,使企业承担坏账损失。而应收账款管理的实施,则可以对企业应收账款予以控制,降低经营风险,并且可以尽量降低坏账损失^[3]。

其三,应付账款管理。企业合理的运营应付账款,利用节省的营运资金,能够促使企业更好地生产经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但是,对于应付账款的运用,企业不能无限期的推迟付款时间,否则将会影响企业商业信用,不利于企业未来融资或贷款。应付

账款管理的实施,以应付账款周转次数为标准,科学、合理地控制应收账款量及使用时间,如此不仅使企业可以有效地运用应付账款解决短期资金紧张等情况,还能保证企业商业信用不会受到影响。

3. 营运资金管理目标

企业内实施营运资金管理的目标是:

(1)保持资金的流动性。营运资金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不仅能够保证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稳定进行,还能在企业资金周转困难时发挥作用。营运资金管理作为影响营运资金流动性的重要手段,借助营运资金管理来合理地安排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数量、种类、期限等,可以保持资金的流动性。

(2)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虽然流动资产本身没有创造现金流量的能力,但能够影响企业价值。科学、合理地实施营运资金管理,促使营运资金有效地应用,提高企业绩效,能够间接促进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4]。

二、营运资金管理效率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为了深入了解营运资金管理效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此利用假设—实证方法进行具体的分析与探讨。

(一) 提出假设

1. 提出假设

假设1:现金周期与公司绩效具有负相关关系。

假设2:应收账款周转期与公司绩效具有负相关关系。

假设3:存货周转期与公司绩效具有负相关关系。

假设4:应付账款周转期与公司绩效具有负相关关系。

2. 样本选择

选取2010—2014年上市公司的数据。出于数据的有效性考虑,按照以下标准来筛选数据,进而获取有效的样本数据。

(1)剔除数据不全的公司样本。

(2)剔除金融保险类公司样本。

(3)剔除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公司样本。

(4)剔除年度销售增长率超过5的异常增长公司样本。

(5)剔除周转期绝对值大于1000的公司样本。

3. 变量设定

对于营运资金管理效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的变量设定,主要是:

(1)因变量——公司绩效指标。参考相关文

献,确定国内外学者均认同的主营业务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托宾 Q 值等作为衡量公司绩效的指标。

(2)自变量——营运资金管理效率指标。考虑前面假设内容,确定营运资金管理效率指标为现金周期、应收账款周转期、应付账款周转期、存货周转期。

(3)控制变量。控制变量的有效手段为公司规模,即公司经营状况及实力体现,直接影响公司的组织形态和决策能力,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绩效;控制变量的有效手段为财务杠杆,即作为影响公司价值的重要手段,财务杠杆的提高,可以使企业价值增加,反之,会影响公司绩效。利用财务杠杆控制变量,可以深入研究公司财务状况对绩效的影响程度^[5]。

(二)模型设计

基于相关理论及相关文献,确定在营运资金管理效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的实证分析中,设计的理论模型为:

第一个模型是主营业务资产收益率模型:

$$Y = \beta_0 + \beta_1 CCC + \beta_2 \ln(\text{SALES}) + \beta_3 \text{LEV} + \varepsilon$$

第二个模型是托宾 Q 值模型:

$$TQ = \beta_0 + \beta_1 CCC + \beta_2 \ln(\text{SALES}) + \beta_3 \text{LEV} + \varepsilon$$

第三个模型是现金周期各个组成部分与公司绩效相关性的模型组:

$$Y = \beta_0 + \beta_1 \text{DSO} + \beta_2 \ln(\text{SALES}) + \beta_3 \text{LEV} + \varepsilon$$

$$Y = \beta_0 + \beta_1 \text{DPO} + \beta_2 \ln(\text{SALES}) + \beta_3 \text{LEV} + \varepsilon$$

$$Y = \beta_0 + \beta_1 \text{DIO} + \beta_2 \ln(\text{SALES}) + \beta_3 \text{LEV} + \varepsilon$$

(三)实证结果分析

采用统计学方法对样本数据的各个变量的均值、最大值、最小值、标准差进行描述,得到营运资金管理效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的描述性统计表(见表1)。

表 1 营运资金管理效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的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主营业务资产收益率	-0.0137	0.6142	0.1795	0.0745
总资产收益率	-0.5124	0.4101	0.0846	0.0574
托宾 Q 值	0.8469	4.6215	1.6013	0.4125
现金周期	-86.4512	893.0154	158.998	103.459
应收账款周转期	1.3652	631.1821	150.0142	93.987
应付账款周转期	0.3214	338.986	65.8414	48.157
存货周转期	0.0142	671.013	79.0111	60.154

参考表 1,了解公司主营业务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托宾 Q 值的最小值与最大值,通过数据对比可以确定公司业绩差异较大,且营运资金管理效率差异较大。其中,存在负值的现金周期,反映出企业销售存货和应收账款的时间比支付应付账款的

时间短,由此可以确定公司的流转状况良好。总之,根据以上实证分析确定营运资金管理效率与公司绩效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即营运资金管理效率高直接影响公司绩效^[6]。

三、绩效视角下营运资金管理效率的强化

(一)营运资金管理效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基于以上营运资金管理效率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确定现金周期、应收账款周转期、应付账款周转期、存货周转期均会影响企业绩效。所以,基于绩效视角出发,对营运资金管理效率研究确定,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1. 生产渠道营运资金管理效率

生产渠道营运资金管理效率对企业整体绩效的影响程度较大。因为在企业业务发展的过程中,各项业务的推进必然会占有大量资金,使得企业流动资金减少,如此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会受到影响。但是营运资金管理的科学实施,稳抓生产渠道营运资金管理,提高生产渠道营运资金管理效率,可以使设备管理等方面的资金充分有效地应用,使得企业各项工作稳步推进,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绩效。所以,生产渠道营运资金管理效率会正面影响企业绩效,利于提高企业绩效的整体水平。

2. 采购渠道营运资金管理效率

物资采购必然会占用企业一部分资金,使得企业流动资金减少,如若物资采购量较大,那么将会占用大量的资金,使得企业用于生产经营的流动资金较少。营运资金管理的实施过程,基于企业物资采购的实际情况,合理地规划采购渠道营运资金管理,提高采购渠道营运资金管理效率,利于降低物资采购成本,使得企业流动资金增多,如此可以将更多的流动资金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投资活动,提高企业绩效。所以,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科学、合理地实施采购渠道营运资金管理,提高采购渠道营运资金管理效率,同样利于企业整体绩效水平的提高。

3. 营销渠道营运资金管理效率

实践研究证明,企业营销营运资金管理的效率与企业整体绩效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基于此,在企业生产经营的过程中,一定要基于企业实际情况,不断优化发展业务形式,促使企业营运资金可以迅速地周转,以便企业更好地开展营销活动,提高产品销售量,提高企业绩效,为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创造条件。另外,提高营销渠道营运资金管理效率还有利于维护企业形象。营销渠道营运资金管理的有效

推行,提高管理效率,就意味着营销渠道增多,产品营销活动良好展开,能够间接提升企业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所以,营销渠道营运资金管理效率的提升,能够提升企业绩效,也利于提升企业的形象^[7]。

(二) 营运资金管理效率的强化措施

综合以上内容的分析,确定营运资金管理效率与企业绩效具有正相关关系。为了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应当从企业绩效视角出发,采取有效措施来强化营运资金管理,提高营运资金管理效率。那么,企业如何强化营运资金管理效率呢?

其一,优化调整企业的生产经营形式。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企业应当出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考虑,结合企业内外部环境,对企业生产经营形式予以优化调整,使其逐渐向自动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如此营运资金管理的实施将会引入科学技术,对企业生产经营进行科学、合理的监督与控制,促使生产经营活动在营运资金的支持下良好地运行,促进企业绩效提升。

其二,制定健全的营运资金管理制度。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为了使营运资金管理充分发挥作用,提高营运资金管理效率,一定要基于国家相关标准及企业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地进行营运资金管理制度的构建,保证健全的、完善的营运资金管理制度适用于企业中。营运资金管理制度应当对应付账款管理、应收账款管理、存货管理进行严格的约束和规范,使得应付账款管理、应收账款管理、存货管理在企业内充分发挥作用,在提高营运资金管理效率的同时,辅助企业规避经营风险,提升企业绩效,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四、结束语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营运资金管理效率作为提高企业绩效的有效手段,有利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为此,企业应当高度重视营运资金管理,基于企业发展需求及企业生产经营实际情况,提出切实有效的营运资金管理措施,科学、合理地实施营运资金管理,提高营运资金管理效率,进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为良好地发展企业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 张宁. 上市公司营运资本管理与公司绩效分析: 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D]. 济南: 山东大学, 2010.

[2] 赵欣, 张冉. 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营运资金管理绩效分析[J]. 会计师, 2013(12): 52-54.

[3] 赵欣. 我国房地产业上市公司经营活动营运资金管理效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D].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 2014.

[4] 于森林. 企业集团营运资金管理模式研究: 基于 M 型组织结构的企业集团视角[D].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 2013.

[5] 郭玲. 创业板上市公司营运资金管理效率及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D]. 石家庄: 河北经贸大学, 2014.

[6] 高丽萍. 企业资源规划系统宣告效果与财务绩效评估之研究: 以两岸上市企业为例[D].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2010.

[7] 马鑫. 制造业上市企业营运资金策略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D].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 2015.

(责任编辑 刘成贺)

Research on the Efficiency of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formance

LIU Hui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Radio & TV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011,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market economy, working capital is regarded as the “flow of blood” of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enterprises, planning, monitoring and controlling of the working capital can make it effectively applied in daily production and business activities, improve business performanc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in the market economy. Based on above, the methods of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s are analyzed and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formance.

Key words: performance;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management efficiency

网络营销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以微商为例

吴文瀚, 彭展

(河南工业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郑州 450001)

摘要:移动互联网时代下,微商的出现不仅创造了巨额的财富神话,也为更多的创业者提供了机会。然而,微商相对于其他电子商务模式,交易平台多为社交媒体,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虚假交易额、代理压货、缺乏售后保障等一系列的问题,导致从事微商扩展的稳定性不足,微商的信任度降低。本文针对微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结合实际经验提出改变现有代理模式、树立品牌意识、完善售后保障以及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对策,以期对微商的发展起到改善和促进作用。

关键词:微商;交易平台;营销模式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6.05.008

中图分类号:F7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6)05-0036-05

随着互联网和自媒体的蓬勃发展,微商成为电子商务的一种新形式,在短时间内迅猛发展起来。有数据显示,仅一年时间微商人数已经超过1000万,而淘宝十年才达到如此规模。微商从出现至今,引起了众多学者的争议。微商不仅带来了强大的经济利益,而且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本文从微商的发展背景,结合微商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对微商的出路进行思考,以期对瓶颈期的微商有参考作用。

一、网络与自媒体:微商的发展背景

(一)微商的概念

关于微商的概念,目前还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一些学者对此作了尝试。高飞岩^[1]指出微商是指以个人为单位,利用web3.0时代所衍生的载体渠道,将传统方式与互联网相结合,打破区域限制,实现可移动性的销售渠道新突破的小型个体商业行为。这个概念对于早期微商的特点进行了较好的概括,指出微商可移动性的销售特点,但随着微商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传统企业也加入了微商的行列,所以此概念仍然不够完善。周翔^[2]提出微营销是指通过自媒体的传播渠道在一定的人际关系群体中从事的操作便利、信赖度高的人际互动和产品销售行为,

强调微营销过程中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李贺^[3]认为在移动互联社交应用上进行商业活动,并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群体以及这个群体所代表的行业及商业模式,广义上都可以成为微商;在微信上进行商业活动,并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群体以及这个群体所代表的行业及商业模式都可以称为狭义上的微商。可以看出,相对其他学者李贺更为深层地对微商进行了概念界定。

综上所述,笔者把微商理解为通过移动社交平台上的人际交往进行营利行为的商业活动。微商往往需要选取社交平台来发布信息,而各种社交平台层出不穷,并且具有不同的属性,所以他们的传播对象也有所不同。例如:微博相对于微信是一个更为开放的平台,传播对象可能存在不熟悉的陌生人,而微信则是自己所熟知的好友圈。依托于人际关系的微商行为更能诠释微商的特点,本文主要讨论以微信为主要平台从事商业活动的微商行为。

(二)微商的发展背景

2016年1月国内移动数据服务商Quest Mobile发布了《2015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国内在网活跃移动智能设备

收稿日期:2016-08-17

作者简介:吴文瀚(1973—),男,江苏泗阳人,传播学博士,河南工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广告文化与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数量达到 8.99 亿,表明我国移动互联网呈现井喷式发展。相对于 PC 端来说,移动端几乎具有 PC 端的一切功能,例如:实时传播、上网浏览、游戏娱乐等。低价、便于携带、无地点限制的特点让人们更加依赖移动端。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产生了一批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有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第一季度,微信已经覆盖中国 90% 以上的智能手机,月活跃用户达到 5.49 亿,微信支付用户则达到了 4 亿左右。微信已经不仅仅是交流工具,人们打车、旅游、订餐、付款等都可以用它完成。与此同时,电子商务诸如淘宝、京东等网上商城的门槛逐渐提高,程序繁杂。拿淘宝来说,前期申请开店的程序需要实名认证、等待审核等步骤,后期需要店铺装修、推广、客服人员等支出,再加上淘宝网上店铺繁多,竞争力太强,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积累人气,对于一些创业者来说只能望而却步。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的影响,微商在产生之初就受到了广大创业者的青睐。在从事微商活动时,没有年龄地域的限制,无需审核,投入成本很低,仅仅需要在社交媒体发布产品信息,而顾客对象基本上都是来自熟悉的朋友以及朋友带来的客源,相对传统电商,微商得以发展的优势逐渐呈现出来。因此,可以说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及传统电商的高门槛催生了大批微商。

(三)微商的研究状况

微商创造了很多创业神话,但微商相比传统电商来说成熟稳定性不够,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引起了很多争议,学术界针对微商发展和出路的探讨也逐渐增多。其中,一些学者提出了具有代表性意见,比如殷言言等^[4]指出建立微商信任机制的四个角度:微商商家、电商平台、第三方信任制度和政府立法;张洋^[5]将微商与已经接近成熟的淘宝电商相比,指出微商的优势与劣势,并对微商的发展道路提出扬长避短、多元整合、转变思路、建立商会、诚信经营等建议;李贺^[3]提出微商是碎片化传播方式在经济生活中的映射,从微商最初的出现到现实中所出现的问题指出微商转型的路径,等等。这些学者为微商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对于微商提出的建议仍然不够全面,并且这些建议多为从完善微商发展平台、政府调控方面来进行研究,针对个体微商的意见不多。本文从微商的发展背景出发,探讨微商发展过程中所出现在问题,并给出建议和意见,以期微商可以更具活力、更有生命力。

二、光环下的暗影:微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一)微商的发展

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使得加入微商行业的门槛很低,往往只需一部手机和为数不多的代理费便可加入,再通过支付宝、微信红包、当面付等支付手段就可以完成一次交易。于是,当一些微商在社交平台发广告信息的时候,周围朋友基于对发布者的信任,开始购买他们的产品,这样冲着亲友间的交易就构成了最初微商交易。^[6]

李贺^[3]指出第一个可以查证的微商出现在 2009 年新浪微博上,一个 ID 为 @mayce 的用户发布了一条零食广告。此时的微商是以个人形式出现的,单独的个体通过社交平台把商品卖给周围的人,这种模式的消费对象是很有限的。之后,国内出现海外代购狂潮,似乎一夜之间 QQ 空间中就遍布广告。这一时期,微商通过发 QQ 状态附带图片或超链接方式达到宣传的目的,产品主要涉及奢侈品、电子产品、化妆品等。在这一阶段,社交平台里的广告铺天盖地,微商的宣传方式变为了“刷屏”。接下来,在经历了个体微商的发展模式之后,微商开始发展团队代理模式,通过建立一个销售团队,也就是说把自己手中的货物以不同的价位分给几个不同等级的代理,再由代理分销给他们的代理,一级一级地分下去,将销售风险降到最低。但是,这种模式也会导致销售末端的代理拿到的货物价格很高,利润空间降低,而使下层代理难以坚持下去,微商发展到了瓶颈期,有很多微商难以存活。2015 年下半年,社交平台上微商的广告越来越少,从事微商活动的人数也逐渐减少。

(二)微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微商在面向消费者时,主要是以图片、文字、超链接等传播形式来传递商业信息。根据拉斯韦尔和德弗勒对于传播过程的描述,传播过程由传播者、接受者、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传播效果、反馈组成。微商通过以微信为代表的传播媒介发布传播内容并对顾客产生购买行为的影响,在此过程中收到顾客的评价或反馈信息,可以看做一次传播过程。在传播过程中,任何一个传播环节出现的弊端,都可能对传播效果产生影响。在微商发展过程中,由于无法体验真实产品,社交平台上发布的产品信息所造成的传播效果对于用户的购买行为有直接影响。

1. 假货与仿冒

微商传播过程中,传播者通过发布附带产品的图片、超链接构成了传播内容,但传播过程中逐

渐出现了传播内容与产品相脱离的状况。微商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使得很多知名传统企业也逐渐加入微商的行列之中,一些领先一时的企业已经开始尝试利用微商快速、轻便地开创适合自己的“互联网+”模式。^[7]多样化知名企业的加入本该为微商市场增加活力,但是各种仿冒产品越来越多,导致微商市场在一段时间内产生混乱。微商活动中,奢侈品本来是寻常人家望而却步的东西,但是自从有了微商,朋友圈中也出现了代购奢侈品,如LV等名牌包。据了解,这些奢侈品大多不是正品,而是假货和高仿品,这样就造成传播过程中传播内容不实的情况,导致一部分顾客对微商的信任度下降。

2. 虚假宣传

在宣传过程中,大部分个体微商的宣传手段就是把顾客购买时的交易对话进行截屏,发布在各个自媒体平台上,以此来宣传自家产品的购买率。一些不法微商为了制造出貌似繁荣的交易额,甚至选择使用对话生成器或者支付宝生成器。这些软件的用途最初是为了娱乐,却被一些微商利用,欺骗客户。使用这些软件进行宣传属于虚假宣传行为。随着这些软件的曝光,微商的信任度又进一步降低了。腾讯为了打击不法微商,发出了“微信朋友圈是由熟人关系链构成的小众、私密的圈子,它不是营销平台。我们不鼓励利用个人微信号进行营销,为了保护用户体验,净化平台环境,微信会对部分通过大量添加好友从事商业营销的个人微信号进行联系人数限制”的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虚假宣传。但是,仍然有部分微商在售卖过程中,运用虚假宣传牟取不法利润。

3. 维权困难

目前,微商并没有被国家列为一种正式的商业行为,交易的产品一般价格不高,想要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所花的时间、精力、成本都比较高,发布的信息很容易被删除。因此,通过微信朋友圈购物还面临着取证困难的问题。^[8]在支付过程中,由于交易双方可能是认识的朋友,有时候会采取当面交易的方式。微信红包、支付宝这些交易方式在微商交易中应用很多,但是顾客支付时都是随机选择一种支付方式,没有一个中间机制来确保交易是否完全成功,消费者的利益得不到保障。^[9]拿淘宝来说,顾客给商家付账的时候,会经过支付宝暂为保存,顾客如果不满意商品,可以申请退款。若是商家不同意,还可以申请淘宝介入等方

式来维护个人利益。而微商缺乏这种中间机制,造成了维权困难的现状。

4. 缺乏合理的评价机制

传播过程中,反馈机制是否畅通便利,会对传播行为造成一定的影响。有些消费者在购买产品之后,发现产品并不符合图片上的宣传,但是没有一个是公开评价的平台,可能会继续误导其他的消费者。评价机制的推进对于网上购物的作用显而易见,对于没有见到实物的顾客来说,他人的评价就是最好的借鉴。淘宝等电子商务为消费者提供这样的评价机制,使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可以根据他人的评价对即将购买的产品进行挑选,并且这种评价机制是由淘宝统一管理的,所呈现出的评价只能由消费者自主取消或修改。相比淘宝等传统电商来说,微商评价的信任度相对较低。

5. 法律法规不健全

微商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同样也承担着“把关人”的角色,传播内容的选取仅仅是由传播者决定,对于传播内容的真实性无法保证。对于微商的规范问题,法律是传播活动中的“第二把关人”。有关微商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导致微商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弊端,如假货盛行、虚假宣传等问题无法得到明确的解决。2014年3月15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布《网络交易管理办法》,但是并没有明确涉及基于微信等社交工具进行商业活动的微商,这样就给了一些不法微商钻法律空子的机会。法律是规范微商行为的一把利器,政府和相关部门应该积极主动地健全有关法律法规,为微商的健康发展创造有序的环境。

三、由个体自发到社会介入:微商发展的出路思考

微商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在全民微商的情况下寻找出路,成了很多微商应该思考的问题。微商采用的C2C模式,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弊端,而传统的电商模式已经接近成熟,有很多可取之处值得微商从业者学习和借鉴。

(一) 微商发展的思考

1. 准确定位

产品的定位可以直接体现出它对市场的反应、价值的体现以及精准顾客的圈定。与传统的商业行为一样,微商在宣传产品的过程中应准确把握产品的定位,定位所出售产品的需求对象,再结合适当的宣传方式进行推广。由于很多微商都是利用业余时间 in 社交媒体上发布产品信息,在

其从事微商之前缺乏商业经验,对于产品定位的意识薄弱,盲目地发布广告,无法锁定精准客户。因此,明确的产品定位是微商在宣传过程中应该首先考虑的。

2. 借鉴其他模式

相比传统电子商务模式,微商属于新生事物,模式上难免会有不足,大多是借助微信等社交平台,由个人直接向个人出售产品,存在着宣传力度不够、评价机制和售后不完善、产品重复单一等问题。而传统的电子商务模式已经相对成熟,其所形成的一整套体系中的优点可以被微商吸纳和借鉴。微商应积极借鉴传统的电子商务模式,个人微商应积极寻求与企业的合作,取长补短,不断增强微商的生命力,提高竞争力。

3. 提高创新意识

创新是微商长期经营的一大策略。无论是传统商业模式还是微商,产品是企业得以生存的基石。微商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产品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顾客对其的信任。微商市场中,产品单一化现象严重,经常出现某段时间内爆红的某一产品。这样一来,产品缺乏独特性,很难长期满足客户需要。创新成就未来,要想寻求突破,需要微商在创业过程中不断创新优质产品,才能在微商的发展道路上走得更远。

4. 提高行业自律意识

在微商发展过程中,一方面,由于社交媒体具有信息发布的随意性,微商为了塑造良好的产品形象,可能会发布与实物不相符的虚假产品信息,导致客户的缺失。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没有明确出台关于微商的法律法规,行业自律意识成了微商自身应有的基本意识。在交易过程中,做到诚信经营,对顾客负责,是微商从业者应该遵守的底线。

5.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目前,微商虽然没有被明确列为一种具体的商业行为,但是它确实已经存在。微商为我国创造出了极大的经济利益,促进了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创业的行列。^[8]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管理和约束。在我国,对于微商这种商业行为进行约束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导致一些微商钻法律空子,谋取非法利益。为了形成有序而又充满活力的微商市场,给消费者提供一个安全放心的购物环境,微商实名制的推进迫在眉睫。国家和相关部门应加快出台管理微商市场的相关法律和政策,有效地控制微商的不法商业

活动,营造良好的微商经营环境。

(二) 微商发展的对策建议

1. 建设营销团队

一个优秀团队的宣传能力是个人无法与之抗衡的,团队模式仍是微商发展的主要模式。但是,传统微商的层层分销模式弊端太多,无法激起微商的持久动力和信心,应建立一种更加公平、公开的销售模式。注重产品的质量,以质量取胜,控制乱价现象,而不是变相地把销售压力层层下移。例如:思埠个人代理都采用零门槛、不囤货模式,即个人只需要通过身份证等信息认证、学习思埠代理规则之后即可获得授权,然后在朋友圈进行推广,订单产生后,代理再向上游采购,上游经销商直接发货。若个人代理发展到一定规模,能准确预估销量,可以自愿采购、囤货、自主发货。

2. 建立宣传与评价一体的机制

鉴于微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虚假宣传问题,有必要建立宣传与评价一体的机制。通常,微商凭靠聊天截图来呈现产品的反馈,但随着一系列假货新闻的曝光,这些截图的信任度骤降,甚至遭到了屏蔽。微商缺乏专业的评价平台,可以借鉴淘宝等电商的评价模式,创造一个属于微商的公开的评论机制。由于这些都是消费者对产品的满意程度作出的真实评价,可以为其他消费者提供一个参考的平台,同时也在无形中为产品做了宣传。

3. 线上线下相结合

微商大多通过社交平台发布广告,广告形式多为图片。购买过程中,顾客凭借对产品的想象以及对微商的信任来猜测产品的性能,很难真实感受和体验产品的优劣,再加上微商的信任度遭到假货等问题的冲击,顾客可能会选择到实体店铺进行购买,导致客户流失。实体店铺和网上销售应该进一步结合,注重用户体验,不仅可以增强信任度,而且可以增加客户群。比如南娜手工精油皂的很多微商都有实体店铺供顾客体验,通过微信等社交方式,把线上体验线下购买相结合,进一步提升顾客信任度,促进微商长远发展。

4. 加强微商间的合作

微商在社交平台进行商业活动,通常是在个人的朋友圈中进行宣传,而个人的朋友圈中好友数量有限,他们在一定时间内可能不会连续购买。对于很多微商来说,产品单一化和宣传广度有限会导致客户流量较小。为了增加客户量和宣传范围,微商之间可以采取寻求合作的方式,比如在对

方的朋友圈宣传产品,再由对方向他的老顾客推荐产品,加强合作和交流,借助他人的宣传,尽可能扩大顾客流量,使双方都受益。

5. 锁定舆论领袖为首要客户群

从传播学角度来说,在社会公共事务中,往往会有一些舆论领袖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微商活动中,商家应该主动及时锁定某个群体中的舆论领袖,比如:朋友圈人数较多的人、对本领域内产品有发言权的人或是在某一个领域内有权威的人。这一部分人就可以被锁定为首要客户。宣传过程中,产品首先要获得舆论领袖的认可,再从舆论领袖进行宣传到各个级别的人群。这就要求微商从业者有灵敏的观察力,准确锁定舆论领袖,进而扩大宣传范围,获得更多客户。

四、结语

移动互联网大背景下,微商所创造的巨大经济增长以及对我国平民创业所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其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创业者们应该做的不仅仅是看到眼前的经济利益,更要反思其弊端进而改善经营模式。一方面,经营者要建立新的代理模式,增添评价机制,树立品牌意识,提升产品质量;另一方面,国家应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让不法经营者无隙可乘,进一步保障消费者的权利,使微商活动更加秩序化、

规范化。本文列举的微商对象多为个人,对于企业微商的出路没有做出过多的建议,需要其他学者的补充研究。

参考文献:

[1] 高飞岩. 论微商的产生及其与传统电商的区别[J]. 智富时代,2015(3).
[2] 周翔. “微营销”的营销实践与人际关系网络的构建[D]. 昆明:云南大学,2015.
[3] 李贺. 碎片化的商业模式:微商解析与策略探索[D]. 南昌:南昌大学,2015.
[4] 殷言言,苗蕴慧,张圣男. 微商的信任机制研究[J]. 现代商业,2015(12).
[5] 张洋,郭进利. 微商营销的利与弊:与淘宝电商相比[J]. 电子商务,2015(8).
[6] 一扇雪. “微商”能走多远? [J]. 商周刊,2015(1).
[7] 杨剑英. 传统企业微商进行时[J]. 中国药店,2015(16).
[8] 张晓霞. 关于“微商”购物维权难引发的思考:以微信平台为例[J]. 现代商业,2015(2).
[9] 朱娟,胡玉霞. 微商模式下消费者权益救济机制的构建[J]. 大庆社会科学, 2015(5).

(责任编辑 姚虹)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Network Marketing

——Taking WeChat Business as an Example

WU Wen - han, PENG Zha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enan Industry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Internet, WeChat business not only creates the huge wealth myth, also provides the opportunities for more entrepreneurs. The WeChat business, however, relative to other e - commerce modes, has a trading platform which is social media. In the process of its development, a series of problems appear such as false transactions, cargo agent pressure, lack of after - sale protection and so on, which result in the shortage of the stability of WeChat business expansion and the less trust.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such measures as changing existing proxy mode, establishing brand awareness, improving after - sale guarantee and improving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order to improv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WeChat business.

Key words: WeChat business; trading platform; marketing mode

新常态下我国实现绿色化发展的具体路径

——以郑州市为例

李本松

(河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郑州 450001)

摘要:绿色化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观;绿色发展理念和绿色发展观。本文论述了其丰富内涵:发展与生态环保相统一,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绿色发展目的为人,倡导绿色伦理道德、绿色消费、绿色生活方式和生活模式;并以郑州市为例指出在新常态下我国实行绿色化发展途径:实现绿色化发展首先要做好顶层设计,转变生产方式、改革创新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建立和健全法规体系、严格执法与监督,以人的发展为导向促进绿色化发展,倡导绿色伦理,培育绿色文化,建设绿色文明。

关键词:新常态;绿色化;生态文明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6.05.009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6)05-0041-06

新常态是我国发展的新阶段、新平台、新特征,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创新发展与转型发展,而实现绿色发展是我国实现创新与转型发展的必然。我国即将进入到“十三五”发展的关键时期,未来几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为此党中央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这是我国未来发展的指导思想,其中,实现“绿色发展”是“五大发展理念”中的一个重要理念。绿色化发展是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内在要求,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必然选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抉择,这是能实现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和永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一、绿色化的丰富内涵及其实践要求

(一)绿色化的丰富内涵

绿色化作为一种新的发展理念是具有丰富内涵的,这表现在如下的几个方面:第一,绿色化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与发展观,即:绿色发展观,这种绿色发展观是“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

展”^[1],是坚持发展与生态环保相互内化为对方的尺度,是两者的统一;第二,绿色化是以节约高效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方式进行生产,即:经济生态化,这是绿色高效的生产和经济增长模式;第三,实现生态向经济转化,即:生态经济化,实现生态效应向经济效应转化、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是生态成为经济新增长点和经济发展新动力。第四,坚持绿色发展为人的目的性,即人的发展的目的性,实现绿色化发展的目的就在于“使青山常在、清水长流、空气常新,让人民群众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2]。第五,绿色化包含着生活方式绿色化价值取向,即:绿色消费观。这就是“培育绿色生活方式。倡导勤俭节约的消费观”^[3],实现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绿色化以实现绿色伦理道德观——这是生态文化的伦理价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绿色化的实践要求

1. 内涵要求实践化

绿色化的首要的实践要求就是要将绿色化的

收稿日期:2016-08-10

作者简介:李本松(1969—),男,河南光山人,博士,河南工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副教授,吉林大学博士后,美国堪萨斯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

发展理念付之于实施,变成人们的行动,实现发展的绿色化。绿色化的发展理念是要实现绿色化发展,把理念变成现实,否则也没有提出的可能,提出后也没有意义。所以,绿色化的思想理念内含着要求实现实践化。思想只有变成现实才能改变世界,思想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变成物质力量。同样,绿色化的新发展理念只有通过实践、通过人的行动才能变成绿色发展的现实。这个过程就是要绿色化的发展新思想由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变成人民群众接受和自觉践行的思想与理念,变成政府的施政纲领和现实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的意识。如果绿色化的新发展理念仅仅停留在宣传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国的转型发展、创新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绿色化内涵的实践要求是时代发展转型的必然要求。

2. 坚持用改革创新思路

绿色化发展相对于原来的发展模式是新理念、新模式、新方式、新道路,因此需要用改革的思路来进行。提出绿色化是要改变以前发展模式走新路,以前的发展模式资源消耗量大、生产效率不高、环境污染严重,是粗放的发展方式,直接造成资源枯竭、生态形势严峻、环境状况恶化等问题,制约着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不改弦更张进一步发展将变得不可能。与此相对,绿色化的发展理念是走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生产效率高的发展之路,走科技创新型、质量效益型的增长与发展之路,这种发展的模式、方式、道路由旧到新的转变靠的是改革的办法、创新的思路。只有改革创新才能打破旧的束缚和限制,才能破旧立新,才能有新思路、新办法,绿色化发展才能实现。

3. 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

实现绿色化发展是我国增长模式与发展方式的整体转型,是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整体转型,是国民经济结构的整体改造升级,所以,实现绿色发展要求整体推进。这在方法论上要用有机体的理论和方法,要用整体思维、系统论的观点来整体推进我国实现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是在发展中保护好生态,是调整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转型发展,是靠科技创新与科技进步的发展,是靠发展绿色生产、生态经济、循环工艺、清洁能源、环保产业等方式来实现的,需要提高和扩大绿色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并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最终实现国民经济与生产方式的绿色化。但是,在目前我国生态形势极端严峻、环境污染极端

严重的情况下,实现绿色发展需要重点突破。具体说来,就生态与环境治理上要求在治理空气污染(例如:雾霾治理)、水污染上有突破,要在阻止生态形势恶化上有突破,在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方式上有突破,要在调整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上有突破。例如:要在实现淘汰高污染、高耗能、低效率、过剩产能的产业上有突破。

4. 规范和调整利益,要利用利益杠杆来实现绿色化发展

分析当前我国生态环境破坏到如此严重程度的原因,包括郑州市在内的很多城市严重的空气污染和雾霾天气,有如下的一系列原因:第一是认识的原因,例如,围湖造田、毁林开荒等造成的水土流失和生态恶化。第二是经济利益的原因,例如,工厂企业只讲企业利益和利润,不讲生活利益和生态环保利益,为了省钱、减少成本,对防止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上不愿投入,对“三废”治理不愿意投入,甚至违法偷排、偷放,更不愿投资“三废”的循环利用。第三是生产与生活的原因,例如,汽车尾气的排放和城市居民生活排污、排废造成的污染。第四是技术的原因,例如,治理污染的技术上不先进、不发达,发展清洁能源的技术和循环产业的技术不成熟或者成本过高导致难以推广和大量使用。其中,后两种原因都与经济利益直接相关。所以,在实现绿色化发展的实践要求上要做到在各种具体措施中贯穿利益机制和手段。例如,利益诱导机制和经济处罚手段。

二、新常态下实现绿色化发展的现实途径

当前我国发展进入到新常态,我国经济发展“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4]。在新常态下,“我国的发展更加注重追求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人民群众分享发展成果、更加注重发展为人的目的”^[5]。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只有在这个大逻辑下布局才能实现绿色化发展。

同时,从郑州市实现绿色发展来看,郑州市又称“绿城”,这是沿用历史的称谓,历史上的郑州必然是绿色的世界才有如此的美誉!所以,历史上的郑州必然是天蓝水清、绿树成荫的绿色世界,必然是生态良好、环境优美的文明商都,可如今,生态环境到了非常糟糕的程度,很难寻觅到曾经“绿

城”美誉的“绿味”的踪迹。例如,长时间严重雾霾已经使得郑州成为全国城市中空气质量最糟糕和雾霾最严重城市之一,郑州成为名副其实的“雾都”。所以,实现绿色发展对郑州市来说,刻不容缓、势在必行,这不是为了过去“绿城”的荣光,而是郑州市要实现可持续永续发展的必然。实现绿色发展新转型,郑州面临着新挑战,即:生产方式、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方式需要创新与转型;同时,面临“一带一路”、“郑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等新机遇,这是郑州市实现绿色化发展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与契机。下面就论述我国绿色化发展的实现路径,同时,结合郑州市的情况论述郑州市实现绿色发展的现实路径。

(一)实现绿色化发展要做好顶层设计

在人类历史上,在发展和生态环境关系上曾有过几种情形: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以实现生态保护为前提的生态统一于发展之中的绿色发展。可以说,前两种发展模式是我国自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的模式,目前这三种情况在我国已经同时存在。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模式是造成我国当前生态环境灾难的主要原因,边污染边治理的增长模式依旧不能有效阻止环境状况的恶化,生态破坏的严重程度和环境污染的严峻形势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重要制约因素,这种状况正在直接阻碍甚至正在毁掉我们已有的发展,也让我们已有的发展失去意义。为此,要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来转变发展模式,改弦更张走新路,这就是生态化环境保护与发展统一起来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尽管这个问题在国际上是有现成的经验是可以借鉴的,但是做顶层设计以实现我国绿色化发展的转型必须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因此要做到:在指导思想,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指导,特别是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依靠科技、依靠创新。转变发展理念,彻底摆脱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发展的唯 GDP 导向发展观,使绿色发展深入人心,成为发展的内在尺度。

郑州市的情况与全国情况比较来看,既有共性又有特殊性。从共性上来看,生态形势严峻、环境污染严重,生产方式、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创新转型有待实现,生产方式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经济形态与经济模式的绿色化没有形成,绿色发展的理念没有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等等。从特殊性上来看,郑州市当前空气质量非常差、严重雾霾已经成为突出问题,缺

少税收与就业的支柱产业,缺少绿色产业引领,近年来房地产飞速发展造成经济结构呈现畸形特征等。仅以大气污染的严重形势为例,据资料显示:2013 年郑州全年雾霾天竟长达 251 天,2014 年郑州全年雾霾天也长达 201 天,环保部的一组数据显示,2015 年上半年,郑州市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仅有 39 天,在全国 74 个重点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位列倒数第三,其中 4 月至 6 月连续 3 个月,都是倒数第二,郑州市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雾都”“霾城”。也正是因此,郑州成为了新环保法实施以来全国首个被约谈的省会城市。所以,目前郑州市实现绿色发展顶层设计上既有统一于全国实现绿色化发展的整体设计和过程推进,解决实现绿色发展中共性问题;又要根据郑州市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结构的特殊性制定自己实现绿色化发展的规划、政策、措施。在当前应该以整治雾霾为首要重点突破来带动郑州的绿色发展;另一个重点就是要从科技与创新转变生产方式与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做起,从根本上减少污染源,实现生产方式绿色化、绿色经济形态。

(二)转变生产方式,改革创新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

就我国目前严峻的生态形势和严重的环境污染状况来看,主要原因是由于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耗、低产出的生产方式与产业结构造成的,是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与发展方式造成的,是不合理资源消耗型、科技含量低下的经济结构与经济形态造成的,因此,实现绿色化发展的现实途径必然要从转变国民经济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做起,必然要从改变经济增长模式 and 经济发展方式做起,归根结底要从改革创新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模式实现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模式创新转型升级做起。具体说来,通过发展清洁能源、循环产业、低碳经济实现生产和产业的绿色化,并发挥其带动和示范作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绿色化。通过不断提高绿色生产、绿色产业、绿色经济的示范带动作用,实现绿色经济形态。要实现这些最终是要通过改革创新的方式、通过借助科技发展来实现。

就郑州市来说,绿色发展主要是从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培育新产业、承接“郑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新机遇等几个方面来实现。贯穿着改革、创新、科技三条主线,是郑州市实现转型发展、绿色发展、创新发展的现实路径。从改造升级

传统产业来看,郑州市的传统产业不强、不大、效益低下、没有支柱产业等问题较为突出。例如,汽车制造业虽然有宇通客车为龙头,但是没有形成较强的系统产业链条,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有竞争力的核心技术有待提高,靠科技、靠创新的自我发展能力不足,适应新形势变化的主动变革能力有待提高,影响力和带动力不强,因此,必须要用科技来改造郑州市的传统制造业。培育新产业是郑州市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现实途径,当前郑州市的高新技术产业、动漫创意产业、文化产业、信息技术产业、服务业(除了物流业之外)、科技创新产业、清洁能源产业等发展不足、能力不强、产值比例不高,带动示范作用不强,这是制约郑州市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因素,加强这些产业的发展是郑州市实现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为此,解决的办法是:一方面要加强自我创新,另一方面要通过外来引进植入。准确把握国家从战略需要的层面对郑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定位,实现生产、产业、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的创新、转型、升级。《国务院关于同意郑洛新国家高新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批复(国函〔2016〕63号)》中指出:“着力培育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全面提升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原创创新创业中心,努力把郑洛新国家高新区建设成为开放创新先导区、技术转移集聚区、转型升级引领区、创新创业生态区。”着力促进科技创新与金融、贸易、投资、文化等要素的良性互动以形成新的生产方式、产业模式和经济结构,利用国家新政策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文化与动漫创产业、计算机与软件产业等产业集群;同时要发挥郑州市交通区位优势来发展辐射全国和全球的物流业,形成相关的物流产业集群和为此配套的相关产业,例如,包装业等。这是郑州市实现生产方式、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结构改造创新、转型升级的途径,是实现绿色发展的现实途径。

(三) 建立和健全法规体系,严格执法与监督

建立和完善法规体系是实现绿色化转型与创新发展的保障。首先要制定科学技术标准,制定完善绿色化发展的标准,然后据此制定完善绿色化发展的法规制度体系,实现法规之间的配套、完整和衔接。这一工作包括两个方面:制定新的法规体系,同时要改变现有的与绿色化发展不相适应的法规体系。这些法规应该包括:节能减

排法、国土利用和规划法、生态产业化法、生态保护与补偿法、空气与水土的保护法等,包括鼓励与扶持绿色化生产与产业发展的经济、财政、税收等法规体系,还要制定和健全绿色认证制度、生态环保的责任追究制度、生态环保评价制度等。制定和完善实现绿色化发展的法规体系是重要的,但是严格法规执行和监督也同样重要,监管与落实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这是通过法规实现绿色化发展的重要一环。为此,要从如下方面来加强监督管理: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的排放,既包括工业生产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废料等生态和环境的污染物等,也包括居民生活产生的废水、污水和垃圾等污染物,严格垃圾分类制度。依照制定的节能减排法律,通过并、关、转、停等途径实现工业生产的规模集约高效,坚决淘汰技术工艺落后的高耗能、高污染、产能过剩行业和产品,降低国民经济的单位能耗,并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绿色生产,实现生产方式绿色化。

郑州市实现绿色化发展同样需要加强法制、严格执法,这是郑州市能实现长久化、机制化的绿色发展的重要保证和现实途径。针对目前郑州市的生态形势和环境污染现状,针对郑州市当前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结构,依法实现郑州市的绿色发展主要从如下的方面来做:第一是制定郑州市为长久实现绿色发展必须要法制化和制度化,既要制定诸如《郑州市实现绿色发展的实施纲要和长远规划》等文件,也要制定诸如《郑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法》《郑州市治理环境污染实施细则》《污染防治与处罚法》等法律,坚持依法治污,使得绿色化发展是在法律的保障下实现的。通过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形成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合力,形成人人监督生态环境违规和违法的良好局面。第二是为了通过科技与创新来实现生产方式、产业结构、增长模式、经济结构的创新升级转型,应该制定《郑州市科技创新促进法》《郑州市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转型中长期发展规划》《郑州市实现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实施办法》等法规,通过法规来实现生产转型、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郑州市生产方式绿色化、经济结构绿色化、经济形态绿色化。

(四) 以人的发展为导向,促进绿色化发展

“绿色发展就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6]绿色化发展必须以人的发展为导向,这是绿色化发展的价值向度,更是实现绿色化发展的目的与目标。只有符合促进人的发展的途径才

是绿色化发展的长久途径,以人的发展为导向是促进绿色化发展的现实途径。这要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从人的发展内容来看,人的发展既有身体发育也有心智健全、人格完善、精神提高与自主性增加,既有生物性肉体发育与健康也有社会性关系发展与丰富、精神性道德完善与提升、自由个性不断增加和多样化,所以人的发展是全面的、整体的、协调的、综合的。绿色发展是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所以,从特征上看,绿色发展是实现人全面发展的。第二,从人的发展条件来看,实现绿色化发展是人的发展条件。人的发展是需要条件的,正如人的发展是全面、综合、整体的一样,实现人的发展的条件也是全面的、整体的、综合的,生态环境条件是人的发展的必须的条件,实现绿色化发展就是以人的发展为导向,通过绿色化发展来创造出人的发展所需要的生态环境条件。为此,第一是要求通过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创造出绿色化发展成果,以此来实现人的发展,这就必然能促进绿色化发展。第二是通过建设美丽社区、美丽区县、再到美丽郑州,使得蓝天常在、绿树常在、清水常在,这是人的发展的必然条件。第三是从实现人的发展的审美情趣尺度来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人的发展需要提升人的审美情趣,加强精神修养和境界的提升,只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条件才能做到这些。从促进实现人的发展出发实现绿色化发展是一种引导,以人的发展为导向来加强生态保护,创造优美环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一种倒逼机制形成的实现绿色发展的途径。

郑州市从促进人的发展角度出发实现绿色化发展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做起:第一是空气安全、水安全、食品安全。保障空气安全从整治雾霾和实现清新空气做起。为此,大力发展轨道交通等公共交通,减少汽车尾气排放。改革工艺、发展科技、转变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减少废气排放。防治水污染要通过科技、经济、法制等手段来实现。对于工业企业废水要实现净化后达标排放,或者内部循环使用。对于生活废水与污水要实现系统联网式的生活废水和污水的治理体系实现达标排放。要发挥全民监督、新闻监督、执法监管等方式及时发现污水、废水无处理排放,然后严厉惩处。要使全社会对治污法规心存敬畏,不敢妄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过天。坚决不允许有毒有害食品流入市场、摆到餐桌,对于利欲熏心的制造有毒有害食品的罪恶之徒要严惩重罚,使其违法

犯罪成本成为不能承受之痛,要建立连带责任制,要建立食品信息溯源倒追信息系统,要建立信用制度,要建立市场准入制度。第二是实现人的发展还要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做起。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包含多方面的内容,从生态环保来看,良好生态、优美环境等是人民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条件,人在优美的生态中生存不仅会得到美的享受而且还会陶冶情操,人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与生活不仅会提高生活品质更会激发人民群众保护生态环境意识。第三是从促进人的发展的角度实现郑州市绿色化发展就是要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绿色化发展就是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当前的高房价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最近郑州房价上涨非常快,涨幅非常大,这是不正常的,是不可持续的,不合乎绿色发展理念,因为绿色化发展是可持续发展。房价上涨原因很多,抑制房价上涨措施同样很多,从政府角度看,对于郑州市来说,要通过改革、创新、调整实现郑州市产业和经济结构的均衡,以防止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以此造成财政收入的畸形化和畸形土地财政依赖。对于个人来说,实行征收房地产税政策以抑制房地产投机炒作,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和经济泡沫化造成经济空心化,给郑州市未来经济发展留下隐忧。从房地产企业,要求其实施信息公开制度,坚决查处价格垄断和欺诈行为,建立市场化的定价机制,坚决打击商业贿赂。

(五)倡导绿色伦理,培育绿色文化,建设绿色文明

实现绿色化发展必须要在全社会倡导绿色伦理道德,这就是倡导勤俭节约的绿色消费观和价值取向,实现生活方式绿色化。“绿色化主张在消费上坚持节俭消费,这就是绿色消费,这是一种绿色消费观。”^[7]实现生活方式绿色化就是要在郑州市主流媒体和各种场合大力宣传绿色节俭消费,旗帜鲜明反对奢侈浪费、炫耀性高消费、不合理非理性消费。这既要注重广播电视和墙体平面宣传,同时也要注意网络、手机、微信等新媒体的宣传,也要注意地铁、公交、大巴车等车载移动媒体的宣传,也要注意站台、车站、商场等公共场合的宣传。倡导绿色节俭消费和绿色伦理道德必须要落实到行动上来,这就是要从实践行动做起。通过宣传使得广大人民群众认同绿色伦理价值道德,人人皆可为,事事皆可做,形成人人践行绿色消费观、事事体现绿色消费观、时时做到绿色消费观,倡导人人崇尚勤俭节约的绿色生活方式,从点

滴做起,例如,从节约一滴水、一张纸、一滴油等点滴小事做起,从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出行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等具体事情上做起。通过这些能使得绿色化落到实处,变得可做可学,不至于流于空幻。通过在全郑州市宣传倡导,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风气,最终实现全社会和全民的消费和生活方式向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方式转变。在这一过程中,郑州市的党政机关、国有企业要带头厉行勤俭节约,国家公职人员更应该做出表率,必须要求政府和公职人员的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以党风和政风的转变带动社风和民风转变。

实现绿色化发展还要积极培育绿色文化,发挥绿色文化的熏陶、塑造、培养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特别是行为实践方式的作用。绿色文化就是坚持绿色化发展的文化,是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相统一的文化,倡导的是绿色发展观、为人的发展观、绿色消费观,主张生态经济化和经济生态化。绿色文化与郑州市的绿城文化天然具有相通之处,郑州市古有绿城之称,要把绿城的绿色文化与绿色化的绿色文化有机结合起来,相互融通、相互吸收,推进绿色文化深入人心,潜移默化影响人的行为。这是实现生态绿色化的文化保证,这也是实现绿色化的途径。绿色文化就是文化的一种形式类型,有多种类型和层次的表现,例如: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物质产

品、科学技术、生产工艺、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等。在大力培育绿色文化的同时,还要积极建设生态文明,大力弘扬生态文明价值观,把生态文明价值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中。郑州自古就是商都,要把商都文明与绿色文明有机结合,使得商都文明成为绿色文明成长发展的肥沃土壤,使得绿色发展观和生态文明在社会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使之成为实现绿色化发展的强大而持久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211.
[2] 审议《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研究广东天津福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关方案[N]. 人民日报, 2015-05-06.
[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N]. 人民日报, 2015-05-06.
[4]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 人民日报, 2014-12-12.
[5] 李本松. 论新常态下“包容性增长”的价值考量和世界历史意义[J]. 江汉论坛, 2015(3).
[6]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重要读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7] 李本松. 绿色化的经济学向度[J]. 理论视野, 2015(6).

(责任编辑 许峻)

Discussion on the Concrete Ways to Realize Green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under the New Normal State

——Taking Zhengzhou City as an Example

LI Ben - song

(Marxism College, 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Greening is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idea put forward by th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green development idea and green development concept. Its rich connotation i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namely,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re unified; economy is ecological, while ecology becomes economy; the aim of green development is for human being; and green ethics, green consumption and green lifestyle and life mode are advocated. Then, taking Zhengzhou city as an example, the ways to realize the green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normal state are pointed out. That i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reen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top-level design, we should change the mode of production, innovate economic growing mode and economic structure, and establish perfect system of rules and regulations, carry out and supervise laws strictly, promote green development for human development, advocate green ethics, cultivate green culture, and construct gree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new normal state; green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新常态下农村金融改革面临的新挑战及应对策略

侯 燕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 郑州 450044)

摘 要:“新常态”对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来说,意味着一场由外及内、由浅入深、由量到质、由粗放管理到锐意创新的系统性改革的开始。本文首先归纳了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发展历程,接着运用 PEST 分析方法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外部新挑战,最后提出了农村金融改革系统内政府、供给方、需求方为适应外部挑战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新常态;普惠金融;农村金融改革;供给侧改革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6.05.010

中图分类号:F3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6)05-0047-06

一、“新常态”的内涵及对农村金融改革总要求的解析

“新常态”的主要特点,一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1]。对农村金融改革来讲,新常态意味着进入由外及内、由浅入深、由量到质、由粗放管理到锐意创新的改革新阶段。

“由外及内”,“外”主要指工业和城市,“内”包括农业和农村,指的是农村金融改革的推进离不开农业现代化、城乡一体化、工业反哺农业等外部环境的改革举措。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和农村被放到一个相对次要的位置上,国家优先发展工业和城市,取得改革的一系列成就,农业经济增长指数远低于国家 GDP 和工业增长指数^[2]。在新常态时期,工业和城市的改革成果必将应用于农村改革,而农村金融的改革又会成为这场“由外及内”改革的关键,影响整个农村经济改革成败的大局。

“由浅入深”,指新常态对农村金融改革来讲,必将触及改革的深层次难题,触及数十年来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的主要成因。农村金融改革担负着农村

经济各项事业的经济命脉,如图 1 所示。新常态下,对农村金融的支农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束缚农村金融发展数十年的难题,如“贷款难”“抵押难”“信用体系缺失”“产权流转”等必须在制度上寻求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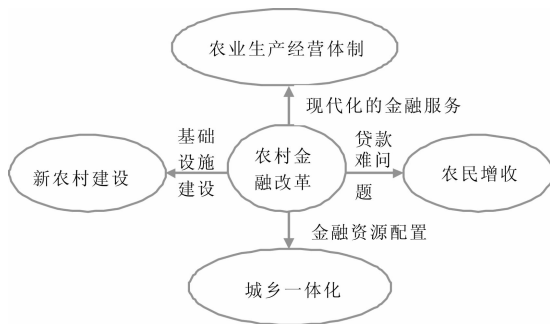


图1 农村金融改革在农村各项事业及改革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

“由量到质”,指新常态下,农村金融改革要取得的成就,也会有一个由量到质的过程。前期的农村金融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主要关乎政策布局,关乎制度建设,倡导建立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改革越推进,对减少金融抑制,提升农村金融机构服务质量的要求就越强烈,要求加强金融创新力度,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更切合实际地服务“三农”。

“由粗放管理到锐意创新”,主要体现在农村金

收稿日期:2016-06-28

基金项目:2015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河南省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支持与互动机制研究”(豫教科技[2016]0100号)

作者简介:侯燕(1982—),女,河南郑州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经济贸易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与管理。

融的供给侧改革,其重点在农村金融机构。以往的农村金融机构,在管理上比较粗放,制度上漏洞较多,经营上问题频发。农村信用社经历了“社改行”之后,从形式上看与城市商业银行无异,但在管理水平、创新能力上,差距还是较大。新常态突出了“创新”的要求,我国农村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比较普遍,不同地区的农村金融改革没有经验可以学,没有规章可以循,不创新就没有出路。

二、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发展历程

(一)文献综述

关于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历程的研究,由于研究者在阶段划分上标准不同、依据不同、视角不同,因此目前尚没有一个统一的划分方法。叶志刚(2009)将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4年),农村金融政策转轨时期;第二阶段(1984—1997年),农村金融政策缓步前进阶段;第三阶段(1998至今),农村金融政策的范式转换阶段^[3]。这种划分方法是以政策转变速度和方向为依据对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发展历程进行归纳。金运(2015)归纳了当前学术界对我国农村金融改革阶段的划分:以建党为时间节点进行划分,有建国前、建国后改革开放前、进入经济体制改革阶段后、进入经济市场化改革后四阶段;以建国为时间节点进行划分,两分法以1978年为界,三分法以1991年和1999年为界,四分法以1978年、1984年、2003年为界;以改革开放为时间节点进行划分,两分法为资金短缺条件下的储蓄动员机制和资金宽裕条件下的流动性悖论与垂直合作安排,三分法为重建阶段、构建三位一体体系阶段、偏重农村信用社改革的阶段,四分法为农村金融的重构阶段、拓展阶段、调整阶段和改革深化阶段^[4]。李万超(2014)从金融功能的角度将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分为供给主导的金融机构改革阶段(1978—2004年)和需求主导的金融功能改革阶段(2005年至今)两个阶段的划分方法也很有参考意义^[5]。

以往研究的不足在于时效性和实效性。时效性方面,以往研究对“十二五”规划期间农村金融改革的动态归纳尚存空白;实效性方面,许多研究重政策动态轻改革效果,对政策时滞理解不透,对农村改革环境研究不足,对改革实效关注不够。

(二)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发展历程

1. 1978—1999年,农村金融机构布局阶段

1979年,中国农业银行恢复成立,农村信用合作社重新恢复并由中国农业银行管理。1986年邮政系统设置邮政储汇局。农村合作基金会在80年

代发展较快。1994年,农业发展银行成立,承担了扶贫贷款、农业综合开发等政策性支农职能。1996年,农村信用社从农业银行独立出来,性质为合作金融。1997年,农业银行响应国家支持城市地方经济发展的号召,大幅缩减了县级以上网点,农村金融发展一度萎缩。1998年,农业发展银行的一部分政策职能由中国农业银行行使。1999年,国家又全面清理了农村合作基金会,至此,农村信用合作社成为最贴近农民的金融机构。

2. 2000—2006年,农村金融体系建立阶段

2000年开始,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探索从江苏省开始试点。2003—2006年,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逐渐推广到全国范围。2004年和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到“多种所有制金融机构”。2005年12月开始,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启动。2006年年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工作启动,主要包括按规定设立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

3. 2007—2015年,农村金融体系完善阶段

2007中央1号文件中“加快制定农村金融整体改革方案,努力形成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小贷款组织互为补充、功能齐备的农村金融体系”的表述,意味着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正式由建立阶段进入完善阶段。已有的农村金融机构的功能性改革开始,同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培育工作也拉开序幕。

2008年中央1号文件对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银行的改革进行了部署,同时提到积极培育小额信贷组织的要求。2009年中央1号文件继续部署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和服务农村为主的地区性中小银行,并提出扩大农村消费信贷市场。2010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要求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等银行业金融机构进一步增加涉农信贷投放,并且加快培育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有序发展小额贷款组织,引导社会资金投资设立适应“三农”需要的各类新型金融组织。2011年,银监会提出要用5年时间消化历史亏损,并完成农信社股份制改革。2013年,先是银监会正式实施了《农户贷款管理办法》,将农村金融中最难解决却又最受百姓关注的业务品种单独进行研究。随后,《农业保险条例》出台,对农业保险的定位、保费补贴、保险金支付时效等内容进行了规定。2014年,银监会、农业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农业规模化生产和集约化经营的指导意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农村信用社产权改革。2015年国务院发布

了《关于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指导意见》,“抵押难”问题有了突破性进展。截至2015年12月末,批准开业的全国农村金融机构共计3676家,其中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共计2303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共计1373家^[6]。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相结合的农村金融体系逐步完善,农村金融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

4. 2016年以后,普惠金融——农村金融体系与城市金融体系融合阶段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要加快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全面激活农村金融服务链条。2016年,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发展普惠金融写入了国家级战略规划。这体现出农村金融改革要进入与城市金融体系的融合阶段,普惠金融就是这一时期的特征。普惠金融,是指能有效、全方位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目的是为老百姓提供普遍惠及的金融服务。发展普惠金融作为农村金融改革的目标,与我国新常态时期经济结构优化和创新驱动的需求一致,与缩小城乡差距、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的阶段性目标一致,也符合当前“需求中心”的农村金融改革路径。可以预见,技术层面上互联网金融和移动支付的发展给农村金融改革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发展契机,城乡金融体系融合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三、新常态下农村金融改革面临的新挑战

农村金融改革的新挑战,主要是来自于宏观外部环境的变化,因此采用PEST模型的视角进行分析。

(一)政策及法规方面

挑战一:顶层设计就绪,政策空间有限

改革开放以来,大体上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已经经历了从供给主导的金融机构改革到需求主导的金融功能改革,政府在顶层设计上积极布局完善金融体系,在金融创新上大力推进金融试点、多点并举。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农村金融改革的总要求是:“推动金融资源更多向农村倾斜。加快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可以预见,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已经基本就绪,政策空间越来越有限,改革的主体中心点由政策端移向供给端。

挑战二:农村金融机构相关法律不健全

自2003年以来,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步伐明显,

银监会关于农村金融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和指导性意见,主要有[2003]10号《农村合作银行管理暂行规定》、[2003]14号《农村信用社省联合社管理暂行规定》、[2007]7号《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2012]190号《关于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实施金融服务进村入社区工程的指导意见》、[2014]287号《关于印发加强农村商业银行三农金融服务机制建设监管指引的通知》、2014年9月,银监会、农业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农业规模化生产和集约化经营的指导意见》等^[7]。不难发现,多数文件以“暂行规定”和“指导意见”为主,相关法律处于空白状态,不利于金融风险的防范和金融体系的健康有序、协调发展。

挑战三:新政策方面——利率市场化、存款保险制度和市场退出机制

利率市场化对农村金融机构的传统“吃利差”的利润模式提出了新挑战。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以及其他农村金融机构,在利率市场化后,首先可能面临吸储成本上升,一方面要应对利润空间减少的压力,另一方面还要面对城市商业银行和互联网金融在农村地区“吸金”的竞争压力;其次是利率波动带来的经营风险增加,而风险控制能力上与城市金融还有较大差距。存款保险制度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挑战主要在于提升了吸储成本并增加了生存压力,政府不再为农村金融机构的大量亏空买单,由市场决定其存亡。存款保险制度和市场退出机制对于农村金融健康发展,创造有序金融生态环境的作用是积极的,但对农村金融机构来讲提高了金融风险防范的压力。

(二)宏观经济方面

挑战一:经济增速放缓

经济增速放缓对农村金融行业影响应从消费和投资两方面来分析。虽然经济增速放缓可能影响农产品的消费,从而进一步影响农业生产收入和农村金融的资金供给。但是,农产品消费本身存在向下刚性,并且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中高端农产品的需求不降反升,尤其近年来农产品电商的发展快速并成为电商消费热点,因此经济增速放缓对农产品消费负面影响并不大。投资方面,由于农业是结构优化的重点产业,且国家层面对涉农贷款一直持大力支持态度,因此经济增速放缓对农业生产投资的负面影响也不大。

挑战二:农业的弱势和高风险

农村金融的健康有序发展是以农业的优质高效为前提的。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农业的高风险不

会有太大的改变。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尚在试点探索阶段,一定程度上对农村金融的发展造成束缚。

挑战三:设计与实际——各类农村金融机构的“越位”发展

政府在顶层设计上是要农村金融体系商业性、政策性、合作性相结合,包括引进社会力量发展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但在实际经营中资本的逐利性往往推动各类农村金融机构“越位”发展,即相互补充不足,相互竞争抢优质客户资源常常发生。农村商业金融机构的经营常常受到政府相关审核机构及政策意图的影响,造成资金配置效率低下。合作性金融是农村金融体系中的薄弱环节。

(三)社会方面

挑战一:农村居民金融观念落后,长期“贷款难”压抑了农民贷款的积极性

农村居民普遍缺乏金融常识,贷款意识弱,理财观念淡薄,长期的“贷款难”更是束缚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居民金融观念的落后与当今社会金融创新工具层出不穷对比之下,矛盾更加突出。从互联网金融到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大部分农村居民接受的速度和效率都要更差一些。

挑战二:城镇化使农村人口减少,农村金融机构吸储压力增大

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50%。城镇化必然带来农村人口的减少,尤其是经济能力强的人将更快更早城镇化,这意味着农村金融的优质客户资源流失。农民的消费性支出将大多发生在城市,相当于农村资金的净流出。这种消费性资金的净流出是不容忽视的,即便考虑了二胎放开给农村经济带来的人口红利,农村金融机构的吸储也面临较大压力。

(四)技术方面

挑战一:农村电子银行发展迅速,但开通成本高
随着互联网金融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是否开通电子银行已经成为消费者选择银行的重要理由。以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为代表的电子银行,近年来在农村发展非常迅速。截至2015年末,农村地区网上银行开通数累计3.56亿户,手机银行开通数累计2.76亿户,电话银行开通数累计1.81亿户^[8]。此外,微信银行业务在农商行、农信社等农村金融机构也进展很快。关于电子银行的开通,农村金融机构面临有两大挑战:一是开发成本的问题,二是开发深度的问题。就开发成本而言,农村金融机构在用户数量和交易量方面远不能与大型商业银行相比,因此开发手机银行和网上银行的单位用

户成本较高。开发深度方面,农村金融机构同样受制于成本约束,已经开通的手机银行或网上银行,功能上相对单一,多用于消费支付,较少推出个性化的金融产品。

四、新常态下应对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新挑战的策略

农村金融改革的主体分为政府、供给方和需求方。政府的角色定位是顶层设计,主要包括两头的引导和监管;供给侧改革的方向主要是做好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创新和成本及风险控制等;需求侧改革的方向是变分散的、高风险的金融需求为有效金融需求。

(一)农村金融改革的政府方对策

1. 引导:构建科学的普惠金融评估指标体系

发展多种类型的农村金融机构,加强农村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积极推进农村金融立法,加强宣传让农民增加对农村金融机构的了解和支持。央行、银监会应继续增加对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政策倾斜,并对小微型农村金融机构下乡支农持欢迎态度,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农村金融体系。逐渐剥离农信社、农商行等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政策金融任务,保证其经营的独立性。在税收、融资方面给予小微型农村金融机构优惠。构建科学的普惠金融评估指标体系,解决好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2. 监管:完善法律法规,减少监管空白

农村金融改革尤其要处理好金融安全与金融创新的关系,对监管的要求较高:监管要全面、监管要适度、监管要及时。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要实行全覆盖,建立法律依据,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定位应明确;要改变农村金融监管中对正规金融机构监管过度和对非正规金融机构监管空白的局面,以农村资金互助社为例,银监会只监管有金融许可证的资金互助社,而对小额贷款公司等小微型农村金融机构视而不见,银监会、保监会在县以下的监管机构基本是真空状态;政府方应当完善监管体系,完善监管法规,及时防止农村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

3. 在抵押和担保问题上把握政策尺度

就“抵押难”来讲,农民现有的资产如房子和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本身具有较大风险,应该区别对待。如生活用房和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业用地不能用于抵押,而生产用房、商业用房等产业可以抵押。总的原则是涉及农民生活“生命线”的房子和土地不能抵押,其余的可以考虑抵押。“担保难”更多体现在龙头企业贷款寻找担保难,贫困地区担保

落实难,农户大额贷款担保难等方面。解决农民的“担保难”“抵押难”,政策上既要灵活开放,又要注意风险防控,避免政策过于宽松带来更严重的金融安全问题。

(二)农村金融改革的供给侧对策

供给侧改革是农村金融改革的重点,而农村金融机构是新常态下农村金融改革应对新挑战的主要力量。

1. 农村金融机构的定位应明确

农村金融体系已经基本建立,各金融机构要做到“相互补充、功能齐备”就必须定位准确。国家在政策上对各大商业银行支农支持鼓励态度,甚至把支农程度作为考核目标之一,但未来农村金融的主力军依然是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如农信社(农商行)、邮政储蓄银行等。农信社的合作金融性质已经不存在,大部分都已经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一起作为商业性金融接受银监会的监管。政策性金融如农发行、国开行等作为政府农业政策的金融服务执行者。其他新型微型金融机构如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作为正规银行的有益补充,对于解决农户和小型企业的急需性贷款是有利的。而合作金融如农业资金互助社等,是更适合相对贫困地区的农户之间的组织,一些农业合作社一定程度上也承担了合作金融的角色。

2. 农村金融机构应加强金融产品创新

农村金融机构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压力、吸储压力、经营压力、成本压力,这一切问题的解决主要靠加强金融创新。目前,农村金融机构如农信社,虽然经过了社改行,经历了股份制改造和不良资产剥离,但许多农信社基本上没有金融理财产品,存贷差仍是农信社最主要的利润来源。要进行金融创新,必须深入研究农民的需求变化。围绕三类需求:一是农业现代化需求,二是城镇化需求,三是普惠及便利性需求。一要进行符合种植业、林业、畜牧业风险规律及特征的金融产品创新,二要进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类和社会事业发展类的金融服务及产品创新,三要进行助力脱贫的“无抵押”的“普惠”小贷型金融产品创新。

3. 农村金融机构应提供多元化的便利金融服务

农村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应实现两个转变。一是功能转变:由存贷汇机构向金融服务专家转变,主要是提供各种中间业务如咨询和建议、租赁、代理、信托、担保类业务等;二是方式转变:由柜台服务到身边服务的转变,包含了手机银行、电话银行、网上银行等电子服务,也包括定时送款服务等解决“最

后一公里”问题的服务。

金融服务多元化的另一个方向是,在农村地区发展正规金融如农商行的混业经营。城市地区商业银行必须分业经营,但农村地区受制于网点数量可以考虑尝试由农商行等提供混业经营业务,主要是保险和证券两个方面。保险以代理和开发农业保险为主。证券方面考虑证券经纪业务、基金管理和咨询服务业务。

4. 农村金融机构与互联网充分结合

(1) 与互联网金融相结合

农村金融机构应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技术,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农村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潜力很大,有两大优势:一是覆盖面优势,可以适应农民非标准化的金融服务需求;二是终端设备优势,农民手机上网的比例高于城镇,为手机银行等互联网金融提供了良好的推广终端基础。

(2) 与电商平台相结合

农村金融机构与电商平台的合作前景,主要在于整合分散小农的金融需求。农户的分散经营,不利于掌握农产品的市场定价权,不利于形成农产品差异化收益,且抗风险能力弱。农村金融机构可以建议农户联合起来组成农村经济组织,通过电商平台营销农产品,重新找回农产品的市场定价权。贷款方面可通过联合担保贷款降低还款风险,并提高整体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农村金融机构与电商平台的合作,还可以通过与支付宝、花呗、借呗、京东白条等进行金融对接,利用农村网点优势,为农村消费提供便利。

(3) 结合大数据

农村金融机构可利用网点多及对农村了解多的优势,建立“三农”大数据库,收集金融需求变化、农业产业化、农业现代化、城镇一体化、新农村建设、农民征信体系等大数据库,为金融产品的创新、金融服务的多元化提供数据支持。

5. 加强成本和风险的控制能力

成本方面,利率市场化、存款保险机制、电子银行等都推动农村金融机构成本上升。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涉农小微企业贷款风险上升。需要进一步创新完善风险控制机制和控制流程,强化内部管理控制风险,解决农村金融服务特别是普惠金融业务的可持续问题。近年来,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经验告诉我们,合作金融风险高、破坏性大,应限定在小区域的熟人圈子内开展,才能发挥基于“共同纽带”的风险免疫和成本节约功能。另外,合作金融适合解决弱小用途的资金需求,而且不限定在生产用途

的资金用途上(如消费信贷),规模大的生产性融资还要通过其他金融机构解决。

(三)农村金融改革的需求侧对策

需求侧改革的总体思路是:从金融主体上,引导分散金融需求向集中化、规模化的金融需求发展;从金融服务方向上,引导农村消费方向的金融需求侧重于生活质量提高和新农村建设,投资方向的金融需求投向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贸易方面的金融需求投向农产品的电商化。

1. 消费性金融需求

带有普惠性质的农民消费金融,可以通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方式实现,与互联网金融相结合,形式上主要是小额消费贷款。农村消费潜力巨大,发展无抵押无息短期小额贷款,有助于建立农村地区征信体系,转变农民观念,改善农村金融的生态环境。

2. 投资性金融需求

我国农业的发展趋势是现代化、规模化,这决定了金融需求的主要力量应是个体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经济组织,其金融需求包括了存贷款、投资和金融理财项目。需求侧改革应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情况,提高投资性金融需求的针对性和质量。

经济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化基础好,有工厂或者做生意的农户很多,还有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拆迁户等,经济中等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也很好,这些金融需求主体的需求集中在投资和理财两方面。河北的合作金融组织围绕农业生产的上下游产业链,通过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的“三位一体”模式整体加强了当地大型农业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3. 贸易性金融需求侧改革

小农经济经营分散,回报低且缺乏市场定价能

力,只能被动承担生产和市场风险,而且风险有可能转嫁到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因此,要引导低质量、高风险的分散的贸易性金融需求整合,以农业合作社等经济组织为基础,依靠电商平台通过差异化策略包装农产品,找回定价权,才有获得更高回报的可能,金融、生产、市场才能进入良性的可持续的发展轨道。贸易性金融需求主要支持以电商平台为依托的农产品从货源、包装、线上营销推广、物流和售后服务等环节的金融需求。

参考文献:

- [1] 牛一兵,谭树森,张晓赫,等.新常态: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习近平经济工作论述”解读之一[EB/OL]. [http://finance. people. com. cn/n1/2016/0222/c1004 - 28140061. html](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16/0222/c1004-28140061.html). 2016-02-22.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EB/OL]. [http://data. stats. gov. cn/easyquery. html](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l). cn=C01.
- [3] 叶志刚.我国农村金融改革路径研究:以九江农村信用社为例[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4:10-11.
- [4] 金运.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历程及改革思路[D].吉林:吉林大学,2015:6-9.
- [5] 李万超.中国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结构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2014:28-29.
- [6] 中国供销集团:农村金融机构数据大盘点[EB/OL]. [http://www. ccoopg. com/html/2016/03/02/19006. html](http://www.ccoopg.com/html/2016/03/02/19006.html). 2016-03-02.
- [7] 新浪财经.银监会十年来有关农村金融的相关政策法规整理[EB/OL]. [http://finance. sina. com. cn/china/hgjj/ 20150106/152321235548. shtml](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hgjj/20150106/152321235548.shtml). 2015-01-06.
- [8] 搜狐财经.农村电子银行业务发展迅速[EB/OL]. [http://business. sohu. com/20160328/n442532430. shtml](http://business.sohu.com/20160328/n442532430.shtml). 2016-03-28.

(责任编辑 许峻)

The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of Rural Financial Reform in the New Normality

HOU Ya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rade,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For Chinese rural financial reform, “new normality” means a beginning of the system reform. Firstly,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rural financial reform in China, then analyzes the new external challenges for Chinese rural financial reform by the use of PEST analysis. Finally, the strategies of rural financial system reform are put forward in the view of government, supply side and demand side.

Key words: new normality; inclusive finance; rural financial reform; supply-side reform

利益相关者视域下我国体育旅游业发展策略研究

余艳丽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体育教学部, 郑州 450011)

摘要: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对我国体育旅游业利益相关者进行界定和分类,认为体育旅游业利益相关者应包括:当地社区、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体育旅游经营者、体育旅游者、学术界、媒体、社会公众等,并对各利益主体与体育旅游业之间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和相互影响程度进行分析,对各利益主体进行了角色定位,最后提出了发展策略。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体育旅游业;角色定位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6.05.011

中图分类号:G80-05;F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6)05-0053-04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公司的发展都离不开各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企业追求的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某些主体的利益,企业也不是只为股东而生存,而是为诸多利益相关者服务的组织^[1]。作为我国体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旅游业与其他旅游业一样,是一个多产业集聚的综合营利性产业链,其发展进程受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所制衡^[2]。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的持续影响,我国体育旅游业得到快速发展,同时诸多问题也日益突出,如社会建设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公平竞争问题等。体育旅游业的各种管理体制、政策体系还不够健全和完善,产业结构不合理,体育旅游产品开发不足等诸多因素制约着体育旅游业的发展进程^[3]。本文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对我国体育旅游业相关利益者进行界定、分类,对体育旅游业利益主体进行了分析,并对各利益主体进行了角色定位,提出了各利益主体的发展策略。

一、我国体育旅游业利益相关者界定与分类

美国学者弗里曼(Freeman 1984)认为:利益相关者是指任何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到一个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影响的所有个体和群体^[4]。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体育旅游业利益相关者

即能够影响体育旅游业发展进程、目标实现或被其影响的任何个体、群体以及相关组织机构。

结合我国体育旅游业目前基本状况,笔者认为体育旅游业利益相关者应包括:当地社区、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体育旅游经营者、体育旅游者、学术界、媒体、社会公众等。

二、体育旅游业利益相关者分析

根据体育旅游业利益相关者与体育旅游业关系的密切程度及其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可划分为三个集群,即核心集群、次核心集群及边缘集群。

(一)核心集群

主要包括政府部门、当地社区、体育旅游经营者及体育旅游者,这些利益相关者在整个体育旅游业集群中占居重要地位,他们对体育旅游业的关注支持程度影响着甚至左右着体育旅游业的发展进程,而体育旅游业的发展进程对他们影响也最大最深。

1. 当地社区

当地社区的支持、关注、参与程度影响着体育旅游业的发展进程,同时体育旅游业发展中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又影响着当地社区参与热情和积极性。从构成上看,社区居民、社区居民委员会是当地社区组织中对体育旅游业发展进程产生影响的主要元素。从密切程度上看,社区居民是体育旅游业最主要利

收稿日期:2016-07-12

作者简介:余艳丽(1977—),女,河北石家庄人,硕士,河南牧业经济学院体育教学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体育营销学。

益相关者,体育旅游业的发展影响着当地居民的切身利益。

2. 政府部门

体育旅游业利益相关的政府部门包括体育活动管理部门、旅游部门、环保部门、交通部门、建设部门。由于我国体育旅游业发展起步较晚,各项管理体制、规章制度还不健全和完善,各种体育旅游产品开发不足,基础配套设施不完整,成功经验欠缺,导致一些体育旅游业的发展规划不够合理,存在盲目性和不公平竞争,需要政府部门的引导、支持和建立标准规范。在体育旅游业发展中,政府主要实施协调引导和服务监管的职能,体育旅游业的发展也势必影响到政府相关部门中的责权分配问题。

3. 体育旅游经营者

体育旅游经营者包括体育旅游经营商、交通客运商、餐饮住宿经营者、体育旅游产品开发公司、旅游零售商、旅行社等。体育旅游经营者对体育旅游资源开发建设程度、服务水平、价格合理度以及经营能力直接影响着体育旅游业的开展,在体育旅游业资源开发、品牌建设、知名度提升、服务提供等过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体育旅游经营者之间也相互制约和影响,关系着其他相关旅游经营者的利益分配问题,并进一步影响其参与意愿、支持程度。

4. 体育旅游者

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旅游业对体育旅游资源进行开发再建设,通过有限的体育旅游资源最大程度地吸引游客、商家从而盈利。体育旅游者是整个体育旅游产业的最基本和最根本的消费群体,体育旅游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体育旅游者的投入支持,体育旅游者对体育旅游的认识、观念、项目喜好、消费意识、消费水平、消费态度等都深刻影响着体育旅游业的发展。

(二)次核心集群

主要包括学术界及非政府组织两方面。他们关注着体育旅游业的发展进程和各环节的开展效果,为体育旅游业发展提供理论研究和服

1. 学术界

包括专家、学者及相关研究机构或组织。2010年12月,我国成立了第一个以体育旅游为研究对象的科研机构——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户外休憩和体育旅游研究所,致力于旅游服务业的探索和完善,培养与体育旅游相关的人才。目前,我国体育旅游业的研究机构多偏属体育学科,他们以学科交叉的形式为我国体育旅游业的发展出谋划策,对体育旅

游产业政策、法规、产品开发、运营及开展策略进行深入的、系统的研究,对推动我国体育旅游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技术指导。

2. 非政府组织

主要包括旅游行业协会、慈善、环保、人权、工会及其他公益组织等,这些非政府组织与体育旅游业具有一定关联。由于现阶段我国体育旅游业专项组织或部门的不完备,非政府组织在整个体育旅游业中无法形成统一的、完善的体系,影响其在体育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介入体育旅游业的管理发展过程中,表现出行业交叉契合度低、结构松散,服务水平不到位、关注力度不够等现象。

(三)边缘集群

包括媒体、社会公众等。与其他集群相比而言,他们与体育旅游业的关系较为疏远,但仍会对体育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一些不连续的、间接的监督和宣传作用。

1. 媒体

在我国并没有某个媒体组织专门从事体育旅游业的监督宣传工作,体育旅游业只是各媒体日常活动中的一部分,如各类网络、报刊、杂志对某些体育旅游景区、游览场所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对某些体育旅游舆情事件的报道则起到了监督作用。但由于部分媒体对体育旅游知识、技能的宣传缺乏专业性,对旅游景区、游览场所及舆情事件的宣传报道缺乏客观性,甚至扭曲事实,在助推体育旅游业发展的同时也产生着不良影响。

2. 社会公众

社会公众是体育旅游业最边缘的利益相关者,从某一角度而言,社会公众既是体育旅游业的潜在消费者又是其监督宣传者:一方面,体育旅游业需要挖掘社会公众成为其消费者,另一方面,社会公众的口碑影响着体育旅游业在其他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对体育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监督规范作用。我国体育旅游业影响力度不够,社会公众对体育旅游业的认识不足,关注度较低,甚至混淆了体育旅游与一般旅游的概念,外加体育旅游业的舆论机制不健全,目前社会公众对体育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极其有限。

三、利益相关者视域下我国体育旅游业发展策略

体育旅游业的发展,需要各利益主体明晰自身角色定位,相互协调配合,共同推进,才能促进体育旅游业的顺利发展。

(一)当地社区:体育旅游业发展的支持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

无论是体育文化资源或自然历史资源,对之最

了解、熟悉,关系最为密切的无疑是目的地所属的当地社区,因此,目的地社区的意愿、支持程度、参与程度对体育旅游业发展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同时,体育旅游业的开发建设作为一项利民、惠民工程,目的地社区也是直接受益者。体育旅游业开展中任何项目决策的制定实施都有可能涉及到目的地社区的切身利益。因此,对景区的选取、项目的开发、游览场所的建设等,应尊重目的地社区居民意愿和意见,将居民权益保障纳入到旅游业规划发展中。要尽可能为当地居民谋福利,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制造更多商机使当地居民参与进来;减少污染,改善居民居住环境;努力打造自身品牌,增强当地居民自豪感和归属感。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当地社区居民更大程度的支持和参与,促进当地经济和体育旅游业的共同发展。

(二)政府部门:体育旅游业发展的协调引导者及服务监管者

由于我国体育旅游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人们对体育旅游的认识不清,各种管理体制、政策体系还不够健全、完善,产业结构不合理,体育旅游产品、资源开发不足,如河南省体育旅游资源丰富,但是许多并不为人所知,甚至在中部地区也没有取得应有地位^[5]。因此,需要政府部门积极发挥协调、引导、服务、监管等职能,积极推动我国体育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在体育旅游业发展进程中,政府部门的协调引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协调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优化体育旅游产业链结构;对体育旅游业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健全体育旅游业的管理体制;完善体育旅游业的规章、管理制度,规范体育旅游产业标准;加强引导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联姻合作,积极引导大众体育旅游消费,逐步形成大众体育旅游新观念、新时尚,把体育旅游培育为新的旅游消费热点。政府部门的服务监管作用体现在提高服务效率和水平,规范服务流程;制定合理、科学、具体的发展规划,为体育旅游业的顺利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完善体育旅游业中交通、接待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支持游览场所、停车场、餐饮住宿等景点基础设施建设的民间资本准入;明确体育旅游业各相关利益主体责任,设置相应执法机构对各利益相关主体严格监管。

(三)体育旅游经营者:体育旅游业发展的开拓领航者

体育旅游经营者首先要考察好市场,选好项目定准位,挖掘目标客源市场,锁定特定的目标客户群体,研究探索他们的实际需求,合理发挥自己各方面的优势,配置适宜的项目。其次,经营者在开发体育

旅游项目时要选择科学合理的切入点,以“点”带“面”开发发展;注重资源开发的科学性,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最后,经营者内部突出文化管理,树立“以人为本”的现代企业文化,充分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人本管理来实现企业所追求的目标。在经营过程中将“人性化”服务融入到每一个服务人员的工作理念中,由被动服务转变成主动服务,时刻以消费者为中心,一切为消费者着想。

(四)体育旅游者:体育旅游业发展的验证者和推动者

体育旅游者既是体育旅游业发展的验证者、反馈者,本身也是体育旅游业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体育旅游者要发挥验证反馈以及推动的作用,首先应提高自身对体育旅游的认识,在旅游过程中约束自己不良行为;其次,建议政府主导,联合各经营者共建立体育旅游信息反馈平台或通道,为体育旅游者信息反馈提供便利,对体育旅游业的开发经营起到舆论监督作用,帮助体育旅游业健康发展。

(五)学术界:体育旅游业发展的研究指导者

学术界对体育旅游行业发展的建议、倡导以及学术成果将会对政府的决策选择、政策方向及体育旅游产业中各利益主体的行为方式产生影响。由于专业性的研究人员或机构较少,体育旅游的一些理论性研究还不够深入、透彻,如大型体育赛事与体育旅游契合度问题、竞赛表演及健身休闲与旅游活动之间的有机融合问题、有条件的体育运动场所向游客开展旅游服务时的途径选择问题、体育与旅游产业双边合作问题等等。学术界及其相关研究机构若能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取得重要突破,无疑将对我国体育旅游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我国要尽快建立更多的体育旅游研究机构,培养更多、更专业的优秀体育旅游研究人才,加强相关产业之间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为我国体育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提供理论及技术指导服务。

(六)非政府组织:体育旅游业发展的支持者和协同管理者

在体育旅游业发展中,非政府组织作用主要包括:加强与政府、体育旅游业之间的相互协作,共同参与体育旅游业的发展规划及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为体育旅游业从业人士、体育旅游者、相关企业人员提供项目知识、技能的教育和培训;对体育旅游社区、旅游景区建设提供资金、技术方面支持;协同体育旅游相关管理部门对体育旅游经营者、体育旅游者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对诸如环境保护、利益分配不当的地区或组织施加压力,维护相关利益方的

合法权益。

(七)媒体:体育旅游业发展的监督者和宣传者

媒体的监督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体育旅游业中各经营者所经营产品及经营过程的监督,如经营者出售假冒伪劣产品、不良竞争等;二是对体育旅游者不良行为的监督,如体育旅游者污染环境、破坏公共物品、攻击性及诽谤性行为等;三是监督体育旅游业的发展对景区所在地文化、生活、经济、环境的影响。宣传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向广大社会民众和体育旅游者提供体育旅游方面的信息,普及体育旅游方面的知识、技能、技巧等;二是及时宣传报道体育旅游中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的事件。在全民健身目标下,媒体在体育旅游业发展中的作用还应进一步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宣传引导民众树立体育旅游健身意识,以形成大众体育旅游新时尚;二是宣传引导社会民众和体育旅游者形成正确、科学的体育旅游消费观念。

(八)社会公众:体育旅游业发展的支持者和监督者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潜力和消费欲望得以释放。健身娱乐成为人们追求和实现更高生活质量的充分必要条件,体育旅游业的发展无疑为人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契机。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公众,有责任和义务支持我国体育旅游业的发展,积极关注体育旅游业的发展动态、发展趋势及未来方向,同时在产业发展中的环境保护、公平竞争、遵纪守法等方面还需要社会公众的共同监督、维护。

四、结语

体育旅游业作为一个覆盖面较广、产业链较长的综合性服务产业,涉及众多的利益主体。体育旅游业的发展需要各利益主体充分发挥自身角色作用,加大相互之间的协作和配合力度,加强各产业之间的衔接,共同推进和监督体育旅游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江若玫,靳云汇.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应用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陈昕.旅游地相关利益主体间的博弈分析[J].学术探索,2013(1):84-89.

[3]卢晓,张梅生.政府在我国体育旅游发展中的角色探讨[N].中国旅游报,2010-09-17.

[4]爱德华·弗里曼,等.利益相关者理论现状与展望[M].盛亚,等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5]高彩琴,刘红,周艳丽,等.基于TOWS理论审视我国体育旅游发展战略[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3(2):12-16.

(责任编辑 许峻)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Sports
Tourism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ockholders

SHE Yan-li

(Phys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 Henan University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Economy, Zhengzhou 450011,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stakeholder theory, the stakeholders of sports tourism in our country could be defined and classified as local communitie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ports tourism operators, sports tourists, academia, media, the public and so on. This research also defines the roles for every interest body and puts forward some strateg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tourism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est bodies and the sports tourism industry and the degre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se interest bodies.

Key words: stakeholder; sports tourism; role positioning

破除“笔录中心主义”的裁判模式

——“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要求

崔永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笔录中心主义”作为“侦查中心主义”的核心,已然成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所面临的重大阻碍。为了保障庭审在刑事诉讼中发挥实质性的作用,破除“笔录中心主义”的裁判模式需要实现以下两个方面的突破:首先,严格限制询问笔录、讯问笔录在庭审中的适用,构建中国语境下的传闻证据规则,确保庭审实质化;其次,实现法官个体独立,贯彻法官裁判原则,确保法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关键词:笔录中心主义;传闻证据规则;法官独立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6.05.012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6)05-0057-05

“以审判为中心”已成为刑事司法改革工作的最高呼声,但是相关改革的着力点应当如何定位,尚未有一个准确把握。^[1]“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模式可谓是我国现阶段刑事司法弊病的缩影,许多冤假错案的发生与其难脱干系。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改革,不仅要重视审判程序,还要充分地研究审前程序。因此,做好对“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模式的现状解读至关重要,这有助于避免我们盲目和任意的看待“以审判为中心”,防止“新杯装旧酒”。“笔录中心主义”作为“侦查中心主义”的核心,已然成为“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所面临的重大阻碍,需要重点研究,严肃对待。

一、问题的提出

可以说,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进步在立法上最直观表现之一,就是对侦查权的规范性限制和对审判权的制度性保障,这是诉讼模式由“纠问式”向“对抗式”转变的必然规律。例如,英国制定的规范警察权力的第一部成文法,即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就是以英国刑事司法改革为契机而出台的。该部法律以及后来陆续出台的若干执行规程,主要目的是在侦查阶段规制警察权力,保障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人权,以求实现权力和权利之间的平衡。^[2]我国刑事司法改革面临同样的契机,虽然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在立法上有所突破,但是规范层面的问题依然不可小觑。该法在条文数量的整体变动上可谓前所未有,但是出于对各部门利益平衡的立法考量,实际上公检法三机关权力力量的对比关系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从诉讼的角度来看,审判作为对被告人命运和案件结局产生决定性影响的阶段,当然应该处于刑事诉讼的中心地位。但是,在中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侦查阶段却“有违诉讼规律”地居于整个诉讼活动的关键性地位,甚至主导着整个案件的发展和结局,形成“以侦查为中心”的异化的诉讼格局。侦查阶段形成的侦查结论对后续的审查起诉和法庭审判具有强大的“控制力”,“重侦查,轻审判”的观念在我国长期存在,庭审甚至被看作是走过场的程序。

如果说“侦查中心”诉讼模式在刑事审前程序表现为追诉机关完全主导侦查程序,审判权无法介入,被追诉人地位客体化的话,那么它在审判阶段的表现形式则是审判权的严重异化,庭审流于形式。在“侦查中心”诉讼模式的冲击下,对案件结果起到

收稿日期:2016-05-24

作者简介:崔永存(1993—),男,河南周口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学。

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法官的独立裁断而是以刑事侦查笔录为核心的侦查结论。“侦查中心”诉讼模式的司法弊病在审判阶段直观地表现为以审核笔录证据为主要内容的审判方式,如果说“审判中心主义”的对立面是“侦查中心主义”,那么“侦查中心主义”的核心就是“笔录中心主义”。

无罪推定是现代司法制度的基本要求,任何人在被法官做出有罪判决之前均不得被认定为有罪,无论是警察或检察官均无权力在审前程序中行使定罪权。“以审判为中心”是针对“以侦查为中心”的司法弊病而提出的改革思路。“以审判为中心”是近现代法治国家所普遍遵循的诉讼原理,它是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基本表现,从“侦查中心”到“审判中心”的转变符合刑事诉讼发展的一般规律。^[3]实现以审判为中心,不当论及部门利益和个人得失^[4],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刑事司法的公正合理,实现诉讼制度的科学合理。

二、司法困境的现状与成因

(一)关于卷宗全案移送制度的思考

“正义根植于信赖”,一旦失去中立性,裁判者在审判过程中就会存在偏听偏信和先入为主的问题。司法的不中立一方面导致被告方很难得到公正合理的对待,另一方面使得司法裁判失去双方的信任,甚至无法获得社会公众的尊重。^[5]象征着公正无私的司法裁判者,应当在司法裁判中始终保持超然的地位和不偏不倚的态度,对代表着不同诉讼利益的冲突双方“一视同仁”。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庭前预断的形成却不可避免,法官们非但不能保持最基本的司法中立,反而往往摇身一变成为侦控方的帮凶,以至于承担起积极追诉犯罪的“责任”。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与公诉方式的弊病有着密切的关系,全案移送的卷宗审查制度可谓责无旁贷。关于卷宗移送方式的问题,学者们作了很多批评性论证,但本人认为它不是导致庭审虚化的根本原因。相反,它只是“侦查中心主义”模式下的外在表征,因为立法和司法实践已经针对此问题进行了有力的尝试,但是收效甚微。^①这种曲折反复的公诉方式改革说明,“侦查中心”的诉讼模式下,法官的办案方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侦控方移送的卷宗材料,这种约定俗成的做法很难在中国语境下被舍弃,在缺乏切实有效的法官裁判原则和庭审证据规则的情况下,审判往往沦为法官对侦查结论的程序性确认。综上,卷宗移送其实是“侦查中心”的一种表象,公诉

方式改革并没能在司法实践中取得预期的效果,主要原因在于它没有真正阻止法官对案卷材料的依赖。所以,在既有的卷宗移送方式下探索裁判规则下的庭审实质化路径,尤其是建立适应中国实践的传闻证据规则,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二)笔录证据过量使用

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等在调查取证时,通过文字记录的方式对言词型证据和实物类证据进行客观描述后,以书面、照片或复印件的形式整理附卷,形成笔录证据。司法实践中,笔录证据的运用存在严重异化的情况,法院在认定案件事实时对笔录证据的采纳尤为“青睐”,甚至无端滥用。一方面,侦查和检察阶段制作的笔录证据随卷宗“一路前行”,并在各个诉讼阶段发挥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笔录证据的运用成为举证、质证环节的主要内容,《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七种法定证据基本上是以笔录的形式被当庭宣读或出示。然而,代表着最高、最直接证明力的原始材料和实物类证据却被法庭所“冷落”,证人出庭难以保障,“证据类型也因此产生了案卷化、书面化的逆向变异”^[6],司法实践中甚至很难在法庭上看到对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的举证和质证。

总体来说,我国刑事诉讼的重心在审前程序。公安机关细致地调查案件,通过反复地讯问被告人、询问被害人和证人,形成侦查笔录后并入侦查卷,并以此为主要内容得出侦查结论,检察机关在对这些具备一定关联性和客观性的传闻证据进行审查后提起公诉。在传统的“定罪思维”的左右下,刑事审判权处于被边缘化的困境,法官对这些笔录类证据“深信不疑”,法庭审理一定程度上沦为对相关卷宗材料尤其是各种笔录证据的确认程序。笔录证据的大量运用往往会影响法官的主观判断,案件的公正裁判难以得到切实保障。司法实践中,法官对于公诉机关依职权获取的笔录类证据的证明力往往予以优先认可,对于被追诉方提出的相关证据异议却置若罔闻,言词审查原则难以得到贯彻。虽然说笔录证据过量运用的问题存在着“司法无奈”的客观原因,如检察院和法院司法资源有限,对实物证据的移送保管有心无力等,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出笔录证据的运用已然深度融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笔录裁判的思维定势隐约可见。实际上,笔录证据的过量运用所导致的“庭审形式化”是不是对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呢?如果说法院在不经实质审理的情况下依然可以作出同样的判决,那为何还要花费巨

大的人力物力去完成徒有虚名的形式化庭审呢?

(三)“笔录中心主义”主导下的庭审虚化

“侦查中心”在审判阶段集中表现为“笔录中心主义”的庭审方式,笔录证据的过量使用所导致的后果是庭审的严重虚化。^②有学者甚至将这种现象戏称为“表演化”的庭审,法院的庭审“走过场”,并演化成一种教化形式,这种流于形式的庭审的主要功能不在于查明案件事实,而在于以“表态—展示—教育—忏悔”四部曲的方式来教化被告人和其他公民^③,其本质是对检控方移送的笔录证据的一种程序性确认。法官对证据的采纳和对事实的审理实际上是通过阅卷宗笔录的庭前或庭后的审阅来完成的,而非通过当庭的调查和辩论来实现。这种由“法官背后的法官”所作出的裁判结论乃是“披着司法外衣”的行政决定,这与强调合理对抗的诉讼机制相去甚远。“笔录中心主义”主导下的庭审虚化主要有以下表现:

举证、质证程序虚化,被告方质权难以保障。笔录证据的过量运用使得举证和质证程序尤为简单,法庭调查阶段被严重虚化,以至成为检察官向法庭展示“成果”的“舞台”。就举证环节而言,公诉方多以“固化”的书面形式出示证据,证人出庭困难,实物证据难以在法庭上进行展示,而摘要宣读笔录证据的做法更是使得举证虚化颇为严重。就质证环节而言,控辩双方对证人、被害人予以当庭质询,展开交叉询问,本应是法庭审理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保证法官通过亲身感知和言词审理的方式作出裁判结论的必经程序。然而,笔录证据多由公诉机关单方面以“固化形式”出示,证人出庭不被重视,导致辩护方很难就该类证据展开交叉询问,也难以进行其他质证活动。法官虽然在一方举证之后会询问另一方是否对该证据提出异议,但该询问缺乏实质性意义。且不说被告人很少对此提出异议,哪怕是其偶尔对控方出示的笔录证据提出异议,这种异议也会因为法官驳回异议或者证人、被害人、鉴定人的不出庭等原因而“失效”。

认证程序虚化,裁判结论通常被提前预断。一方面,法官当庭认证的“愿望”不足,法官独立办案的能力有限,其“内心之确信”的形成不是审判权行使之结果,而是通过庭前的沟通和阅卷所得出的结论。另一方面,哪怕是庭后认证也是更多地依赖于卷宗中的各种笔录证据,裁判结论的形成不是直接来源于法庭审理,不是对庭审的举证、质证等程序的

结论总结,而是更近似于一种“行政化”的处断决定。正如陈瑞华教授所指出:“中国的刑事法官即使在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下,仍然可能拒绝采纳证人当庭所作的口头证言,而坚持将侦查案卷中所记载的证言笔录作为定案的根据。”^[7]在赵作海案的办理过程中,商丘市检察院曾以“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为由两次退卷,并拒绝再次接卷。但警方坚持认为赵作海是杀人凶手,不肯放人,致使赵作海被长期羁押,以至于后来警方“动用”政法委的力量迫使检法机关“就范”。^④案件的审理成为了对笔录证据的核实认定程序,庭审中,虽然赵作海及其辩护律师都进行了无罪辩护,但法院认为其曾向侦查机关作了九次有罪供诉,所以就以该口供笔录合法有效为由驳回了他们的抗辩。

三、反思与构建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庭审在刑事诉讼中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因此,破除“笔录中心主义”的裁判模式需要在审判过程中实现以下两个方面的突破:首先,严格限制询问、讯问笔录在庭审中的适用,构建中国语境下的传闻证据规则,贯彻证据裁判原则,确保庭审实质化;其次,实现法官个体独立,贯彻法官裁判原则,确保审判权的依法独立行使。

(一)严格限制询问、讯问笔录在庭审中的适用

“笔录中心主义”审理模式的核心是笔录定案,即直接以笔录证据的内容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关于笔录证据的属性^⑤,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属于典型的传闻证据。这是因为,在证据法学中,笔录证据符合传闻证据的三个基本特征^[8]:(1)包含两个以上的主体,即原陈述人和转述人。(2)包括原陈述人对转述人的陈述环节和转述人在法庭上的陈述环节。(3)转述人提出传闻证据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原陈述人所反应的事实真实。因此,在法庭审判中,公诉人向法庭提交并当庭宣读的询问笔录、讯问笔录、辨认笔录、勘验笔录、检查笔录等,均属于传闻证据。

在刑事审判过程中,笔录证据的取舍问题与传闻法则有着密切的关系。按照传闻证据排除规则的一般原理,既然笔录证据属于传闻证据,那么就应当予以排除,不得直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是,就勘验笔录、检查笔录、搜查笔录等固定实物证据的笔录而言,它们分别形成于相应的侦查程序中,笔录制作过程与侦查行为同步,相对于询问笔录和讯问笔录来说更加强调做到及时与纪实,往往具有

不可重复性。此外,考虑到“客观真实性的保障不足已成为影响其适用的重要问题……其解决途径是细化笔录制作规范和强化笔录证据制作的外部监督机制,落实见证人制度,扩大全程录音录像适用范围,确立笔录制作相关人员出庭制度和辩护律师在场权”^[9],因此,这一类固定实物证据的笔录无须严格适用传闻证据的排除规则。

对于询问笔录与讯问笔录而言,应当贯彻传闻证据排除规则,严格限制其在庭审中的适用。原因如下:首先,要解决询问笔录、讯问笔录证明力问题,就要理清在司法证明过程中询问笔录、讯问笔录与被告人的当庭陈述之间的关系。由于询问笔录、讯问笔录属于侦查人员对供述或证言的再加工,其传闻属性非常明显,侦查人员在制作询问笔录、讯问笔录时,出于打击犯罪和及时破案的目的,往往带有片面的追究犯罪的主观倾向,在关键性问题的突破上可能出现诱供或诱证的情况,甚至发生逼供、逼证现象。因此,当询问笔录、讯问笔录与被告人的当庭陈述存在矛盾的情况下,法庭的质证与认证环节应当围绕后者展开,严格贯彻传闻法则,并对前者的证明力予以排除。其次,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不够发达,律师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辩护效果不甚理想。在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下,侦查机关依职权获取的证据往往容易被法院所采信,控方提供的证据的合法性与真实性更是“不容置疑”,这导致的后果就是询问笔录、讯问笔录在庭审中具有天然的优越性。尽管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予以明确,但不排斥公诉人以当庭宣读询问笔录、讯问笔录方式进行质证,而且法院在证人出庭作证问题上的裁量权过大,不利于控辩双方平等对抗,尤其是辩护方的辩护权的有效行使。“整个制度构建围绕着定罪量刑,而忽视保障被告人的对质权,为询问笔录、讯问笔录在庭审中的过量适用继续提供温床,使得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量使用询问笔录、讯问笔录代替相关人员的陈述。”^[10]因此,为了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格局,确保庭审实质化,保障被告方对质权,应当严格限制询问笔录、讯问笔录在法庭审判中的适用。

通过对两大法系证据法的考察可以知道,为了有效发挥庭审功能,确保“以审判为中心”,英美法系国家大多确立了传闻证据规则,并通过交叉询问机制来实现庭审实质化,使得法官的裁判结论直接来源于案件审理;大陆法系国家大多确立了直接言

词原则,强调法庭的举证、质证、认证和辩论环节都应当以言词形式展开,强调法官亲历性。总之,凡是具有人证属性的任何种类的证据的适用,都应当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或者确立传闻证据排除规则,证人都必须出庭以口头方式在法庭上作证,接受质证。只有在特殊情况下,询问笔录或讯问笔录才被允许采信。比如,《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在第174条、第190条分别对讯问笔录和询问笔录适用直接言词原则的内容作出明确规定,同时又在281条规定了例外^⑥,在符合特殊情形和法定程序时,才可以以宣读审前询问笔录的方式予以采纳。可以说,传闻法则下的法庭质证是发现真相的有效方式,同时有利于保障被告对质权的实现。虽然中国的刑事证据法中并没有类似于西方“人证”的法定证据分类,但是存在询问笔录、讯问笔录这样的以固定“证言”为内容的笔录类证据。对此,我们是否可以参考西方的证据类型的划分方法,对传闻证据的排除规则予以借鉴呢?在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进程中,法庭的裁判应“严格区分询问笔录、讯问笔录与当庭陈述,严格限制此类证据在庭审中的适用,确立传闻证据排除规则,以人证的出庭陈述作为定案依据,发挥询问笔录、讯问笔录作为弹劾证据的作用,让审理形式从‘笔录为中心’转向‘证人为中心’。”^[9]只有特殊情况下,才对询问笔录、讯问笔录进行采纳。

(二)实现法官个体独立

要摆脱“笔录中心主义”的司法弊病,必须确保司法独立,尤其是保障办案法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应当将构建中立、独立的法院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在刑事诉讼中,公、检、法关系的重塑,关键在于建立以司法裁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构造。”^[11]司法独立分为外部独立和内部独立,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保证法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我国司法的外部欠独立主要呈现为两大特点,即司法的地方化和司法的行政化,这成为影响法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两大“顽疾”。而破除“笔录中心主义”的裁判模式必须实现司法的内部独立,确保法官依法独立办案,从“事后性”“书面性”转向“亲历性”。

首先,应当赋予法官依法独立办案的权限。以往的司法改革过程中无法去除行政化办案模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无法构建以法官为权力主体的办案制度,例如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福

田区人民法院近年来推行了“审判长负责制”改革模式^[12]。可以说,上述改革是当前的法制背景下实现由法院整体独立向法官个体独立转变所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应该看到这种改革仍然未能够触及司法独立的核心内容——司法独立是承认并保障每一位办案法官的独立性。将独立的办案权限赋予审判长的做法否认了其他办案法官的独立办案权限,所以存在着审判长“行政化办案”的风险,审判长很可能成为新的“庭长式法官”,不参与案件的审理过程,却拥有案件决定权。有鉴于此,未来的改革应当直接赋予每一位法官依法独立办案的权限,并确立以法官为责任主体的独立办案模式。最高人民法院目前正在探索和推进的主审法官制度,肯定了承办案件的法官个体的独立性,符合司法独立的本质内涵,也契合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所明确的内容,即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

其次,明确院长、庭长及审判委员会的职责。要实现司法审判的内部独立,除了直接赋予法官个体的独立办案权限外,还应当协调好院长、庭长、审判委员会及法官之间的关系。院长、庭长属于法院的司法行政人员,行使着司法管理权能,尽管他们的选任与其业务能力有很大关系,但是以实现审判的审慎化为初衷的审批制度却容易导致行政管理职能与审判职能的混同,并对司法审判的独立性造成侵蚀。因此,“未来应当进一步简化甚至是取消庭长、副庭长这些管理性职务设置,并代之以职业称谓和职业荣誉”^[13],以推动司法职业化改革。审判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法官自治和司法民主的理念,有助于发挥法官集体的智慧,在中国语境下确有存在价值,但是,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做法与司法审判规律是不相符合的。因此,未来的改革中应当实现审判委员会职能的优化与转型,取消其讨论并决定案件的职能,着重发挥其在法律适用方面的专业优势。对此,有观点认为应当取消审判委员会对案件事实问题的审理权限,但是就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仍可以进行讨论、决定。这种观点有其进步意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裁判者在案件事实认定方面的亲历性,值得肯定。

注释:

①在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大修改中,卷宗移送制度由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主要证据复印件移送制度”改为“全案移送制度”,由此复归了1979年《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

“全案移送制度”,兜了一圈,全案移送制度又回来了。重回旧路,该制度固有的旧病——庭前预断并没有得到解决。

②自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事庭审实证研究”课题组的成员分别以问卷调查、座谈访谈、旁听审判和上网查阅等方式就我国刑事庭审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在各种笔录为中心的审判模式下,庭审虚化在刑事诉讼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这主要表现在举证的虚化、质证的虚化、认证的虚化和裁判的虚化四个方面。参见何家弘《刑事庭审虚化的实证研究》,载《法学家》2011年第6期。

③有学者这样表述,如果说这种主要关注被告人态度的“教化型庭审”本身就是场“表演”的话,那么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则更容易变成“表演”中的“表演”,只是表演的形式和水平因人因案而有所不同罢了。参见李奋飞《“表演性辩护”——中国律师法庭辩护功能的异化及其矫正》,载《政法论坛》2015年第2期。

④2002年初秋,在全国刑事案件清理超期羁押专项检查活动中,拓城县公安局将该案提交商丘市政法委研究。政法委牵头研究,做出了案件具备起诉条件的决定。之后的45天,该案迅速走完了从审查起诉、起诉至一审有罪判决的全部程序。关于该案可参见李奋飞《正义的救赎:影响中国法治进程的十大刑案》,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34-47页。

⑤此处主要围绕作为笔录证据主要内容的侦查笔录展开论述。

⑥《俄罗斯刑事诉讼法》第281条规定的特殊情况包括:被害人或证人死亡;被害人或证人患严重疾病而不能到庭;被害人或证人是外国公民而且拒绝接受传唤出庭;自然灾害或其他特殊情况致使被害人或证人不能到庭;被害人或证人在法庭上所作陈述与以前的陈述存在重大矛盾,根据控辩一方申请;享有豁免权的被害人或证人在法庭上表示拒绝作陈述不妨碍宣读审前询问笔录,只要这些笔录是他们自愿同意做出的。参见:黄道秀译《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240-241页。

参考文献:

- [1] 张建伟. 以审判为中心的认识误区与实践难点[J].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5).
- [2] 彭勃. 英国警察与刑事证据法规精要[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1-3.
- [3] 何家弘. 从侦查中心转向审判中心: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良[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2).
- [4] 沈德咏. 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J]. 中国法学,2015(3).
- [5] 陈瑞华. 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82-183.
- [6] 于书生. 笔录证据运用的过量与适量[J]. 法治论丛,2011(2).

(下转第67页)

情谊侵权行为理论探究

——从道德与法律相结合的角度分析

单光新

(扬州大学 法学院,江苏 扬州 225127)

摘要:“情谊”一词通常被认为带有浓厚的道德主义色彩,然而在人际关系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氛围下,原本处于“法外空间”的纯粹情谊行为正不断向“法律规制”的范围进行融合与渗透。在由道德向法律进行转化的过程中,对“情谊行为”和“民事法律行为”的区分是认定情谊行为性质的关键所在。当情谊行为满足条件成为法律调整对象之一的侵权行为时,其采用的归责原则对损害事实的分析和双方当事人权益的维护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正确理解情谊侵权行为的内容能够切实把握法律对现实生活的介入程度,也对合理划定二者的边界发挥良好的示范效果。

关键词:情谊行为;情谊侵权行为;民事法律行为;侵权责任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6.05.013

中图分类号:D9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6)05-0062-06

互帮互助、礼尚往来自古在具有“人情社会”背景下的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道德基础,情谊行为作为情感沟通与表达的重要纽带,在现实生活中串联起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友谊和密切关系。但在情谊行为人为对方提供服务与帮助的过程中,有时原本以良善为出发点的做法却在不经意间成为侵犯他人权益之损害行为。对于此现象如何找到一个既能准确分担双方的责任,又不影响助人为乐传统美德在当今社会中发挥作用的平衡点,是值得剖析与探讨的问题。鉴于该侵权后果产生基础之特定性,笔者将以情谊行为相关理论为切入点,对情谊侵权行为制度的内容予以必要阐释与相应论述。

一、情谊行为的界定

(一)情谊行为的含义

“情谊行为”(Gefälligkeiten)追其根源产生于德国判例学说,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德国民法典》中对此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论述。随着情谊行为在现实生活中不断深入,学界对其重视程度日益提升,对“Gefälligkeiten”一词的翻译版本也不断涌现。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和黄立教授将其译为“好

意施惠关系”^{[1]156}和“施惠关系”^[2]。内地学者苏号朋教授、邵建东教授分别将之称为“施惠行为”“情谊行为”^[3]。在此,笔者倾向于邵建东教授的译法,因为“情谊”一词与我国的“人情世故”社会和礼尚往来的具体生活更加贴切,更能够反映我国的国情和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悠久历史。再者,情谊行为说明的是双方或多方行为,而不仅仅只是一方主动为之,进而有别于单纯的赠与行为。

关于情谊行为的含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表述:德国学者梅迪库斯认为情谊行为是发生在法律层面之外,不能依法产生后果的行为。费肯切尔则提出情谊行为是不受法律管辖范围的日常生活事实,不具有受合同拘束的意思。^[4]还有学者提出情谊行为“在于当事人间就其约定,欠缺法律行为上的法律效果意思,不受法律拘束的意思。”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对情谊行为进行定义首先要把握三个重要因素:(1)情谊行为属于社会交往的事实行为,不属于法律调整的对象;(2)实施情谊行为的当事人不具有受法律拘束的意思表示,这一点是与民事法律行为相区分的核心因素;(3)纵然情谊行为

收稿日期:2016-07-11

作者简介:单光新(1992—),男,山东新泰人,扬州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商法学研究。

的一方当事人违背诚信诺言,亦不可依据法律追究其违约责任。故笔者在此提出情谊行为的含义为:当事人基于诚信善良风俗而实施的以促进和维护感情为目的,不具有表示意思,不产生法律效果的生活行为。其中最典型的为共同饮酒和好意同乘。与此相应的,由情谊行为而产生的彼此相互关系被称为情谊关系,而在情谊行为当中实施该行为的当事人被称为情谊行为的施惠者(Gefälliger),对方当事人则为情谊行为的受惠者(Gefälligkeitsempfänger)。对于情谊行为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类型^[5],广义的情谊行为是指所有含有情谊因素的行为,包括含有情谊因素的法律行为、纯粹情谊行为和模糊情谊行为三种,而狭义的情谊行为仅指纯粹情谊行为。本文中笔者所提及到的情谊行为则是狭义的情谊行为。

(二)情谊行为的性质

情谊行为的性质是指情谊行为本身固有的根本属性,其决定了情谊行为的本质面貌及相关事实的认定。笔者认为要准确把握情谊行为的性质不能仅从表面进行论述,相应参照物的对比则可显得更具体形象。在此,笔者将从情谊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事实行为之区别的角度展开分析,进而揭示情谊行为的本质属性。

1. 情谊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的区别

民事法律行为是一种法律事实,我国《民法通则》第54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提出,“法律行为乃以意思表示为要素,依其意思表示之内容,而发生私法上法律效力之法律要件”^[6]。大陆法系民法理论坚持民事法律行为作为“私法自治工具”,意思表示则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构成要素。可见,情谊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的区别的关键点在于当事人实施行为时是否具有意思表示。首先,情谊行为双方没有缔结法律关系的意思。情谊行为的施惠方目的在于为对方提供相应的帮助,从而维护其良好的友谊,受惠方则是希望通过救助来达到自己受益的理想状态。因而,二者并不具有签订合同目的意思和从事交易的行为动机,不产生须进行相互给付的债权债务关系,而只是单纯的社交行为。其次,情谊行为中没有受法律拘束发生特定法律效果的意思。民事法律行为会产生当事人期望的法律后果,主要是法秩序对当事人自主意思特别是当事人具有受法律拘束意思的尊重与认可。^[7]相反,情谊行为双方当事人从事的情谊行为仅是出自道德和礼仪,即如果不进

行该行为只会感到内心不安和情感上的愧疚,不具有受法律拘束的条件,这直接致使其处于法律调整范围之外,并不能产生法律上的后果。最后,情谊行为是双方共同行为。情谊行为不同于赠与合同中的单方行为,其必须由当事人双方共同完成,即情谊行为施惠人的施惠行为和受惠人的受领行为相结合,两者缺一不可;反之如果一方给予而另一方明确表示拒绝接受,其行为则非情谊行为。

2. 情谊行为与事实行为的区别

所谓事实行为是指行为人不具有设立、变更或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但依照法律规定能够引起法律后果的行为事实。^[8]事实行为不以意思表示为要件,无须让对方了解其真实内心想法而能产生法律效果,这是与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相区别的独到之处。而情谊行为虽不具有意思表示中的法效意思,也不产生法律效果,但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应充分尊重对方当事人的意愿。如果与之主观愿望相悖则实施情谊行为的价值就不复存在,甚至会陷入“好心办成坏事”的尴尬困境,因情谊行为是在善良风俗和人之道德的基础之上产生,其根本目的在于使接收方受益,进而建立和巩固双方当事人的友谊与情义。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情谊行为因不具有缔结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而不产生法律效果,因此其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同时,在实施情谊行为过程中考虑对方的情感需求与主观意愿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使得其亦不在事实行为的范畴之列。王泽鉴先生亦曾指出,“此等行为,当事人既无受其表意约束的意思,不能由之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9][57]}故情谊行为的性质只是一种受道德所调整、无法律约束力的生活事实。

对情谊行为含义与性质的准确把握给予我们一个以民事法律行为为中心,系统观察社会生活行为的良好视角,为合理划分彼此的界限提供相应的依据,进而有助于深化拓展对民事行为的划分标准,同时也为法院适用法律解决民事纠纷进行明确方向性的指引。

二、情谊行为向情谊侵权行为的转化

由于情谊行为是公民个人之间出于私人关系进行的友好交往,其仅属于“法外空间”的单纯道德行为,受道德和日常生活礼节的约束,对于此种纯粹的情谊行为本身,民法应该秉持谦抑性原则,否则可能导致法律对社交生活的“殖民化”,干扰正常结交往来的人之常情。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由于行为人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和当事人自身的过错而造成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屡见不鲜,使

得原本情谊行为的属性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从道德领域中的情谊行为过渡到了法律规制领域的情谊侵权行为。然而,情谊侵权行为属于民事法律事实,针对民事法律事实有学者提出:“民事法律事实是立法者将社会生活事实中无规范意义的部分加以裁剪,并将剩余部分运用民法的语言予以转述之结果,其实际上是立法者在法律评价的指引下对社会生活中的事实部分撷取而进行的一场“圈地运动”。^[9]据此,笔者认为允许哪些情谊行为进入民事法律事实范畴成为民法所调整的对象,可以依据“利益衡量原则”对具体问题中的不同考量因素进行分析和判断。所谓利益衡量(Balancing of Interests)又称利益考量、法益衡量,是指在既定的法律秩序内,针对相互冲突的利益做出其优先与否以及优先程度的判断,并基于此种判断而作出裁判的法律方法。利益衡量理论作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论,其思想来源于德国的自由法学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利益法学。情谊侵权行为作为民事行为当中的一种,势必会涉及到双方当事人利益得失。在社会资源处于动态平衡的良好模式下,作为社会成员的每个人其拥有的利益资源都相对均衡,且彼此不得相互侵占,否则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同理,如果在作为母行为(先行行为)的情谊行为的实施过程中,一方获得的利益明显高于或低于另一方,即双方利益处于显著失衡的情况下,则可推定该行为已经进入法律所调整的范围之列,先前的社会生活行为则转化为法律行为抑或事实行为,并可运用法律方法调整双方当事人原已失衡的利益使之得以复位。故利用利益衡量的方法对侵权行为的认定是理解和把握情谊侵权行为的前提,从而在此基础上进行具体问题的分析与探讨。

(一)情谊侵权行为构成要件

现代侵权责任制度体系的确立是人类法治文明发展和进步的产物。^[10]随着社会关系的多元化及人们法治观念的增强,侵权责任纠纷案件日益呈现出复杂化、专业化的趋势。但万变不离其宗,作为一种法律责任制度,其基本规则和固有的规律则是相通的,只要把握其核心本质即可认定相同类型的事实。我国法学界通说认为,一般侵权行为之侵权责任的成立须同时具备四个构成要件:侵权行为、损害后果、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过错。笔者认为情谊侵权行为侵权责任的成立与一般侵权行为侵权责任一样仍需具备以上四大要件,但情谊

侵权行为毕竟与一般侵权行为有所差异,对于二者构成要件的相同之处笔者在此不再赘述,笔者仅就其特殊条件方面进行必要论证。

1. 情谊侵权行为人基于情谊关系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

情谊关系是基于情谊行为而产生由道德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英美法系将情谊关系称为“君子协定”(Gentleman's Agreement)^[11]。侵权责任主体间具有情谊关系是形成情谊侵权行为的基础,同时亦是区分情谊侵权行为与一般侵权行为的首要因素。情谊关系一般产生于具有一定亲密关系的人之间,如同事、朋友、同学等,其是一种感性复杂的社会关系而非明文规定的法律关系。至于侵权人是采用何种行为方式造成损害,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主要有两种表现形态:作为与不作为。但纵观情谊侵权行为实施的整个过程并结合日常生活的案例,笔者认为情谊侵权行为应属于不作为的侵权行为。现代侵权法理论认为,人们不仅负有不得以作为的方式积极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义务,而且就自己行为对他人产生的不合理危险也应当具有警惕与防免之义务。在情谊侵权行为中,由于情谊行为人基于道德情操对受惠人提供无偿的物质帮助或精神服务,是为了增强和促进与受惠人之间的情感,行为人并无积极主动的去实施加害对方的行为与目的;如果有之,性质则为一般侵权行为。因此,就情谊侵权行为本身而言不应归入作为的侵权行为之列。

2. 情谊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只能为过失

在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中,行为人主观心态主要包括故意和过失,对于故意侵权与过失侵权二者的界定,梁慧星教授认为“以损害他人为目的实施相应行为或明知其行为会侵害他人却仍予以实施者,为故意侵权行为;因未达到法律规定抑或社会生活一般原则所要求的注意程度侵害他人的,则为过失侵权行为。”^[12]情谊行为的实施是以日常生活中诚信善良风俗为原则,并无刻意损害他人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主观意图,只是由于情谊行为实施人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而未尽到相应安全注意义务,进而造成了损害后果的产生。反之,如果行为人故意损害对方利益,就丧失了善意助人的基础,双方即不具备一定的情谊关系,所造成的侵害行为也非情谊侵权行为。但由于过失包括一般过失与重大过失,如果受害人基于情谊侵权行为进行索赔,究竟依照何种标准进行责任认定,对于该问题笔者将在下文归责原则和标准中进行详细分析。

3. 情谊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我国侵权责任法上的因果关系主要分为:一因一果、多因一果和多因多果等类型,鉴于情谊行为造成侵权损害后果的原因具有单一性或多元性,故导致因果关系亦出现以下不同情形:第一,在行为人进行情谊行为的过程中,因一方当事人的过失对他方实施了侵权行为且造成了损害,即在先行行为的基础之上产生了侵权行为,而后者是造成损害的直接原因,此种因果关系是现实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也相对容易判断。第二,实施情谊行为时有其他因素的介入,情谊行为与该因素二者共同促成情谊侵权行为继而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在此情形当中,虽有多个致害原因,亦不能阻断情谊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是在责任分担时会适当考虑减轻行为人的责任。第三,情谊行为中的不作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就此笔者认为,行为人承担安全注意义务是其从事先行行为时的内在要求,不作为的客观状态致使本不应受害的一方当事人处于被侵权的境地,基于该种危急情形才迫使其动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二)情谊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与标准

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是侵权责任法的统帅与灵魂,是侵权责任法理论的核心,是确认侵权行为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般准则和重要依据。^[13]依据民事责任制度上的“风险自担”理论,情谊侵权行为应该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因为任何具有独立意志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公民都应对自己所从事的行为予以充分的谨慎和注意,须为自己所做的选择承担“正常理性之人”可以合理预见的相应后果。该原则不仅可有效预防损害的发生,亦能够充分的发挥协调和平衡的法律效用,符合和谐社会理念的具体要求。但在过错责任原则下,情谊侵权行为究竟采取一般过失原则抑或重大过失原则,法学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邱鹭风教授认为应以故意和重大过失作为情谊侵权行为的责任归责原则。^[14]其理由为:情谊行为属于法律调整范围之外的纯粹生活事实,如法律过度介入这一社会生活层面让行为人承担一般过失责任,则会给人们的日常交往带来诸多不安全感,扼杀民事主体的意志自由,使得原本约定俗成的社会生活规则被破坏殆尽。再者,邱教授还提出如果行为人—有过失就让其承担责任对行为人不免过于严苛,不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理念,不利于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的理想目标。

笔者认为邱鹭风教授的观点有失偏颇。首先,

在上文中笔者已经提到情谊侵权行为的主观构成要件为过失,情谊行为是基于崇高道德和善良风俗而进行的助人活动,如果行为人自开始就具有侵害对方的不良企图,又何谈双方具有情谊关系,此前所做的一系列行为可谓是为将要实施的故意侵权行为做铺垫,其性质本就为普通侵权行为。同理,如果行为人在实施情谊行为过程中产生了损害对方的想法进而从事加害行为,则原先具有情谊性质的行为就成为具有一般侵权性质的损害行为,而此依然不属于情谊侵权行为的范畴。其次,邱鹭风教授过于强调对情谊侵权行为人的保障,对受害方权利的维护却未给予充分的重视,使得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处于失衡的状态之中。针对情谊侵权行为适用一般过失责任会导致公民不敢轻易地对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助之手,且破坏生活秩序的顾虑,笔者认为没有担心的必要。以典型的酒宴劝酒为例,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饮酒文化,酒桌上的劝酒行为表现了敬酒人对被敬人的尊重和热情,但鉴于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思维方式的转变,人们开始更加注重自身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同时劝酒人考虑到“醉驾”已入刑,如过度劝酒会使对方发生不良事故而自己也需承担相应责任,相应的劝酒的力度则会减弱转进而会提醒对方适可而止。故适用一般过失原则会对情谊施惠人起到良好的督促与警示效用,且进一步会防止损害事故的发生,这不但不会削弱邻里往来的感情交往,反而会促进和巩固双方乃至多方的友谊情感,更符合维护公共安全与构建和谐社会之要求。相应的,情谊侵权行为实行一般过失原则亦符合民法的基本价值目标。因为在情谊活动中当事人之间基于饮酒或好意同乘行为形成某种特别结合关系^[15],在此种情谊关系形成的同时,情谊行为人也需承担起对应的安全注意义务。随着对形式平等的追求到对实质平等的关注,以及由偏重对加害人的维护向重视受害人利益保障的价值理念之转变^[16],在一般过失原则当中对行为人设以“理性人”作为客观基准的更高要求的安全注意义务,正体现了侵权责任法约束不良行为、捍卫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价值追求。

(三)情谊侵权行为责任承担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换言之,对于侵权行为我国坚持“无损害则无赔偿”的理念,但笔者认为因情谊侵权的特殊性,在认定行为人责任时不能完全照搬普通侵权的法律规定,应在此基础上联系具体情形进行适当的调整与修正。因此,以下

几项因素可在司法人员进行责任认定时作为相应参考,并使得情谊侵权双方当事人的利益都处于法律的规制之下。

1. 情谊因素。情谊侵权行为毕竟不同于一般侵权行为那样具有直接的损害目的性,受传统道德的影响,行为人实施具有无偿性特点^[17]的情谊行为其本意是为对方当事人提供帮助,从而联络彼此的情感,当事人虽因过失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但对其原先帮助行为的积极价值则不可予以全盘抹杀,否则公民之间信任感将不复存在,整个社会也将陷入严重的道德危机之中。故法官在判定侵权人责任承担时应对此因素进行酌情考虑。

2. 受害方或第三方的过错。在对当事人侵权责任进行认定的过程中,对受害人和第三方的主观状态及相关行为的把握是进行合理归责的必要条件。如果情谊侵权的损害后果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则情谊施惠人不承担责任。假设在此期间行为人与受害人都具有一定过失,则依据过失相抵和公平责任原则按照二者相应的过错程度进行责任的分配。同理,由于第三人的过错使得损害发生或扩大的,行为人进行举证以后可以适当减轻或免除情谊侵权行为人的侵权责任,以达到损害与赔偿相当、利益与责任对应的公平公正的理想状态。

3. 纯粹经济损失。对于由情谊侵权行为造成的纯粹经济损失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瑞士《赔偿法》第2条规定:“纯粹金钱上的损失是指在任何方面都与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无关联的经济损失。”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关于纯粹经济损失的立法^[18],而其他国家对其规定仍处于学术讨论阶段。笔者认为纯粹经济损失因其并非由侵权行为直接引起,加之侵害人对纯粹经济损失缺乏可预见性,为了防止责任承担的无限扩大,对于纯粹经济损失不应当给予赔偿。再者,目前法律特别规定对纯粹经济损失给予赔偿的主要为婚姻家庭领域受害人的扶养人之生活费,故除法律规定外,对于情谊侵权行为造成的纯粹经济损失的法律请求原则上应不予支持。

4. 自甘风险。自甘风险又称自甘冒险,是指受害人明知某种行为具有危险,但仍然自愿冒险从事该行为。在情谊活动当中,如果情谊行为当事人在损害后果发生前,已经意识到风险可能发生,仍执意实施或者接受此种情谊行为,其本身就是对自己合法权益的一种忽略与淡化,虽不至于说其在主观上具有过错,但当事人依然要为自己缺乏考虑的行为

承担必要的责任。因该种情况在情谊行为中时有发生,为了使双方当事人的权利都得以维护和公平对待,可将其归入侵权责任法当中作为认定责任归属或免责事由的标准之一。

三、结语

情谊行为被称为是从传统的民法体系中发掘出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的精巧理论,其本身并不为法律所调整,但这并不意味着情谊行为无法纳入法律规制之轨道。情谊侵权行为作为情谊行为质变后的一类新型侵权行为,其存在不仅使得民事侵权责任制度的内容更加丰满,同时也为法官深入了解现实生活、扩展法治思维提供了新鲜素材,进而在法律规则与道德传统二者之间构架起一道坚固的桥梁。但鉴于情谊侵权行为类型的多元化,这对司法人员立足于我国具体现实国情且准确合理认定行为人之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标准。然而,法律制度毕竟具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情谊侵权制度的逐步建立并趋于完善,在弥补民法制度体系与当前民法典的制定方面具有相应的参考意义与借鉴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将保障与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的法治理念真正落到实处,从而为实现法治国家和彰显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 [1] 王泽鉴. 债法原理[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2] 黄立. 民法债编总论[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7. 另参见余家骏. 试论共同饮酒中的情谊侵权行为责任[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4(9):92-98.
- [3]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 德国民法总论[M]. 邵建东,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48.
- [4] Wolfgang Fikentscher, Andreas Heinemann. Schuldrecht[M]. Berlin:De Gruyter Recht,2006:21.
- [5] 张文显. 法理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00.
- [6] 史尚宽. 民法总论[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306.
- [7] 蒋镭帆. 论情谊侵权行为[D].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3:6-7.
- [8] 李峰. 民法学[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120.
- [9] 王雷. 情谊行为、法外空间与民法对现实生活的介入[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4(6):42-51.
- [10] 张民安. 现代法国侵权责任制度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68.
- [11] 张平华. 君子协定的法律分析[J]. 比较法研究,2006(6):69-81.
- [12] 梁慧星. 民法总论[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234.
- [13] 杨立新. 侵权行为法专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2002;102.
- 报,2010(4):18-22.
- [14]邱鹭凤.论情谊行为侵权责任:以一起“情谊行为侵权案”的判决为分析样本[J].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122-131.
- [17]王雷.情谊行为基础理论研究[J].法学评论,2014(3):57-66.
- [15][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总论[M].杜景林,卢湛,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4.
- [18]沈志先.侵权案件审判精要[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114.
- [16]邱雪梅.情谊侵权行为初探[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
- (责任编辑 刘成贺)

Research on the Friendship Tort Theory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bination of Morality and Law

SHAN Guang-xin

(School of Law,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127, China)

Abstract:The word “friendship” is usually endowed with color of moral idealism in real lif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omplicate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the pure friendship behaviors that are outside the law are penetrating into the scope of legal regulation. Distinguishing between friendship behavior and civil juristic act is the key to identifying friendship behavior nature in the process of morality to law. When friendship behavior transforms friendship tort that is one of the legal adjustment object, the imputation principl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nalyzing the damage to the facts and maintain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both parties. In the meantime, understanding correctly the friendship tort is beneficial to grasping the degree of law, and dividing the boundary of legal regulation and life at present.

Key words:friendship behavior; friendship tort; civil juristic act; tort liability

- (上接第 61 页)
- [7]陈瑞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92-194.
- [11]熊秋红.刑事司法职权的合理配置[J].当代法学,2009(1).
- [8]朱立恒.传闻证据与侦查笔录的运用[J].法学杂志,2006(2).
- [12]赵蕾.佛山试行独立审判改革,最大胆的法院改革等待下文[EB/OL].(2013-04-25)[2016-06-15].<http://www.infzm.com/content/89909>.
- [9]邓陕峡.我国刑事笔录类证据制度探析[J].证据科学,2013(1).
- [13]陈卫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研究[J].中国法学,2014(2).
- [10]罗海敏.两岸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比较[J].证据科学,2012(3).
- (责任编辑 刘成贺)

Breaking the Trial Model of “Notes Centralism”

——A Response to the “Trial-Centered” Reform of the Procedural System

CUI Yong-cun

(School of Law,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As the core of “investigative centralism”, “notes centralism” has become a major obstacle to the “trial-centered” reform of the procedural system.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at the trial plays a substantial role in criminal procedure, the trial mode of “notes centralism” should be broken and a breakthrough must be achieved in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firstly, the application of inquiries record and interrogation record in the trials should be strictly limited and hearsay rules in China should be created in order to ensure the essence of the trial; secondly, individual independence of judges should be realized and judgment principle of the judges should be carried out to make sure that the judges independently exercise their functions and powers according to law.

Key words:notes centralism; hearsay rules; independence of judges

异化:后殖民主义翻译策略的选择趋势

王振平,焦亚芳

(天津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222)

摘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后,翻译研究开始着眼于译者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因素,逐渐与文化、社会、政治结合,于是后殖民主义理论也进入翻译研究领域,并促进了其自身与翻译研究的共同发展。在后殖民主义翻译中,译者为达到解殖民化目的,多采用能体现其目的的策略,尤其是异化的翻译策略,这不但表现了后殖民主义思想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也表现了其对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的影响。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异化;混杂性;巴西食人主义理论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6.05.014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6)05-0068-04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之后倍受关注的翻译理论,以往的研究者主要从实质、内涵、代表人物、翻译策略、影响等方面对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进行阐述。本文将从后殖民主义译者的翻译策略出发,分析后殖民主义译者为达到解殖民化翻译目的,最终会选择异化翻译策略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一、后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翻译

(一)后殖民主义

西方中心主义者认为欧美是世界的中心和唯一的意义渊源,而把其他地区看作是笼罩在黑暗和蒙昧中的“他者”,主张将西方文化普遍化,喜欢把自身规范强加于弱势文化,利用自身优越性剥夺弱势文化的话语权,推行文化霸权。后殖民主义是对这种观念的反对或批判。

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是1970年代兴起的学术思潮,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其历史使命是解殖民化。杨耕等认为后殖民主义“不仅成为东方与西方‘对话’的文化策略,而且提供了东方文化得以重新认识自我的前景,是‘边缘’学者用来拆解西方主流话语的一种策略”^[1]。后殖民主义研究的焦点是,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的话语权关系以及国家民族文化和文化身份等问题,通常

以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理论为核心话题,通过研究东、西方不平等关系来揭露文化霸权的实质。

(二)后殖民主义翻译

1. 后殖民主义翻译的作用

翻译曾经并仍然被西方某些人用来充当殖民工具,以达到其文化渗透的目的,但是在解殖民化进程中,翻译也是弱势文化用来抵制文化霸权、摆脱殖民束缚的武器。

殖民主义时期结束之后,强权国家对殖民地的殖民方式由军事压迫、武装掠夺变成了经济与政治控制和文化渗透,而翻译便是进行文化渗透的最佳殖民武器。强权国家通过翻译将西方文化带入弱势文化,慢慢麻痹读者,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被其文化意识形态所主导,进入所谓主流文化,并逐渐忘记或舍弃自己的民族特性。

殖民时期的暴力掠夺会遭到武力反抗,而后殖民主义时期,思想控制、文化渗透就像温水煮蛙一般,会慢慢消磨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意识,使之西化,接受西方意识形态。因此,要抵制文化渗透,弱势文化就需要寻找有力的“防身”武器,而翻译便是一个选择,它既可以帮助弱势文化抵制殖民霸权,又有助于其行使自己的话语权。

收稿日期:2016-07-14

作者简介:王振平(1965—),男,河北崇礼人,博士,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与比较文学。

2.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目的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也称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 兴起于 1980 年代, 主张将政治和翻译结合, 通过翻译实现解殖民化目标。

在后殖民主义翻译中, 译者为了实现解殖民化翻译目的, 使弱势文化能够抵制文化霸权, 夺回话语权, 会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来体现和实现其目的, 这一观点也正是当下流行的翻译目的论的体现。目的论认为翻译是跨文化交际活动, 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或意向性, 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 而翻译策略的选择又常常反映译者的主张和意向。因此, 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 翻译策略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解殖民化特性。

但是, 翻译目的论又不同于目的。目的指意图、目标, 是预先设想的静态行为结果, 而翻译目的论强调的是通过多方努力使译文显现特有的功能。例如, 为使译文达到预期的效果, 译者会根据赞助人要求、读者期望或译者自身的翻译观, 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 并对原文进行修改与调整。因此, 从目的论视角看,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具有解殖民化的目的, 后殖民主义译文具有解殖民化的功能。

二、后殖民主义翻译策略

后殖民主义翻译策略有霍米·巴巴 (Homi K. Bhabha) 的混杂性 (Hybridity) 翻译、巴西食人主义理论 (Cannibalism Theory) 以及异化翻译策略 (Foreignization), 这些翻译策略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后殖民主义翻译家和理论家试图通过翻译达到其解殖民化目的的追求。

(一) 混杂性翻译理论

混杂性又称杂合性或杂糅性。杂合 (Hybrid) 一词最先用于生物领域, 指生物或物种意义上的杂交, 被引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之后, 指语言文化、意识形态或价值取向等方面的混杂, 由两方面或多方面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从而形成新的一方。

后殖民文学具有一定的混杂性, 是本土传统的语言文化与强权国家的语言文化的杂合体。率先将混杂性借用于后殖民主义理论, 对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的是霍米·巴巴。^[2] 巴巴认为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话语权力关系, 并不仅仅是强势文化单向的霸权压制, 弱势文化的本土性特征也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强势文化, 他们之间相互交织、相互混杂, 难以严格划分界限。^[3]

巴巴认为混杂性关注或强调的并不是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相互对立, 而是产生于两者之上的杂合。韩子满指出, 弱势文化在面对西方文化输

出的大量作品时, 不会照单全收, 而是根据自身需要, 发挥主动性, 有选择地对外来成分进行改造, 并与本土文化结合, 从而形成杂合的第三文化。这样, 弱势文化在面对文化渗透时, 虽然会失去部分本土特性, 但又不会被强势文化全部同化。^[4] 189-190

在后殖民主义翻译中, 译者采取混杂性翻译策略, 使译文兼有西方文化特色及弱势文化的本土特性, 这满足了一些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试图否定东西方文化二元对立、寻求第三种研究视角的诉求, 避开了话语权争夺的尖锐局面, 并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争斗, 起到了解殖民的作用。

(二) 巴西食人主义翻译理论

“食人” (Cannibal) 一词产生于 16 世纪初。巴西图比人 (Tupinamba) 食人部落吞食他人, 吃掉尊敬的人, 就像吞食其图腾一样, 是为了汲取力量, 并向其表达虔诚和敬意, 具有特殊寓意。

安德拉德 (Oswald de Andrade) 在 1928 年发表的《食人宣言》中, 将食人论视为抵抗宗主国的武器, 这代表了一种觉醒和反抗。1963 年, 翻译家德·坎波斯 (Haroldo de Campos) 的《作为创造和批评的翻译》 (On Translation as Creation and Criticism) 一文, 将食人论引进翻译理论。^[5]

巴西食人主义翻译理论, 强调弱势文化通过“吞食”外来文化来达到摆脱西方文化霸权、文化渗透及文化同化的目的, 主张本土弱势文化吞噬强势文化, 吸取其精华, 内化为本土文化, 从而强化自我, 重塑文化身份, 并达到抗衡文化殖民的目标。并且, 食人主义翻译理论倡导弱势文化不断更新变强, 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止弱势文化走向狭隘民族主义或本土主义的作用。

(三) 异化翻译策略

在英美翻译史上, 归化策略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在主观或客观上达到了捍卫西方文化中心与主流地位的效果。归化翻译有意无意中剥夺了弱势文化话语权, 起到了文化殖民的效果。韦努蒂的“阻抗式”翻译, 即异化翻译的目的就是挑战归化翻译的权威地位, 以打破西方人不健康的文化观, 摧毁其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韦努蒂认为“英语中的异化翻译有时是抵制民族中心主义与种族主义、文化自恋与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 有利于民主的地缘政治关系的确立。”^[6] 21

韦努蒂强调, 异化翻译“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 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7]。异化翻译满足了一些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的需求, 他们主张创造多元文化共存的局面, 以实现解殖民化目标; 主张译者把

弱势文化的异域情调译入西方,重塑本土文化形象,以夺回话语权。例如对《红楼梦》的翻译,不同于霍克斯的归化翻译,杨宪益夫妇采用异化策略,译出了富含中国文化色彩的英译本。对于“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饭。”霍译为“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杨宪益夫妇则译为“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对于“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霍译为“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杨宪益夫妇译成了“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再比如,对于“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性命。”的翻译,霍克斯译为“The disillusioned to their convents fly. The still deluded miserably die.”杨宪益夫妇将其译作“Those who see through the world escape from the world, while foolish lovers forfeit their lives for nothing.”霍克斯的归化翻译,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文化差异,忽视或有意消除了汉语的文化特色,而杨宪益夫妇译文表现的异域情调恰到好处地使西方人了解到中国独具特色的饮食习惯、宗教信仰及文学特性,再比如对金陵十二钗的简短的命运结语,道出了对特定历史时期中国传统大家族命运浮沉的悲叹。如果译者想要把本土文化的异质色彩展现给西方乃至全世界,异化翻译应是首先的考虑。

在后殖民主义翻译中,使用异化翻译能使西方读者体会到异域文化的美妙,领略到不同文化的魅力,这有利于解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价值观,抵制文化霸权。

三、后殖民主义翻译异化策略选择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一) 选择异化策略的可能性

后殖民主义翻译策略各有所长,同时也各有其局限性,但相比较而言,异化翻译更优。

混杂性翻译策略追求双赢,强调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从而形成杂合的第三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双方对话语权的争夺采取了折中的态度,避开了争锋相对的局面。韩子满指出杂合模糊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界限,淡化了两者间的主次之分,使弱势文化不再被认为是低等、滞后的文化。他认为宗主国文化进入弱势文化,为其发展提供了动力。^{[4]12}混杂性理论强调文化的杂合性,西方文化进入本土时,需尽量保留本土文化的特性,以防被西方强势文化完全同化;同时,弱势文化译入西方,无论加入多少异质色彩,也难以彻底摧毁目标语文化的民族特性。因此,虽然混杂性翻译理论是弱势文化抵制文化霸权的一种抵抗策略,

但它并不彻底,不能满足后殖民主义者要彻底改变弱势地位、追求话语权力平等的目的。

相对于混杂性理论,巴西食人主义翻译理论观点更加鲜明。它主张弱势文化通过“吞食”进入本土的强势文化来摆脱殖民操控。但由于该理论仅限于其他文化译入本土范围内时使用,易导致弱势文化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从而无法真正摆脱强势文化的操控,获得世界范围内解殖民的胜利。弱势文化只有走出狭小地域,进入西方文化的中心,才能真正夺回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并且,食人主义翻译理论的实质就是一种归化翻译,而归化作为被西方权威化的翻译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文化霸权的代名词,不符合解殖民化需要。还有,过度归化会阻碍弱势文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削弱对文化霸权的抵御能力,从而加速其自身的殖民化。

异化策略的提出是对归化翻译的抵抗,也是对西方文化权威的挑战,本质上体现了一种解殖民化的追求,满足了后殖民主义抵制文化霸权、去权威化的要求。异化翻译策略主张将源语文化的异域情调传入目标语文化,广泛传播民族特色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从而保存文化的差异性,这既为后殖民主义译者提供了明确的翻译策略,又有利于弱势文化重塑自身的形象,同时还为文化多元、平等共存的美好未来的实现做出了贡献。在长期的文化霸权下,东方文化中异域情调的那份神秘感和美好都未曾真正展露,西方人未必领略过东方文化中短短一句佛教禅语所表达的生死轮回与人世缘分,更无法参透简单的文字中可能蕴含的精深的含义。而异化翻译,有利于弱势文化将其文化特性展现给世界,以达到抵抗文化霸权的效果。当然,异化翻译也有局限性,过度异化会使译文变得晦涩难懂,甚至失去可读性,阻碍译本的传播。

综上所述,由于混杂性理论具有不彻底性,以及巴西食人主义理论具有一定的狭隘性,因此后殖民主义研究会逐渐把目光挪开,去关注其他策略,而异化译法正好满足了他们对于去权威、解殖民化、追求文化多样性的要求,所以在后殖民主义视角下,异化翻译策略应是译者的首先选择。

(二) 采用异化策略的现实性

全球化最显著的特点是人们对差异的追求。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各种文化通过网络平台、影视媒体、书刊网站在世界各国传播,并在某种程度上逐渐趋同化,而在这种趋同化局势的背后,可能便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强势渗透与操控。朱安博指出“所谓的全球化,实际上主要是美国文化对其他文化

的‘化’……从弱势文化的角度说,文化的全球化其实也就是文化的殖民化。”^[8]因而,只有实现解殖民化才能实现真正的全球化。而异化翻译,既能满足全球化时代对差异的追求,又能推动解殖民化的进程。

读者的追求与期待不可忽视,译者大多都希望得到读者的接受。关于异域情调在译文中是否受欢迎这一话题,曾有人组织过对《红与黑》汉译读者意见征询活动,调查表明大多数读者比较喜爱与原文结构较为贴切的译文。^[9]因此,异化翻译的运用正好满足了读者猎奇的需求,也满足了后殖民主义者对于反抗殖民霸权的诉求。

异化翻译也会产生不良的效果。对异化翻译的过分追求,可能导致作家刻意创作,为了勾起西方批评家猎奇的审美欲,肆意宣传本民族文化中曾经或现在仍然存在的扭曲、低俗、丑陋的异质,如《红高粱》《菊豆》等中国作品,虽然作品改编的电影在国际上大获成功,但却容易在西方人眼中丑化甚至僵化中国的形象,有人用“‘挖祖坟’献媚西方”来形容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过分。

综上所述,在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中,虽然混杂性理论和巴西食人主义理论都不同程度上为解殖民化作出过贡献,但异化策略更符合后殖民主义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要求,并且,异化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的要求,更满足了全球化时代的需求。

四、结语

异化翻译策略是对归化翻译权威地位的挑战,后殖民主义是对强权国家文化霸权的抵制,翻译目的论是对原文中心论的反拨,在一定程度上,异化翻译、后殖民主义、翻译目的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去权威化色彩,异化翻译能满足后殖民主义解殖民化的诉求。

把弱势文化译入西方时,可以用异化策略去翻译那些不被关注的异域作品,重建文化权威,使弱势文化获得新的身份。或者,翻译那些遭到排斥的弱势文化文本,在英语中重构外国文学的典律,抵制主流文化的霸权。

如果后殖民主义过分强调话语权力的差异性,容易造成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抵制,形成狭隘的民族主义,阻碍东西方和平共处与文化交流。所以,盲目、刻意或过分的异化会起到过犹不及的作用,也是我们在实践中应当避免的。

参考文献:

- [1] 杨耕,张其学. 后殖民主义:实质、特征及其局限:从马克思的观点看[J]. 社会科学战线,2005(2):247-256.
- [2] 陆薇. 混杂性[J]. 国外理论动态,2006(5):60.
- [3] Bhabha K H. The Location of Culture[M]. Lond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197.
- [4] 韩子满. 文学翻译杂合研究[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 [5] 杨司桂,樊波. 食人主义翻译理论的发生及其启示[J]. 社会科学家,2013(9):148-151.
- [6] [美] 韦努蒂. 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M]. 张景华,等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 [7] Venuti Lawrence. Strategies of Translation[M]. Lond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5.
- [8] 朱安博. 归化与异化:中国文学翻译研究的百年流变[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189.
- [9] 许钧. 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25.

(责任编辑 谢春红)

Foreignization: Trend of Post-colonialism Translation Strategies

WANG Zhen-ping, JIAO Ya-fa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ianjin 30022,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cultural turn of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experts and scholars gradually focus on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ideologies of translators, poetics and sponsors instead of only focusing on the plain text, and the scholars try to combine their studies with culture, society and politics. Therefore, postcolonialism studies are introduced into translation field and promote their own development with translation study development together. In postcolonialism translation, translators tend to choose strategies that adjust to their objective of decolonization, especially foreignization. And this trend shows that postcolonialism not only influences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ideology of us, but also affects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translation study.

Key words: postcolonialism translation theory; foreignization; hybridity; Brazilian Cannibalism theory

接受理论指导下童话语言的“形象性”汉译实践

——以伯吉斯的《狐狸奶奶》为例

程秀芳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外语系, 江苏 徐州 221100)

摘要:接受理论以读者为中心,以读者接受为目标,为童话翻译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接受理论的核心是读者的主体性,而读者的特殊性正是儿童文学的特殊之处,因此接受理论对准确把握英语儿童文学汉译本中儿童语言的特色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在接受理论指导下,基于汉语儿童语言“形象性”的特点,对伯吉斯动物童话《狐狸奶奶》进行了汉译探索,总结了在词法和修辞上的具体翻译方法。

关键词:接受理论;形象性;词法;修辞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6.05.015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6)05-0072-04

一、引言

伯吉斯是美国著名童话作家、环保主义者、自然主义者、自然资源保护论者、“睡前故事大叔”,一生热爱大自然,热爱小动物。在大约50年创作期间,他以自然界的小动物为主角,为孩子们写了170多本书,并在报纸专栏上发表15000多个专栏故事。他的多部作品都是金麦田国际获奖童话作品,同时获得波士顿科学博物馆“引导孩子爱上神奇的自然”金奖、“睡前故事俱乐部”保护野生动物终身成就奖、“大草甸俱乐部”永久纪念奖、“灰松鼠乐乐俱乐部”成立奖、“自然联盟广播”频道特殊贡献奖等多项大奖。

“伯吉斯动物童话”系列蕴涵着丰富的科学知识,塑造了一批立体鲜活、性格迥异的动物朋友,为读者描绘了童话里的美好世界,被誉为跨越时空的永恒经典,影响名人、作家一生的童话作品。情节曲折有趣,语言质朴生动,把丰富的科学知识、大自然与生灵万物息息相通的依存关系以及人与动物、人与社会间多重关系的哲学思辨渗透在多姿多彩的故

事中。本研究通过对伯吉斯所著的动物童话 *Old Granny Fox* 的汉译实践,探索总结英语儿童文学汉译过程中语言处理的具体应对方法,旨在丰富英语儿童文学汉译的翻译技巧和翻译策略,为儿童文学的汉译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二、接受理论及对英语儿童文学翻译的启示

接受理论是由德国学者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其代表人物有 Reiss, Vermeer 及 Nord。接受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是一项需要考虑读者和客户要求的目的性交际行为。由于语言种类、文化背景、思维模式、表达习惯上的差异,源语作者的意图和采用的语篇形式与译文读者的接受能力存在着一定的差异。”^{[1]35}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从目标读者的角度出发,根据译文的预期功能和目的决定翻译策略和方法。“接受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翻译目的论,其强调的不是译文与原文是否对等或译文是否完美,而是注重译文应该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以译文的预期的功能为目的,选择最佳的处理方法或策略。”^{[2]93}目的论的观点是“翻译的标

收稿日期:2016-06-15

基金项目:2014年度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指导项目“基于幼儿语言认知规律的儿童绘本汉译研究”阶段性成果(2014SJD480);国家级子课题“幼儿英语视听启蒙网络资源的整合运用研究”阶段性成果(156222802-00005)

作者简介:程秀芳(1979—),女,江苏徐州人,硕士,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准是合适,而不是等值,与传统评判译文质量的标准相比,接受理论突破了以语言形式和语言结构上的完全对等的标准的束缚,将目标读者的感受与反应作为评判译文质量的一个方面。”^{[3]118}

在儿童文学翻译实践中,首先要确定翻译的目的,将目标读者放在重要地位,根据目标读者的实际情况和接受能力及水平确定翻译策略和方法,以实现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被接受、被认可。英语儿童文学翻译的目的是借助其英语文本为目标语(中文语言)提供中文文本,以实现译文的预期功能:让译语小读者享受到源语小读者同样的阅读效果。因此在英语儿童文学的汉译中,让儿童增长见识、熏陶性格情感和体验其中快乐的文本功能应该在译文中得以重现或移植,以满足目标受众读者(中文儿童读者)的阅读需要。

作为成人的译者一定要充分考虑目标读者的需要和特点,要深入考虑儿童读者的生理及心理特征、语言特点、接受能力和理解水平,以适合其认知规律和语言水平的表达作为儿童语言处理的标准,找出适当的策略和方法,创作出符合译入语言和文化规范的译文,来满足目的受众的阅读需要。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译者根据接受理论的要求,将目的受众的阅读需要放在首要位置,以儿童语言的浅显性、音乐性、形象性、动作性、情感性和趣味性作为儿童语言处理的标准,对译稿做出反复多次的修改。限于篇幅,下文主要从儿童语言的形象性方面,通过对比分析译文初稿和终稿的语言处理变化来探讨英语儿童文学汉译实践中的语言的处理技巧和方法。

三、儿童文学“形象性”的语言特点在《狐狸奶奶》汉译中的应用

“语言的形象性首先是由文学的基本特性决定的。首先,文学是通过塑造形象反映生活、表达情感的,不管是成人文学还是儿童文学,用的都是形象思维;其次,儿童的抽象思维比较薄弱,具体形象思维是他们认识世界的主要形式。”^{[4]8}因此,儿童文学要尽可能地应用形象化的语言,把人和物的声音、形状、色彩、动作、神态等,鲜明而具体地展现给读者,使他们感同身受、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触其物、如闻其声。

“形象化的语言有利于儿童将语言所提供的信息与自身的经验相结合,儿童的生理心理特征决定了其注意以无意注意为主,并且其注意力集中的时间不会太久,还容易受到干扰和分散,形象化的语言能够吸引并延长儿童注意力集中的时间。”^{[4]8}由此可见,为了吸引儿童读者的阅读兴趣,译者应该采用

多种翻译方法来增强译文的形象性。

(一) 词语选择

感叹词和语气词被广泛应用在汉语中,用于表达各种情绪、情感和态度。汉语中富含各种表意丰富的感叹词,并且他们频繁出现在孩子的日常语言对话中来传递孩子的情绪、情感。在汉语目的语言中合理使用感叹词和语气词能使译文文本更加生动、形象、鲜活,也就更容易让目的语儿童产生情感共鸣,进而喜欢和接受。

例1:“I’m starving now,” whined Reddy.^{[5]2}

初稿:“我现在就饿了,”雷迪发着牢骚。

终稿:“哎哟……哎哟……我都快饿死啦!”雷迪故意扯着嗓子大叫。

汉语中的感叹词和语气词远较英语中丰富,而且感叹词和语气词本身极其富有形象性和感染力。虽然原文文本中并未直接出现感叹词和语气词,但鉴于该故事中小狐狸张扬淘气的性格特征,他此时说话的语气一定是极其撒娇、夸张,小狐狸雷迪使尽浑身解数以迫使狐狸奶奶改变原有的猎捕方案和计划,因此修改后的译文添加了感叹词“哎哟”和语气词“啦”以更好地传递源语文本的语用涵义,把一个装腔作势、撒泼耍赖的小狐狸形象刻画地鲜活生动,译文语言的形象性大大增强,更容易为中国小读者喜爱和接受。

“儿童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要借助物体的颜色、形状及声音进行。叠音词,是重复同一个音节所构造的词,在中文儿童语言中,是一种应用极广的词汇。”^{[4]9}叠音词在汉语儿童文学中广泛频繁使用能大大凸显语言的形象性。因此,在翻译英语儿童文学时,译者可适当选用叠音词,即便在原文并未出现叠音词的情况下,译者也可主动创造出一些生动形象的叠音词,使译文更容易为目的语的儿童读者所接受。

例2: Jolly, round, bright Mr. Sun had just got well started on his daily climb up in the blue, blue sky that morning when he spied two figures trotting across the snow – covered Green Meadows, one behind the other.^{[5]3}

初稿:那轮整天乐呵呵的红圆脸太阳公公刚刚爬上湛蓝湛蓝的天空,就看到一前一后两个身影在疾步穿越冰雪覆盖的“绿草地”。

终稿:乐呵呵、圆滚滚、亮堂堂的太阳公公刚刚爬上湛蓝湛蓝的天空,就看到一前一后两个身影在疾步穿越冰雪覆盖的“绿草地”。

这句是对太阳公公的描述,原文中使用了“jol-

ly, round, bright”三个形容词把慈祥可亲的太阳展现在小读者眼前。终稿译文叠音词生动活泼,且节奏、韵律十足,能把声音、形状、状态等描摹得更加生动形象和自然传神,充分考虑到译入语小读者的阅读习惯,使用中国儿童读者熟悉、喜爱的叠音词,以增加作品的语言魅力,提升作品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以激发儿童读者的阅读兴趣。翻译终稿中的叠音词“圆滚滚”“亮堂堂”不仅较好地平衡了句子结构,而且传递出源语中的艺术风格和美学价值,在孩子头脑中形成具体可感的意象,更易于为习惯形象化语言的儿童读者所接受所喜爱。

例3: Then began such a queer performance that it is no wonder that Reddy was sure Granny had lost her senses. She rolled over and over. She chased her tail round and round until it made Reddy dizzy to watch her. She jumped up in the air. She raced back and forth. She played with a bit of stick. ^{[5]9}

初稿: 接着是如此奇怪的表演以至于雷迪都觉得她疯了。她翻滚;她追着自己的尾巴转圈,转到雷迪看的都晕了;她在空中蹦跳,上窜小跳;她跑来跑去。

终稿: 然后呢? 就是奇奇怪怪、疯疯癫癫的表演,连雷迪都觉得她一定疯啦! 她在沙滩上翻呀翻,滚呀滚;她追着自己的尾巴一圈一圈地转,转到雷迪看的都晕了;她在空中蹦蹦跳跳;她来来回回地跑。

终稿采用了一系列叠音词诸如“奇奇怪怪、疯疯癫癫、翻呀翻、滚呀滚、一圈一圈、蹦蹦跳跳、来来回回、跑来跑去、耍来耍去”,把狐狸奶奶描绘的栩栩如生,形象逼真地再现了当时的场景,终稿中的翻译处理不仅使文字更加生动可读,而且给予小读者更多的想象时间和空间来理解感受这一情境。

另外,儿童独特的心理和认知特点决定了其对声音的敏感性,摹声词具体、清晰、动感、朗朗上口的特点能增加文本的形象性,可以使文字更加生动,增强译文的音响效果,使儿童在不知不觉中走进作品描绘的情境之中。

例4: Like a flash he turned. There was the whistle of stiff wings beating the air and the patter of feet striking the water as he got under way. ^{[5]7}

初稿: 他闪电般转身飞奔回安全的水域,甚至可以听到他僵硬的翅膀拍打空气和脚掌击水的声音。

终稿: 他闪电般转身,飞奔回安全的水域,甚至可以清楚地听到他僵硬的翅膀扑楞扑楞拍打空气的声音和脚掌扑隆扑隆击水的声音。

在接受理论指导下,使用了意译的翻译方法,增

用了叠音摹声词,分别具体形象地翻译为“扑楞扑楞”和“扑隆扑隆”,不仅具有音响效果,而且活灵活现地渲染了当时鸭子急于逃命的情形和气氛,给译入语的小读者营造了一种形象、自然、逼真的场景,引起了儿童读者对音响的直感,音响的直感又可唤起形象,让小读者更好地体验作品的情节和内容,取得了良好的翻译效果。

(二) 修辞手法的运用

“比喻,即用儿童熟悉的事物去说明他们未知的事物,或用具体、形象的事物去描绘比较抽象的事物。”^{[4]11} 形象的比喻能使儿童把作品表达的意义与自己所具有的经验世界相连接,获得新的或更深层次的体验和感悟。

“夸张,就是将事物的某些特征进行有意识地放大或强调,以增强艺术效果的一种修辞手段。”^{[4]12} 由于儿童的思维极富想象性,常把幻想当真,喜欢夸大想象事物的特征或情节,因此儿童文学作品常用夸张,让小读者情不自禁地发出笑声。

在儿童文学翻译中,按照接受理论的要求,译者也应根据孩子的认知水平,多使用一些比喻夸张的修辞手法。

例5: “I’m old enough to know when I’m wasting my time,” replied Reddy with a toss of his head. ^{[5]1}

初稿: “我长大了,我知道什么是浪费时间!”雷迪头一甩。

终稿: “我长大了,知道什么是浪费时间!”雷迪头摇得像拨浪鼓。

“头摇得像拨浪鼓”是表示不同意的肢体动作之一,一般来讲,头摇得频率与不同意的程度是成正比的。但是孩子对摇头频率的差异却没有清晰的概念,因此为了帮助小读者理解雷迪不赞成奶奶的肢体动作,译者在此使用了比喻夸张的修辞手法,将头比喻成拨浪鼓,将头摇得频率夸张成和拨浪鼓一样快,小读者在读到这里时,很容易想象到拨浪鼓摇动的样子,因而也就更容易理解雷迪不赞成的程度了。

例6: Reddy’s own eyes gleamed with excitement. ^{[5]6}

初稿: 雷迪自己的眼睛也兴奋地发光。

终稿: 雷迪自己的眼睛也兴奋地发光,就象被“噌”的一声擦亮的火柴,倏地光芒四射。

雷迪从刚开始的绝望和对奶奶行为的质疑慢慢转化,原文中的描写相当精彩,作者形容雷迪眼神的激动用了“gleamed with excitement”这样传神的描述,遵循接受理论,将译文添加了比喻和夸张的修辞手法,“就象被‘噌’的一声擦亮的火柴,倏地光芒四

射”，这样的表达不仅生动形象，且妙趣横生，更容易引起孩子们情感上的共鸣。

例 7: Reddy squirmed uneasily. He couldn't see as well as he wanted to.^{[5]7}

初稿: 雷迪躁动不安, 他要看的更清楚、更真切!
终稿: 雷迪的心卜通卜通地跳, 都快跳出嗓子眼儿了, 他太激动了! 太兴奋了! 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躁动不安, 他要看的更清楚、更真切!

原文中的“squirmed uneasily”能够让我们感受到雷迪当时的紧张和迫切。为了达到使目的读者和源语读者拥有相同阅读效果的目的, 使译文更好地满足目的受众的阅读需要, 译者对译文增加了“像热锅上的蚂蚁”这一比喻修辞方法将雷迪马上就能捉到鸭子的兴奋、激动、迫切刻画地活灵活现, 增加了“心扑通扑通地跳, 都快跳出嗓子眼儿了”这一夸张的修辞手法, 淋漓尽致地传递了红狐雷迪当时万分紧张的状态, 符合孩子的心理和感官需要, 有利于提高孩子的阅读兴趣。

四、结束语

在接受理论指导下对比分析了译文初稿和终稿的语言处理变化, 具体探讨了英语儿童文学汉译实践中儿童语言“形象性”的处理技巧和方法, 通过在词法及修辞层面合理使用增译、意译等多种翻译方

法, 来增加译文的形象性, 从而降低儿童读者的理解难度, 使译文更易于被目标小读者接受和喜爱。笔者同时在目标小读者群中做了验证试验, 把译文初稿和终稿分别读给孩子们听, 实践证明, 终稿中形象化的汉语译文更为中文小读者所喜闻乐见。因此, 笔者认为接受理论对于儿童文学的翻译具有较好的理论指导意义, 儿童语言的形象性作为英语儿童文学汉译的一重要语言标准, 对翻译实践中儿童文学语言的处理有着较好的引导作用。

参考文献:

[1] 张锦兰. 目的论与翻译方法[J]. 中国科技翻译, 2004 (1).
[2] 陶友兰. 从接受理论角度看古诗英译中文化差异的处理[J]. 外语学刊, 2006(1).
[3] 马红, 林建强. 接受理论与其翻译原则和方法[J]. 外语学刊, 2007(5).
[4] 宋文翠. 儿童文学概论[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0.
[5] Thornton W B. Old Granny Fox[M]. London: Dover Publications, Inc, 2001.

(责任编辑 谢春红)

On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of “Vivid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eption Theory

——Taking Burgess' *Old Granny Fox* as an Example

CHENG Xiu - fa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Xuzhou Kindergarten Teachers College, Xuzhou Jiangsu 221100, China)

Abstract: Reception Theory, focusing on the reader and the reader reception,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fairy tale translation.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reader is the core of the reception theory, 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readers is the fundamental one of children literature. Therefore, reception theory has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in accurately grasping lingu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nslated text. Considering “vividness” in Chinese children language, the author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ranslation methods of vividness on the lexical level and rhetorical level in *Old Granny Fox*, an animal fairy tale by Burgess.

Key words: reception theory; vividness; morphology; rhetoric

构建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染色体工程”

——以郑州市惠济区“未成年人教育导师制”活动为例

丁建国

(中共郑州市惠济区委宣传部, 郑州 450044)

摘要:未成年人是“社会细胞”——家庭中携带遗传物质、起血脉延续、种族繁衍和文化传播功能的“染色体”。通过开展以未成年人为对象、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为主要内容、以导师辅导活动为手段、以实现未成年人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未成年人教育导师制”活动,为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找到了一个新载体,为开创未成年人教育工作新局面探索了一项新机制,为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注入了新活力。“未成年人教育导师制活动”已成为郑州市惠济区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染色体工程”。

关键词: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未成年人教育;导师制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6.05.016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6)05-0076-06

未成年人处于人生过程中变数较大但可塑性较强的时期,因此加强未成年人教育(尤其是加强其思想道德教育),全面提升其综合素质,是我国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重要内容。郑州市惠济区探索实施的“未成年人教育导师制活动”(以下简称“导师制活动”),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全新实践中产生的,已成为该区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一个新载体、开展未成年人教育工作的一项新机制、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一个新动力。众所周知,父母、子女、血脉,是一个家庭中最重要关系链;如果把一个家庭看作一个“社会细胞”的话,在其中起血脉延续、种族繁衍、文化传承作用的孩子(未成年人),自然可被视作这个“社会细胞”中携带遗传物质的“染色体”。基于以上认识,笔者把以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发展为宗旨的“导师制活动”,称为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染色体工程”。

一、导师制活动的基本宗旨

(一) 开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新局面

其一,导师制活动是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实

践中产生的。随着全国各地文明单位创建、文明社区创建、文明村镇和文明城市创建活动的蓬勃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在各项文明创建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凸显,国家在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方面,标准越来越高,力度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严。为促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全面发展,中央文明办于2008年颁发《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体系(试行)》,设置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教育体系、未成年人特殊群体的教育管理等6大测评项目;2010年,中央文明办又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并轨,将其达标与否设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前提条件。为顺应郑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的需要,作为其创建主力县区的惠济区,在2010年探索实施了这一针对性强、操作性好、覆盖面广、效果明显的促进未成年人教育工作全面发展的新机制。

其二,导师制活动是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志愿服务活动的一种新形式。导师制活动把社会

收稿日期:2016-08-16

作者简介:丁建国(1969—),男,河南南阳人,博士,中共郑州市惠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惠济区文明办主任,副主任医师。

上人员较为分散、目标不甚明确、活动不甚系统、为活动而活动的未成年人教育志愿服务活动进行了有机整合,形成一项组织结构严谨、目标任务明确、开展活动系统、机制能够良性运行的常态化志愿服务活动。随着导师制活动的深入开展,郑州市的广大志愿者对未成年人教育事业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参与度越来越大,纷纷应聘导师、积极申请加入导师志愿者队伍,导师制活动遂逐步发展成为惠济区乃至郑州市发动、吸引与组织广大城乡居民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尤其是志愿服务活动)的一个新载体。

其三,导师制活动是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一项新机制。郑州市惠济区探索实施的导师制活动,是顺应未成年人教育自身规律而诞生的,它为推动未成年人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开创未成年人教育事业的新局面、提升未成年人的综合素质、实现未成年人的全面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活动中,导师是从社会各界选聘出来的、经各级党委政府重新优化组合的志愿者队伍;受导社团成员即受导者主要是学习或生活于家庭、学校和社区中的广大未成年人及其家长;“导师团——受导社团”的对口辅导活动,既着眼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素养的提升又注重其科教文卫素养的提升,既着眼于未成年人现代文明素养的提升又注重其对传统文明的继承与弘扬,既着眼于未成年人全面素质的提升又注重其独立个性的发展,是未成年人正规学校教育之外的一项充满活力、效益显著的教育补充甚或倍增机制。质而言之,导师制活动既把志愿服务活动与未成年人教育活动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又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者有机地整合在一起,还把未成年人教育的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平台诸环节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从而为作为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之一的未成年人教育工作(尤其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注入了新鲜血液、激发出创新活力,成为惠济区乃至郑州市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一项新机制。

(二) 推进未成年人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其一,推动“三大教育”的真结合。未成年人教育工作中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既是独立的三个教育领域,又是教育系统中相互关联的三个子系统,这三者之间关系的不协调是制约当前未成年人教育成效的关键因素,而在充分发挥家庭、学校、社会各自教育功能的基础上,广泛开展教育合作实践,构建家庭、学校、社会密切配合的“三位一体”教育格局,则是提高未成年人教育成效的关键所

在^[1]。惠济区探索实施的导师制活动,通过从社会各界选聘未成年人教育导师、组建统筹调度的导师团队,通过选择培育符合未成年人年龄性格特点的诸多家庭、学校、社区平台资源,针对分布于家庭、学校和社区中的未成年人开展有计划的“导师团——受导社团”对口辅导活动,从而以时间、空间和人物关系为纽带,真正践行了家校社“三结合”的教育理念。

其二,促进“两大素质”一起抓。从基本内容上看,思想道德建设并不能尽赅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部内容,其仅仅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不仅仅是思想道德建设,还包括科学文化教育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任务,也不是单一的,它是一个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综合性目标系统。因此,要全面提升未成年人素质,必需从以上两个方面同时着手。郑州市惠济区探索实施的导师制活动,把未成年人教育工作目标定位于“以思想道德建设为经线,以科学文化建设为纬线”:通过不断加强未成年人的理想信念教育、“三观”教育、家风教育、美德教育以及法制纪律教育等等,引导广大未成年人形成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断提升思想道德素养,从而为其科学文化素养的提升提供先进的思想保障和强大的精神动力;通过不断加强未成年人的传统文化教育、现代文化教育、科普教育、普法教育和环保教育及其相关设施建设,努力提升未成年人的科学文化素养、文明礼仪素养和身心健康素养,从而为其思想道德素养的提升提供丰富的营养元素和坚实的技术支撑。导师制活动兼顾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这两个方面,并使二者互根互用、合拍共振,有效地促进了未成年人全面发展,体现了以未成年人全面发展为宗旨的全视野、全思路的教育理念。

二、导师制活动的结构要素

(一) 导师

导师(Tutors)是导师制活动中的指导主体。因此,在导师制活动中选聘合格的导师,是导师制活动能够科学开展、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是整个导师制活动的关键环节。

其一,导师的条件。制定科学的导师入选条件,是选聘合格导师的门槛。惠济区主要是针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目标任务和本质要求,从思想、道德、法治、科教、文化等方面来设置前提条件的。条件既不过于宽泛,以保证选出的导师队伍具有先进性;又不面面俱到,以营造优秀导师人才脱

脱颖而出的环境。导师队伍主要从家庭、学校和社会三大领域中具有思想道德引领能力和科学文化传播能力的志愿者中来筛选,凡是家庭文明代表志愿者,离退休老干部、老战士、老教授、老专家、老模范等“五老”志愿者,青年志愿者,巾帼志愿者以及活跃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安全、环保、法律等领域的其他专业志愿者,只要符合下列基本条件者,均可通过自愿报名志愿参选。

第一,具有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即要具有牢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要具有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人生观,要具有“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能够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封建迷信,反对各种邪教。

第二,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即必须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现阶段主要是必须具有坚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第三,具备“四德”兼优。即在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诸方面无污点,无违法、违纪记录,无失德、缺德行为。其中,获得国家、社会或社区邻里认可者优先(如在各种道德模范评选中获得过各级党委政府或社会公益组织的提名或表彰者、在道德表现方面获得多数邻里乡亲的肯定或赞许者等等)。

其二,导师的选聘。导师选聘作为导师制活动的重要环节,其关键程序如下:

第一,填报志愿。导师制活动成员单位在农村文化大院、社区门口、公园广场、主要交通站点(路口)以及各大书店、图书馆、文化馆、艺术馆、科技馆、大商场、旅游景区(点)门口等人流量较大的场所,广泛设立导师志愿者报名站(点)。志愿者根据“自愿参选”的原则报名,并填报《惠济区“未成年人教育导师制活动”导师申请表》等表格。填表时要详细填报个人特长(譬如足球、花样跳绳、绘画、剪纸、烙画、民间腰鼓、舞龙舞狮等)、拟参加的导师团(譬如美德教育导师团、传统体育导师团、科技兴趣培养导师团、新媒体教育导师团等)、拟任教的区域(遵循“就近服务”原则、以就近择教为主,填报具体的社区、学校或其他公益场所)、个人诚信记录(以“全国个人诚信档案查询网”的记录和家人、邻里、同事的评价为主)、曾获得的荣誉、是否有违法违纪记录等信息,并提交相关的证明材料及其复印件。

第二,资格审查。惠济区主要是通过“三审定师”机制来确定导师资格的。一是由基层导师制活

动领导小组根据导师申报条件以及申报者提供的证明材料,对申报者的资格进行初审。二是由基层导师制活动领导小组成立“导师资格考察组”,到通过初审者所在的单位、社区(村组)、户籍地派出所等进行实地调查与走访,主要了解其“四德”情况、是否有违纪违法行为、是否存在不诚信记录等,然后写出详细的考察报告,交由该基层导师制活动领导小组对其资格进行二审。三是基层导师制活动领导小组把通过二审者的申请表、相关证明资料和考察报告提交惠济区导师制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其结合辖区受导者对导师资源的实际需求情况,对申报者的导师资格进行终审。对通过终审的申请者,由惠济区导师制活动领导小组下发正式文件,颁导师聘书、导师徽章和导师胸卡各一套,正式聘为该区的“未成年人教育导师”。

(二) 平台

其一,选育并拓宽导师制活动的学校平台资源。充分利用惠济区内的大、中、小学校的教育资源,搭建学校导师制活动的辅导平台。一是要求辖区各校都要在校园中相对安静的区域,至少建成一所“心语小屋”“阳光小筑”“心灵港湾”或“成长驿站”等情趣名趣各异的心理咨询中心(室)。每个心理咨询中心(室),至少要拥有接待室、会谈咨询室和心理活动室等三个相对独立的功能区;至少要拥有心理测量量表、心理测量软件等配套工具和音乐放松治疗椅、游戏沙盘、宣泄器材、相关书籍与报刊杂志等配套器材。二是全面建成乡村(城市)学校少年宫。惠济区率先在郑州市启动了乡村(城市)学校少年宫建设工程,目前其辖区的每个学校都建成了至少拥有5个室内功能活动室的乡村(城市)少年宫,在河南省率先实现了乡村(城市)学校少年宫全覆盖目标。三是全面开办学校(班级)道德讲堂。辖区各校按照统一标准分别建设了学校道德讲堂和班级道德讲堂,并参照“省自我、唱歌曲、学模范、诵经典、发善心、送吉祥、崇‘德’躬、一堂一善事”等“八个一”基本流程,开展丰富多彩的道德讲堂活动。四是优化整合学校的各种社团资源。把学校原有的音乐教室、美术教室、书法教室、舞蹈教室、计算机室、荣誉室等场所,改造提升为导师辅导平台,实现一室多用、资源共享。

其二,选育并拓宽导师制活动的社会平台资源。一是充分利用社区的平台资源。惠济区不断完善社区未成年人活动室、青少年心理咨询室、党员活动室、电子阅览室、文体活动室、图书阅览室、家长学校、四点钟课堂、道德讲堂、志愿服务站以及其他便

民服务中心等场所的设施与功能,为社区导师制活动提供了广阔平台。二是充分利用辖区各级文明单位的平台资源。惠济区积极倡导河南省体育中心、河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展览室及救护场所、河南省森林公安局展览室、河南省水产科学研究院水产选育基地及标本室、郑州师范学院自然博物馆及图书馆、郑州黄河湿地公园、郑州市第三苗圃花卉基地、郑州市第三看守所、惠济区人民检察院审讯室、惠济区人民法院法庭以及位于郑州市黄河风景名胜区的黄河地质博物馆、黄河碑林、炎黄二帝广场、黄河母亲哺育像、大禹像、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处等场所,主动对辖区未成年人免费开放,接纳导师率领受导社团前往参观、学习与体验。三是充分利用各种校外活动场所的平台资源。惠济区充分利用位于辖区内的郑州黄河国家地质公园、邙岭生态园、丰乐葵园、绿源山水生态园、黄河湿地公园、花园口风景名胜、黄河富景生态园等旅游资源的平台作用,积极开展以远足、写生、科普、志愿服务等为主要形式的导师辅导活动;充分利用位于本辖区的隋唐大运河遗址,位于古荥镇的纪公庙和汉代冶铁遗址,位于大河路街道办事处隋唐惠济桥遗址,位于花园口镇的1938年黄河扒口处等历史文化遗址,积极开展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导师制辅导活动;充分利用辖区内的文化馆、图书馆、科技馆、档案馆、农村文化大院、体育场馆等设施,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阅读、吟诵、体育训练等导师制辅导活动。

其三,选育并拓宽导师制活动的家庭平台资源。家庭教育既是每一个具体小家庭的事情,也是宏观社会大家庭的共同责任。因此,家庭教育的健康运行,需要有无数家庭的精诚合作与良性互动,需要有无数家长的言传身教与精心耕耘。惠济区开展的导师制活动,立足于一个家庭,放眼于一个社区乃至整个辖区的优秀家庭,从辖区中筛选并培育了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优秀家庭,诸如十星级文明户、五好文明家庭、最美家庭、优秀家庭、文明代表家庭、好媳妇好婆婆家庭、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家庭、文明市民家庭、双拥模范家庭、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家庭、优秀共产党员(干部)家庭、优秀教师家庭以及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家庭等等,在开展导师辅导活动时,由导师带领受导者,深入这些优秀家庭之中,通过聆听这些家庭的精彩故事,体验其良好的家教家风与文明的家庭生活方式,接受社会大家庭的多彩教育与熏陶。这种家庭教育方式,既使惠济区的未成年人教育工作直接走进了千家万户、登上了家庭这一广阔舞台,又使广大受导者同时获得了优

秀家庭和导师的双重辅导,拓宽了家庭教育平台,实现了家庭教育资源的互补。

三、导师制活动的辅导机制

(一)组建受导社团

“受导社团”制度是导师制活动的一项基本制度。大家知道,组织和群体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对个体的素质培养、情感依托、个性形成等具有重要意义。处在生理心理发育期的未成年人,对集体的舆论和行为具有较强的趋同性,对组织和群体的需求尤为强烈;同样,他们所处的组织和群体,对其自身的成长也具有较大的影响^[2]。可见,组织育人法是开展未成年人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方法。一般而言,“学生社团”是在校学生为满足个人兴趣爱好、实现共同意愿而自愿组成的、按照一定章程开展活动的群众性学生组织,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是许多高校第二课堂的引领者^[3]。惠济区开展导师制活动时,积极借鉴“学生社团”这一有效组织形式,在辖区的学校与社区内,把分散于学校、社区(行政村)中的那些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但兴趣爱好相同的、或者处于同一年龄层且有共同成长需求的未成年人组织在一起,建立了一大批未成年人及其家长乐于参加并在其中积极活动的组织——“受导社团”。

按照“全面育人”和“分类育人”相结合的原则,惠济区组建的“受导社团”分为两大类型,一是以班级或社区为单位、以提升公共素养为宗旨的“大众社团”;一是以特殊群体为单位、以实现个性发展为宗旨的“特色社团”。“大众社团”主要接受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教育、法制警示教育 and 科普教育,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学模范活动、“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活动和家庭文化体验活动等。“特色社团”主要是根据受导者的实际需求而成立的,诸如根据一些受导者对某一学科领域的特殊需求而成立的“课程培优社团”“科技兴趣社团”“文艺社团”“新媒体社团”和“平安使者社团”等;根据一些受导者对某一体育领域有浓厚兴趣、有独特发展潜质或平素身体素质差、心理容易失调需要加强身心修炼者而成立的“传统体育社团”“现代体育社团”和“阳光少年社团”等;根据一些受导者对家庭教育的实际需求而成立的“家长成长社团”“家庭文化社团”“感恩社团”等。

(二)组建导师团

“导师团”制度是导师制活动的另一项基本制度。惠济区在导师制活动中,以实际成立的各类“受导社团”为依据,参照选聘导师填报的“拟参加的导师团”志愿,将其编入到不同的辅导团队中,这

些辅导团队就是所谓的“未成年人教育导师团”(以下简称导师团)。“导师团”是导师制活动对导师人才进行资源分类和储备的一项基本措施,是开展“导师团——受导社团”对口辅导活动的基础。2010年,惠济区根据其未成年人教育现状,首批成立了道德教育、普法教育、“三理”教育、家庭教育、科普教育、文化教育、安全教育、环保教育和模范事迹宣讲等9个导师团。其后,随着导师制活动的深入开展,他们又根据实践需要对原有的导师团进行了分化重组,逐步完善了导师团类型,到目前为止已经整合出了18类导师团。

其一,与提升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素养密切相关的导师团有4类:以未成年人理想信念教育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为主题,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中国梦为核心的“理想信念教育导师团”;以爱国、明理、尊德、守礼为主题,以诚信、友善、仁爱、忠义等美德传承为核心的“美德教育导师团”;以弘扬志愿服务精神、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和“学雷锋、树新风”活动为主题的“志愿精神传播导师团”;以广泛宣传各类身边好人、道德模范、劳动模范和行业先进人物先进事迹为主题的“模范事迹宣讲导师团”。

其二,与提升未成年人法治素养密切相关的导师团有2类:以普及法律法规常识、宣传依法治国国策、提升未成年人法治素养为主题的“法制教育导师团”;以加强未成年人警示教育、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援助为主题、以违法违纪和失德缺德反面典型的忏悔录、判决书、警示教育片等为主要内容的“警示教育导师团”。

其三,与提升未成年人家庭文明素养密切相关的导师团有3类:以家长学校(家长学堂)为阵地,以“家长成长社团”为对象,以传授家庭教育知识与技巧、提升家庭教育水平为主题的“家长成长教育导师团”;以优秀家庭为阵地,以“家庭文化社团”为对象,以组织未成年人聆听优秀家庭故事、体验优秀家庭文化、向未成年人传播优秀家风为主题的“家庭文化体验导师团”;以“感恩社团”为对象,以培养未成年人的感恩情怀和生活态度为主题、以教育未成年人感恩父母、感恩亲朋、感恩家国为主要内容的“感恩教育导师团”。

其四,与提升未成年人科学文化素养密切相关的导师团有6类:以“科普社团”为对象,以传播相关学术领域、相关行业部门的科学常识、提升未成年人科学素养为主题的“科普宣传导师团”;以“课程培优社团”为对象,以语文、数学、英语等校本课程

的辅导训练为主题的“课程培优导师团”;以“科技兴趣社团”为对象,以培养未成年人创新意识、创新思维为主题,以研究计算机编程、机器人制作、航模设计等现代技术为内容的“科技兴趣培养导师团”;以“文艺社团”为对象,以花鼓腰鼓、杨琴古筝、戏曲音乐、诗词吟诵、书法艺术、国画艺术、剪纸烙画等文艺创作与表演的技法传授为主题的“文艺教育导师团”;以“新媒体社团”为对象,以提升未成年人对新媒体信息的鉴别力、积极消化吸收正能量、有效消融化解负能量为主题的“媒体素养教育导师团”;以“平安使者社团”为对象,以各种安全知识教育、普及与传播为主题的“安全教育导师团”。

其五,与提升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素养密切相关的导师团有3类:以“传统体育社团”为对象,以开展武术、气功、舞龙、舞狮、五禽戏、抖空竹、围棋、象棋等传统体育训练活动为主题的“传统体育教育导师团”;以“现代体育社团”为对象,以开展足球、篮球、乒乓球、花样跳绳、拉丁舞等现代体育训练活动为主题的“现代体育教育导师团”;以“阳光少年社团”为对象,以疏导心理问题、培养阳光心态、促进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为主题的“心理健康教育导师团”。

(三)开展“导师团——受导社团”对口辅导活动

其一,辅导活动由校社统一管理。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发现,导师制活动是以每一个学校、社区(行政村)为单位、借助“受导社团”这一形式起来的,成立了什么类型的“受导社团”,就需要组建出为其提供相应服务的“导师团”。这样,“导师团”与“受导社团”之间就建立起了一一对应的关系。惠济区导师制活动领导小组统一要求,在“受导社团”和“导师团”组建起来以后,主要交由辖区中的学校和社区(行政村)实行统一管理,由他们具体负责“导师团——受导社团”之间的对口分配、制订辅导方案、安排辅导活动,并组织填写《惠济区“未成年人教育导师制”活动“导师团—受导社团”对口辅导登记表》,上报于区导师制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存档。

其二,辅导形式由导师自由决定。惠济区开展的导师制辅导活动,提倡导师们根据具体内容自行决定辅导方法,倡导灵活多样、不拘一格的辅导形式。譬如:讲授法,是导师们通过口头语言向受导者传授知识的一种辅导方法,主要用于理想信念教育、美德教育和课程培优教育等活动中;问答法,是受导者根据已有的知识或经验向导师提问,通过与导师

对话来获得知识的一种辅导方法,主要用于科普教育和科技兴趣引导等活动中;案例法,是导师通过模拟或重现某一含有“问题”的典型事件,启发受导者进行分析与决策,进而提高受导者的分析问题解决能力的一种辅导方法,主要用于模范事迹宣讲和法制警示教育等活动中;实验法,是导师带领受导者运用一定的仪器设备、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作业、进而使受导者获得知识、验证知识的一种辅导方法,主要用于科技兴趣引导及生物、物理与化学课程培优等活动中;体验法,是导师把受导者带入某一特定场所或特定环境中、通过实践活动使其获得知识受到教育的一种辅导方法,主要用于感恩教育和家庭文化体验等活动中;示范法,是导师通过展示自己的动作或发声等技巧,使受导者直接感知所学技术的要领的一种辅导方法,主要用于科技制作、手工制作、体音美教育和诗词咏诵等活动中;实习法,是导师带领受导者到学校或社区内外的一定场所、运用已有的知识进行实际操作或其他实践活动、进而获得相关知识与技巧的一种辅导方法,主要运用于志愿服务和“学雷锋树新风”等活动中。

其三,辅导效果由受导者据实评价。导师制活动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染色体工程”,主要是为受导未成年人全面发展提供指导服务的,受导未成年人是这一活动中的“主体的主体”。受导未成年人对导师辅导活动评价,是最直接最真实的评价,若导师得不到他们的拥护、辅导活动得不到他们的好评,

就说明这场导师辅导活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因此惠济区规定,对导师制辅导活动的效果评价主要由其辅导的“受导社团”中的受导未成年人来完成。在每场辅导活动结束后,受导者都要当场总结自己受导后获得了什么知识、受到了什么启发,并根据他们对导师辅导内容、辅导形式及在辅导过程中的综合表现等方面的满意度,对本次辅导活动进行评价,据实填写《惠济区“未成年人教育导师制”活动辅导效果评价表》。该表由学校、社区(行政村)的导师制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回收后,上报区导师制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便其及时掌握活动动态、了解辅导效果、评估导师能力,适时调整辅导内容、辅导方法甚或辅导导师,不断提高导师制辅导活动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杨雄,刘程. 关于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教育合作的思考[J]. 社会科学,2013(1):92-101.
[2] 中央文明办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组.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创新案例[M]. 北京:学习出版社,2007:15-16.
[3] 百度百科. 学生社团[EB/OL].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Q0MAoYs4vyXVqdPZLzdjoqedp7VW3DhfgerZHLTe85b0Gj7srG_E8x9oCcDUGa_3t.

(责任编辑 许峻)

Building “Chromosome Engineering” of Mass Cultural and Ethical Progress Activities

——A Case Study of “Juvenile Tutor System” Program in Huiji District of Zhengzhou

DING Jian – guo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of Huiji District Zhengzhou City CPC,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Juveniles are “social cells”, functioning actively in family bloodline continuing, racial reproduction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By carrying out the “Juvenile Tutor System” activities, which take juveniles’ ideological and ethical construction and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as the main content, mentor coaching as the means, realization of juveniles’ fre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s the goal, a new carrier to strengthen juveniles’ ideological and moral construction is found, a new mechanism for initiating a new phase of juveniles education work is created and new vitality for promoting mass cultural and ethical progress activities is injected. “Juvenile tutor system” program has become “chromosome engineering” of mass cultural and ethical progress activities in Huiji District of Zhengzhou.

Key words: mass cultural and ethical progress activities; education of juveniles; tutor system

略论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的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

冯 峰

(河南师范大学 青少年问题研究中心,河南 新乡 453007)

摘 要: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思想政治教育和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均为高校教育教学的重要工作内容。在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充分融入就业创业指导的相应内容,两者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以期达到一种理想契合的运行状态,共同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就业创业指导;契合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6.05.017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6)05-0082-05

在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过程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既符合中国特色,也由现阶段中国国情和高校实际所决定。目前,一些高校并没有真正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就业创业指导充分契合,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的作用和功能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体现。一般情况下,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多在大学一年级进行,就业创业指导工作则多在高年级开展,因两者时间不同步,在内容和方式上也有一定的差别,因而诸多高校仅在人生观、价值观和创业观等就业教育中部分地融入一些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内容,且多以讲座、报告会等形式展现,效果也不尽理想。高校要充分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的重要作用和功能,分析其影响因素,将两者充分契合,这既是高校教育教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环节,也是促进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养成,实现大学生顺利就业创业的重要途径。

一、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的重要作用

(一)促进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养成

近年来,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居高不减,呈逐年

增多之趋势。201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为765万人,比2015年高出16万人,预计整个“十三五”期间,每年将稳定保持在750万人以上,总量将维持在高位状态。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复杂严峻,这对大学生价值观和价值取向的顺利养成也造成一定的冲击。一般情况下,大学生具有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就有着什么样的核心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和对待客观事物的基本态度。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培养教育下,在大学生学习、生活和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也应赋予其显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征。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内容可简单地概括24个字,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不断丰富和完善,为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养成提供了广阔的平台。高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融入到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之中,不断促进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养成,这既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目标,也是中国现实需求和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收稿日期:2016-09-05

基金项目: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大学生职业发展和创业就业中的思想引导研究”(15JDSZ2076)

作者简介:冯峰(1973—),男,河南信阳人,博士,河南师范大学青少年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

（二）帮助大学生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样,反映着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精髓、社会主义运动的价值导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规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应当深入到有机统一着的社会主义理论、运动、制度之中获得其理论与实践的依据。^[1]在新的就业形势下,大学生的思想观念、职业价值观、道德观念等日益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严峻挑战。大学生就业质量与高校的教育教学质量紧密相关,也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就业创业指导的功能和效果密切相连。如果大学生没有坚定的政治方向,缺乏相应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政治敏感度,那么,他们在择业行为上就很容易产生偏差,进而导致择业时将国家和社会需求置之度外,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处处以“唯我”角度着想,从而会造成言行不一,理想与现实脱节的现象。因此,高校在开展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工作时,要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从大学生最关心、最现实的就业问题入手,将思想政治教育充分融入到大学生的就业创业指导之中,帮助大学生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从而自觉校正自己的择业思想和行为。

（三）切实提升大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

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是我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道德教育为学生提供的作为道德认识起点的道德价值原则应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性,要体现道德教育的宗旨、目标,同时也应该具有基础性,因为道德价值原则具有程序性形式,并不直接表现为社会的具体道德规范,但却为具体道德规范的推导提供依据,并为解决道德问题提供指导。^[2]在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工作开展过程中,行之有效的道德教育是提升大学生职业道德素养的重要途径。现阶段,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历史时期,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3]一些高校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薄弱,大学生在择业时职业道德素质欠缺,处处以自我为中心,不计后果,唯利是图,为达到目的不惜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利益,当然也不利于大学生的职业发展。高校将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充分融入到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既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诚实守信品格,也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艰苦奋斗精神和社会责任

感,进而促使大学生在职业选择中能够正确处理好个人、集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自觉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

（四）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引导劳动者转变就业观念,鼓励多渠道多形式就业,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做好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工作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困难人员、退役军人就业工作。^[4]新的就业形势对劳动者的就业观念提出新的要求。大学生的就业观是其在就业过程中思想、观念和行为等的综合反映,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变化。在一定的职业环境中,大学生一旦树立了某种就业观,也就内化为特定的职业选择趋向性,在择业时就会做出相应的决策和选择。一份“大学生择业趋向问卷调查”显示,八成的大学生认为当前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其中31.2%的学生把就业难的原因更多地归咎为“缺少实际技能,难以符合企业要求”。在“毕业后你最理想的就业单位是什么”选项中,选择“编制内”和“国企”的人数最多,这两部分共占59.8%。^[5]近几年被吵得沸沸扬扬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出现动辄几百、上千甚至几千名考生扎堆报考同一岗位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大学期间是大学生就业观形成、发展、调整和完善的重要时期。因此,高校应在就业创业指导工作中充分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准确把握青年大学生的思想、心理特征,做好国内外社会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就业创业政策的解释、宣传、指导和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创业观,从而规范和引导其择业思想和行为,进而促进大学生更快、更好地适应未来的职业发展。

二、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凸显的问题

（一）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有待提高

随着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化机制的全面实施和不断发展,进入市场业已成为大学生就业的主要渠道,在此背景下,受就业压力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和功能也受到一定的冲击。一项“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生心目中的地位”的调查显示,有40.5%的学生认为不太重要,有8.8%的学生认为一点也不重要。^[6]为提高大学生的就业率、就业质量、就业层次,提高社会的认可度和用人单位的满意度,很多高校注重对大学生开展一些实用性、时效性和实操性的就业创业指导,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和导向功能,从而导致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脱节的现象。目

前,在学校层面,一些高校并没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过程中存在急功近利思想,没有将大学生就业创业需求与当前就业形势和实际结合起来,对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境界、认知水平等方面的认识还很不到位,当然也无法对大学生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自身方面,很多大学生认为找到理想的工作岗位是其中心任务。一些大学生认为通过接受学校提供的就业创业指导与服务,更快、更好地落实理想的用人单位,获取适合的职业岗位就是就业创业指导的最好体现,至于开展所谓的思想政治教育,纯粹是搞形式主义,既不能为自己择业提供帮助,也不能为自己带来职业岗位,从而对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一定的逆反和抵触情绪。一旦面临关系自身的切身利益时,一些大学生往往会抛弃正确思想政治理论的引领,出现一系列如职业价值观扭曲、法制观念淡薄、诚信意识缺失等思想与行为不一致现象,因而在职业选择时也变得更为现实和功利。这些认识不到位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开展。

(二) 思想政治教育不能有效满足大学生的实际需求

高校在开展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加强思想教育引导,及时把握问题的前沿是关键。把握了前沿,就牵住了问题的“牛鼻子”。前沿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有的问题从前是前沿,现在解决了或者发现是过时了的假问题,那就不是前沿;有的问题从前不是前沿,但经过一段时间仍然不能解决或出现了新的情况,那就有可能成为前沿。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的前沿问题是什么?切实、有效的思想教育引导或许是不二之选。面对新形势、新情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不够适应,存在不少薄弱环节。^[7]一些高校就业创业指导工作相对滞后,思想政治教育没有有效地融入到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工作之中,且教育教学方法相对单一,多以传统课堂讲授的形式进行,一些先进的教学手段和方法并没有真正应用到教学中来。部分高校仍沿用传统意义上的理论说教,对于大学生的学历层次、专业特色、性别差别、性格特征和内心需求等并没有认真地调查、研究和分析,不能进行个性化、特色化的教育教学,当然也不能结合大学生的实际需求而开展有精准化的就业创业指导,从而影响大学生广泛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此外,在就业创业指导师资队伍建设方面也不容乐观。一是高校普遍扩招,在校

大学生人数逐年增加,在就业创业指导师资队伍总数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一名教师往往要承担上百名甚至数百名大学生就业创业课程的教学工作。在此种状况下,就业创业指导教师开展正常的课程教学尚显得力不从心,更别说在就业创业指导教学中充分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二是很多从事就业创业指导的教师并非具有思想政治教育或相关专业背景,知识结构相对单一,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缺乏,且没有进行相应的培训和提高,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

(三) 思想政治教育不能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突出标志。^[8]与时俱进地将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之中,无疑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创新和发展。在现行的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中,思想政治教育多放在低年级进行,而大学生普遍在临近毕业时才真正关注就业创业指导。在这种客观条件的影响下,如果高校不充分重视两者的契合,很容易造成思想层面的不重视,在教学层面也极易形成彼此相脱节的现象。一些高校在开展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时,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相对较薄弱,且形成相对固化的教育教学模式,很容易造成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分离的现象。为切实提升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高校应与时俱进地改进就业创业指导工作,充分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如举行思想政治教育讲座,举办先进人物事迹报告会,邀请一些优秀校友、成功人士、道德模范等与毕业生座谈等,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内化到就业创业指导之中,这样,往往能更大程度上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功能和效果。同时,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和日益完善的今天,互联网、手机、电视等各种现代化信息技术媒介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拓展和应用,大学生非常容易获取就业创业指导方面的相关知识和内容。现代信息技术在使大学生充分体验和感受其方便、快捷的同时,也向大学生传递着各种不良的观念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干扰或影响着大学生的职业发展。因而,高校在人才培养中,应与时俱进地将思想政治教育充分融入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之中,找准两者的最佳契合点,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功能,使大学生正确认识国内外一些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自觉抵制国内外各种不良思潮的影

响和诱惑,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合理的职业价值观。

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就业创业指导充分契合的有效途径

(一)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要切实提高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的效果,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实现理想效果的有效途径。高校就业创业指导人员要准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和规律,紧密结合当前的大学生就业形势,正确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手段,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通常情况下,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想在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充分契合:一是注重就业创业指导与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相契合。高校要充分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连续性、全程性和整体性相统一的特征,将日常的思想教育渗透到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的全过程。二是注重典型教育与自我教育相契合。典型教育具有形象直观,号召力、感染力强等特点,一般情况下教育效果更深入,也更持久。自我教育则是大学生在学习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受到一定的教育和熏陶,进而内化为一种自觉意识,对大学生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起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高校就业创业指导职能部门可通过不同渠道,收集和整理往届优秀毕业生的典型事迹和材料,汇编成册发放给大学生;也可邀请有代表性的先进典型,通过职场人物生涯访谈以及举办讲座、座谈会、报告会和就业论坛等形式,使大学生与他们近距离交流,从而受到教育和鼓舞,进而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化到自己的择业选择之中,达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效果。三是注重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契合。要想切实提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和层次,高校既要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就业创业指导理论教育,也要注重实践教育环节,两者任何一方缺失,都将会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高校可定期组织大学生深入社会,深入基层,通过参观、实习和参加社会实践等方式,使大学生充分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国情和民情,自觉提高思想政治觉悟,以更加积极的心态迎接未来职场的竞争和挑战。

(二)强化大学生的主体地位

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将大学生视为受教育的客体,大学生往往只是被动地接受相应的理论知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大学生的主体地位,当然对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会产生一定的阻碍和制约。在开展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工作中,

高校要进一步明确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广大高校就业创业指导人员要充分认识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就业创业指导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整体,大学生在这个整体中居主体地位。在具体工作开展中,高校要不断加强就业形势和发展趋势的研判,找准思想政治教育与就业创业指导的最佳契合点,坚持以大学生为本,树立以提高大学生职业素质和就业竞争力为目标的教育理念,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有利于充分发挥大学生主体地位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切实增强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能力。这是创新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工作的精髓所在,也是切实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和效果的有效方式。

(三)优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

当前,各种积极、消极的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同时影响着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着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工作的开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界限模糊、选择困难等问题。要使我们的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工作卓有成效,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关键。其一,优化社会环境。党和政府要切实加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其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功能,加强立法建设,营造安定有序、和谐团结的社会环境,创造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使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的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其二,优化高校育人环境。高校是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基地,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大学阶段是大学生思想道德品质养成、职业素质培养和职业技能提升的关键时期。高校应注重加强育人环境建设工作,增强“教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三位一体的育人意识,自觉地在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过程中营造积极、健康的校园育人环境氛围。同时,建设优良的校园文化环境,加强校风、教风、学风和考风建设,让大学生在健康、向上的校园环境中受到思想政治教育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三,优化网络育人环境。网络已深入到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起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现阶段,网络已贯穿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就业创业

指导的全过程。在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过程中,高校应主动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要全面加强校园网的建设,使网络成为弘扬主旋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要利用校园网为大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服务,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和引导,不断拓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渠道和空间。

(四)发挥高校政治辅导员的作用

高校政治辅导员作为大学生的人生导师,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发展等方面起着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可替代的作用。加强政治辅导员队伍建设是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工作开展的基础,建设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的辅导员队伍,是提高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工作科学化水平,服务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内涵发展的重要保障。教育部对高校政治辅导员工作职责提出了明确要求,要组织、协调班主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组织员等工作骨干共同做好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为学生提供优质高效的就业指导与信息服务,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这是高校政治辅导员的职责所在,也对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具体的工作要求。通常情况下,高校政治辅导员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就业创业指导工作的最基层管理者、指导者和组织者,是高校相关职能部门、专业课教师与大学生紧密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大学生在校期间与辅导员朝夕相处,在辅导员言传身教的直接影响下,最容易建立稳定的相互信任关系,最容易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的契合点,是高校开展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理想人选。高校政治辅导员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和作用,及时关注大学生中出现的思想意识问题,

充分研判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分析发展趋势,帮助他们澄清模糊认识,分清重大是非问题。在开展具体工作过程中,将就业创业指导与思想政治教育充分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自觉培养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观念,树立崇高的职业理想,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增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认同感,使大学生在就业创业时,始终把个人价值的实现与祖国、社会和人民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合理、有序地促进大学生的职业发展。

参考文献:

- [1] 沈壮海. 解开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维之结[J]. 思想理论研究, 2011(21).
- [2] 洪明. 大学生道德教育重在培育道德理性[J]. 高等教育研究, 2009(12).
- [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EB/OL]. (2004-10-15) [2016-08-02]. <http://news.sohu.com/20041015/n222514470.shtml>.
- [4]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2012-11-18) [2016-08-05].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118/c1001-19612670.html>.
- [5] 媒体调查:59.8%学生的理想就业是进国企和编制内[EB/OL]. (2013-03-04) [2016-08-05]. <http://roll.sohu.com/20130304/n367761197.shtml>.
- [6] 丁全忠,王宁. 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的问题、原因及改进措施[J]. 经济与社会发展, 2007(11).
- [7] 沈壮海,刘玉标. 与时俱进: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突出标志[J]. 教学与研究, 2008(9).
- [8] 教育部. 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EB/OL]. (2006-07-23) [2016-08-09].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7/content_705523.htm.

(责任编辑 姚虹)

On the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Guidance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ENG Feng

(Research Center of Youth problems,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453007, China)

Abstract: In higher educational system of China,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college students' guidance of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are both important contents of teaching work. The former should be enhanced in the latter, and the latter should be blended into the former. Their mutual effect and promotion tend to form a virtuous cycle in order to achieve an ideal cooperation and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guidance; agreement

基于路径突破视角的大学生创业路径比较研究

曹爱军, 陈 思

(甘肃政法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兰州 730070)

摘 要:以职业生涯周期为大学生创业的发展阶段,运用路径突破理论分析大学生创业的发展演化过程,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的交互作用,从内生性路径的角度为大学生创业提出有意识的偏离、构建多样化创业团队、建立学习型组织等建议,帮助我国大学生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所处的创业发展阶段。

关键词:路径依赖;路径突破;创业路径;比较分析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6.05.018

中图分类号:G647.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6)05-0087-05

与美国大学生 20% 甚至是 30% 的创业成功率相比,我国大学生的创业意识、创业能力颇受社会的怀疑,难以真正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伴随“以创业带动就业”战略的开展,我国大学生的创业渠道日臻完善,创业条件日趋好转。但是,我国大学生的初始创业路径选择大多以学校和政府为导向,具有路径依赖的特性。本文系统梳理大学生的创业历程,将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理论应用于大学生前期的创业生涯,对路径理论的动态交互作用、内生路径的潜在影响力进行了理论上的补充和例证,以帮助大学生更清楚、全面地认识自身的创业状态。

一、理论工具

(一)路径依赖理论

路径突破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史学家 Paul A. David 提出,经由 W. Brian Arthur 和 Douglas North 等学者发展,成为分析路径选择和路径演化的重要理论。^[1]路径依赖理论是指系统一旦陷入最初的路径,则不论路径的好坏都会在惯性的作用下延续并不断强化最初选择的路径。尽管路径依赖理论能够合理解释次优选择的存在,但是这个理论本身也有不可忽视的内在缺陷——过于强调历史的决定性作用,忽视行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更排除内生路径存在的可能。越来越多的学者注重对内生性路径以及

路径突破理论进行深入研究,但是就目前的进展来看,无论是路径依赖理论还是路径突破理论都仅仅聚焦于单一的演化路径,忽视两者之间的交互性关系。^[2]

将路径依赖理论应用于分析高校毕业生的创业路径,首先要对传统的路径依赖理论的研究对象进行重新定义。路径依赖理论的研究对象泛指系统,将来自不同院校、不同专业的高校毕业生去差异化,宏观地将其看作是一个统一的系统,系统中的成员受到相似外部环境的作用,这种外部环境会对大学生最初的创业路径选择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同时这种影响会在系统内部一直持续,最终形成大学生创业的路径依赖。

(二)路径突破理论

路径突破理论是由路径创造理论以及路径构造理论演化而来。美国学者 Garud 和 Karne 认为路径创造不仅依靠外部的环境和恰当的时机,更需要企业家的发散性思维以及学习整合能力,最终实现发展思路的交叉转变。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出“路径构造”理论,即将路径构造的过程分为“路径产生、路径持续、路径终止”^[3]三个阶段。任何一个阶段的产生、发展与持续都离不开企业家的主观能动性,每一条路径的产生都不是一个偶然的过程,而是企

收稿日期:2016-05-27

作者简介:曹爱军(1977—),男,甘肃灵台人,博士,甘肃政法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战略管理。

业家为实现创新目标持续奋斗的过程。

本文根据路径突破理论的三个阶段构造出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交互作用概念模型(见图1)。路径依赖的产生源自学校和政府的创业导向,政府和学校的鼓励为大学生带来潜在的发展机遇,大学生感知机遇并衡量现有资源(资金、技术、信息等)进行初步创业选择,需要强调的是,大学生拥有的资源也是其内生路径产生的根源。进入创业期,大学生感知到外部创业环境的限制性因素和突破性因素,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路径突破,出现多元化的创业路径。最后由于追求创业利益最大化以及受制于自身有限的创业能力,创业路径逐步缩小,由“广口路径”变为单一的“长条路径”,陷入路径依赖。伴随外部环境的变化、大学生自身创业能力增长以及企业资本的不断积累,原有的限制性因素成为新一轮路径选择的机遇和路径突破的契机,展示出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的交互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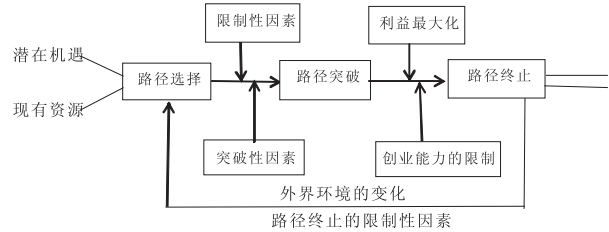


图1 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交互作用概念模型

二、大学生初始创业模式界分

本文的第一部分构建概念模型,以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的动态交互作用展示出大学生创业路径的一般演化过程,第二部分将围绕路径依赖理论的三个特征分析其对大学生初始创业方向的影响并对大学生的初始创业模式进行界分。

路径依赖具有持续性、偶发性和滞后性三个特征,这三个特征对大学生初步创业方向的选择有较为明显的影响。首先,路径依赖就是原有状态的持续,大学生长期学习自己的专业课,其创业的方向会首先围绕自己所学的专业展开,所以其创业选择可以看作是原有状态的持续;其次,早期的偶然历史事件会对系统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大学生有时会以学校中成功学生的创业案例作为自己创业的初步选择,即使只是个案、具备偶然性,但仍会对系统中的成员产生影响;最后,路径依赖具有滞后性,大部分在校大学生掌握的市场信息、风险信息不全面,只会短视地看到某种创业方向的成功之处,对其潜在的风险一无所知,这种路径依赖的滞后性为今后大学生的创业发展埋下隐患。

任何一种创业模式都是一个涵盖企业资源和能

力、客户价值和盈利方式的三维立体模式。^[4]大学生创业模式实质上就是其创业组织形式、创业方式、创业行业等创业要素的统一整合。^[5]本文基于不同客体对创业主体的影响将传统大学生的初始创业模式界分为三种:学校导向的创业路径、政府导向的创业路径以及创业者个人导向的创业路径。

(一)学校导向的创业路径

本文将学校导向的创业路径细分为学校政策导向的创业路径和专业导向的创业路径进行详细阐述。

1. 学校政策导向的创业路径

我国各高校通常开设创业的培训课程、成立创业社团或者是举办创业大赛,支持具有创业意识的高校学生进行创业思想交流。同时,学校也会提供学生一部分创业资金、推出一些政策扶持的创业项目,这些创业项目往往较为简单,市场进入的壁垒较低,很容易成为大学生创业的首选。此外,学校政策对学生的影响还会以一种较为特殊的形式展开——校企合作,这种形式多半出现在高职类院校。高职院校通过与企业合作,将高职院校的学生引进企业基地观摩、培训、学习,这能促进学生更好地理解企业文化和企业理念,有的企业甚至以较低额度的创业加盟费用吸引大学生加盟企业。基于校企合作的便利性优势以及相关的政策的导向,大部分大学生也会将加盟曾经学习的企业视作创业的重要选择之一。

2. 专业导向的创业路径

我国高校开设的艺术类专业和科技信息类专业对今后大学生的创业十分有利。因为艺术类院校的大学生通常具备较强的艺术技能,其典型的创业模式是毕业之后成立艺术辅导班或艺术公司,其扎实的艺术功底将成为他们的创业优势。对于科技信息专业,基于当前消费市场多元化的局面,充满个性的高科技信息产业可借此机遇大力发展。很多掌握现代科技技术的研究生、留洋博士归国创业,成立技术含量较高的高科技企业或者成本较低的小型互联网轻应用(APP)企业。

(二)政府导向的创业路径

政府的政策导向一般集中于有潜在需求但又尚未得到社会普遍认可的领域,类似于服务业、农业等领域。目前,世界各国对培养高素质农业人才技术和农业创业人才具有促进本国农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科技化的重要作用已达成共识。^[6]落后的农业生产技术明显不利于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所以现在很多政府鼓励农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回乡创

业。此外,农学专业的大学生利用高科技技术提高生产力,也会形成区别于传统农业者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多的农林畜牧专业的大学生选择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回乡自主创业。政府更是出台了相应的创业扶持政策,减免创业税收、简化创业贷款手续、制定专项资金、提供大额度的创业补助等,以此推动潜在需求向现实需求的转变。

(三)个人导向的创业路径

个人导向的创业路径主要体现的是内生性路径对创业的潜在影响,这部分大学生受到学校、政府政策的影响干扰较少,坚持以个人喜好、理想或者资源为核心进行初始创业模式的选择,主要分为传统的创业路径以及依托互联网的新型创业路径。

1. 传统导向的创业路径

传统创业路径的大学生以实体店作为其涉足传统行业的首要开端,这种传统的创业路径对于资金和信息的需求量较高。选择传统创业路径的大学生一般掌握较为丰富的启动资金、对创业的领域较为熟悉、对自己创业能力充分自信。

2. 互联网导向的创业路径

伴随着国家“互联网+”战略的展开,很多大学生敏锐地感知到企业发展的新机遇。同时网络“微商”“淘宝店主”等小微企业创业的相继成功,促使很多大学生选择互联网为导向的创业路径,这种创业模式成本较低但竞争十分激烈,如果不能在市场上为自己的产品精准定位并确定目标消费人群,很容易导致创业失败。

三、大学生创业模式的动态演化

本文的第二部分在对大学生初始创业模式进行界分的基础上,从学校和政府两个维度阐述了大学生创业的路径依赖特性,从个人角度阐述了内生路径存在的巨大影响力。第三部分以路径突破理论为基础,以探索期、实验期和立业期三个创业生涯周期为基点,从学校、政府以及学生个人三个维度动态展示大学生创业模式从路径依赖走向路径突破、路径突破陷入路径依赖,直到突破因素的再度出现实现新一轮路径突破的一般过程,其动态发展概念模型如图2、图3和图4所示。

(一)学校导向创业路径的突破

创业的探索期,大学生受学校环境的影响来选择创业项目,这种项目可以是学校举办的创业大赛也可以是学校推荐的创业项目,学生基于对学校资源的依赖进行了初次创业选择。创业的实验期,大学生逐步摆脱学校的束缚,感知到外部市场的变化,在原有创业的基础上,或者开发新的创业模式,满足

客户的需求,或者转换原有的创业模式,形成各异的创业路径,之后再次陷入路径依赖。创业的立业期,大学生的创业能力不断加强,资金积累不断加厚,人脉关系不断拓宽,在此基础上诱发新一轮的创业路径突破,其概念模型如图2所示。

1. 学校政策导向创业路径的突破

以学校政策导向的创业路径在创业的探索期,依据学校的政策选择创业的路径。创业的试验期,大学生感知到市场的变换会对原有的创业方向进行微调。创业的立业期,大学生会将原有的创业路径发展为整合了外部各要素的、高效率的、具有独特核心竞争力的运行系统。校企合作展开的创业也是如此,大学生通过企业实习,对企业的扶持产生依赖。创业的探索期,也就是以加盟连锁店的形式形成初步的创业选择。创业的试验期,大学生真正接触这个行业,与这个行业的上下游产业链进行深度的接触,一部分会继续在这个行业或企业坚持走下去,另一部分高校毕业生会在原有的基础上更换创业选择。最后,创业的立业期,大学生随着对行业的深入认识以及资本的积累,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度进行路径突破,以兼并的方式扩大规模或者是以多元化的方式丰富企业的日常经营。

2. 学校专业导向创业路径的突破

以专业导向的创业路径在创业的探索期,大学生紧贴自己的所学专业进行创业选择。创业的试验期,单一的专业难以应对市场的激烈竞争,在原有的专业基础涉足更多的创业领域,尝试不同的创业路径。创业的立业期,伴随资本的累积,会确定一个或几个创业路径深入地发展,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本提高企业的影响力及创业的深度。

具体来看,艺术专业导向的创业路径在创业的探索期,选择与自己的专业直接联系的创业路径。创业的试验期,大学生不断地接触市场,面对难以计数的竞争对手,根据自己现有的资源进行专业外延。创业的立业期,大学生充分利用自己的丰厚资产以及创业资源,再次进行路径的突破,形成一体化的产业链。科技信息专业导向的创业路径在创业的探索期,以自己的专业作为创业的切入点,基于熟练应用的科技技术进行创业。以高端科技为导向的创业,其创业的形式一般是以对高科技产品进行改良的方式展开,使科技产品应用在更多的领域。创业试验期,由于受市场的影响,以高科技为创业导向的大学生主要依靠拓展市场营销模式,丰富产品的实际用途进行创业路径突破;而以轻应用为创业导向的企业,更容易受到时刻变换的市场的冲击,不断为

自己的应用软件添加新的功能。创业的立业期,伴随资本的丰富,以高科技为创业导向的企业在原有的基础上选择集中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确定自己的技术垄断地位;以轻应用为创业导向的则不断与新的企业合作拓展应用软件的影响力,完善应用软件的功能形成系列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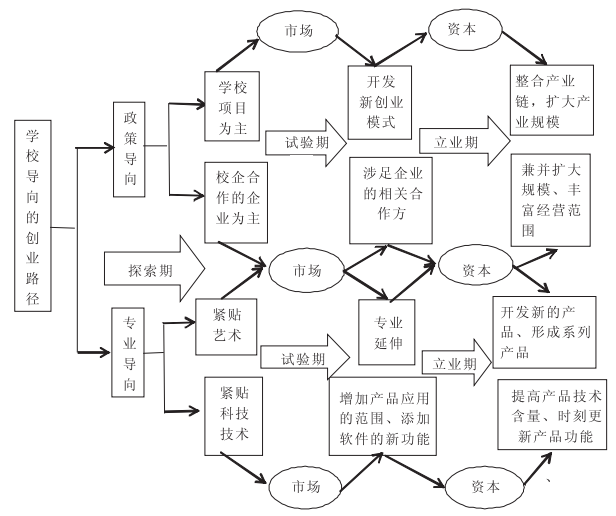


图2 学校导向创业的路径突破分析图

(二) 政府导向创业路径的突破

政府导向的创业路径集中于农业、服务业等领域,并且其发展演化的轨迹较为类似,所以本文就以农学为例,分析政府导向的创业路径,其概念模型如图3所示。创业的探索期政府鼓励农林专业大学生回乡创业,为现代农业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大学生受到政府政策的鼓励返乡,基于自己完全掌握的农学知识以及农学技术进行创业。创业的试验期大学生感知到市场的变动,会在创业的基础上与上下游产业积极联系,进而扩展自己的创业路径,使自己创业路径的选择更加多样。创业的立业期,大学生利用自己的资本扩大创业内容,形成规模化的上下游产业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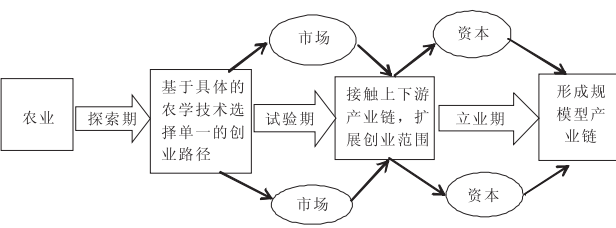


图3 政府导向创业的路径突破分析图

(三) 个人导向创业路径的突破

个人导向这种内生性路径,即使在最初的创业选择上成功避免了路径依赖,在其随后的发展中也会陷入其中,更难以摆脱受到二者交互作用的影响,其概念模型如图4所示。

1. 传统实体导向创业路径的突破

创业的探索期,大学生会依据自己的兴趣以及资源选择传统行业进行创业。创业的试验期,大学生受市场的影响,在原有的门店基础上,丰富门店产品的内容或者更换门店的地址以期获得更多的利润。创业的立业期,大学生的创业资本累积,扩建原有的门店形成连锁店。

2. 互联网导向创业路径的突破

创业的探索期,大学生利用自己的创意性想法、可靠的产品来源以确定网店的定位。创业的试验期,创业者感知到市场对产品的不同需求,丰富自己的产品内容,并积极与顾客互动,提高顾客的满意度,积攒较多的好评。创业的立业期,大学生会利用自己的资本积累,在不同的地方投放广告,培养稳定的客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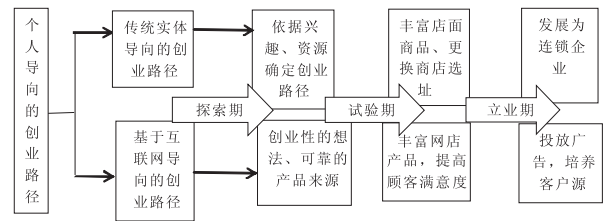


图4 个人导向创业的路径突破分析图

四、结果与讨论

本文的第三部分是从路径突破的状态进行分析。从横向来看,路径依赖的状态受到市场突破因素的影响进行路径突破;受制于资金等限制因素,确定固定的发展轨迹进入路径依赖;随着企业的发展,资金对企业的限制逐步减少,限制性因素转变为突破性因素,实现第二次路径突破;由于创业能力的限制以及短期利益的考量,创业发展的轨迹再次被固定,二次进入路径依赖。所以,无论是学校导向、政府导向或者是个人导向的大学生创业路径都是伴随大学生职业生涯周期以及外部市场、资本积累不断从路径依赖——路径突破——路径依赖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过程。除了大学生创业的状态能展示这种交互作用之外,在路径突破的阶段上,也就是大学生创业的纵向时间段上,这种作用也有所体现。如图5所示^[3],大学生创业路径的第一个阶段,想法丰富;第二个阶段,学生受到学校、政府的影响,创业路径的选择范围不断锐减;第三个阶段,综合外部潜在机遇和挑战,大学生确定唯一的一条创业路径,进入路径依赖;第四个阶段大学生深入接触市场,伴随外部环境的影响及自身创业能力的提升,从路径依赖走向路径突破,创业方案的选择逐步丰富起来。但是迫于资本、现实情况的束缚,会逐渐从第四个阶

段回到第二个阶段,最终走向第三个阶段,再次陷入路径依赖。同样,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大学生试验期的制约因素被突破,又一次走向第四阶段,实现路径突破,这种交互关系会贯穿大学生创业的始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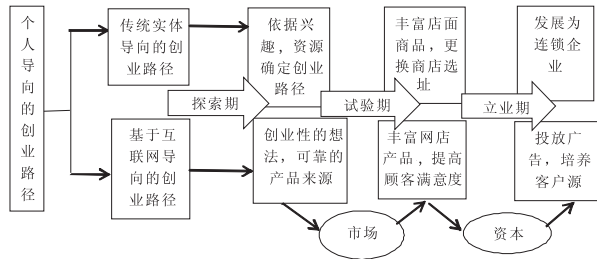


图5 变革中的路径突破

虽然大学生身处于一个较为固定的环境之中,与外部的接触有限,在最初的路径选择上难免会受制于现有的条件,容易产生路径依赖。但是这并不能排除内生性路径存在的可能,现实生活中仍然有部分大学生在校期间就摆脱了路径依赖的束缚,选择了一条与常人不同的创业道路并取得了成就。基于内生路径的视角可以为大学生摆脱创业路径依赖、开启多元化的创业模式提出一些指导性建议:积极与不同的成功人士进行交流沟通,到不同的企业进行调查学习;主动参与社会活动,增加对不同的行业的了解;培养主观能动性,敢于选择常人所不敢选择的道路,培养应对困难的能力与克服障碍的勇气;路径选择上要善于摆脱外部环境的限制,对现有的创业模式进行“有意识地偏离”;在组建创业团队的

过程中要积极吸纳富有多元化思维的成员,合理发挥来自不同专业、具有不同专长成员的能力^[7];构建学习型组织,借助“以变应变”的学习过程,改变路径依赖“以不变应万变”的僵化思维模式和学习过程^[8];培养创业成员之间默契的精神以及变革创新的企业文化,便于今后整体式战略方向的转变及具体变革措施的实施,使全体成员能够共同努力以最大程度地降低路径依赖的惰性与路径突破的阻力。

参考文献:

[1] 林志扬,李海东. 组织结构变革中的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133-140.
[2] 尹贻梅,刘志高,刘卫东. 路径依赖理论研究进展评析[J]. 外国经济与管理,2011(8):1-7.
[3] 林志扬,李海东. 组织结构变革中的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机制研究:以联想集团为例[J]. 管理学报,2012(8).
[4] 马君,郭敏,张昊民. 大学生创业模式及其动态演化路径[J]. 教育发展研究,2012(3):59-64.
[5] 徐明. “互联网+”时代的大学生创业模式选择与路径优化[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5(5):49-55.
[6] 袁成龙. 回乡大学生农业创业的路径分析[J]. 学术论坛,2014(7):46-50.
[7] 唐根丽,王艳波.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育路径研究[J].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2011(3):76-79.
[8] 刘小可,陈通. 学习型组织的组织学习过程模型的构建[J].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25-29.

(责任编辑 许峻)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Entrepreneurial Path of College Students
Based on the Path Breakthrough Perspective

CAO Ai-jun, CHEN Si

(School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Gansu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theory of path breakthrough, the paper analyzes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ship taking the career cycle as the students'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stage, which show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ath breakthrough and path dependence from one side. From the angle of the endogenous path,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such as building a diversified entrepreneurial team, establishing a learning organization, etc. to help our students understand their own entrepreneurial development stages clearly.

Key words: path dependence; path breakthrough; entrepreneurial path; comparative analysis

伪大师的社会身份建构探析

吴军超

(郑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郑州 450001)

摘要:社会身份理论对于个体的社会群体成员身份如何影响他的社会体验、社会态度以及社会行为进行了解释,并认为个体通常需要某个特殊的社会身份以明确自己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本文基于社会身份理论的基本观点,对于大师和伪大师的社会身份建构进行了剖析和比较,认为大师这一社会群体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使得伪大师们倾向于通过相关策略为自己建构大师的社会身份。

关键词:大师;伪大师;社会身份;身份建构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6.05.019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6)05-0092-04

近年来,社会上不断有打着各种旗号的所谓“大师”粉墨登场,譬如具有特异功能的气功大师、鼓吹长命百岁的养生大师、号称手到病除的医术大师、自谓通晓古今的国学大师等等。他们通过精心设计的自我包装和自我推销,混淆视听,欺骗民众,以达到骗人钱财、名利双收的丑恶目的。这一出出人间丑剧接连上演,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大众心态的浮躁、精神信仰的缺失、价值观念的扭曲等当代社会问题。本文拟从社会身份理论出发来探析伪大师们如何对其社会身份进行建构和操纵,从而揭露这一社会丑相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现实。

一、社会身份建构

社会身份理论是由社会心理学家亨利·泰弗尔(Henri Tajfel)及约翰·特纳(John Turner)等学者在对群体行为及群际关系的研究过程中提出的,已成为这一领域影响最为广泛的理论之一。

(一)社会身份的概念界定

泰弗尔将“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定义为人们对于自身归属于某个社会群体以及这种成员身份所带来的价值和情感意义的自我认知^{[1]255}。换句话说,社会身份指一个人对于他/她属于某社会群体的意识,这个社会群体由自视属于同一社会类别的

个体所构成^{[2]225}。归属于某个社会群体不仅呈现出某种与生俱来的特征(国籍、种族、性别等)或源自社会制度的特征(阶层、职业、信仰等),同时也伴随着获得相应社会身份的心理过程。

(二)社会身份建构的含义

社会身份理论的基本观点在于解释个人对所属社会群体成员身份的认识,在哪些方面影响他/她的社会体验、社会态度以及社会行为。人们在现实中从属于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然而个体通常需要某一个特殊的社会身份以明确自己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因此,人们倾向于利用自己在某个社会群体的成员资格(Group Membership)来建构自己的社会身份。这包括三个基本含义:1. 个人力图获取或维持积极的社会认同。2. 积极的社会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社会群体与群体之外所进行的有利比较。3. 如果社会认同令人不满,个体会离开所属社会群体并加入到更好的群体中,或力图使所属群体变得更好^[3]。

(三)社会身份建构的过程

社会身份理论认为,社会身份建构由三个基本过程构成,即社会类化(Social Categorization)、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以及积极区分(Positive Dis-

收稿日期:2016-05-23

作者简介:吴军超(1976—),男,河南安阳人,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治理与公共政策。

tinctiveness) ^{[4]24-27}。社会类化指个体把自己归属于某一社会群体,认为自身拥有该群体的普遍特征,同时将符合群体内的特征赋予自身。社会比较指个体对自身所属群体相对于其他群体所具有的权力、声誉和社会地位进行评价,从而使社会分类更有意义。积极区分指个体在进行社会比较后,利用自己的群体成员身份提升自尊水平的过程。通过社会身份的认同和建构,人们可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和自尊,提高认知安全感,满足自身归属感,并找到自身存在的意义 ^{[5]202-223}。

二、大师的社会身份特征

(一) 大师的界定

“大师”最早指一种官职,《周礼》记载说是周代宫廷的乐官长。在现代汉语中,“大师”一词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对出家人的尊称,如台湾的星云大师。二是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且为大家所尊崇的人,如国学大师梁启超、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等。

对于佛教用语的“大师”且不讨论,那么在学术和艺术领域,哪些人能被称为大师呢?或者说“大师”的标准是什么?有一种观点认为,凡称学术大师必合学界约定俗成的若干尺度,这种尺度简单地说就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德才学识兼备,非但于本门学科为不世出的专家,并以卓特识见、新颖方法或指明未来取向,而受众多学者景仰”^[6]。对于艺术大师的一个通常理解是“具有鲜明的个性风格,且其作品有艺术的高度和难度,以创新为己任,为丰富艺术表现语言耗费毕生精力而最终获得成功,引领潮流,并对当时社会及后世社会具有巨大影响力”^[7]。

学界对于“大师”的界定也没有特定标准,但总体来说无论是学术大师还是艺术大师都具有一定的共性:一是在自身领域成为学术权威或里程碑式人物,例如被誉为东方学大师的季羨林先生,在印度古代语言、佛教史、吐火罗语等研究领域取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是这些研究领域当之无愧的集大成者。二是在自身领域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引领作用,例如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别树一帜,在多年潜心研磨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中国传统的文人画风与纯朴的民间艺术风格相融合,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我国现代花鸟画的最高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晚年独创的红花墨叶画风,可以说开宗立派,影响深远。三是在思想境界上能够引领一个时代,例如豫剧大

师常香玉先生作为一代豫剧宗师,对我国尤其是中原地区的民族戏曲艺术充满着不懈的执着和炽热的情感,终生履行自己提出的“戏比天大”的诺言,影响了一大批热爱民族戏曲艺术的青年艺术家。

(二) 大师的社会身份特征

毋庸置疑,无论是学术大师还是艺术大师,都具有普遍认可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然而,这种大师的身份不是自封的,不是花钱买来的,也不是政府部门授予的,而是领域内同行达成的共识,并在社会上也取得广泛的认可。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大师的称号能够经营出来或者评选出来,那么这一称号所具有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就大打折扣,在人们心中也不会具有崇高和神圣的地位。季羨林先生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可见,大师的名号不仅不是自封的,即使别人主动授予,真正的大师也不会堂而皇之地接受。

总之,大师身份的建构不是大师本人主观故意的结果,也不是社会民众刻意营造的产物,而是一个多种因素不自觉发生作用的、约定俗成的、渐进的历史过程,从而使得大师这一社会群体所具有的较高社会地位呈现出长期性、稳定性、广泛性的特点。

三、伪大师的社会身份建构

社会身份理论认为,如果拥有某个社会标签能够最大程度地体现自身与社会群体内成员的共同点,同时能够突出与群体外成员的不同之处,那么个体更有可能把自己视为某个社会群体的成员^{[8]134}。如上文所述,大师这一社会群体具有积极的社会认知意义和较高的社会认可度,使得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通过各种手段给自己身上贴上“大师”的标签,这正如泰弗尔所说,对积极区分的需求驱动着人们对社会身份的追逐。自封的“大师”,或曰伪大师,通过以下策略和手段建构“大师”的社会身份,以达到其见不得人的意图和目的。

首先,借助具有欺骗性的技巧或手段来吸引大众的眼球,提高社会彰显度。曾任重庆缙云山道教协会会长,号称弟子三万的道长李一,早年不过是一个摆地摊表演杂耍的街头小混混,后来在1990年重庆电视台举办的“太阳神杯巴蜀绝技大赛”中表演“人体通电”,获得巴蜀绝技“十绝高手”称号,在当地初有名气。政界、商界、演艺界通吃的“气功大师”王林,最初蹲过大牢,略懂杂耍小技,以“表演隔空取物”见长,尤其是能驱动意念出窍,到野地里抓蛇后放入空盆中,震住了不少普通大众甚至是社会

名流。

其次,通过媒体、网络、出版物、商业活动等方式推销经过精心包装的某种理念,树立在某个领域的权威地位。号称“中国最权威的营养大师”张悟本,在2010年2月做客湖南卫视《百科全说》节目后迅速蹿红。他所著的《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一夜之间成为各大书店和网站销售的畅销书,号称“上市4个月突破100万册”。他大肆宣扬绿豆包治百病等伪科学的食疗理论,受到很多人追捧,被称为“中医食疗第一人”。2005年,著名导演张纪中夫妇接受李一的“辟谷”治疗并著书推介后,由于明星效应的影响,李一开始经常受各大有影响的电视台邀请去做宣讲,办讲座,如湖南卫视《天天向上》、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等,《南方人物周刊》《中国企业家》也不甘落后,相继对李一进行大幅的推介和报道,李一渐渐被披上了“神圣”的光环。

第三,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运作,给自己封上各种官方的或非官方的头衔,进一步确立“大师”的社会身份。张悟本号称自己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是国家卫生部首批国家高级营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科技合作中心研究员、中华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等等。虽然最终这些头衔都被有关部门否认,但确实对于张悟本“大师”称号的塑造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道教大师”李一不是普通的道士,他拥有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重庆道教协会副会长以及重庆市政协委员等众多官方的身份头衔。王林曾被武功山管委会授予“武功山大师”称号,时任萍乡市政协主席、芦溪县县长、县政协主席等政府官员出席授牌仪式。王林与刘志军等省部级官员、马云等商业大鳄、成龙等演艺界巨星等的密切交往,也无形中为其蒙上了一层高大上的神秘色彩。

四、大师与伪大师的社会身份比较

在社会身份理论看来,个体有利用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群体成员身份来提高自尊和自身地位的倾向和动机。大师的权威性和社会地位对于别有用心的人是具有巨大吸引力的,他们精心炮制,通过各种手段为自己也运作出“大师”的头衔,以彰显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并达到名利双收的目的。通过对比,大师与伪大师的社会身份具有以下三方面的不同之处。

第一,在身份获取(Identity Acquisition)方式上,大师的社会身份是由其多年的学识和艺术修养

积淀而成,是一个历史渐进的自认而然的过程;伪大师的社会身份获取是凭借某种雕虫小技或偷梁换柱的某个概念,通过媒体炒作和商业包装而形成的,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在武术这一领域,近年来能称为武术大师的实属罕见,国际影视巨星李小龙被誉为中国功夫之王,就其武术的实战能力和成绩、对武道的理解和阐释、对中国武术的创新和国际推广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来说,应当能称得上武术大师,尽管他在33岁的年龄英年早逝。而自封为“气功大师”的王林,依靠其空盆来蛇、隔空打人、气功治病等不入流的伎俩,通过媒体造势、明星效应、广收门徒等手段,不断扩大自己的社会知名度,营造出一种虚假的、经不起推敲的大师身份。

第二,在身份获取的意图上,大师的社会身份是学术领域、艺术领域和社会大众约定俗成的共识,在这种身份获取的过程中,大师本人是置身度外的,甚至对这种称号持排斥态度,并不企图利用大师的身份获取某种利益;伪大师的社会身份获取是有意而为之,是通过不法手段运作的结果,其目的就是抬高自己的身价,并从中谋取实际利益。相声大师马三立是一位德艺双馨的人民艺术家,创立了独具特色的“马氏相声”,深受社会各界及广大观众的热爱与尊敬,但对于纷至沓来的荣誉和称号他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刻意保持距离。他反复强调:“我不是大师,不是艺术家,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老艺人,是个热爱相声、喜欢钻研相声的老艺人”^[9]。再看看伪大师王林之流,利用精心炮制的“大师”身份,到处招摇撞骗,编制关系网,大肆敛财,大有呼风唤雨、如鱼得水之势。这种利欲熏心的跳梁小丑与德艺双馨、淡泊名利的大师们在思想境界上有着天壤之别。

第三,在身份的持续性上,大师的社会身份一旦形成,就具有长期的稳定性,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具厚重感;与此相反,伪大师的社会身份是脆弱的、暂时的、阶段性的,经不起历史的洗礼和科学的推敲。比如在我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梁启超是一个璀璨的明星。他学术研究涉猎甚广,在史学、文学、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均有影响广泛的著述,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实实在在的百科全书式人物,是不折不扣的思想大师和国学大师。他的学术思想没有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有所损减,反而在新的时代更具有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而伪大师们即使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社会群体内产生了轰动效应,最终结局也不过犹如昙花一现,被科学

和理性的浪潮所冲击淘汰。更有甚者,很多伪大师由于做出伤天害理之事而身陷囹圄,如李一涉嫌强奸罪,王林涉嫌故意杀人罪,张悟本涉嫌非法行医致人死亡罪等等。

总之,“大师”之所以层出不穷,一方面是他们对于大师的社会身份进行恶意操纵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前社会中科学理性、人文精神与理想信念的缺失和扭曲,以及社会文化土壤和环境生态的恶化。可以预见,在人类文明的发展期和社会的转型期,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形形色色的“大师”登上我们的社会舞台。“大师”层出不穷,大师寥若晨星,这种现象值得学术界和整个社会进行更深入的挖掘和思考。

参考文献:

[1]Tajfel H. Human Groups and Social Categories: Studies in Social Psycholog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2]Stets J E,Burke P J. Identity theory and social identity theory[J].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2000(3).
[3]泰弗尔. 群际行为的社会认同论[J]. 方文,李康乐,译. 社会心理研究,2004(2).
[4]Tajfel H.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1982(33).
[5]赵志裕,温静,谭俭邦. 社会认同的基本心理历程:香港回归中国的研究范例[J]. 社会学研究,2005(5).
[6]曹玲娟.“大师”该由谁来封? [N]. 人民日报,2009 - 03 - 02.
[7]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item/艺术大师/3135804> [EB/OL].
[8]Hddy L. From social to political identity: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social identity theory[J]. Political Psychology,2001 (1).
[9]李玉霄. 马三立的眼泪[J]. 人民文摘,2006(9).

(责任编辑 刘成贺)

On the Soci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Pseudo – masters

WU Jun – chao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Social identity theory explains how the social group membership of individuals influences their social experiences, social attitudes and social behaviors, and holds that individuals usually need some special social identities so as to show their special social positions. Based on the basic ideas of social identity theory,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different models of soci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masters and pseudo – masters and puts forward that pseudo – masters, attracted by the high authority and influence of the social group of masters, tend to construct the social identity of masters for themselves through some cheating methods.

Key words:master; pseudo – master; social identity; identity construction

当代艺术创作与社会责任意识

张 戈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 郑州 450044)

摘 要:艺术的社会功能在很早的时候就已为人们所注意,随着时生产力的发展,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高度文明的信息化、全球化时代,信息的传播方式、传播速度发生了质的飞跃,而艺术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也更加深刻、广泛。艺术工作者必须要有清醒的社会责任意识,高尚的人格,艺术创作要有针对性,创作出既满足人民审美需求,又体现时代精神的艺术作品。

关键词:艺术创作;社会责任;市场价值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6.05.020

中图分类号:J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6)05-0096-03

人们对于艺术创作社会责任问题的认识可以追溯到艺术的起源,原始人在洞窟壁上画的狩猎图以及突出丰乳肥臀的女性生殖特征的裸体雕塑(如原始维纳斯塑像)就是为了祈盼狩猎成功及部落人丁兴旺。这些洞窟壁画及雕塑作品具有了早期朴素的社会功能,明显涉及到了艺术创作的社会责任问题。

古今中外很多思想家也对艺术创作的社会责任作过精要的论述,但不同的人对艺术这一功能的认识又不尽相同。对艺术持批评态度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理念”才是世界的本质,现实是对理念的模仿,而艺术则是对现实的模仿,是对模仿的模仿,犹如镜子一般,而且诗人“像画家一样,他的创作是和心灵的低贱部分打交道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拒绝让诗人进入治理良好的城邦。因为他的作用在于激励、培育和加强心灵的低贱部分毁坏理性部分,就像在一个城邦里把政治权力交给坏人,让他们去危害好人一样。”^①因而柏拉图决然地要把诗歌和诗人从自己的“理想国”中驱赶出去,只允许音乐等有限的艺术形式存在于他的“理想国”之中。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扬弃了老师的观点,认识到艺术对生活的影响,不但肯定了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而且强调艺术可以比现实更加真实。他认为艺术可以按照事物应该有的样子去描绘,按照事物逻辑发展的必然性去描绘,因而比生活更加真实,

并具有净化和教育的功能,具有揭示真理的作用。

中国的先贤们也很早就深刻地意识到艺术对社会生活的巨大作用,明确提出了艺术“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功能,要求艺术为统治阶级服务。先秦时期的孔子就在《论语·阳货》里提出:“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②在这里,孔子认为诗歌可以表达情感,观察自然与社会,还有利于结交朋友,抒发心中郁结之气。把诗学好了,往大处说可以孝顺父母、侍奉君王,最不济还能知道不少鸟兽草木的名称。孔子在总结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兴观群怨说,把诗对社会的作用进行系统的理论表述,对后世的诗论产生深远的影响。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指的是人们可以通过诗歌抒发情感,进而引发联想和想象活动,使感情得到升华,在感情的涌动中获得审美感受。诗可以“观”,强调诗歌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人们通过诗歌可以明白社会风俗的变迁、历史朝代的更迭。诗可以“群”,主要是说诗歌能够促进人们的情感交流,使人们更加团结,社会更加和谐。诗可以“怨”则是指诗歌可以起到批判不良的政治弊端和社会风气的作用。

显然,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学者们都看到了艺术对社会的巨大作用,看到艺术与生活的紧密关系。

收稿日期:2016-05-15

作者简介:张戈(1975—),男,河南固始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油画创作与教学研究。

艺术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它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争取自由的社会实践中的主观创造,它不仅满足着人类的基本审美需求,还是客观世界在人们的主观世界的反映,起着社会教育与导向的作用,是表达人们内心情感的重要手段,是人全面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艺术的社会作用,并从研究艺术的本质与艺术发展的角度出发把艺术的功能在总体上概括为社会功能和心理功能两大部分。其中社会功能包括人们常常提到的审美功能、认知功能、教育功能、社会组织功能等,而艺术的娱乐功能、宣泄功能、心理平衡功能则属于心理功能的范畴。

如果我们仅仅从艺术创作个体的角度出发,把艺术看作是一种个人行为,是个体的精神探索活动,那么艺术就是个人的主观活动,即想做什么,怎么做都行,这就很容易割裂艺术与社会的关系,陷入为艺术而艺术的形而上学的误区。从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的宏观角度出发去探讨艺术活动,我们便能够发现艺术的发生与发展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艺术与社会生活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艺术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但是艺术绝不是消极被动地反映社会生活,而是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生活,影响经济基础,这就是艺术的社会功能。一方面,艺术家作为艺术创作的主体,其创作思想、方法、实践等等都会受到社会生活的影响,会留下深深的社会烙印;另一方面,艺术家也会通过自己的艺术作品反作用于政治、道德、宗教等领域,进而影响社会生活。既然艺术对社会的发展有能动的反作用,那么这种作用就有两种可能性——积极的促进作用或消极的阻碍作用。作为艺术创作个体的艺术家就必须相应地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创作出符合时代潮流和社会发展趋势的积极健康的优秀艺术作品去鼓舞人民大众,弘扬真善美,抨击假恶丑。

当代社会,由于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互联网及电子媒体的出现,人类社会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不同地区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空前便捷。这一方面促进了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融合,使得本土文化在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过程中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和空间,迸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也使得各地本土文化不得不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与碰撞,强势文化迅速繁殖扩展,挤压弱势文化的生存空间,加剧本土弱势文化的消亡。所以,我们既要看到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也要意识到它更是一种挑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是西方殖民掠夺和资本

逐利的结果,它发端于西方文化,是对非西方文化资源的掠夺,对落后地区文化艺术的传统和发展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面对强势的西方文艺,其他地区民族本土文艺往往只能以通俗文化的形式残存下来,沦为西方享受异国情调的点缀。西方是全球化的绝对核心,非西方地区是“被全球化”的,同时伴随着被边缘化。

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文化受到全球化大潮的冲击,呈现出多元化和功利性的特征。一方面,传统的强调主旋律的艺术创作思想受到叛逆性的报复与冲击,不再是唯一的正统标准;另一方面,文艺作品走向市场,市场成为唯一的标准,艺术创作被市场所左右。这就使得以往被过度强化的艺术的社会功能现在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被过度地弱化甚至被忽视。文艺变得功利而浮华了,成了做工精良、准备充分的一场场表演秀。在技术与操作大踏步前进的同时,精神内涵却渐趋消失。在全球化、多元化的影响以及新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艺术家们不再需要花费很多精力去苦练技艺、历练精神、提高艺术上的修养,仿佛艺术只需要想出一个新颖别致的点子,通过新的媒介或新的观念形式把它包装出来,再进行一番商业操作,就万事大吉了。在这种趋势的引导下,艺术家不再对人类的生存状态进行深刻而严肃的思考和反省,不再将艺术创作活动视作自身独立而艰难的精神探索过程,艺术不再是崇高而珍贵的精神载体的代名词了。商业操作成功的快感取代了精神探索的愉悦,以往艺术所关注的精神追求、艺术语言的精致、艺术修养的提升都成为商业成功所必须的手段,艺术已经被庸俗化了,而更像是一种商业行为了。

在这个艺术观念激荡动荡的时代,每一位艺术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就是要充分发挥艺术对社会的积极作用,极力避免其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和破坏作用。

首先,艺术创作者要有高尚的人格和正确的世界观,这样才能为人们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不能仅仅以市场为导向或仅凭个人的兴趣爱好。我国自古就有“画如其人”的评判标准,甚至以评判人的道德品格的“品”来给艺术作品定位,如谢赫在《画品》中就把书画分为“六品”,这里虽然是以艺术价值为标准,但也隐约包含着“人品”“品格”的意思。南宋的秦桧虽然在书法上很有造诣,但因其个人品行上的败笔,终不能得以流传,而颜真卿、文天祥等先贤却因其高尚的道德情操、强烈的爱国热情、不屈的激昂斗志和深沉雄厚的艺术造诣流芳万世,受到世人的敬仰。所以,艺术家应该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用高尚

的品格去打动人,用优秀的作品去鼓舞人。

其次,为形成良好的艺术欣赏氛围,艺术创作要有针对性。

艺术既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社会活动方式,它不仅仅表现为艺术工作者的艺术实践活动,还包括艺术作品在社会中的传播、接受与消费的过程。艺术家创作出的艺术作品必须进入艺术世界,在传播的基础上,通过以艺术作品为对象、以鉴赏者为主体,积极能动的消费、鉴赏、批评等活动,对社会产生影响和作用,而这种影响和作用又反馈到艺术家那里,影响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如此循环往复,才是艺术活动的完整过程。它不仅包含艺术家的创作实践活动(艺术生产),还包括艺术作品在社会生活中的传播以及被社会大众所接受(艺术消费)这样一个动态的循环过程。

21世纪以来,艺术传播的速度更快捷,传播途径更多样,这使得艺术在当代更加普及,更容易走进寻常百姓的生活,艺术对生活的影响大大的加强了,而艺术的影响越深刻,艺术的社会功能越强大,艺术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就越大,艺术家就更应该注重艺术作品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属性。因此,艺术创作要有针对性,把握好尺度,对不同的受众人群要区别对待。广大艺术工作者要勇敢承担起应负的社会重任,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的艺术作品,从作品的内容到艺术的表现形式上都要审慎选择,要注意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避免不健康的价值导向。

最后,要有健全的社会管理制度,不断完善艺术作品的审查管理机制。

艺术的传播受到艺术主体、艺术信息、传播媒介、接受者四大因素的影响,在传播过程中又会经过新闻媒介、博物馆、展览馆、出版社、艺术院校和艺术市场等中间环节,各种因素、各个环节都需协调起来,担负起各自的职责。传播媒介及政府文化管理

机构对艺术作品的推介要有所选择,不能只考虑市场因素,更需要考虑社会影响,确实肩负起自己的监督检查的职能。受众也要提高自己的艺术素养,在欣赏艺术作品时也要有所选择,择其精华,去其糟粕。未成年人更应该在监护人的引导下有选择地参与艺术消费,既是对未成年人的一种保护,更是艺术传播媒介、社会管理机构、监护人应尽的职责。

总之,文艺创作有其自身的规律,在目前阶段,我们的艺术工作者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紧紧围绕着“人民”这个核心,创作出既满足人民的精神生活的需要,又能体现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72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出了艺术为人民服务的指导思想,72年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3]。两次座谈会都强调艺术家在进行文艺创作时必须要有社会责任意识,要考虑作品的社会效益。艺术创作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高度统一,艺术作品不仅要接受市场的检验,更要在思想上、艺术上达到一定的高度,实现其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 [1][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M].王大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2]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3]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4.

(责任编辑 许峻)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Artistic Creation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Awareness

ZHANG Ge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Many people have paid attention to the social function of art ear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our society has been in a highly civilized era of informat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The way and speed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have a qualitative leaping, and the art influences people's life more profoundly and extensively. Thus, art workers must have a clear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nsciousness and noble personality. Meanwhile, the artistic creation should try to satisfy people's aesthetic demands and embody the spirit of art.

Key words: artistic crea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market value

郑州市“三人制”篮球赛的发展现状及对策建议

毛永明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体育学院, 郑州 450044)

摘要:通过文献资料法、调查问卷法、访谈法,对郑州市“三人制”篮球赛的开展现状和发展趋向进行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郑州市“三人制”篮球的场地数量明显不足;赛事制度需要结合本市的情况进行完善;赛事传播方式逐渐以网络和宣传单的形式取代报纸宣传;赛事的经费主要由赞助商赞助和赛事报名费用支撑。建议在郑州市“三人制”篮球赛的发展工程中,将赛事深入到群众和学生群体中;逐渐建立健全赛事的运行和管理模式;加大新媒体对赛事和赞助商的宣传力度,拓展经费来源,加大社区、校园和企业的合作。

关键词:“三人制”篮球赛;发展现状;郑州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6.05.021

中图分类号:G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6)05-0099-03

一、引言

所谓“三人制”篮球赛,是指在场进行的三对三的篮球对抗运动,也叫“斗牛”比赛,它是在五人制篮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体育运动项目。^[1]与“五人制”篮球赛相比,“三人制”篮球赛具有运动负荷适宜;技战术要求不高;规则场地要求低;健身性、娱乐性强等优势。^[2]因此“三人制”篮球赛的推广前景比“五人制”篮球赛的推广前景更为广阔。与此不相适应的是,地处中原地区的郑州市,其“三人制”篮球赛的发展普及状况却存在比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速度稍显滞后。因此,在查阅众多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郑州市的实际情况,通过有针对性的分析研究,对郑州市“三人制”篮球赛的后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资料。^[3-4]

“三人制”篮球从其起源、发展和功效三方面分析,具有普适性、对抗性、趣味性、游戏性和短周期性等特点;^[5]2002年,“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推出了中国大学生“三人制”篮球赛,标志着“三人制”篮球赛正式进入高校。^[6]但由于学校受到资金、场地和时间等限制,致使大量高校学生无法真正参与到“三人制”篮球运动中来;在查阅众多前人的研究文

献后,^[7-10]结合郑州市实际情况,分析出了郑州市“三人制”篮球的发展需从场地设施、规则制度、宣传赞助和组织领导等方面着手解决。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郑州市篮球运动相关人群、场地资源、机构部门。

(二)研究方法

1. 文献资料法

通过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了解分析国内“三人制”篮球赛的普及现状及发展趋向。

2. 问卷调查法

根据研究目的,本研究在参考国内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郑州市“三人制”篮球调查问卷》。该问卷只有“三人制”篮球爱好者问卷,共发放100份,回收100份,回收率100%。

(1)问卷效度检验

效度问题直接地会影响到整个研究的价值,如果问卷的设计不能够充分的显示出所研究的主体,那么整个研究就会表现出毫无意义,笔者利用专家法对问卷进行内容效度检验。效度检验时请5名专

收稿日期:2016-07-20

作者简介:毛永明(1985—),女,河南郑州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体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

家对《郑州市“三人制”篮球调查问卷》内容与文章主题所搭配的程度进行评分,最高为 5 分,最低为 1 分。结果显示该问卷的平均得分为 3.93,相对效度为0.786。

(2) 问卷信度检验

信度检测就是对信度进行估计。笔者采用了间隔 30 天的重复测量法来检测问卷的信度,测量结果 R=0.88,说明该问卷的具有可靠的信度。

(三) 访谈法

针对研究内容和目的的需要,以及研究的目的任务,通过走访和电话的方式向多位界内人士(包括 5 位专家教授及大量参与“三人制”篮球的运动人士)进行过调查。访谈的内容主要有:郑州市“三人制”篮球的开展现状,特点以及发展的前景分析、对策建议。以此明确了研究中应该重视的问题,吸取了其中许多有价值的内容和建议。

三、结果与分析

(一) 场地设施分析

据相关资料显示,世界发达国家体育人口在 1997 年明显高于我们国家,而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我国的体育人口也以平均每年 5% 的速率增长,预计将于 2020 年赶超发达国家。^[4] 与此不适应的是,我国大众体育设施人均占有率非常低,人们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与大众体育场地设施之间的赤字逐渐扩大。

根据调查结果表 1 得知,郑州市城区共有篮球场地 223 块,其中水泥场地 80 块,占总数的35.9%,塑胶场地 135 块,占总数的 60.5%,木地板场地 8 块,占总数的 3.6%。由此可以得出,郑州市城区篮球场地主要以塑胶场地为主,水泥场地为辅。调查过程中,据相关人员介绍,塑胶场地和水泥场地相比较,水泥场地维护费用极低,木板场地维护费用极高,木板场地大多集中在学校和郑州市城区体育馆内。

表 1 郑州市城区篮球场地类别调查情况统计结果

	水泥场地	塑胶场地	木地板场地	合计
数量	80	135	8	223
百分比	35.9%	60.5%	3.6%	100.0%

根据调查结果表 2 得知,郑州市城区共有“三人制”专用篮球场地 17 块,其中水泥场地 5 块,占 29.4%,塑胶场地 12 块,占 70.6%,木地板场地没有。由此可见,郑州市“三人制”场地数量明显不足,并且专用的“三人制”木地板场地没有,这对郑州市“三人制”篮球的发展有着非常大的制约。

表 2 郑州市“三人制”篮球专用场地调查统计结果

	水泥场地	塑胶场地	木地板	合计
数量	5	12	0	17
百分比	29.4%	70.6%	0	100.0%

(二) 赛制体系及赛制分析

郑州市“三人制”篮球赛事大部分为企业组织,在郑州市各个学校或体育馆举行。郑州市“三人制”篮球赛事制度上面,根据调查结果表 3 可知,被调查的 100 名篮球爱好者中,有 62 个人认为郑州市“三人制”篮球赛事制度不完善,占总数的 62.0%,有 20 个人认为郑州市“三人制”篮球赛事制度基本完善,占总数的 20.0%,有 18 个人认为郑州市“三人制”篮球赛事制度完善,占总数的 18.0%。由此可见,郑州市“三人制”篮球赛事制度还不太完善,需要相关部门给“三人制”篮球赛事制定行之有效的赛事制度,促进郑州市“三人制”篮球赛事的发展。建立与郑州市自身实际相符的规则制度,也是促进社会体育持续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

表 3 郑州市“三人制”篮球赛事制度调查统计结果 N=100

	完善	基本完善	不完善	合计
人数	18	20	62	100
百分比	18.0%	20.0%	62.0%	100.0%

(三) 信息传播分析

根据调查结果表 4 可知,郑州市“三人制”篮球赛事传播方式有四种,分别是报纸、网络、电视、宣传单,其中通过报纸获取信息的有 8 人,占总数的 8.0%,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有 48 人,占总数的 48.0%,通过电视获取信息的有 18 人,占总数的 18.0%,通过宣传单获取信息的有 26 人,占总数的 26.0%,由此可见通过网络渠道获得比赛信息人数最多,说明了随着现代人们生活方式和环境的改变,网络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网络属于新生的信息媒介,凭借其便捷,高效以及迅速的传递方式,已经成为现代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信息媒介,其潜在的价值十分巨大,有必要在网络宣传方面加大力度;还有就是宣传单,约占总人数的 26.0%,说明宣传单也是调查范围内人们获得比赛信息的一种重要渠道,尽管因其信息传递方式相对于其他方式要繁琐,但其传递效率却十分高,有一定的推广价值;再次是电视渠道,约站总人数的 18.0%,表明在被调查范围内,电视渠道也是一种不可忽略的宣传方式,这也与近代中国人民养成的餐前饭后看新闻等长久习惯有关,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考虑这种信息传递渠道;最后是报纸,该种方式渠道仅仅占被调查人群总数的 8.0%。报纸,这一曾

经风靡近现代历史进程的信息媒介已经在人们生活中的信息获得方面,不再占有重要地位,这与网络电视等新兴信息媒介的迅速成熟和普及有关,在当代社会,这种信息传递渠道的推广应用前景不会长远。

表4 郑州市城区“三人制”篮球赛事信息传播方式统计结果 N=100

	报纸	网络	电视	宣传单	合计
人数	8	48	18	26	100
百分比	8.0%	48.0%	18.0%	26.0%	100.0%

(四) 赛事经费分析

赛事经费是郑州市“三人制”篮球发展的血脉,根据调查结果表5得知,郑州市“三人制”篮球赛事经费来源于赞助商赞助的有45人,占总数的45.0%,来源于赛事报名费的有38人,占总数的38.0%,主办方出资的有17人,占总数的17.0%。由此可见,郑州市篮球赛事经费主要来源于赞助商赞助和赛事报名费。

表5 郑州市城区“三人制”篮球赛事经费来源情况统计结果 N=100

	赞助商赞助	赛事报名费	主办方出资	合计
数量	45	38	17	100
百分比	45.0%	38.0%	17.0%	100.0%

四、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三人制”篮球赛无论从其发展趋向,还是从其普及现状,都值得继续推广;郑州市的“三人制”篮球发展趋向也符合国内的趋势,应当推广普及这种运动,无论从社会效益方面还是其他方面,都是有必要的。在郑州市推广“三人制”篮球,应着重从场地设施方面、组织领导方面、宣传赞助方面以及规则制度方面入手解决。

具体说来,在场地设施方面,既要提高“三人制”篮球场地设施的数量和质量,又要提高现有场地的使用率;在宣传赞助方面,既要加大宣传力度,改变单一的宣传方式为多元的宣传方式,又要开拓经费来源的渠道;在规则制度方面,则应根据现有实际情况,建立一系列的竞赛规则制度,推动郑州市“三人制”篮球向着社会化、竞技化和全民化发展。

(二) 建议

1. 完善场地设施

一方面,在保证资金的前提下,加大“三人制”篮球场地资源设施的建设,尤其是“三人制”篮球比赛的专用场地,同时也要加强对场地设施的管理维护,延长场地设施的使用年限。另一方面,进一步提高现有场地的使用效率,特别是人口集居地,应拓宽

开放人群,把更多的场地资源开放给更多的人。

2. 加大宣传赞助力度

利用现有新媒介(网络、手机、微博、微信等等),针对“三人制”篮球进行多渠道,多方面的宣传报道,必要时可建立“三人制”篮球赛事的报道专栏。经费方面,一是要精简领导层面的结构,清理非必须的组织部门,减少经费支出;二是要开发“三人制”篮球的市场资源,吸引更多的资金,与赞助商建立长期的稳定的合作关系,拓宽经费来源,加大校企合作等。

3. 引起领导重视

一方面,在郑州市建立行之有效的赛事组织领导机构,合理安排赛事的竞赛规程和日程,统筹管理“三人制”篮球的推广和发展,提高领导层面的业务能力和水平,建立健全郑州市“三人制”篮球赛的运行及管理模式;另一方面是建立符合郑州市实际的配套后勤保障机制,以应对推广发展“三人制”篮球中或赛事中的突发情况。

4. 建立赛制体系及赛制

建立一套完善的“三人制”篮球赛制体系,同时认真贯彻国家的体育政策法规,并与政府章程和教育制度法规结合起来,建立郑州市“三人制”篮球自己的规则制度,制订并实施统一的“三人制”篮球竞赛规则,能够使郑州市“三人制”篮球更加深入到大众和校园中去,保障“三人制”篮球的健康持续发展。

五、结束语

郑州市“三人制”篮球赛的发展受到场地、赛事制度、赛事传播方式和赛事经费几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建议在郑州市“三人制”篮球赛的发展过程中,将赛事深入到群众和学生群体中;充分利用现有的场地资源;逐渐建立健全赛事的运行和管理模式;加大新媒体对赛事和赞助商的宣传力度,拓展经费来源,加大社区、校园和企业的合作。

参考文献:

[1] 邓飞.“三人篮球赛”的发展状况及我国的现状[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1999(4):15-16.
[2] 李胜军. 论三人制篮球比赛的本质与趋向[D]. 杭州:浙江师范大学,2009(4):12-30.
[3] 周冰. 三人制篮球竞赛特征研究[D].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14(6):9-13.
[4] 初永和. 三人制篮球的兴起及其在中国高校的开展[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3):35-36.
[5] 薛海涛,樊西宁,李小妮.“三人制”篮球赛开展现状及对策研究[J].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6):27-28.

(下转第111页)

传播廉洁文化 滋养纯洁心灵

——浅谈对高校开展廉洁文化教育问题的认识

张 豪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德育教学部, 郑州 450044)

摘 要:腐朽文化的影响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反腐倡廉长效机制要在廉洁文化的倡导和传播中才能形成。高校承担着为人类文明进步、社会建设发展培养合格人才的任务,承担着优秀文化、先进文化传播的历史使命,在高校切实有效地开展廉洁文化教育是教育目的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

关键词:廉洁文化; 教育培养; 实效性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6.05.022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6)05-0102-04

习近平同志指出:“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经常抓、长期抓,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必须全党动手。”廉政建设是国之大事、党之大事、民之大事,关系到党的事业和国家、民族的兴衰。社会生活中的腐败现象之所以不灭反而不断滋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腐朽文化的存在和影响。正因为一些腐朽没落的特权思想、贪图享乐追求感官刺激的消极生活方式等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认知中还有着一定的市场,从而为腐败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只有廉洁文化得以广泛传播和继承弘扬,以廉洁文化取代那些腐朽文化,才能从根本上清理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观念。当以廉洁为荣成为公众的共同认知和人格追求,全社会形成了健康、积极、和谐、向上的良好社会风尚,就会给腐败行为造成巨大的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压力。廉洁文化的建设和传播是遏制腐败现象的源头举措,是廉政建设的长效基础。

文化具有继承性和发展性,文化在传承过程中通过对人的思想、精神、价值判断及行为规范的渗透、影响,从而激发人们的文化自觉。廉洁文化建设必须通过教育的主渠道才能得到有效的传播。高校承担着为人类文明进步、社会建设发展培养合格人才的任务,承担着优秀文化、先进文化传播的历史使

命,在高校开展廉洁文化教育是教育目的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正确把握廉洁文化的内涵,充分认识到在高校开展廉洁文化教育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性,真正重视廉洁文化教育的实效性,是高校卓有成效地开展廉洁文化教育的关键所在。

一、正确认识和把握廉洁文化及其特性

“廉洁”一词,《词源》上解释为“公正,不贪污”。东汉著名学者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注释“不受曰廉,不污曰洁”。即:不接受他人馈赠的钱物,不做有违公德之事,保证自身的品格清白。换言之,廉洁就是行端品正。^[1]

廉洁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精神现象,是人类为了维护社会的有序、健康发展而创造的有关廉洁的一切物质产品和非物质产品的总和,包括了关于廉洁的认知、观念、制度和相应的社会生活方式、公共行为规范等。廉洁文化提倡的是廉洁自律、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不谋私利、清白做人的精神。^[2]一般而言,廉洁文化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征:其一是文化主体的社会公众性。廉洁文化的形成必须建立在社会大多数成员对廉洁基本要素的认同、接受、践行的基础上,并与社会的相关制度规范相适应。其二是传承传播的学习养成性。廉洁文化的建设要求大多数社会成员通过相关知识学习和传统继

收稿日期:2016-09-07

作者简介:张豪(1962—),男,河南郑州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德育教学部副教授。

承而获得相应的能力,培养廉洁的习惯。其三是社会效果的广泛参与性。廉洁文化在社会生活中要通过社会公共组织的公道正派、诚实守信、廉洁高效和社会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爱岗敬业、遵纪守法等职业操守的模范表现得到认可和弘扬。

廉洁和廉政既有内在的联系性,又有明显的区别。廉洁是一个社会范畴,是社会公众在社会生活、社会行为中的一种道德追求和道德评价;廉政专指社会管理者的职业道德要求和行为道德评价。廉政文化的形成根植于全社会廉洁文化的培养和崇尚,也反作用于廉洁文化的发展变化。文化是人类社会的软环境、软实力,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源。廉洁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优秀组成部分,其对社会生活及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影响,往往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和一种文化的先进程度。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廉洁文化建设,就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民族文化基因出发,大力宣传、传播民族文化中的优秀廉洁传统,使之与时俱进并得到继承发展。通过倡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八荣八耻、公民道德规范为主要内容的先进的社会文化,使社会公众的思想与行为得到不断的规范和约束,把廉洁的意识用文化的方式渗透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财富观念、成功界定等认识中,使社会公众自身的抗诱惑拒腐蚀能力得到不断增强。以社会公德教育为基础、职业道德教育为重点、家庭美德教育为切入点,不断提升全社会的道德建设水平,努力营造清正廉洁、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使廉洁意识自觉转化为社会公众的思想追求和道德标准,让公正做事、清白做人成为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习惯方式,从而推动廉洁社会的全面形成和发展。

二、开展廉洁文化教育是学校教育的使命所在

韩愈《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即传播道理、教授课业和解答疑惑。这里的“传道”指的是传授、传承为人处世之道和社会道德规范,也就是现在的“思想品德教育”,强调的是“育人德为先”的教育宗旨,是社会教育的基础和核心。而“授业”指的是传授学业、技能,这里的技能是指能够使学习者适应生活、适应社会的各种技术、理论知识,当然也包括社会文化、社会规范,而不是单纯的专业能力。“解惑”是要求教师在学习者面临未知、未解事物之时,运用自身的知识、经验、技能为学生解开困顿、迷惑。传道、授业、解惑三者缺一不可,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学生。自古以来文化传承、道德培养都是教育事业的重要使命,是教育工作

的重中之重。

从古至今,诚实、守信、正义、清廉都是人类社会一切道德的基础和根本。自古以来我国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对民众和官员进行道德品质教育,用不同的方式和渠道向人们灌输“仁、义、礼、智”“忠、信、诚、勇”“勤、俭、节、廉”和“公生明、廉生威”等伦理道德观念。这种教育主要是通过三种形式进行:一是学校教育。主要内容是让学生从儒家经典中接受“敛从其薄”“平政爱民”“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处世治世的道理。二是家庭教育。往往以“家训”“告子书”等方式告诫晚辈“俭,德之兴也”,防止“居官必贿”结局发生。三是政府教育。告诫官吏“岂得苛贪财务,以害其身,付子孙怀愧耻耶”等等。

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是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是为人的一生在打基础,包括人的学习兴趣、学习做事的习惯、对社会的适应能力、独立思考和科学思维及健全的人格、健康的身体等。教育要给予学生的是科学的精神、高尚的道德、持续的耐力、发展的能力。高等教育对人的一生有着极为主要的影响,是一个人的整体和谐的发展过程,是社会化的重要阶段,也是整个社会和人类文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动力。在高校开展廉洁文化教育是一项利在当下功在千秋的种子工程,是预防腐败的根本性源头治理,对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长远意义。

(一) 青年健康成长需要廉洁文化的滋养

在高校进行廉洁文化教育,旨在使青年学生在廉洁文化氛围中受到熏陶,提高其敬廉崇洁的意识。青年身上存在多种发展的可能性,要使青年能够健康地成长,具有清白做人的追求和抵御各种腐败的定力,成为一个奉公守法、廉洁自律的好公民,就需要在其人生最重要的学习阶段进行有效的廉洁文化的教育、培养和引导,并将这种教育贯穿于学习的全过程,使廉洁的观念如细雨润物般逐渐渗透到学生的内心和思想中,让廉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处世习惯和精神需要。

人的廉洁素养需要经由后天的教育和养成而形成,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子在《墨子·所染》中说:“染之苍则苍,染之黄则黄……故染不可不慎也。”意思就是说:人生之初是没有是非倾向的,就像刚刚织成的白布,后来用什么染料去染就会成什么颜色,所以后天的教育必须要谨慎。这就给学校、家庭、社会出了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必须加强对青年进行健康文化教育,因为对青年进行什么样的教育就将决定他

们会有什么样的未来。一个人的青年时期是思想观念逐渐形成的关键阶段,优秀的品德素养教育对一个人的身心健康和终生发展至关重要,在这个阶段通过有效的教育,让公正、公平、自律、守纪、诚信、正义等廉洁的理念植根内心,将会对其一生的是非观念和行为习惯产生深远的导向性作用,进而对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起到重大而深远的影响。^[3]

(二)党的教育方针要求高校开展廉洁文化教育

党的十八大提出报告:“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高校开展廉洁文化教育是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立德树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要求的具体体现。^[4]青年正处于身心发育、思想成长的关键时期,用廉洁文化来武装头脑,用公正廉洁的意识来引导是非判断,正确引导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才能为他们的人生打好根基,防微杜渐,不让阴暗的东西占据和影响他们的心灵,增强识别真善美和假恶丑的能力,才能培养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5]

(三)应对腐朽文化的侵蚀,需要廉洁文化进校园

文化似水,滋润万物悄然无声。学校是培养人的地方,如果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不占领青少年思想阵地,那么腐朽没落的自私自利、贪图享乐、死梦醉生的腐朽文化必然去腐蚀青年灵魂。因此,对大学生进行针对性、系统性的思想品德教育和廉洁自律教育十分必要,大力推进廉洁文化进校园活动是教育机构和教育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校园廉洁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在校园里树立清正廉洁的良好风尚,为大学的健康成长营造健康纯净的“小环境”,用廉洁文化、科学精神来净化大学生的心灵,不断提高他们自觉抵制丑恶腐败的能力,只有这样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才能实现。

三、开展廉洁文化教育的实效性保证

习近平同志指出,反腐倡廉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在高校开展廉洁教育切忌为教育而强加、为贯彻而形式。要收有实效,就必须认真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成长成才规律,把廉洁文化建设贯穿于学校工作的全方面,使廉洁文化教育在教育管理、课堂教学、社会实践、校园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实现有机融入。

大学生廉洁意识的培养,是一种关乎人文的教育,旨在对学生进行促使其人生境界提升、理想人格塑造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教育。其实质是以人为本的本源性教育,核心是涵养人文精神,以美的追求、善的向往激活人们内心廉洁的欲望,让每个学生从青年时期就以廉为荣、以贪为耻。这种精神的养成需要通过多种途径并行,突出正面引导,包括广博文化知识的滋养、高雅文化氛围的陶冶、优秀传统文化的熏染传承以及人生实践体验等。

在廉洁文化教育中,正确内容的确定和有效方法与途径的选择是教育收有实效的关键。在教育的内容上,六个方面的教育要同时进行不可偏废,即:道德传统的熏陶继承,社会公德的学习培养,法律意识的确立实践,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正确审美意识的引导和科学崇高理想的确立。

在教育的方法与途径上,一是要注重发挥学校已有的思想品德及政治理论课程的主渠道教育功能,同时要努力发掘发挥其他学科中蕴涵的廉洁文化的思想资源和教育功能。二是要充分发挥师德师风建设在廉洁教育中的引导作用,通过“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师德师风建设,发挥教师“行为世范”的楷模影响。三是要重视学生组织在学生群体中的影响力,通过有效管理和正确引导,充分发挥其在廉洁文化教育中的辅助作用;要注重廉洁文化与校园文化建设的有效结合,广泛搭建廉洁文化平台,大力宣传学生身边好人好事,大力宣传廉洁从政的杰出校友、优秀人物,感动中国的时代英雄,为学生营造廉洁、纯净的学习、生活、成长的良好环境。四是学校廉洁文化教育要与挖掘现有学科资源有机结合,廉洁教育不单单是某一门课或某一些人的事,要各科参与、全员参与。要认真抓好新生入学教育及思想政治课等重点环节,对学生进行全程廉洁教育。

在开展廉洁文化教育实效性的保障上,有四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注意:

一是注意廉洁教育内容的针对性。对广大学生的廉洁文化教育,必须按照学校教学规律的要求和学生不同年龄、不同年级的特点,因势利导,循序渐进,针对学校不同专业不同学科教学规律,适当融入廉洁文化内容,同时与思想道德教育、学生养成教育、素质教育紧密结合,重点培养学生诚信守法、正直自律等良好的道德意识。

二是注意廉洁教育对象的多层性。学校有党组织、行政领导、教师和学生,根据这一特点,廉洁文化进校园,就应该区分层次,分别对待。对于学校党组织和各级领导班子的教育主题是突出树立廉政自律

意识,带动廉洁校园的风尚建设,营造良好的校风;对于教师的教育主题应侧重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养成严谨治学廉洁从教的教风;对于广大学生,应遵循学生的成长规律,从公德培养、习惯养成和审美提升等方面入手,使全体学生逐步养成良好的学风。

三是注意廉洁教育的普适性。廉洁文化进课堂、进课本,除按不同年龄、不同学段的学生进行不同内容的廉洁文化教育外,还应注意教育方法,切忌灌输性授课方式,切忌把某些廉政文化内容或章节硬塞进课程的教学,向学生生搬硬套地讲述。这样的教育,不仅不能让学生通过廉洁文化教育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还使学生对廉政建设文化教育产生厌恶感。心理学告诉我们:事物本身对主体的价值或兴趣的体现,是引发人们关注的原因和关键。换言之,就是说这件事对你有没有用?会不会让你感兴趣?这是引起一个人对某件事情重视程度的诱因。因此,一定要将廉洁文化生活化、趣味化、自然化,寓教于乐,在学生中起到春雨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四是注意教育的社会效应。学校不是世外桃源,学校是现实社会的组成部分,虽然学校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学生接受的教育不仅来源于学校,学校、社会、家庭都会对学生的成长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大千世界的方方面面都在学生中有不同的反映。高校开展廉洁文化教育,在充分发挥学校的主渠道

作用的同时,要广泛开展廉洁教育的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响应社会反腐倡廉和廉洁社会建设的各种举措、号召和宣传,把校园的廉洁文化教育和建设与整个社会的敬廉崇德活动融为一体,让学生自己去感知真、善、美,以提高学生的识别能力。

四、结语

好的开始,意味着成功的可能;初始的缺失,导致未来的缺憾。大学生正处于人生成长成才的重要阶段,他们决定着国家、社会的未来,高等教育不应让青年学生的人生起步出现品行缺陷,在高校开展廉洁文化教育是高等教育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伟大的使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 于广琮,朱林.论“微时代”视域下大学生廉洁文化教育的载体构建[J].江苏高教,2016(1):123-125.
[2] 诸毅超.“中国梦”视角下高校廉洁教育浅析[J].统计与管理,2014(6):92-93.
[3] 彭蓉.廉洁教育进校园的必要性[N].湖北日报,2010-10-14(13).
[4] 王雅蓉,党同.地方师范院校党校教育与师德教育的结合[J].文学教育,2016(9):138-138.
[5] 车宗哲.关于廉政文化进校园的思考和对策[J].中国成人教育,2009(20):42-43.

(责任编辑 姚虹)

Spreading the Honest Culture, Nourishing the Pure Heart

——Discussing the Honest Culture Education in Higher Institutes

ZHANG Hao

(Department of Moral Education,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decadent culture is the important reason which causes the spreading of corruption phenomenon, and the long-term anti-corruption mechanism may be formed in advocating and spreading the probity cultur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take the task of cultivating qualified talents for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task of spreading the outstanding and advanced culture. To carry out the incorruptible culture education practically and effectivel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to realize the education purpose.

Key words: incorruptible culture; education training; effectiveness

我国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改革研究

宋 平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社科办, 郑州 450044)

摘 要:人文素质教育的成效决定着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的质量。本文从人文精神、人文能力、人文知识三个方面探讨了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内涵和重要价值,并从六个方面阐述了目前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基本情况与存在的问题。结合高职院校教学实际,从更新教育观念,树立人文理念;构建组织机构,实现科学管理;强化队伍建设,营造教研氛围;创新思维模式,构建课程体系;改革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效果;变革考评方式,优化考核体系等六个方面探讨了改革创新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主要路径。

关键词:高职院校;人文教育;课程体系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6.05.023

中图分类号:G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6)05-0106-06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的变革无时不与国家发展战略及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紧密相连,特别是为生产一线培养应用技术人才的高职院校,已从追求规模效益向强化内涵建设转变,内涵建设的主要标志是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和毕业生为社会所认可,而毕业生被社会所承认的重要因素则取决于其人文素质的高低。因此,人文素质教育既关乎着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也是高职院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一、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内涵

人文一词来自《易经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人文”即“教化”。人文一词“一是‘人’,一是‘文’;一是关于理想的‘人’,理想的‘人性’的观念;一是为了培养这种理想的人(性)所设置的学科和课程”^[1]。高等教育界的大部分学者对高职人文素质教育内涵的诠释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一是人文素质教育由人文精神培植、人文能力培养、人文知识传授三个重要部分组成,且以知识传授为基础,以精神培植、能力培养为目标;二是人文素质教育知识包括人文精神、人文能力和人文

知识。人文精神是指人类社会的漫长历史发展中凝聚文明精华而形成的精神体系,包括价值观、行为方式、思维习惯、责任感、使命感及自我认知等。人文能力指个体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能力,包括适应与体验能力、学习与交往能力、判断与审美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等。人文知识主要指个体在培植人文精神和培养人文能力中所必须的基本知识,包含文、史、哲、艺等人文学科知识;三是人文素质教育的主旨是教师将人类优秀文化成果通过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精神培植等方式促使受教育者内化为自身相对稳定的人格、气质、修养。可见,人文素质教育的本质就是对大学生进行健全精神、提升素质、强化能力、优化品质的综合培养,目的是实现学生素质的提升和智慧的达成。^[2]

从教育的实际效果看,人文素质教育对大学生道德人格的形成、文化品质的修炼、思维能力的培养、审美趣味的提升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高职院校对大学生开展人文素质教育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必须按照高级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在专业教育中体现人文精神的内涵,在

收稿日期:2016-06-15

基金项目:2015年度中原文化建设科技创新团队建设项目(HUAHE2015012)

作者简介:宋平(1966—),男,河南邓州人,硕士,河南牧业经济学院社科办副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人文素质教育中渗透进崇尚科学、富于创新、以技立业的追求,不断促进两者有机结合。通过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使毕业生既会做人,又能做事。实现以人文品质“乐业”、以综合素质“拓业”,以人文精神“成业”的培养目标。

二、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教学现状

近年来,人文素质教育在高职院校开展的风生水起,大多高校都开设了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经典导读、职业素养与企业文化、人文素质专题、职场语言艺术、文学与艺术欣赏等人文素质类相关课程,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但在教育过程中还存在诸多显性或隐性问题,特别是学科系统的管理制度缺乏、专业教师 and 校本教材缺失、教学研究和教辅工作还不到位、人文素质教育没能与学校的整体教育融为一体等,这使得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很难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1. 重视人文不够,师生认识错位

一是部分高职院校受传统课程理念的惯性影响,把人文素质教育当做面子工程,过分注重专门知识的传授和专业技能的训练。重技能、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现象依然存在。过多强调专业特色,在总体学时框架内,加大专业技能课程比重,占压了少之又少的人文课程,使人文类课程在培养计划中所占比例甚小,侧重人文知识传授,忽略人文素养的培植。有一部分高职院校除了国家规定的思想政治教育、英语、体育等公共必修课之外,很少开设其他公共选修课。特别是在我国理工科类、农林类及一些民办高职院校的人文素质教育课与国外同类院校专业相比,课时过少问题更加突出。另外,在专业教育中固有的人文教育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开发与利用,大多停留在单纯的专业知识教育,或专业教育中伴随形式化的人文教育。^[3]

二是师生认识错位。不少教师认为人文素质教育只是少数人文类课程教师和学生管理部门的事,专业教师教好专业课就足够了,对人文素质教育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态度。大学生则对人文素质教育重要性认识不清,对人文素质教育目的模糊,不少学生从功利性动机出发,把人文素质教育划归到“第三课堂”,造成随意性选课,进而出现到课率低,授课效果差,极大地影响了学习兴趣及求知、向善的主动性。

2. 组织机构缺乏,教育倾向行业

目前,大多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由教务、学生、就业、宣传、思政等多个部门参与管理,缺乏专门

的组织机构,教学文件缺失,授课计划简单笼统;教师无参考,学生无课本,授课内容和方式单调,文学艺术教育类课程在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中占较大的比重,有些高职院校的公选课甚至只有文学艺术教育类课程,其连续性和衔接性不够,人文素质教育的教学管理依然处于孤立、散乱、无组织状态;有的高职院校所开设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受其发展定位和人才培养方向的制约,倾向于培养的是某行业的人才,就开设相关方面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使得人文素质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出现行业化和专业化倾向。

3. 师资力量薄弱,适用教材缺乏

师资和教材是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不少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多就现有教师的专长、能力,简单开设课程,显得随意而零乱。特别是理工类院校主要由校内兼职教师和外聘教师授课,不利于教学管理和质量监控,更缺乏教学团队和课程建设的连续性。同时,由于国家没有统一的人文素质教育教材,高职院校本身又缺乏与其人才培养定位相吻合的、能满足就业岗位和学生未来发展所需的校本教材,所授课程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致使不少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与行业对人才的素质要求错位。有的虽设置了大量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购置了大量的书籍,投入了大量的资源,由于缺乏专业化的师资力量,使得人文素质教育仍旧不能达到理想效果,整体上影响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实效性,更制约着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提升和发展。

4. 课程设置无序,“四化”倾向明显

不少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缺乏整体安排和精心设计,普遍存在粗糙单一现象,课程中的“四化”倾向严重。一是课程目标的“功利化”。过分强调人文类课程的工具性和实用性,忽视其深刻的文化性、思想性和审美性,没有从大学生的终身发展需要和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定位课程目标,大多倾向于学生求职需要,侧重传授功利性实用性的谋生方法、手段和技巧,弱化人文素质培育。二是课程内容的“随意化”。部分高职院校开设的人文素质课程不是取决于教育规律和受教育者的需求,而是取决于教师的好恶,“因师定课”现象突出,课程设置缺乏系统性,据笔者对河南部分高职院校的调查得知,这些学校所开设的人文素质教育课在名称、内容、学时等方面差距较大,即使同类院校在授课、管理、考核等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三是课程实施的“形式

化”。对人文素质教育多停留在口号上,专业技能教育仍占绝对优势。把人文素质课程看成是专业之外的、次要的,甚至可有可无的课程,认为是在主课以外扩大一点学生的兴趣和知识面的副课,实际上是在所谓专业观念的前提下给学生加一些能力培养。这就导致高职院校应用型人才人文素质教育的基础地位并没有得到落实,人文素质教育没有起到优化学生知识架构、改善学生智能结构、提高学生基本素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目的。因此,在实际运行中常常满足于开设几门课,举办几次讲座,开展几次活动等等。四是课程评价的“简单化”。大多高职院校对学生人文素质的评价目标集中在显性课程、知识层面的掌握及传统的分数多少上,没有将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隐性课程纳入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使之游离于学校正规教育内容之外,不能凸显高职教育的特色,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所起的作用甚微,甚至无法支撑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4]

5. 内容缺乏整合,课程交叉重叠

人文素质教育课程通常包含“显性”和“隐性”两类课程。“显性”课程又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而“隐性”课程主要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学术讲座、名著导读、音乐欣赏、社会实践、校园文化等,对学生人文素养的熏陶和培养具有潜在作用。随着高职院校对人文素质教育的逐步重视,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在个别高职院校的也出现急剧增多的现象。诸如音乐欣赏、诗文诵读、电影欣赏、艺术鉴赏等急切走进课堂。内容各异的专家讲座、课外活动、企业调研等隐性课程大量涌入学生的生活。这些内容丰富的课程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学生综合素质,但关键是这些隐性课程与显性课程既有交叉重叠,又存在各自为政、单打独斗、不能互补的现象,整体上缺乏科学性整合;而显性课程与专业课程之间又相互脱离、没有联系,人文精神的培养没有渗透进专业教育内容等。另外,不同院系在专业教学计划中根据自己的认识选定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缺乏统一的人文素质教育基本课程内容,致使教学执行部门难以统一布置落实相关课程。这种缺乏论证和“撒网式”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5]

6. 教育实效不强,考核亟待改变

不少院校把人文素质教育变为人文知识灌输,忽略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的培植。学究化倾向严

重。他们在批评知识灌输的同时,又在极力灌输所谓人文知识,即注重汉语、文学、艺术、历史的系统知识和专门理论,把素质教育变成专业教育或应试教育,使学生以死记硬背、生搬硬套的方法去应付人文类课程的考试。不少大学生受“专业技能是生存之本”观念的影响,放弃人文类课程的选修,使其授课效果差,实效性减弱。多种因素的作用导致近几年的高职毕业生不同程度存在着知识结构单一、智能结构不完善、整体素质不高等问题。集中表现为:人文知识缺乏,言行偏激,责任意识不强,敬业精神不够,诚信意识、奉献精神、吃苦精神与现实社会的要求相去甚远,社会适应能力和抗挫能力一降再降。

对人文素质教育课进行务实有效的考核和评价是促进课程优化、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动力。目前高职院校对人文素质教育课程评价大都存在“两重两轻”现象:一是重“显性”轻“隐性”。习惯于用能够量化的分数和组织活动的次数来评价课程的效果,淡化了学生日常素质表现和能力提升等不能量化的“隐性”内容;二是重“校内”轻“校外”。人的素质形成与发展主要靠后天的培养,既有自然环境的熏陶、文化环境的影响,也需要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内化和体验,更需要时间来感悟和积淀,所以对其素质的评价也不能是阶段式的,应该是长期的。大多高校对学生人文素质评价都是针对课程进行考核,而如何记录学生的人文品行、弘扬正气、褒奖高素质学生则缺乏系统的设计与思考。

三、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改革路径探讨

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黄炎培先生曾提出,职业教育改革的核心是沟通教育与职业,建立适应经济社会需求的教育体系。在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下,社会和用人单位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如何根据社会需要,发挥人文素质教育在学生培养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既是高职院校管理者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更是授课教师必须解决的关键内容。因此,高职院校必须科学设置课程体系,构建具有高职特色的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相结合、专业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统一、人文知识与人文精神相协调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有效促进大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三者同步提升。

1. 更新教育观念,树立人文理念

人文素质是人全面发展重要的基础性素质。爱因斯坦曾说:“仅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学生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不

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产生热诚的感情,那是最根本的,学生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鲜明的辨别力。”^[6]现代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培养“创造性思维”人才,而人文素质教育的目标是与其相一致的。人文是科学创造的动力之源,是科学态度的试金石,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则是人文素质教育的核心。因此,人文类教师必须充分认识到人文素质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改变传统课程理念,站稳人文素质教育的基础地位;高职院校管理者要尽快实现由培养“技术劳动者”向“技术人文者”的目标转变,树立大人文的教育理念,以育人为中心,做好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改革工作,调动教学、管理、教辅等部门全方位参与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在各个教育环节渗透人文素质教育,重视对学生价值观念、能力水平、道德人格、精神状态、思维方式、抗挫抗压的培养教育,努力打造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2. 设立专门机构,实现科学管理

高职院校要尽快修订完善教师、干部、学籍等相关管理制度,建立完备、规范、有效的制度体系,克服人文素质教育中多头、多部门管理的散乱局面,成立直属学校领导的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心,统筹规划全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师资队伍、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改研究、课程实施等,做好与教务、团学、思政、心理等部门的沟通协调,结合学校和专业特色,制定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实施方案,有选择地对人文知识进行充实、编排与整合,编撰学生易于接受的校本教材。在课程实施上,既要重视人文认知,又要关注人文实践,陶冶学生的情操,提高学生道德感、民族感、审美感等高级情感水平,使学生在自然美和人性美中深化自身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处理好“知道”与“体道”的关系,主动追求科学的探索、体验和创造的乐趣,做到知行统一,实现人文素质教育教学的科学化、规范化管理。

3. 强化队伍建设,营造教研氛围

教师自身人文素质状况,直接影响着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效果。而通识性的人文素质教育是高职院校的必然选择,这种教育方式要求教师既要有精深的专业知识和高超的实践技能,更要对科学与人文有统一认识,达到文理融通。因此,高职院校在确保一定数量的专职人文素质教育课程负责人和骨干教师的基础上,注重挖掘整合校内教育教学资源,调动具有通识能力的社科类教师参与人文素质

教育;要采取优胜劣汰的办法完善选课制度,鼓励教师知难而上,勇于创新,加大开设选修课的数量,培养人文素质核心课程的教学团队,重视核心课程教师的梯队建设,以倾斜政策不断为其提供人文素质教育知识更新平台,鼓励他们钻研教学,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提供外出进修和学术考察的机会,促进教师业务能力的不断提高。另外,人文素质课教师应自觉提升修养,强化人文素质,发扬创新精神,研究学生,研究教学,推动人文素质教学体系建设,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使学生领悟到人文教育的内涵,避免教育教学中出现科学与人文疏离以及教育工具化的倾向。^[7]

4. 创新思维模式,构建课程体系

高职院校要在充分研究高技能应用型人才人文素质教育特点的基础上,克服重技能、轻人文,重智育、轻素质的倾向,从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结合当地社会发展的需要,探索开设有助于提升学生就业技能,具有明显以地域特色文化为载体的高职人文素质课程,以模块化课程为基础,构建起高职院校、授课教师、学生学习、用人单位“四统一”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以科学的教学运行模式,不断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养,使其形成独立的人格、健全的心理,养成良好职业道德,激发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发展潜能。

一是顶层设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学校层面要建立科学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做到人文教育课程与专业课程相融通、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相匹配,突出思想政治类课程的人文素质教育功能,使各课程之间既能发挥独自的作用,又不重叠交叉,兼具化合作用,形成有机整体,加强大学生情感、心态、交往、处事等非智力素质的有效提升。^[8]

二是构筑人文素质教育教学资源平台。可以根据精品资源课的建设标准,重点建设具有校本特色的网络核心课程。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从课程介绍、学术研究、教师队伍、教学大纲、参考资料、网络课件、指定教材、学习方法、作业习题、课程特色等方面,将教材建设、教学模式和教学资源统一起来,形成质量高、实用性强的数字化教学资源,^[9]使学生、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能方便、及时、准确地获取所需信息。同时,也可以借助自身的资源与其他高校的优势资源进行交换,互通有无,相互补充,或共同建设、开发优质课程资源,构筑人文素质教育教学资源共享平台。^[10]

三是与用人单位联合构建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根据用人单位对高职院校毕业生专业素质和人文综合能力的要求,科学设置专业课与人文素质课程的比例与授课时序,吸纳企业管理人员到校开展人文素质课程专题讲授,有针对性的为学生传授提升人文素质的有效方法。

5. 改革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效果

雅斯贝尔斯曾说:“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素质课教育的本质在于其人文性,因此,人文素质课程的实质是精神性、智慧性教育,绝不是单纯人文知识的灌输与记忆。达不到精神层面的人文素质教育,是不完全的人文素质教育。^[11]高职院校要以精神层次的人文素质教育为目标,打破传统的“规训”式教学方法,超越照本宣科、空谈道理式的教育,通过教学设计、教案编写、教学模式改革等,不断改进教学过程,注重“人心”教育,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引导,从主观和客观上提高学生学习人文素质课程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人文素质教育实效性。

一是突出学生主体地位,摒弃大课堂“满堂灌”的教学方式。教师要引导学生参与教学,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指导学生拓展课外阅读面,开阔知识视野;划分出学习小组,主动运用启发、讨论、互动、情景、案例、行为导向等教学模式。

二是积极应用实践性教学方法。重视校园文化、社会实践对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作用,组织学生通过参加寒暑假各类形式活泼的社会实践活动感受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引导学生主动找到困惑问题的原因及解决办法,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指导学生学会做事。

三是注重专业和职业课程教学中人文价值的渗透。人文与科学的分裂会导致人格的分裂,人文与专业的割裂会导致文化的分裂,人文与职业发展的裂痕会导致文化的枯萎。因此,人文素质教育要突破学科的界限,认真发掘专业技术课以及职业教育课本身蕴含的丰厚人文价值,以渗透的方式融进专业和职业教育之中,以人文的精神传递专业的技术,以人文的素养映射职业的发展,潜移默化地推进学生人文品质的发展。^[12]

6. 变革考评方式,优化考核体系

高职院校要创新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科学评价方法,形成“内外兼顾”的多元化考核机制,不断提升人文素质课程的教学效果。

一是实施大学生素质教育认证制度。科学评价是人文素质教育中最核心的部分,高职院校所成立的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心可以通过素质档案建设,记录学生素质发展的进程,认证学生人文素质等级,与学生组织发展、评优评先、困补助等挂钩,调动大学生主动提高人文素质的积极性。

二是校内与校外评价有机结合。以“日常性考核+论文”的方式评价学生人文素质,以各学期学生自身人文素质变化控制为主、论文成绩控制为辅,注重学生的日常行为考核,将学生参加的社团和文体活动、艺术竞赛、人文社科竞赛、志愿者活动、社会实践等所取得的成绩和表现引入人文素质评价体系,通过访谈记录、跟踪调查、社会认可等方式对学生的校外表现进行评定,构建行为与素养齐观、能力与价值并重的科学考核体系。

总之,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改革与创新是高职教育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需要学校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不断的继承、发展和完善。我们要抓住机遇,有效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在人文素质教育中的影响力,构建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通过情感熏陶、意志磨练、内化品德、外化行为,努力培养社会急需的既有丰富科学知识、又有深厚人文素养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参考文献:

- [1] 吴国盛. 科学与人文[J]. 中国社会科学, 2004(4): 4.
- [2] 钟荣跃. 高职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构建探析[J]. 考试周刊, 2010(16): 207.
- [3] 贲礼进. 论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改革[J]. 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2(9): 99-100.
- [4] 李明高. 理工科高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J].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3): 406-409.
- [5] 徐胤莉, 石燕萍. 理工类高职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的思路[J]. 教育与职业, 2008(6): 71-72.
- [6]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M]. 许良英, 赵中立, 张宣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310.
- [7] 周榜师, 尤艺金. 试论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J].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1(6): 86.
- [8] 韩秀婷. 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 职教论坛, 2014(11): 36-38.
- [9] 李向明. 高职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化的探索与实践[J].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7): 2-4.
- [10] 熊春林, 黄正泉, 熊亮. 高等农业院校应用型人才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改革[J]. 安徽农业科学, 2009(34):

Research on the Reform of Curriculum System of Humanistic Quality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China

SONG Ping

(Social Science Office, Henan University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Econom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The effectiveness of humanistic quality education directly determines the quality of graduate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connotation and important value of humanistic quality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discussed from three aspects: humanistic spirit, humanistic ability and humanistic knowledge. Meanwhile, the basic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humanistic quality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expounded from six aspects. Finally, combining with the teaching practic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main paths of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humanities quality education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discussed from six aspects: renewing the education idea and establishing the humanistic idea, constructing the organization and realizing the scientific management, strengthening the team construction and creating the teaching atmosphere, innovating the thinking mode and construct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reform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improving teaching effect, and changing the evaluation methods and optimizing the assessment system.

Key words: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umanities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上接第 101 页)

[6]吴碧红,吴少腾. 三人篮球赛在我国的开展状况及其特点和作用[J].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0(2):28 - 29.

[7]余学凯. 三人制篮球运动发展研究[J]. 科技资讯, 2014: 251 - 252.

[8]刘琪. 三人制篮球的特点、价值及其在高校中的推广[J].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2014(4):18 - 19.

[9]李长清. 浅析三人制篮球运动的健身价值[J]. 四川体育科学, 2007(3):158 - 159.

[10]苏链. 南昌市高校三人制篮球运动的传播与发展对策研究[D]. 南昌:江西师范大学, 2009(5):2 - 11.

(责任编辑 赵冰)

Development Statu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ree Persons” Basketball Game in Zhengzhou City

MAO Yong - ming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the tendency of “three persons” basketball match in Zhengzhou city are analyzed by means of literature,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there are serious deficiencies in the number of basketball venues; modification of the existing game system is needed; the old propaganda form of newspaper is gradually replaced by the form of network and leaflet; the match is funded by the sponsor and the registration fee. Thus,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hat we should gradually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mode of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enhance the publicity of the match and the sponsor, expand funding sources, increase cooperation between community, campus and enterprise, and organize the match among the mass and the students.

Key words:“three persons” basketball match; development status; Zhengzhou city

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向延平^a, 陈友莲^b

(湖南女子学院 a. 旅游系; b. 图书馆, 长沙 410004)

摘要:在建立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体系基础上,对湖南省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湖南省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值为3.6606,说明湖南省教育精准扶贫绩效显著,建议湖南省应继续深入开展教育精准扶贫,促进湖南省教育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精准扶贫;教育精准扶贫;精准识别;绩效评价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6.05.024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6)05-0112-03

一、问题的提出

2014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精准扶贫机制,做到科学扶贫。李克强总理2014年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创新扶贫开发方式。地方要优化整合扶贫资源,实行精准扶贫,确保扶贫到村到户”;2015年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持续打好扶贫攻坚战,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精准扶贫成为现阶段我国农村扶贫机制“升级版”和新时期农村扶贫重要决策与扶贫创新方式。精准扶贫重点是实现教育精准扶贫。教育精准扶贫既是教育改革的机制创新,也是扶贫开发的机制创新。什么是教育精准扶贫、如何做到教育精准扶贫、怎样评价教育精准扶贫、如何保障教育精准扶贫等成为政府教育部门和学术界值得深入研究的热点问题和重要课题。

教育扶贫是扶贫的重要内容,教育精准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中之重,教育精准扶贫是教育扶贫的“升级版”,教育精准扶贫需要比较完善科学的理

论、方法、评价和保障体系支持,教育精准扶贫评价体系构建及其实证成为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二、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体系研究

教育精准扶贫既要问“耕耘”,又要问“收获”,关键是教育扶贫效益真正落实到教育扶贫对象,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是对教育精准扶贫效果进行评价,需建立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体系,确保教育扶贫成效,真正做到教育真扶贫和扶真贫。

1. 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我们采用Delphi法、层次分析法(AHP)筛选、确定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指标,并赋予权重,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第一层即目标层是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第二层即准则层,从学生教育(X_1)、师资教育(X_2)、继续教育(X_3)、教育条件(X_4)、个人能力(X_5)、社会能力(X_6)等6个方面综合评价教育精准扶贫绩效。第三层即指标层,包括入学率(X_{11})、教育层次(X_{12})等21个具体的定性和定量评价指标。

收稿日期:2016-06-11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湖南省教育精准扶贫研究”(XJK015AJG002);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我国农村精准扶贫研究:以湘西州为例”(14YBX016)

作者简介:向延平(1973—),男,苗族,湖南绥宁人,博士,湖南女子学院旅游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表 1 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	代码	指标名称	权重	代码	指标名称	层内权重	相对权重
教育精准扶贫绩效	X ₁	学生教育	0.2801	X ₁₁	入学率	0.2518	0.0706
				X ₁₂	教育层次	0.2493	0.0698
				X ₁₃	教育时间	0.2482	0.0695
				X ₁₄	教育经费	0.2507	0.0702
	X ₂	师资教育	0.1425	X ₂₁	教育人数	0.247	0.0352
				X ₂₂	教育经费	0.2412	0.0344
				X ₂₃	教育次数	0.2485	0.0354
				X ₂₄	教育时间	0.2633	0.0375
	X ₃	继续教育	0.1327	X ₃₁	教育人数	0.2466	0.0327
				X ₃₂	教育经费	0.2448	0.0325
				X ₃₃	教育次数	0.2481	0.0329
				X ₃₄	教育时间	0.2605	0.0346
	X ₄	教育条件	0.1348	X ₄₁	教学设施	0.3622	0.0488
				X ₄₂	师资力量	0.3305	0.0446
				X ₄₃	图书资料	0.3073	0.0414
	X ₅	个人能力	0.2036	X ₅₁	思想观念	0.2435	0.0496
				X ₅₂	就业能力	0.2546	0.0518
				X ₅₃	创收能力	0.2568	0.0523
				X ₅₄	生活能力	0.2451	0.0499
	X ₆	社会能力	0.1063	X ₆₁	社会发展	0.5027	0.0534
				X ₆₂	社会安定	0.4973	0.0529

2. 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方法的建立

我们可采用综合加权方法计算教育精准扶贫绩效,其公式为:

$$I_j = \sum_{i=1}^n W_i F_i \tag{1}$$

其中: I_j 为上一层次评价指标分值; n 为下一层次的评价指标数; W_i 为各评价指标对上一层次指标相对权重; F_i 为各评价指标得分值。

三、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实证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1. 问卷设计

结合本文研究要求,我们于 2016 年 1 月设计完成了调查问卷。在问卷调查过程中,要求被调查者根据教育扶贫特征,对湖南省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指标属性作出分析评价,主要采用李斯特评分方法,对每个评价指标优劣程度赋予 0—4 分区间的量分,0 表示该评价指标没有绩效,随着分值的提高,表明该评价指标绩效越大,4 表示该评价指标绩效最大,即评价指标绩效最大 = 4、绩效大 = 3、绩效

中 = 2、绩效小 = 1、无绩效 = 0 等五个等级。

2. 问卷调查

2016 年 2 月 1—20 日,在湖南省内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在调查样本选择时,首先,对湖南省教育精准扶贫基本情况要有一定的了解;其次,样本在湖南省贫困县(市区)要有所分布;第三,政府机构、贫困家庭、贫困学生、教师等样本均要有所选取。我们共发放 2000 份问卷,现场回收,最终收回 2000 份调查问卷。

3. 问卷整理与分析

通过对问卷整理和数据分析,共得到有效问卷 1984 份,有效率为 99.2%,其样本分布在湖南省贫困县(市、区),分别涉及政府机构、贫困家庭、贫困学生和教师,从而分别计算湖南省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指标得分均值(见表 2)。

表 2 湖南省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指标评分值

一级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	代码	指标名称	权重	代码	指标名称	层内权重	相对权重 分值
教育精准扶贫绩效	X ₁	学生教育	0.2801	X ₁₁	入学率	0.2518	0.0706 3.66
				X ₁₂	教育层次	0.2493	0.0698 3.62
				X ₁₃	教育时间	0.2482	0.0695 3.52
				X ₁₄	教育经费	0.2507	0.0702 3.50
	X ₂	师资教育	0.1425	X ₂₁	教育人数	0.247	0.0352 3.71
				X ₂₂	教育经费	0.2412	0.0344 3.65
				X ₂₃	教育次数	0.2485	0.0354 3.38
				X ₂₄	教育时间	0.2633	0.0375 3.46
	X ₃	继续教育	0.1327	X ₃₁	教育人数	0.2466	0.0327 3.54
				X ₃₂	教育经费	0.2448	0.0325 3.72
				X ₃₃	教育次数	0.2481	0.0329 3.64
				X ₃₄	教育时间	0.2605	0.0346 3.72
	X ₄	教育条件	0.1348	X ₄₁	教学设施	0.3622	0.0488 3.86
				X ₄₂	师资力量	0.3305	0.0446 3.61
				X ₄₃	图书资料	0.3073	0.0414 3.63
	X ₅	个人能力	0.2036	X ₅₁	思想观念	0.2435	0.0496 3.71
				X ₅₂	就业能力	0.2546	0.0518 3.85
				X ₅₃	创收能力	0.2568	0.0523 3.90
				X ₅₄	生活能力	0.2451	0.0499 3.60
	X ₆	社会能力	0.1063	X ₆₁	社会发展	0.5027	0.0534 3.84
				X ₆₂	社会安定	0.4973	0.0529 3.72

4. 湖南省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

根据公式(1)我们计算得出湖南省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二级指标得分(见表 3)。

表3 湖南省教育精准扶贫绩效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学生教育	3.5751	教育条件	3.7067
师资教育	3.5477	个人能力	3.7675
继续教育	3.6558	社会能力	3.7803

根据公式(1)和表3数据我们计算得出湖南省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值为3.6606。评价结果表明,湖南省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价值较高,说明在湖南省教育精准扶贫中,已经取得了明显绩效。

四、结论和建议

通过研究,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指标包括学生教育(X_1)、师资教育(X_2)、继续教育(X_3)、教育条件(X_4)、个人能力(X_5)、社会能力(X_6)等6个二级指标,同时包括入学率(X_{11})、教育层次(X_{12})等21个定性和定量三级指标;采用综合加权方法计算教育精准扶贫绩效。

在此基础上,以湖南省为例运用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体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湖南省在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值为3.6606,说明湖南省教育精准扶贫取得了明显效果,绩效较显著,建议

湖南省应继续深入开展教育精准扶贫,促进湖南省教育可持续发展。其中,学生教育指标评价值为3.5751,师资教育指标评价值为3.5477,继续教育指标评价值为3.6558,说明湖南省在以后教育精准扶贫时应更加关注学生教育和继续教育精准扶贫,同时注重加强贫困地区师资培训,提高师资教育精准扶贫;教育条件指标评价值为3.7067,个人能力指标评价值为3.7675,社会能力指标评价值为3.7803,说明湖南省教育精准扶贫要关注贫困地区学校建设,提升教育扶贫对象和当地社会发展能力。

参考文献:

[1]林乘东.教育扶贫论[J].民族研究,1997(3):43-52.
[2]何家理,查芳,陈绪教.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扶贫效果实证分析:基于陕西7地市18个贫困县教育扶贫效果调查[J].唐都学刊,2015(3):125-128.

(责任编辑 刘成贺)

Research on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he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for Education: A Case of Hunan Province

XIANG Yan - ping^a, CHEN You - lian^b

(a. Department of Tourism; b. The Library, Hunan Women's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ystem of the indexes and methods of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he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for education,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he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for education in Hunan province is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value of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he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for education in Hunan province is 3.6589, which shows that the effect is significant. So, the plan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Hunan province should be carried out continuously.

Key words: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for education; precision recogniti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和谐视阈下高校礼仪教育提高国民素养的路径研究

程 燕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文化与传播学院, 郑州 450044)

摘 要:基于对当代大学生礼仪素养缺失现象的观察和思考,文章指出加强高校礼仪教育有利于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水平,实现其身心和谐,有利于促进校园及社会良好风尚的形成,进而提高国民素养。当前礼仪教育应从增设礼仪课程、开展校园礼仪活动、强化礼仪师资培训等途径入手,以期达到通过高校礼仪教育提高国民素养之目的。

关键词:国民素养;高校;礼仪教育;路径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6.05.025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6)05-0115-06

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礼”既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也是修身的重要体现,更能折射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道德风尚和文明程度,礼仪修养应成为每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社会是否文明进步,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思想道德素质。然而,目前整体国民素养现状并不乐观,尤其是大学生这一群体的礼仪修养更是令人堪忧。大学生作为青年中较为优秀的一个群体,是未来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举止文明,言行得体,知书识礼,是大学生应具备的基本素养,加强高校礼仪教育对于提高我国国民素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大学生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后备,将会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其整体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发展情况,决定着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的实现与否,故提高大学生的整体素质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必要性。

一、国民素养现状及原因分析

近些年来,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经济建设发展态势喜人,然而国人的礼仪修养缺失状况却屡屡见

诸报端,呈现出与经济建设不符的一面,并为世人所诟病。美国首位华裔市长、医学博士黄锦波在中国演讲之旅中,曾直言不讳地抨击中国的国民素质不高。他说很多中国人接受了教育,但是并不一定有教养。在演讲中他谈到这样一则故事:他有个朋友从中国携带巨资到美国做生意,虽然刚开张需要客源,但是这个老板宁愿用专机从韩国和日本接送客人,也不愿做中国人的生意。原因何在?原来韩国和日本客人离开后,1名员工1个小时就能收拾完6个房间,而中国客人离开后,2名员工1个小时只能收拾3个房间,并且客房的牙刷、毛巾之类的用品也被“洗劫一空”。他痛心疾首:“有钱买不到庄重,金钱不代表文明。”在2011年4月1日举行的斯诺克中国赛上,英国选手墨菲曾抱怨:“中国观众的行为非常没有礼貌,这种情况七年里从未改善。”听到这样充满着道德优越感的话语,想必每个国人都会感到愤怒,可在愤怒之余,我们是不是应该进行反思呢?

国民素养缺失典型现象之一:随意插队。排队是一种文明现象,它体现的是一种公共秩序,一种对约定俗成的既定规则的遵守。然而在许多需要排队

收稿日期:2016-08-22

基金项目:2015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构建和谐社会视野下高校礼仪教育与提高国民素养之研究”(15B880021)

作者简介:程燕(1976—),女,河南原阳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礼仪、中国现当代文学。

的场合,很多人却并未自觉自律。2015年,《美国网民发帖炫耀殴打中国插队游客》的文章在网络曾被炒得沸沸扬扬(且不论作者的偏见、歧视)。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等很多海外媒体也曾专门做过“中国人为什么爱插队”这类主题的讨论,爱插队已成了贴在国人前额上的一个醒目的标签。

国民素养缺失典型现象之二:随手乱丢垃圾。近些年,媒体曾屡屡报道,每逢节假日之际,有许多游客前往三亚度假,当游人散去之际,海滩上总有被四处丢弃的垃圾,2014年9月8日中秋之夜,在清理大东海海滩、三亚湾及海坡海滩垃圾的相关部门人员达到1220人,共计清理45吨垃圾。这种现象在国内其他旅游城市或景区也屡见不鲜。其实,国人随意丢的不是垃圾,而是素养,是道德。

国民素养缺失典型现象之三:景区内的系列不文明行为——信手涂鸦、攀折花木、攀爬塑像、刻字留念等。近些年来,当越来越多的人们热衷于出境游时,“中国人”却成了不文明、粗鲁的代名词,在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法国、德国、日本、泰国、新加坡等地频现以简体中文标出的警示牌,如“请不要随地吐痰”“中国人,便后请冲水”“请保持安静”,一些中国公民的旅游陋习,严重损害了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形象,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和批评。文明出游本该成为最美的风景,如今却成为了煞人的风景。

国人素养的总体缺失现状,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之一,缺乏系统的礼仪学习,对传统礼仪文化缺乏认知。我国是富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与礼仪之邦,礼仪既可以“治国、平天下”,又可以“修身、齐家”。在古代,礼仪制度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行为规范,他们的行为处处以礼进行约束,正是这些礼,维护着中华民族的和谐延续。许多古礼富有深刻的含义与哲理,完全可以古为今用,可恰恰相反,这些礼仪文化并未引起国人的重视,一度处于被漠视的状态。

原因之二,家庭教育的缺位。家庭是孩子接触的最早的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教育与言行举止对孩子的成长有着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当前,不可否认的是,许多家长对孩子投入了比以往任何其他年代更多的精力、时间、财力,为了孩子,家长们可以辞掉工作全陪读,可以不惜代价购买学区房,可以牺牲自己的节假日时间陪孩子上各种辅导班……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只为了一个目标,那就是让孩子能够顺利考入名校,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可是在这样投入的过程中,家长们更多关注的是科学文化知识的提高,在意的是升学的竞争,却忽略了

对孩子基本道德教育与文明素质的养成。对孩子的关怀过度、期望过度,反而成了受教育者的生命不堪承受之重,抑制了受教育者的个性,毁坏了受教育者的创造热情,更破坏了公民意识成长必需的营养与环境。另外,有些家长本身素养欠缺,不注意自身的言行,家长的自身示范性就失去了应有的效力,从而影响到孩子的判断与礼仪素养的形成。

原因之三,外来文化、思想与社会负面效应的冲击与影响。当前,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强,受全球化和城市文明的影响,我国出现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传统的伦理、道德与价值观面临着新的冲击与挑战。这种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极易导致人们礼仪行为失范,曾经以传统文化价值为基础的国人开始变得摇摆不定。在价值取向多元化的今天,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如何取舍,成为国人应该冷静审视与不可回避的问题。

原因之四,现代教育体系的忽视。近些年来,侧重于应试教育的现代教育,关注度更多倾向于成绩的高低、高考的成功、文凭的获取,恰恰忽略了公民道德意识、公民基本规范、人格塑造等方面的加强;学校虽开设有相应的德育课程,但更多地在于灌输宏大的思想、价值与观念,忽略了具体的基本的文明行为的养成教育。学校教育尤其是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阶段,应在多方面渗透文明行为的养成,从一开始即为学生创造一个文明的氛围,以之熏陶他们,内化为意识,内化为习惯。

二、提高国民素养的背景下加强高校礼仪教育的现实意义

(一)当代大学生礼仪素养缺失现象面面观

当代大学生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礼仪素养缺失的状况。例如在公交车上挤占座位,不给老、弱、病、残、孕让座;在公共场所不尊重他人,大声喧哗;在教学区穿着不当,随手扔垃圾,随地吐痰,破坏公物等,这些行为与现象令人堪忧。

1. 漠视中华传统礼仪

《孟子·告子下》中有言:“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然而,在公交车、地铁上,一些大学生竟然坦然坐在老、弱、病、残、孕专座上,看见老人、孕妇、小朋友时,他们以无视代替让座,这样的行为有悖于我国传统尊老敬贤之礼仪。

2. 奢侈浪费,互相攀比

中华民族向来注重通过合适的形式,来表达内心丰富的情感。大学生聚会、过生日等在大学生活中已成为不可少的一项活动,学生会、社团中的学生经常会举行或参加各种聚会,过生日时邀

请同学、朋友一起去饭店或者 KTV 庆祝,在庆祝之时出现奢侈浪费、互相攀比的现象。当代大学生虽有兼职,但仍处于没有经济来源的群体中,庆祝时仍需仪尚适宜。

3. 自私自利,心胸狭隘

现如今有一部分大学生在与人交往中只关注自身利益,以利益交人。《论语》有言:“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当今大学生并没有很好地做到。

大学宿舍矛盾在大学生生活中是无法消解的一个存在,有些人一味付出,有些人一味接受,长此以往,矛盾也就由此而生。因为心胸不够宽广,彼此不够包容,于是矛盾便愈演愈烈。宽容是礼仪的重要原则,它可以化解人际交往之中的矛盾,倘若能够适时运用它,便能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

4. 仪表不端

《弟子规》要求:“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这些规范,对现代人是必要的,对于大学生更是必要的。然而在大学校园里经常会看见一些学生穿拖鞋上课,一些女生的夏装过于暴露、妆容过于浓厚等现象。这些着装与大学生的身份不相符。

以上种种情况表明,我国大学生的礼仪素养需要进行一定的课程教育和进一步的优化提升。

(二)提高国民素养的背景下加强高校礼仪教育的现实意义

1. 加强高校礼仪教育有利于大学生及国民个体自身的和谐

儒家主张“仁爱”,有利于人与人的和谐;道家追求“天人合一”,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禅宗推崇“即心即佛”,有利于人的内心和谐。作为社会人,和谐不仅仅只是个人内心的和谐,还包括外部的和谐即还应该包括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和谐,因为只有整个集体,整个社会和谐,方能促进个人达到理想的状态,体验到更高的价值感、幸福感。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曾说:没有个人的激情,共同体将是一潭死水;没有共同体的共鸣,个人激情将消退寂灭。因此,个体与共同体二者密不可分。礼乐文化在此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礼”的目标就是使“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可以让社会更加和谐与有序,礼仪对调节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有不可或缺的作用。高校礼仪教育在此方面更是担负着重要的功能。

2. 加强高校礼仪教育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进而影响周围人的思想道德水平

当代社会所需的新型人才中,除了要具备较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拥有良好的品德修养和基

本的礼仪教养更为重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修身”放在第一位,“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是行一切之事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君子是儒家中“道德”的代名词,大学生应行君子之事,以仁为己任,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而不是知书不识礼,知识技能水平和道德水平、基本礼仪涵养严重不协调,这样的大学生不可能成为符合当代社会需求的优秀人才。礼仪教养是一个人内在的良好修养的主要表现形式和基本要求,良好的道德品质需要通过彬彬有礼的方式来展现。开展高校礼仪教育,能够正确地指导大学生在实际生活中提高礼仪修养,用正确的礼仪规范约束自身行为,做到内外兼修,“诚于内而行于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具有较高道德修养的现代大学生。通过大学生行为的转变,去带动周围更多的人,以局部带动整体,以一盏灯而照亮身边的人,从而燃亮我们的整个社会。

3. 加强高校礼仪教育有利于促进校园及社会良好风尚的形成,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达到高度和谐与有序

高校礼仪教育的根本目标是教育、引导大学生提高内在修养,自觉遵循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和相应的礼仪形式,提高大学生的整体文明意识,养成文明行为的良好习惯,进而形成良好的校园风气,使整个大学校园达到高度和谐有序的局面。高校校园作为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文明程度的提高势必会促进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的发展进程。

4. 加强高校礼仪教育是继承我国优秀的礼仪文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

弘扬传统礼仪文化,是时代的需要,民族的需要。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礼仪文化是衡量一个国家、民族及个人道德水准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在我国传统优良道德的组成部分中,中国传统礼仪文化是重要的内容,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它自身蕴含丰富,其中不乏许多积极的、有价值的思想和文化,例如其中所提倡的与人为善、宽容豁达、助人为乐等等。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理论体系使得它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来源,并为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中国传统礼仪文化还有利于妥善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是和谐社会发展的催化剂。毫无疑问,中国传

统道德思想在当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倡导的以德治国,法德并重更是需要礼仪文化充分发挥其内在作用。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遭遇到了空前的批判,礼仪文化的传承被人为地阻隔。不可否认,传统礼仪文化中确有不好的一面,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传统礼仪文化,而走向全盘西化的道路,这样的话不但是极端的更是危险的。提高大学生的礼仪修养可以从中国传统礼仪文化中汲取精髓,结合时代形式注入新的内涵,从而赋予其新的含义。

改革开放带来了我国经济上的腾飞,但是我国的国民素质教育与此并不同步,国民大众在公众场合等领域的礼仪教养的缺乏,已使我国国民形象的分值大大降低。“无科技不足以强国,无文化则足以忘种”,文化发展的重要性有目共睹,科技能够推动国家与民族的发展,但文化则是这一发展的潜在推动力量,因为它不仅可以聚人心、鼓士气、化民风、净风气,同时可以树立民族形象,成为软实力发展中的助力。因此,在当代中国经济加快发展的进程中,加强传统礼仪文化的教育,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5. 加强高校礼仪教育是强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近年来,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也稳健前进。“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这是党中央提出的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九大目标和任务之一。足以可见党中央对建设和谐有序的社会的重视和决心,构建和谐社会成为了中国人的追求目标,这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目标。

《论语·学而》中的“礼之用,和为贵”指出了礼在造就和谐社会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荀子曰:“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2000年12月12日香港《大公报》刊登了《社会有礼祥和》一文,文中有这样表述:“富者有礼高雅,贫者有礼免辱,父子有礼慈孝,兄弟有礼和睦,夫妻有礼情长,朋友有礼义笃,社会有礼祥和。”所有这些足以证明礼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那么,礼从何来,如何运用呢?当然离不开礼仪文化的教育。礼仪文化从本质上看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其本身也是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推动了精神文明的发展。一个具有良好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和谐的社会,一定是一个具有良好礼仪修养的社会。礼仪修养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最基础的内容之一,讲文明、讲礼貌是一个国家中人们精神文明程度的具体体现。

中国传统礼仪文化历来讲究“礼”“乐”并重,“礼”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是万邦友爱、民族共存、文化交流的“护身符”,是中华文化得以绵延数千年的基石。礼乐文化不仅推动社会有序化发展,更有“谐万民”的作用,即促进社会的和谐化。

当代大学生是青年中的优秀群体,是我国未来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力量,言行得体,行为规范,知书达礼是他们应该必备的一种基本素养。加强大学生礼仪教育,提高大学生的礼仪素养,能够积极推进我国和谐社会目标的完成。因而,加强高校大学生礼仪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高校礼仪教育提高国民素养的路径分析

大学生礼仪素养不高、道德水准偏低已是一个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提升其礼仪修养势在必行。

(一)在高校广泛增设礼仪课程,提高礼仪课程的地位,对大学生进行系统、全面的礼仪素养教育

我国有着久远的礼仪教育历史。“礼”位于中国传统六艺之首,可见古人对礼仪极为重视。周朝时期形成了“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后来“三礼”等礼乐文化的经典被先后列入官学,成为古代文人必读之书。儒学通过礼仪教育对普通民众从小进行规范,从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开始培养他们的礼仪习惯。正确的文明礼仪习惯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得到规范和指导。

进行礼仪系统学习训练的有效途径之一即是课堂教学,目前许多学校的礼仪教育流于形式,或者处于散兵游勇的状态,缺乏系统的管理和规范,不够普及。首先,要改变有些学校将礼仪课当作公选课不加重视或根本不开设礼仪课的现象,礼仪课作为人文素质课程之一必须提高到必修课的位置。其次,应重视礼仪教育的内容,将其广泛纳入高校课程体系之中,根据学校性质、专业特点调整授课内容,从而对大学生进行系统、全面的礼仪素养教育。通过礼仪课的熏陶,规范大学生的言行举止,矫正其失范行为,培养大学生的优雅气质和风度,塑造其良好形象。就穿衣打扮而言,古人讲究冠正仪整,容颜庄肃,交谈方面讲究“四有四避”,即:有分寸、有礼节、有教养、有学识;避隐私、避浅薄、避粗鄙、避忌讳,这些都可以通过开设礼仪课程给学生以系统的教授。教师还可以充分挖掘传统礼仪文化中的精华,如“曾子避席”“程门立雪”“千里送鹅毛”等礼仪典故对大学生进行礼仪教育。在寓教于乐的同时,让学生了解传统礼仪文化、传承并弘扬中华礼仪文明。

把礼仪教育与思想道德修养有机结合起来,不仅可以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内涵,又可以教会他

们规范自身行为、塑造良好的仪表形象,还可以让学生明白为人处世之道,提取自身蕴藏的积极因素,直面自身的弱点,时刻保持良好的心境,灵活应对不同的社会环境。因此,学校应高度重视对学生礼仪文化的教育,普及礼仪知识,使礼仪教育走进课堂。礼仪教育作为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抓手和有效手段,应与思想道德修养及职业道德教育有机结合,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内强素质,外塑形象”。高校所有专业均可开设高校礼仪这门课程,结合本校大学生特点,以普及礼仪知识为主要目标,对他们进行系统的礼仪教育。不同专业、不同类型的礼仪课程也可以相互补充,使大学生汲取比较全面的礼仪知识,更进一步地完善礼仪知识体系,在学习生活和未来的工作中展现出较高的礼仪素养。

(二)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礼仪活动,营造良好的校园文明环境

环境影响人,也可以造就人,人的品格与习惯的形成与其密切相关。一个良好的校园环境有助于学生文明习惯的养成。高校礼仪教育,离不开多样化的礼仪活动,通过和谐、健康的礼仪活动,达到“以文化人”的目的。第一,常态化聘请校内外专家学者,开设多种形式的礼仪讲座,加强礼仪教育的指导。第二,举办礼仪大赛、辩论、演讲等礼仪主题活动,组织同学们积极参与,使其亲身体验礼仪的魅力。第三,通过校园媒体如校报、广播、宣传栏等介绍礼仪知识,礼仪典故。第四,借助网络传播的力量,创设网络教学礼仪模式。校园网可开设专门的礼仪栏目,教师与学生可利用网络通过互动传授与学习礼仪,不断拓宽校园礼仪文化建设的渠道和空间,使之成为礼仪建设的新阵地。第五,成立校园礼仪队,让学生积极参与校内外各种活动的礼仪服务工作,不断积累经验,同时展示礼仪的魅力和风范。第六,开展文明礼仪宣传活动:比如请大家在条幅上写下一句有关礼仪的句子或签名,以此让大家感知礼仪的重要性;在教学楼、办公楼、图书馆等公共场所摆放立身镜,张贴或悬挂提示标语,提醒师生随时规范言行举止。第七,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引导大学生规范自身行为。礼仪、法律、道德并称为人类社会的三大保护神,但礼仪没有法治的强制性,它需要借助人们的“自律”完成,同时需要通过“他律”逐步获得,靠社会舆论来监督。法律可以有效地实现社会秩序,能规约一个冷静的外部世界;而礼是达致社会和谐和的瑰宝,它可以营建融洽的人际关系,搭建起有效的沟通桥梁,实现社会与国家的共和谐。所以,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引导大学生规范自身行为,可

以督促其克服不良的行为习惯,逐步提高其自我约束和自我克制的能力。

通过长期的扎扎实实的礼仪文化教育和实践,必定可以促进师生整体素质的提高,必将推动和谐校园及和谐社会的建构。

(三)强化礼仪教师师资培训,打造一支过硬的礼仪师资队伍

礼仪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学生学习的表率与楷模,然而目前大多数礼仪教师并非科班出身,一般是从其他专业转行过来,他们没有系统学习过礼仪知识,在授课时往往力不从心,或者授课效果较差。因此,要加强师资培训,打造一支能够适应现代礼仪教学和研究的师资队伍。

(四)提高高校礼仪教师的文明素养,发挥榜样示范作用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作为一名高校礼仪教师,更有必要以典范的形象影响学生,做好学生的表率。冰心曾说过:“教师的现在,就是学生的将来。”教育家马卡连柯认为:教育者对被教育者的作用首先是教师品格的熏陶、行为的教育,然后才是专门知识和技能的训练。教师的品质和行为不仅代表自己,还可以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手段,礼仪教师的行为更可以成为学生最直接的榜样,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处世态度和人生观,无形中成为学生仿效的楷模。因此,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在课堂下,礼仪教师都应注重衣着打扮、言谈举止等,在举手投足间彰显较高的礼仪修养,自觉充当学生的礼仪楷模。“教育者必先强己,育人者必先律己”,作为一名传播礼仪文化的教师,要时刻谨记用礼仪准则规范言行举止,做学生学习的楷模与榜样,以有声的言传和无声的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从而带动整个教师群体的文明水准,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

(五)进一步深化高校礼仪教育,将礼仪教育融入社会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公民礼仪行为习惯的养成

高校礼仪可以塑造大学生的良好形象,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大学生的礼仪传播,感染周边的人。社会教育是高校礼仪教育的进一步深化,可以通过政府、传媒、单位以及社区的引导推进礼仪教育在全社会的开展,落实相关文明礼仪主题活动,以实践促成公民礼仪行为习惯的养成,在实践中学习提高礼仪修养。如可以开展文明礼仪志愿者活动,通过志愿者引导大众的行为;可以开展“万名市民行礼仪”“礼仪你我他,文明我先行”等主题活动,使公民在

学习、工作、生活以及各种社会活动中时刻规范自己的言行,使文明礼仪之风盛行整个社会。

(六)政府、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自觉承担起礼仪文化教育责任,全方位深入推进礼仪文化发展

在礼仪的传播普及过程中,政府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各级政府应重视对国民的文明礼仪素质的培养,自身更要以身作则,可制定相关政策,采取相关措施为礼仪教育提供正确的导向,把礼仪教育列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多加关注;党政机关公务员的素质修养,是礼仪文化的风向标,因此要加强党政机关公务员的礼仪修养,发扬公务员的表率作用。在公务员中推广相关礼仪规范准则,把加强公务员文明礼仪修养、强化公职人员职业道德作为公职人员管理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用相应的检查监督机制约束公务员的言行举止,从而促进公职人员良好习惯和文明礼仪的养成;政府要充分调动媒体的力量,利用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刊发或播出有关礼仪教育的公益广告及节目,加强礼仪宣传,广造舆论;企事业单位要加强礼仪文化建设,提升内部员工的礼仪素养,将礼仪文化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营造良好的内部环境,从而改善公众对企事业单位员工的认知和评价;社区是进行礼仪教育的基本单位,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领导要重视把本单位的礼仪文化教育与社区文化建设结合起来,以社区文化为依托,开展各式各样的礼仪文化活动,组织部门职工或居民学习礼仪文化,以及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和评比活动,通过对礼仪文化的学习,使邻里之间的关系更为融洽,营造一种互助、友爱、和谐的人际关系,形成新的社会风尚,将礼仪素质教育落到实处,引导居民告别陋习,做讲文明、有礼貌的文明礼仪公民。

总之,开展高校礼仪教育,以中华传统礼仪文化去感染、造就大学生,提升大学生礼仪修养,传承中国传统礼仪文化,提升国民素养和形象,可以实现“以文化人”的目的;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会反过来促进礼仪文化的进一步传承,如此则实现了“以人化文”之功效。

参考文献:

[1] 张帆,陈兵,高波. 传承古今礼仪文化以提高大学生文明修养[J]. 中国建设教育,2011,5(9-10).

[2] 梁军,田丽萍. 大学礼仪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刍议[J]. 河北企业,2006(12).

[3] 刘显著,王丽华. 传统礼仪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J]. 网络财富,2008(13).

[4] 周悦娜. 从当代大学生礼仪文化现状探索高校礼仪教育的途径[J].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8(2).

[5] 夏蕾. 秉承中国传统文化,提升大学生礼仪素养[J]. 科技文汇,2007(8).

[6] 彭秀兰. 多元文化视阈下的大学生礼仪教育[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12(7).

[7] 杨桦. 基于传统礼仪文化的当代大学生礼仪教育意蕴[J]. 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8] 张吉. 基于学生礼仪文化现状探讨高职礼仪教育[J]. 德育在线,2012(4).

[9] 陈晔. 论传统礼仪文化与大学生礼仪修养[J]. 德育,2011(3).

[10] 易银珍. 论礼仪文化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J]. 湖南社会科学,2010(4).

[11] 荆秀芳. 试论加强传统礼仪文化教育的重要性[J]. 中国成人教育,2008(8).

[12] 穆廷云. 吸取传统礼仪文化精华以加强大学生礼仪教育[J]. 教育与职业,2008(33).

(责任编辑 刘成贺)

Study on the Path of Etiquette Education in Higher Institutes to Improve National Litera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armony

CHENG Yan

(College of Culture and Transmission,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and the thinking of the phenomenon of lack of etiquette attainments of the contemporary students, the article points out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etiquette education in higher institutes, which is conducive to improve th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moral level, realiz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armony, form the good atmosphere of the campus and community, and thus improve our national literacy. The etiquette educa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through adding etiquette course, conducting campus etiquette activities, strengthening teacher training and so 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national literacy with the help of etiquett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national literacy; higher institutes; etiquette education; path

高职院校项目化教学改革探索和实践

——以《三维设计 Pro/E》课程为例

华学兵, 魏振枢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系, 浙江 温州 325003)

摘要:介绍了项目化教学的概念和特点,以《三维设计 Pro/E》课程为例,从培养目标、教学设计和课程考核等三个方面进行项目化教学,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并总结了高职院校实行项目化教学的利与弊。

关键词:高职院校;项目化教学;三维设计;创新能力;团队合作能力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6.05.026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6)05-0121-04

近些年,国外很多著名的教学方法已经在渐渐影响我们的教学理念,比如德国的双元制教学、英国的模块化教学、澳大利亚的证书制以及国际上非常流行的 CDIO 教学模式^[1]。随着社会高速发展的需要,我国高职院校也在不断地进行教学改革,其中项目化教学就是现阶段比较受关注并流行的一种教学理念。项目化教学是一种比较有特色的教学方式,可以弥补传统教学方法的一些缺陷,培养学生自主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进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一、项目化教学的概念和特点

(一)项目化教学的概念

项目化教学,就是师生为了完成一个或者若干个相对比较完整的项目而进行的教学活动。与把知识传授作为第一目标的传统教学方式不同,项目化教学把解决问题的能力放在第一位^[2-3]。项目化教学首先要求教师非常了解课程整体结构,然后根据实际情况把课程内容划分为若干个模块,这些模块以项目的形式转化为操作单元,教师引导学生对项目进行需求分析,通过若干个小项目或者综合大项目的实际设计,将专业的基础课程与实践操作有机结合,从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充分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二)项目化教学的特点

与以理论授课为主的传统教学方式相比,项目化教学有着比较明显的特征。

1. 实践性。项目的选择与社会需求联系紧密,学生的学习具有实用性和针对性。

2. 自主性。在项目化教学过程中,学生利用多数时间进行自由讨论、自主学习,从而有效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团队精神。

3. 发展性。阶段性小项目与综合性大项目相结合,由浅入深掌握知识点,逐步培养学生综合能力。

4. 评价多样性。项目化教学的测评注重学生能力发展的过程,测评内容包括学生阶段性项目与综合性项目的完成质量以及教学过程中学生各环节的表现,评价具有选择性和多样性^[4]。

二、项目化教学实施流程

项目化教学一定要强调学生的主导地位,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主动学习。整个课程的设计要体现理论实践一体化,课堂内容的安排也以突出学生能力为目标,一般以项目为载体采用分组合作的形式训练学生的综合能力。以《三维设计 Pro/E》课程为例,首先确定各项教学目标。

1. 知识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掌握 Pro/E 三维设计软件的基本操作指令。

收稿日期:2016-08-17

作者简介:华学兵(1980—),男,湖北咸宁人,硕士,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机电 CAD/CAM。

2. 能力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拥有利用 Pro/E 三维设计软件进行中等难度的产品设计能力。

3. 素质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确定教学目标后,根据学生情况和教学课时的安排,把课程内容由浅入深分成四个模块。每个模块分配若干个小项目,在教师的指导下让学生进行设计。

第一模块:二维图/三维图相互转换

本课程主要面对大二学生开设,学生前期已经学过《工程图学和 CAD》课程,对二维图的画法已经比较熟悉。教师在讲授基本的知识点后,马上提供几个企业实际生产的小产品二维图,让学生训练,画出结构和尺寸相吻合的三维图,渐渐进入三维设计的世界。

第二模块:实体零件设计

学生掌握了拉伸、旋转、剪切、镜像、阵列等基本的三维设计指令后,就可以设计简单常用的机械零部件如螺钉、螺栓、螺母、轴承等,它们的结构和尺寸均已标准化,学生设计难度不会很大。熟悉之后可以进一步拓展,让学生自行设计相关零件,这时只需提出零件的基本要求,尺寸和具体结构可由学生自己构思,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创新精神。

第三模块:曲面零件设计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体零件训练,学生已经掌握了 Pro/E 三维设计软件的多数基本操作指令,这时可加大难度,布置项目,引导学生制作相对复杂的型面,因为多数复杂的型面必须先用曲面制作,曲面造型富于变化,灵活自由,这些实体不容易做到。曲面也可以先从简单的开始制作,循序渐进。本课程设置的曲面零件设计第一个项目是电风扇,因为电风扇里面的扇叶必须用曲面制作,同时制作又比较简单,学生容易理解和实际操作。

第四模块:零件装配

通过前面三个模块的学习,学生已经掌握了 Pro/E 三维设计软件的大多数基本操作指令,而且主动到图书馆或者网上查阅资料,自学了一些有一定难度的操作指令。这时可以告诉学生:实际生活中,任何一个实用的产品都是由若干个零件组装而成的。我们需要把之前制作的没有经过组装的产品比如机器人、电风扇等等,重新设计成多个零件,然后把各个零件装配起来,使其真正成为符合企业需

求的产品。

学完所有的四个模块后,教学知识点基本传授完毕,可以布置一个综合性设计项目,代替传统期末考试。要求运用到本课程教授过的大部分操作指令,同时具备两个以上(含两个)的创新点即可。具体内容不限,尺寸、结构不限(符合生活实际)。学生自己交流讨论,教师适当引导确定题目,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若干学生为一组,设计同一类产品,但每个学生之间的具体产品必须有明显区别。

项目化教学的过程中,无论是学习各个模块期间布置的小项目,还是期末的综合性项目,基本上都具有相同的流程(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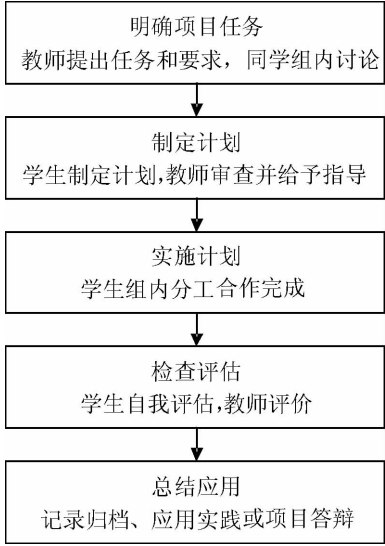


图 1 项目化教学流程示意图

在动手实践比较多的课程中,项目化教学可以实行分组,以组为单位进行教学。分组以后可以选择理解能力和动手能力比较强的学生担任组长工作,在学生实践环节中充当“教师助理”,主动帮助基础相对较弱的同学。这样基础好的学生可以进一步加深知识点的理解,基础相对较弱的学生也能跟上授课节奏,既减轻了教师压力,又可以培养学生团队合作能力。与此同时,对于理解能力和动手能力较差的同学,教师也能够抽出时间加强个人专项辅导。

三、项目化教学课程考核体系

项目化教学的课程综合考核一直都非常困难。有的项目化教学课程基于平时的项目训练过程进行考核,不再进行期末考试;有的课程进行多人分组考核,不易检验组员之间的差异性;有的课程考核面面俱到,使考核过于细致复杂,出现操作性不强、数据量过大等问题。

整体而言,项目化教学课程更注重形成性考核,而形成性考核的主观性比较强,考核结果的公正性、客观性值得探讨,所以项目化教学至今为止还未形成科学合理、操作性强的课程考核体系。

建立科学有效的项目化教学课程考核体系,是进行项目化教学的前提条件。首先,考核体系应尽量分解和量化课程的理论知识点和实践操作技能,形成一定的标准和规范,使考核具有可操作性。其次,采取多元化的评价体系,由教师、学生、甚至企业相关技术人员共同组成评价小组。以《三维设计Pro/E》课程为例,无论是平时各模块的小项目训练,还是期末综合大项目答辩,教师在布置任务之际就将评价标准同时告知学生,让学生在项目训练和平时学习中做到有规可依,教师按照评价标准考核学生平时表现。期末答辩采用教师与学生共同打分的形式,学生评分占总评的一定比例。另外,还可以邀请企业相关专家参与评价。近期我们还引入了社会考证评价,通过参加教育部培训中心组织的三维设计工程师考试,来检验学生学习的成果。

四、项目化教学的利与弊

(一)项目化教学的优势

1. 项目化教学符合高职教育人才培养任务的要求。现有高职教育的基础课程多为学科体系,它是按照人接受知识的逻辑顺序来设置相关课程,而学科知识结构与学术教育相关联。高职教育以培养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为根本任务,因此我们应该将学科主导的局面打破,构建以“应用”为主的教学体系。项目化教学的基础结构是完成一个项目的工作体系,实践教学在教学计划中占有较大比重,也就是围绕着专业的岗位工作体系进行教育,将需要的学科知识融入到工作过程中,这就体现出项目化教学符合高职教育的培养任务。

2. 高职教育关注的是学生工作与实践能力,强调知识储备与实践经验相融合的理念。学生要想具备出色的工作能力,首先必须储备有相关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能够将这些专业知识应用到自己的工作岗位。而项目化教学的核心任务就是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相结合,在相似的工作情境中去解决实际碰到的问题,从而培养和提升高职学生的工作与实践能力^[5]。

3. 项目化教学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高职院校的学生在高中阶段的学习基础不够扎实,自律能力不强,进入高职院校后比较活泼,但学习的自觉性不强。教育学家认为:越是调皮的学生越不拘于

规矩,越是敢于创新,勇于提出、实践自己的想法^[5]。传统教学中,教师以理论教学为主,实行“填鸭式”灌输教学方法,可能会打击高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项目化教学一般是以项目为案例进行分组教学,正好满足了学生的好奇心;传统教学中,理论知识一般是一些定理推论,而项目化教学是在实际的工作环境中完成事先拟定的具有一定价值的目标,并且以学生为主,教师随时可以对学生进行指导,让学生由被动的学习者变成了实践活动的主动参与者,从而激发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6]。

(二)项目化教学存在的问题

目前,虽然很多高职院校在进行着不同侧重点的教学改革,并且将项目化教学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学改革方式,但由于客观条件所限、工作方式的差异以及项目化教学本身存在的某些不足,导致各高职院校在推广项目化教学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问题。

1. 一些高职院校错误地认为项目化教学基本等同于案例教学。虽然教师不再以理论教学为主,而是穿插一些实际项目案例到理论教学中,但由于专业特点和各种软硬件条件的限制以及自身教学水平的不足,某些教师在项目的选择中会出现一些共性的问题,比如有的综合性项目与课程内容的契合度不够,学生无法通过完成项目而掌握课程相关知识;有的多个子项目之间缺乏提高学生知识能力和动手能力的关联度。表面上看,学生在课程学习的过程中完成了多个子项目训练,然而一旦要求学生根据前期学习的知识和训练,完成一个相对具有综合性的项目,学生往往会束手无策。

2. 项目化教学改变了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弱化了理论知识的讲授,突出了学生自主学习和研究的能力。这种以项目为基础的教学方式,教学过程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在传授基本知识点的基础上,只对教学目标和运作程序做简要解释,更深层次的理论知识需要靠学生本人在实践的过程中自学。这就要求具有非常强的学习主动性和逻辑分析能力,而这恰恰正是高职学生的短板。因此,如果教师没有比较强的引导能力,某些课程实行项目化教学就可能浮于表面或者流于形式,学生从中只能学到操作层面的某些碎片化的知识,不易形成系统化的理论知识。

五、结语

随着社会飞速发展和科技日新月异的进步,

高职教育已经成为一种大众教育。当前高职院校的核心任务就是课程教学改革,项目化教学是促进课程教学改革的有效途径之一。项目化教学在有着明显优点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但整体而言,项目化教学利远大于弊。项目化教学的重点应该放在学生实践技能的训练和培养上,注重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就业能力。当然在着眼于实践技能训练、培养的同时,不能忽视“高等职业教育”中的“高等”,不能忽视理论知识的传授。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如果学生理论知识严重不足,只具备普通的操作技能,很难实现自我升值。因此,在项目化教学中应该掌握好训练技能和理论知识的尺度,培养学生对理论知识的自主学习能力,使学生在掌握技能的同时,构建一个条理清晰、逻辑性强的理论知识系统。

参考文献:

[1] 陈星毅,张伟杰. 基于现代学徒制的 CDIO 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1):35-39.

[2] 赵强,李超娜,李俊霞,等. 关于项目化教学的几点思考[J]. 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学术研究,2013,8(1):55-56.

[3] 冯春. 高职教育项目化教学的设计与实践[J]. 产业与科技论坛,2016,15(10):151-152.

[4] 刘宇. 从国外职业教育看我国项目化教学可行性[J]. 黑龙江交通科技,2013(11):53-58.

[5] 胡春芳. 关于高职项目化教学改革的探析[J]. 职教论坛,2012(5):32-33.

[6] 顾准. 对高职项目化教学改革的思考和建议[J]. 中国成人教育,2012(21):164-165.

(责任编辑 刘成贺)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Project – oriented Teaching Reform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aking Three Dimensional Design Pro/E Course for an Example

HUA Xue – bing, WEI Zhen – shu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Engineering, Zhejiang Industry & 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Wenzhou Zhejiang 325003, 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roject – oriented teaching are introduced, and then taking Three Dimensional Design Pro/E Course for an example, the project teaching is carried out from the training target, teaching design and curriculum evalu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students’ abilities of understanding, innovation and teamwork. In the en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project – oriented teaching in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summarized.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project – oriented teaching; three dimensional design; innovation ability; teamwork skill

符号互动理论视阈下的高校易班网络工作研究

曲升刚¹, 严懿¹, 王莹姝²

(1. 广西财经学院 文化传播学院, 南宁 530003; 2.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监察审计室, 郑州 450044)

摘要:本文尝试运用符号互动理论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物质、社会与抽象的三个客体,符号与情感能量的二种因素,“互动仪式链”的一条主线为总体思路,采用提升互动空间、资讯更新及时、完善教育教学功能、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与优化系统软件等措施,通过调查研究资料与案例分析以掌握高校大学生的易班网络使用情况与思想动态,旨在利用易班网络互动平台,提出加强和改进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性建议和措施。

关键词:易班;网络;符号互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6.05.027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6)05-0125-04

美国社会学家赫伯特·布鲁默早在1937年提出了“符号互动”的概念,他认为对社会现象的解释都只能从社会的基本单元——互动中寻找,并且人们通过对符号的定义与理解进行互动。符号指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它是社会个体相互作用的中介。符号互动是能动与可变的过程,它创造、维持与变革社会中的一切事物。^[1-2]

结合布鲁默的符号互动理论传统,美国学者兰德尔·柯林斯提出了“互动仪式链”理论。他认为互动仪式是人们最基本的活动结构,在整个互动仪式中涉及到符号与情感能量两个要素,人们之所以参加某项活动,是为了在这个活动仪式中追求情感能量的最大化。互动仪式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人与人之间面对面交流的方式,比如在大学校园里的教室、食堂、图书阅览室、操场等地方开展的读书会、师生谈话、各种文体体育活动等等。高校易班就是一种网络互动仪式,大学生们运用符号在易班平台进行一种有效性的网络互动,从而达到某种情感归属。易班是以高校师生为主要使用对象的网络虚拟社

区,融合了论坛、社交软件、微博、邮箱、网盘、手机应用等功能,它将娱乐游戏、学习资源共享、教学互动以及教育管理有机结合起来,是一个能调高学生关注度与激情的地方,更是高校教育工作者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想阵地。^[3]

利用易班网络互动平台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尤其是大学生在易班网络平台的符号互动过程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如何有机渗透是当前我国诸多高校学生工作的热议话题。本文结合调查资料进行易班网络符号互动方面的探究。

一、易班网络平台的符号互动

(一)权力互动——学校的大力推广和支撑方案

结合广西某本科大学大一、大二学生对易班网络平台使用状况的调查资料进行易班网络符号互动方面的探究。调研共发放调查问卷1000份,其中有效问卷的回收率为94.8%。通过采用IBM SPSS Statistics 21软件对回收的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分析。调查结果显示,大一和大二学生中有近87%的人已经注册为易班用户,表1中的系统缺失值即样本中

收稿日期:2016-08-06

基金项目: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易班中的符号互动与舆论导向研究”(2015LSZ007);广西财经学院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易班黏度与工作模式研究”(2015SZA11)

作者简介:曲升刚(1982—),男,江西吉安人,硕士,广西财经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党委副书记,讲师,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没有注册易班的学生人数占比为 13%。在已经注册易班的学生中,高达 68.6% 的学生是因为要参加学校活动而登录系统的。因此,学校能够指挥学生行动凭借的是一种权力的力量,学生登录易班网络互动平台,可以说是在参与由命令至服从的权力履行仪式。反之,如果没有学校的强力支撑措施,易班互动可能就没有那么频繁。

表 1 易班使用情况调查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参加学校活动	566	59.7	68.6	68.6
上来随便看一下	96	10.1	11.6	80.2
领取奖品	14	1.5	1.7	81.9
看娱乐新闻、玩游戏	19	2.0	2.3	84.2
获取有用知识与信息	72	7.6	8.7	93.0
多项因素使然或其它	58	6.1	7.0	100.0
系统缺失	123	13.0		
合计		948	100.0	

(二) 人际互动——增进友谊,扩大社交范围

由图 1 可以看出,学生们对易班网络平台的关注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增进友谊,扩大人际关系占 26.9%;时事新闻更新及时占 26.7%;提升专业知识或个人能力占 24.4%;易于登录,界面风格简便占 11.2%;展示自我,获得满足感占 6.5%;应用及附带游戏种类丰富占 4.3%。图 1 显示,以上特点因素随着占比越大,在网络上的波及面就越广。这也正好解释了调查结果中所得出的另一项数据,现今在所调查院校的大一和大二学生群体中最频繁使用的网络互动媒介是 QQ(占比为 45.4%)和微信(占比为 30.2%),因为这两种媒介工具都特别注重社交的应用。在易班网络平台,如果能更加彰显前三项特点因素,将会大大提高易班用户的互动频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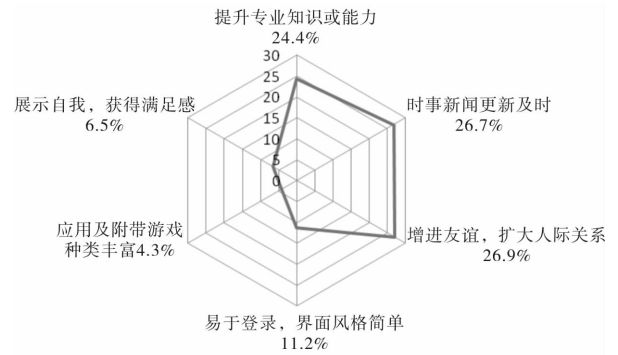


图 1 学生对易班的关注度调查情况

(三) 资源互动——获取有用信息,提升专业知识或个人能力

社会个体成员对资源的不竭获取能力是促使社会进步源源不断的动力,易班平台通过易学院、新课堂、大讲堂、资格认证等板块,传达有利于提升用户

专业技能与知识能力的信息和资源。高校易班网络平台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的前提是其具备资源或信息共享的功能。27.5% 的学生认为通过使用易班网络平台查询信息、下载学习资料,从而学到了很多东西,是自身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此外,学生们也颇为重视易班网页时事新闻的更新速度问题,例如寒假结束同学们已经开学了,但是易班主页的各大版块却还是寒假、春节或元宵节的内容,这难免有碍观瞻。在图 2 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有 19.8% 的学生希望易班网络平台在教学功能上能有所改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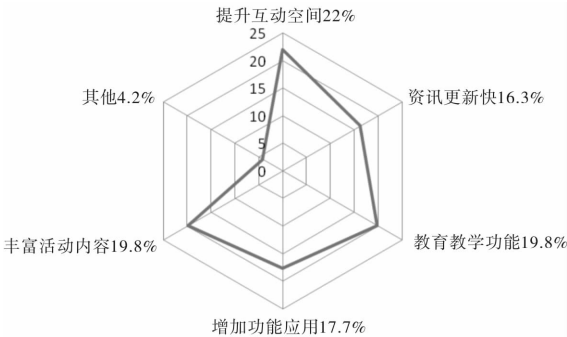


图 2 学生对改进易班设置功能的建议情况

(四) 价值互动——领取活动奖品,自我实现

高校推广易班的方案之一就是举行校园活动与易班墙抽奖联系在一起,每当活动主持人宣布抽奖的时候,在场的全部师生都会兴致勃勃地打开手机里的易班软件,等待被抽中领取奖品的可能。参考表 1 中的数据,我们还可以看到存在着纯粹为了领取奖品而登录易班的现象。另外,易班网站还设有免费的课程学习、领取消费券等。然而,符号互动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布鲁默认为价值应该囿于抽象客体的范畴,即与物质客体如电脑、手机、教室等;社会客体如父母、教师、朋友等有所区分,价值应该可以通过互动进行重新定义。在易班网络中,大学生们基于价值的互动不仅有物质层面的,更是有精神层面的,如文明素养的蕴育、自身价值观的塑造以及对社会主义理想的熏陶等。

(五) 情感互动——展示自我,获得满足感

图 1 数据显示,6.5% 的学生注重在易班能够展示自我与获得满足感的特点;4.3% 的学生关注易班的应用及附带游戏种类丰富的特点,这些都是情感归属类的选项。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从低到高分别为生理上的需要,安全上的需要,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与自我实现的需要。发生在易班网络平台的情感互动行

为,既是用户的需求所在,也可以理解为柯林斯“互动仪式理论”中的另一关键因素——情感能量。情感能量相当于一种动力,具有特殊的社会取向。它是一个连续系统,从高端的自信、热情、自我感觉良好,到中间平淡的常态,再到末端的消沉、缺乏主动性与消极的自我感觉。在高校易班网络互动仪式中,大学生们通过各种符号进行互动的最终目的是追求情感能量的最大化。^[4-7]

易班网络平台的符号互动过程显然是多种多样的,并不限于以上五种。以上互动过程并不是相斥与相包容的关系,而是相互交叉与渗透。当今社会处于一个新媒体的环境,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最大化地使用易班网络。

二、易班网络符号互动理论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一)重视物质、社会与抽象的三个客体

符号互动理论涉及到研究社会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前面已经简单提到了三种客体的区分,主体表现在高校易班中就是大学生自身。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当重视易班网络符号互动的物质客体、社会客体与抽象客体三个方面。

1. 建设物质客体

建设物质客体,即建设物质基础条件。易班运行的物质载体如硬件设施建设、校园氛围、学生们使用易班软件的经济支撑能力等都需要高校教育工作者的大力促进。

2. 联系社会客体

联系社会客体,即联系社会关系成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局不仅仅是高校教师的工作内容,也牵涉到家庭的未来与社会的走向,需要学生家长与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关注。

3. 培育抽象客体

培育抽象客体,即培育思想意识层面。高校教师在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应当精心设计和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吸引力强的思想政治、文体体育、学术科技等校园文化活动,并把这些德、智、体、美教育同步运用到易班网络平台,使大学生们在网络互动的过程中提升道德境界。

(二)强调符号与情感能量的二种因素

互动仪式包含符号与情感能量两个主要因素。柯林斯认为,社会个体成员进行符号互动的最终目标是追求情感能量的最大化。教育工作者在易班网络互动平台推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注意抓住符号互动与情感能量两个关键因素,进行有效

的舆论导向。

1. 突显符号互动

合理布局易班主页的版块内容,根据大学生们重点关注的内容,提升互动空间、改进教育教学功能与快速更新时事新闻等;充分利用权力、人际、资源、价值与情感等方面的符号开展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2. 开启情感驱动

易班网络平台工作人员要懂得抓住大学生们的思想软肋,让易班成为他们的心灵港湾与情感归属地,使易班成为大学生展示自我特点与实现自身价值的平台,同时应增加功能运用与开发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游戏种类。

(三)贯穿“互动仪式链”的一条主线

参考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可以把易班假设为一种网络互动仪式,易班互动过程包括符号与情感能量两个要素。如图3所示,认可符号1与具有相同情感能量1的学生A与学生B进行易班网络互动仪式,从而变成持有符号2与情感能量2。变化之后的学生A再与持有符号2与情感能量2的学生C进行易班网络互动仪式,从而变成符号X与情感能量X,学生B也亦然。这是一个无限扩大的网络互动仪式,但都以互动仪式为一条主线。^[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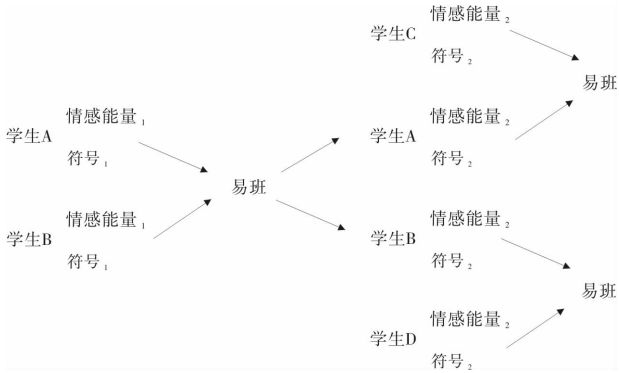


图3 高校易班网络互动仪式链

上述分析启示我们应当时刻注意易班中的网络舆情管理机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贯穿至易班的每个方面。一旦出现不良状况,要及时纠正或制止,防止不当言论或情绪在大学生群体中无休止地扩散。另一方面,高校教育工作者也应当融入学生群体,在易班网络互动中充当思想领袖。因为拥有较大互动空间、有用的资源与信息、热门话题与活动、奇闻异事、娱乐游戏等特点就可以增强大学生们对易班的关注程度,从而映射集体的思想状况。基于

易班网络互动平台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以寻找这种互动仪式中的大学生个体、班级、教育工作者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符号互动过程,从而进行情感导向。

三、结语

利用易班网络互动平台,可以实现权力互动、人际互动、资源互动、价值互动和情感互动,不但可以掌握大学生的思想动态,而且可以使大学生增进友谊、扩大社交范围,获取有用信息、提升专业知识或个人能力。同时,利用易班网络互动平台,可以实现大学生在易班网络中的符号互动过程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机结合,是高校教育工作者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想阵地,是高校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途径之一。

分析[J]. 经济师,2014(8),51-52.

[2] 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新修 [M]. 3 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 朱莹.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探微: 以“易班”为中心的考察 [J]. 科教导刊(中旬刊),2014(5):65-66.

[4] 朱颖,丁洁. 互动仪式链视角下政务微信与用户的互动研究[J]. 新闻大学,2016(4):75-86.

[5] 刘静轲. 互动仪式链理论对失独家庭社会嵌入研究的启示[J]. 鸭绿江,2015(5):1746.

[6] 王鹏. 情感社会学的社会分层模式[J]. 山东社会科学,2013(3):55-59.

[7] 侯钧生. 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M]. 2 版.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8] [美] 兰德尔·柯林斯. 互动仪式链[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9.

(责任编辑 姚虹)

参考文献:

[1] 张传辉,韩炜. 高等农林院校开展雷锋精神教育有效性

Research on College Yiban Net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

QU Sheng – gang¹, YAN Yi¹, WANG Ying – shu²

- (1. College of Culture and Transmission, Gu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ning 530003, China;
2. Discipline Inspection Office,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tends to carry out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by using 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 The general idea of this theory is the “interactive ritual chain”. It improves the education work through three objects and two factors. The three objects include material, society and abstract, and the two factors are symbol and emotional energy. It also employs a range of measures to achieve the goal. The measures include adopting the interactive space, updating information, improving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function, meeting the needs of self – actualization and optimizing the system software. The situation of using Yiban and students’ ideological trends is known by the means of investigation and case analysis.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effective suggestions and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Yiban; network; symbolic interaction;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